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大衛·哈維

王志明、徐若玲 譯

DAVID HARVEY 寰宇主義
自由地理

我熱切希望自己著作中的灼亮餘燼，能獲得年輕一代利用，在批判地理學中燃起一場火，不停延燒



重返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的知識教育；探索實現真正寰宇主義的困境與可能性！

自主 (liberty) 與自由 (freedom) 經常被召喚來正當化政治行動。世界霸權總是將政策奠基於這些尊貴概念的某種版本。但實際上，理想主義的議程經常在面臨特殊具體環境時就變了調。各地美軍監獄的虐囚事件、伊拉克佔領造成的劇烈傷害，一再顯示出對於自主和自由的追尋，會導致暴力與壓迫，破壞世人對於寰宇主義的信賴。

哈維試圖描繪出一種新的寰宇主義秩序，該秩序更適合解放且自主的全球治理形式。他主張，過往政治議程失敗的根源是忽略地理與文化的複雜性。因此，將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知識納入社會與政治政策形構，是真民主的必要條件。

哈維首先針對自由和自主的政治運用，尤其是布希政權時期的作法，提出饒富洞見的批判。接著，透過對於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如空間、地方及環境）的存有論探究，徹底將地理學重新架構為社會理論和政治行動的基礎。此外，他剖析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世界是平的》等暢銷書所隱含的知識預設及盲點。

一如哈維的所有著作，《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組織清晰，寫作風格自信而熱切，書中跨領域的廣泛論證既富原創又深具挑戰，各種主張值得重視。本書的論點和意蘊肯定會激起諸多討論。

ISBN 978-986-6525-79-7, SCS16, NT\$500

寰宇主義 與地理 自由地理

DAVID HARVEY

大衛·哈維
王志弘、徐苔玲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by David Harvey

Copyright © 200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Complex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 /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 ;
王志弘、徐苔玲譯
一版—新北市 ; 群學, 2014. 02
面 ; 公分, 含索引
譯自 :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ISBN 978-986-6525-79-7 (平裝)
1. 激進地理學 2. 世界主義 3. 自由主義
609.01 102027449

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作者：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譯者：王志弘、徐苔玲

總編輯：劉鈞佑

編輯：黃恩霖

出版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8號5樓

電話：(02) 2218-5418

傳真：(02) 2218-5421

網址：<http://socio123.pixnet.net/blog>

電郵：service@socio.com.tw

郵政劃撥：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電郵：no12.studio@icloud.com

印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 3501-2759

ISBN：978-986-6525-79-7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 500元 2014年2月 一版1印

推薦序

……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約翰·藍儂唱道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麥可·傑克遜唱道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歷史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曲唱著「千古江山如詩如畫，
還我一個太平天下」

《共產黨宣言》寫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湯瑪士·佛里曼在印度班加洛市的高爾夫球場，打電話
給他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

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及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持續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進行他獨特而深刻的解殖計畫，在這本火花四射般地動員了高度人文社會知識碰撞、極具思想啟發性與時代意義的鉅著中，他的手術刀，切入一個更核心、更根本的底蘊：自由寰宇主義的普世價值論——一套內育於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康德的寰宇主義、盧梭的意志理性論、洛克的私有財產

及權利的法律政治學組裝。哈維詰問，當國際霸權經常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修辭，來正當化各種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破壞行徑時，我們如何應對「普遍權利」與各種替代性的普世化計畫？除了自由寰宇主義的版本外，其他寰宇主義之希望空間的開拓又如何可能呢？

伴隨著對全球化的反思，寰宇主義（cosmopolitanism）——一如周禮中的世界大同這般淵遠流長的社會思想——的各種倡議與政治社會實踐，在國際上引發了強烈的迴響與論辯，這個複雜議題的復甦，我認為對台灣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哈維這部堪稱博大精深的作品，來得正是時候，無疑是對當代寰宇主義最佳的知識基礎。

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里曼的書名《世界是平的》，新自由主義一向擅於動員啓蒙神話，打造著烏托邦的平坦世界，哈維直接面對其背後的自由寰宇主義基礎，進行刨根式地深刻解構。他引用了後殖民與後結構主義元素加以批判，但未滑入若干「後學」的懷疑主義陷阱，他更認真地與多位看似同道、實則有別的重要批判思想家，如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貝克（Ulrich Beck）、黑爾德（David Held）、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傅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系統地展開真刀真槍的交鋒，理論對話堪稱經典，令人大呼過癮。哈維最後透過根基同樣深厚的歷史地理唯物論，堅持「從支持或反對啓蒙的知識勒索中解放出來」，批判地重構了社會—生態、時間—空

間以及地方領域的辯證理論，並據之鋪陳他「地理理性的謀略」，以為重建真正自由的、解放的寰宇主義社會制度鋪路。

這是一部我相當激賞的作品，喜歡文學的哈維，他充滿地理學想像的文字，除了社會科學的精準嚴謹外，總是帶著一股藝術氣質。打開這本書，彷彿就展開了一段奧德賽史詩般的時空征程，在寰宇世界的崎嶇地表上，匍匐前進，之後你又不自主地會想爬回到自身所處的情境性（situatedness），這進出之間，不管多麼嚴苛，靈感、領悟與力量不斷湧現。

舉幾個跟台灣切身相關的情境，比如說跨界流動中公民權與國境的爭議，我們要如何面對移民與移工？是以康德式良善的臨時「款待權」原則？只有那些「表現成熟」的人，才會被國家賦予永久的居留權？國族主義本身，可說就是一種版本的寰宇主義，如康德的「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建議，唯一行得通的寰宇政府形式，是以獨立的國族國家組成的邦聯為基礎。這或許是個好主意，或許是爛主意，不過哈維至少同意康德的一個基本前提，任何寰宇主義的普世性計畫，不管是基於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宗教、環境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都需要作為界定「可能性條件」的地理學與人類學基礎，而不只是神學、宇宙論這種純粹形而上的思辨或觀念論。哈維獨到之處，在於剖析這個寰宇主義構想背後，康德自認為具有「科學基礎」、實則大有問題的人類學與地理學觀念——國族國家是以共同血統為基礎的市民社會，至於那些「不合格公民」乃至於「麻煩

元素」，主權國家總是有權將之摒除在公民權利之外。

國族主義與寰宇主義大有相互滲透的可能，然而國族國家的僵固與連貫性也不斷遭受挑戰。以「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寰宇主義框架，作為處理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與法律問題的各種倡議，正不斷將知性、秩序和課責，建構到諸如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這類具體的寰宇政治(cosmopolitics)場域。又如我們念茲在茲的「聯合國」——某種形式的寰宇政府，十餘年來高調提倡企業社會責任(CSR)與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視其為調控資本主義的全球治理，被跨國企業菁英奉為圭臬——是另一個標榜普世價值的寰宇主義版本。在聯合國人權公約與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範下，「國際勞動標準」(global labor standard)被視為普世的人權價值，一系列用來衡量勞動標準被遵循與否的企業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指標，及其監督、稽核的操作執行，被系統性建立(如工時、童工、環境安全、性別歧視等)，弔詭的是，核心的勞動標準「勞動三權」(勞工團結權、集體協商權、罷工權)，在這樣的市場化體系中，只是幾百項量化指標之一，因而富士康的勞動條件改善率，被蘋果委託的「公平勞動協會」(FLA)評定為達到99%。

像CSR這種全球治理的寰宇主義版本，其背後的普遍權利觀點，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私有產權的權利論述，這是合宜的權利觀點？哈維不留情面地批判了貝克的寰宇人權以及黑爾德的寰宇民主體制，認為它們過於貼近新自由主義而令人不安，對洛克式

資產階級民主不抱希望，哈維在書中轉而尋求另類的出路——將社會運動的多樣思想與實踐，納入普遍權利的求索。例如楊恩（Iris Marion Young）對照著她所謂的普遍壓迫的五種面貌，來定義普遍權利，這五種面貌包括：勞動剝削；因身分認同而遭到邊緣化；缺乏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生活的資源；文化帝國主義；以及內在於家庭和社會的暴力。很明顯地，經由各種集體行動與社會團結，來解除這些壓迫的權利，已超出新自由主義組裝的規範，然而這些才是合乎正義的普遍權利。

普遍權利主張湧現的另一個脈絡，是面對資本主義的奪取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各地人民所採取的社會自體防禦（social self-protection）。哈維細細解讀，不同於過去資本主義對於勞動剩餘價值的主要剝削方式，當代的奪取式積累，是零散而分殊的過程——山也 BOT、海也 BOT、這片要徵收、那區要都更，還有各式各樣的民營化、自由化、私有化、血汗勞動、關廠外移、環境剝削、原住民文化危機、生態破壞、金融泡沫等等；爲了抵抗這一切壓迫的地理具體性和特殊性，社運團體與 NGO 運用了人權、尊嚴、生態權與環境權等普遍權利修辭，以作爲統一的對抗政治基礎。例如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在台灣的司法改革中，被導入並策略性地運用，憲法對於財產權的保障，被引爲土地正義運動之法律正當性來源。然而面對寰宇主義的缺陷，當然有理由質疑普遍權利的拜物教傾向，以及其背後混沌不清的人類學、地理學與生態學知識假設；像是「我是人，我反核」這句口

號，在社會運動與知識圈內，就曾引發不小的爭論，這種曖昧的類存在（species being），是什麼樣的人呢？本真人？自然人？無差別的人？然而哈維提醒著我們，必須十分警覺於新自由主義化與普遍性、倫理原則及人權等訴求之間，所塑造出來的關鍵連結，如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配，需要實施某一套普遍權利，那麼對這套支配系統的抵抗，也需要爭取不同的權利鬥爭與社會團結，建構另一套普遍權利概念，並務實地將其原則納入法律。

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地理學者，他對當代各種擁保地方原真性（authenticity）——環繞著海德格的現象學哲學，要求「地方充盈」（placefulness）必須優先於自由寰宇主義的「平坦地球」，訴諸於「在地性」（localness）作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逃逸路線，如數家珍；然而對於像艾斯科巴過於浪漫化的地方主義取向，哈維也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他選擇了一條不容易但在我看來頗為實在的路徑，關懷著如何將「戰鬥性地方主義」（militant particularism）辯證而有機地連結上「全球團結胸懷」（global ambition），開創「地理理性的謀略」，而避免流入內閉保守的地方法西斯排外主義。

我想，哈維是認真地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他來說，這絕非神話，於是，他接過並轉化了寰宇主義者努斯鮑姆的問題意識：需要怎樣的人類學與地理學知識，作為進步性寰宇主義之可能性情境？對於人文地理學有興趣的讀者，會驚艷於，哈維以獨到的歷史地理唯物論，運

用馬克思主義的「環節方法」，批判地重構環境、時空性、地方／區域等概念，開展精采的新寰宇主義解放地理，為真實世界的空間實踐鋪路。如同他一貫主張的實踐主義地理學方法，他在文末所表達的對於當紅左翼理論家如哈洛威（John Holloway）、巴迪烏（Alain Badiou）、紀傑克（Slavoj Zizek）等人的不滿意，即在於他們的貧弱地理向度關懷，忽略了空間做為關鍵字的重要性，以至於限制了政治實踐的理論動能。

我必須承認自己是個哈維粉絲，我個人跟哈維有幾次近距離的接觸，除了一般的國際學術會議之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跟他在印度孟買開會，並於會後到農村去做關於徵地抗爭的田野訪查；另一次是他來台灣訪問，去參訪抗爭中的樂生療養院，我們曾以研討會論文的形式，就樂生保留運動的國際串聯（聯合國相關人權機構、NGO、跨國法律訴訟等等）如何與社區組織及運動論述結合的經驗，跟哈維交流。他的論述極富創造力，犀利而務實，政治關懷與敏銳度，始終如一。多年來我受哈維思想的啓迪，高度推崇他的成就，也為他平易近人的人格特質所吸引，他的著作始終是我愛用的教材，在王志弘等人以及群學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哈維近來的著作，得以透過靠譜且閱讀性極高的中文版本，持續與台灣讀者見面。個人除了高度推薦這部作品之外，也深切期待哈維其他作品的出版，共饗讀者。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序

ix

本書濫觴於 2005 年 5 月，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韋勒克圖書館批判理論講座（Wellek Library Lectures in Critical Theory）。與爾灣的批判理論家共度的時光，我感到既榮幸又有趣，我要向組織者和參與者的慷慨、溫暖接待及聰明才智的投入，聊表謝忱。

我原本打算大致原封不動地出版這三篇演講，但當著手校訂後，我日益確信有必要加以填補、擴充成爲目前的形式。面對才智出眾且顯赫的前輩名單，我對於自己獲邀發表這些演講，深感意外而榮幸。意外的部分源於我的地理學者身分，因爲我長期以來習慣這門學科置身學術聲望位階稍低的地位。宣稱一個人是學術圈（或任何其他地方）的地理學者，要不是迎向一臉困惑，就是會引人針對探索亞馬遜或靴子沾雪的瓊斯（Indiana Jones）做出詼諧的評論。但這些典型回應卻給了我額外的責任，令我盡量清楚而全面地說明，批判的地理理論看起來可能會像什麼，並解釋這種批判理論觀點在更廣泛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要這麼做，就必須認真處理某些棘手的主題，而且需要

比三篇演講的篇幅更冗長的闡述。我們的知識任務，一如愛因斯坦曾說過的，就是要「簡潔但不簡化」(to be simple but no simpler)，我但願自己在此已經盡力無愧於這項訓令。這些年來，我極其有幸，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僚共事，他們對於何謂批判地理學，懷有諸多見解。國際批判地理學者 (International Critical Geographers) 這個群體的不定期會議，總是精采刺激，而且隨著越來越多學科 (像是人類學和文化研究) 逐漸採納空間、地方和環境這些觀念，批判地理理論也出現了令人欣喜的、能發揮影響力的地域擴張。

歷年來，我有幸參與橫跨眾多學科的演講、討論班、論文發表及研討會，我從上述無數的批判討論中獲益良多。要從中挑出特定個人來致謝，並不容易，不過，我要坦承這種持續對話的重要性，而且無庸置疑，本書作為集體參與產物的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作為我自己想像的產物。然而，我要是沒有特別感謝源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 (th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教學的深切刺激，那可就錯得離譜了，來自人類學、地理學、社會學及其他學科的親近同僚與學生，他們相聚於此，既開創了相互支持的學習氛圍，也嚴肅地獻身於批判研究。

目錄

推薦序 v

序 xiii

前言 1

第一篇 普世價值

- 1 康德的人類學與地理學 23
- 2 自主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判 51
- 3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71
- 4 新寰宇人 107
- 5 地理邪惡的平常性 135

第二篇 地理知識

- 6 地理理性 169
- 7 時空與世界 179
- 8 地方、區域、領域 225
- 9 環境的性質 275

結語 地理理論與地理理性的謀略 337

註釋 385

參考書目 415

索引 437

前言

自由（freedom）與自主（liberty）的概念，在所謂的美國意識形態（American Ideology）的歷史中扮演吃重的角色，並造成了各種物質性後果。例如，200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的周年紀念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出現了一則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署名的專論。他在文中公開宣稱，我們「決意擁護催生我們國家的價值」，因為「日益自由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反映歷久不衰的美國理想，並將美國的盟國團結起來」。他總結道，人類現在「握有推動自由贏過古老對手的機會」，再加上一句，「美國樂於在此偉大使命中擔當領導職責。」¹這些觀點大致與美國將9/11事件詮釋為攻擊自由與自主的獨特美國價值，而非攻擊美國軍事及金融勢力的主要象徵發的傾向，若合符節。接下來幾個星期，布希政府頻頻表示將領導一場「推動自由贏過古老對手」的獨特美國戰役。兩年後，當精心安排作為對9/11攻擊的回應（藉以合理化入侵伊拉克的正式理由）被證實並不夠格後，布希逐漸訴諸這個主題，即伊拉克的「自由」是這場戰爭充分的道德理由。將自由、自主與民主帶到廣大的頑強世界，特別是中

東，成了布希演講的一貫主題。

2 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採取了更具寰宇主義（cosmopolitan）的立場。2003年7月，伊拉克任務據稱達成後不久，他向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時，針對布希強調的美國價值，提出了友善的修正。他說，「有個迷思，即認為儘管我們熱愛自由，其他人則不然；我們對自由的愛慕之情，是我們文化的產物；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美國價值或西方價值。諸位國會議員，我們擁有的不是西方價值，它們是人類精神的普世價值。」² 布希隨後修改了他浮誇的主張。2003年11月，在白廳（Whitehall）舉辦的一場英國名流顯要聚會的演說中，他說：「促進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天職。它是我們國家的天職。從十四點計畫〔威爾森（Woodrow Wilson）〕、四大自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以迄西敏寺演講〔雷根（Ronald Reagan）〕，美國的力量都是在為這項原則服務。我們相信，自主是自然的籌畫。我們相信，自主是歷史的方向。我們相信，人類的成就與卓越來自於負責地行使自主。而且我們相信，我們珍視的自由，不能獨善其身。它是所有人類的權利和能力。』³

2004年9月，布希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面前發表的總統提名演說中，進一步闡述了這項論點。「我相信，美國被徵召來引領新世紀裡的自由理想，我相信，中東地區數百萬人默默懇求自主。我相信，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們就會擁抱人類所能構想的最可敬的政府形式。我相信

這一切，因為自由不是美國贈予世界的禮物，它是全能上帝獻給每個世間男女的禮物。」在他 2005 年 1 月的就職演說中，布希進一步鞏固這個主題。「我們帶著自由最終獲勝的十足信心向前行。不是因為歷史憑著必然性之輪而運行。推動事件的是人類的選擇。不是因為我們自認是預選的國度。上帝秉其意志來推動和挑選。」雖然「歷史有正義的消長」，但他觀察到，歷史「也有自主及自主的作者所設定的清晰方向」。⁴

從獨特的美國價值，經由普世的人類價值，再到自然賦予的價值，最後是全能上帝的聰明設計，這個轉變除了涉及實質利益，也隱含修辭旨趣。在最後的這個解讀裡，布希顯然自認正在領導美國達成其偉大使命，實現上帝對俗世的聰明設計。於是，重大決定可能在嚴峻而毫不妥協的道德框架下鑄造形成，而這是一種屢屢召喚善與惡的絕對性，正直勝過微妙多變現實的道德框架。過度訴諸軍國主義，有部分根源於此，誠如副總統錢尼（Cheney）所言，「你不會與邪惡談判，你得打敗它。」

不過，這些演講——甚至在 9/11 事件之前，布希就發表了許多這類演講——還有個令人注目的地方，在於它們普遍宣示的高尚和道德高調，與現實的醜陋事實之間，有著鮮明對比，後者包括由美國管理的阿富汗巴格蘭（Bagram）監獄中，證據確鑿的虐囚謀殺；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的可恥照片；拒絕給予布希政府認定為非法或敵方的戰鬥人員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權利；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遭拘留多年而

未經審判的囚犯，令人痛苦的拖曳著腳步的照片；在伊拉克第一年佔領期間，美國陸軍拒絕記錄的「間接死亡」（collateral deaths）人數，估計超過 10 萬人；從全世界任何地方任意（且結果顯示經常是錯誤地）逮捕犯人，並「引渡」到對嫌犯實施酷刑的國家審訊。眾多證據顯示，這些違反人權且不正派的作法是系統性的，而非（如同政府經常堅稱的）軍方少數「爛蘋果」的行動結果。2005 年，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便譴責布希政權在阿富汗、伊拉克與關塔那摩灣對人權「駭人聽聞的違犯」。在美國境內，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限制了公民自主，至於在境外，這個政權儘管做出相反的高尚宣稱，卻從未停止支持壓迫性、威權且有時是殘酷的獨裁政府（烏茲別克、巴基斯坦、阿爾及利亞，僅舉幾例），只要這麼做符合美國利益。

當然，將布希的演講斥為他特有的辭令騙局，這種想法挺誘人的。但這有可能錯得離譜。《紐約時報》的保守派專欄作家布洛克斯（David Brooks）指稱我們必須嚴肅看待這些演說，我認為這主張很正確。他說，我們不應假定真正的美國「是貪婪積財、浪費資源、沉迷電視，毫無反思能力的世間男女」，而所有這種高調語言「不過是尋找石油，或渴求財富、領土或戰爭的偽裝」。⁵ 儘管幾乎可以肯定，這種語言確實是這些唯利是圖目標的部分偽裝，但布洛克斯相當正確地堅持主張，這些遠遠不「只是」偽裝而已。事實證明，布希提倡的理想在美國的菁英與庶民層次，都有長久的政治共鳴。

舉例來說，試想布希最緊密認同的那些人（十四點計畫的威爾森、四大自由的羅斯福，以及雷根）的記錄。布希在白廳演講中大肆宣揚這項事實：最後一位待在白金漢宮的人是威爾森，「一位理想主義者，無庸置疑。」布希詳述 1918 年喬治五世國王作東的晚宴，「威爾森舉杯祝酒。帶著典型的美國式低調，他誓言公道與正義將成爲世界上主導的掌控力量。」然而，正是說這番話的同一個威爾森屬下的司法部長，對移民和「無政府主義者」發動了惡名昭彰的帕爾瑪搜捕行動（Palmer raids），這場行動在薩科（Sacco）與萬澤帝（Vanzetti）的處決中達到高潮（現在已因無罪而獲赦免）。威爾森政府無情鎮壓 1918 年的西雅圖總罷工，將被稱爲「赤色分子」（Reds）的領導者放逐到新成立的蘇聯。威爾森政府因德布斯（Eugene Debs）¹¹¹的反戰言論而將他監禁，並擴大美國於中美洲的干涉主義，將美國海軍陸戰隊駐紮於尼加拉瓜境內十餘年。威爾森理想主義背後的權力政治絕不討人喜歡。當威爾森一再宣誓將自由與自主帶到全世界時，他真正的意思是：「既然貿易無視於國家邊界，而製造商堅持將全世界當作市場，那麼，他所屬國家的旗幟必須追隨在後，而閉關反抗他的國家大門必須搗毀。金融家獲得的特許權必須由國家代理人予以保障，即便不情願國家的主權在過程中受到損害。必須獲得或拓建殖民

[譯註]

¹¹¹ 美國勞工運動組織及社會黨領袖。

地，以免世界上有哪個有用角落遭到忽視或未經利用。」⁶

每當美國（商業及軍事）利益遭受威脅，布希所展現的違逆「不情願國家的主權」，以及宣示（違反聯合國政策）「先發制人」軍事策略的意志，正牢牢立基於威爾森傳統，而他屢屢將個人自由與民主，同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關聯起來的做法，也如出一轍。威爾森在針對開拓殖民地的評論中，召喚了稱為無主物（*res nullius*）的 17 世紀原則，意圖昭然若揭。最著名的倡議者洛克（John Locke）提出這項原則，來替北美殖民地的拓殖辯護，該原則聲明，未被佔領或「未加使用」的土地，可由那些能使該土地更為富饒或更具生產價值的人正當地據為己有。在這裡，關鍵是土地應當變得更具生產價值。這就是英國人正當化他們於 17 世紀奪取愛爾蘭的方式（正如現在美國可能以國家徵用權〔*eminent domain*〕來驅趕屋主，以便讓路給較高價值的用途，如倉儲式商店〔*box stores*〕）。布希在白廳演講中說，「有時，我們因為相信自主可以改變世界的純真信念而橫遭指責。」又說，「如果這是個錯誤，那是因為讀了太多洛克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儘管布希會閱讀其中任何一位的著作的這種想法，看起來有點牽強附會，但他將自己定位於 17 與 18 世紀自由傳統的用心，卻是顯而易見。

如他自己所言，為了「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羅斯福同樣發動了各式各樣國內與國際的先發制人攻擊，對抗民主政府和工會勢力。以安全的名義，他置所有憲法保障於不顧，非法拘

留 12 萬名日裔美人。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宣言是新世界秩序的基礎，有力地訴諸個人主義與私有財產權的自由主義概念。最後這幾項原則，隨後被供奉在聯合國人權宣言（U.N.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裡，並納入了一套國際機構（聯合國，以及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章程，它們一開始就是設計來鞏固市場自由，以及主要是作為美帝強權的工具。該強權獲得一個聯盟（尤其後來正式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基礎）支持，現在已知該聯盟在對抗共產主義蔓延的冷戰期間，「願意」不惜代價保護充斥危機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穩定。很顯然，這個普世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企圖讓蘇聯難堪。羅斯福辭世之後啟動的政策，其高峰是在海外慷慨但自利的馬歇爾計劃，與國內極不民主的麥卡錫主義的奇特結合。美國堅持主張，歐洲列強應該解除殖民，卻只是以美國獨特的新殖民主義形式來取代歐洲帝國體制。美國支持推翻 1953 年伊朗和 1954 年瓜地馬拉的民選政府（這類例子不勝枚舉），還有美國支持任何願意採取反共路線的獨裁者，在在證實美國對於不情願國家的主權，以及任何意義上的國際法治的輕蔑。就雷根而言，他致力自由理念的奉獻，陷入了攻擊工會勢力和廢除許多社會保護形式的泥淖，伴隨著替富人減稅、國內的解除管制和環境醜聞，以及伊朗門（Iran-contra）醜聞（核心是非法支持對抗尼加拉瓜桑定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s〕的戰爭），還有積極支持幾乎整個拉丁美洲的軍事獨裁政權與長期對人權的侵犯。

6 史密斯（Neil Smith）在他針對 20 世紀美國全球化之「三大環節」（three moments）的銳利分析中，巧妙地串接了這些美國版自由大遊行（freedom's march）的不同說詞。⁷他凸顯出威爾森的十四點計畫、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直抵他稱為全球化「終局」的當前階段之間的連續性。超過一世紀或更久，高尚辭令搭配實際上的骯髒作為，這種持續不歇的模式既昭然若揭，又極度令人不安。召喚啓蒙思想及其稱為「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與眾不同、置身局外、本質良善，因而超越了任何外在限制）的特殊版本，將我們帶往棘手的地域，因為在這些後現代的時代中，將我們的諸多當代弊病歸因於啓蒙思想的狂妄自大、錯誤疏漏已是慣例。但誠如傅柯（Foucault）的主張，我們不能只是希望啓蒙消逝。他寫道，「我們得讓自己從支持或反對啓蒙的知識勒索中解放出來。」⁸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全都是啓蒙後果的繼承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這項事實達成協議。而且，這不是什麼獨特的西方觀點，因為毛澤東、尼赫魯（Nehru）^[2]、奈塞爾（Nasser）^[3]、尼雷爾（Nyerere）^[4]，以及恩克魯瑪（Nkrumah）^[5]（僅列舉少數

[譯註] _____

[2] Jawaharlal Nehru，首任印度總理。

[3] Gamal Abdel Nasser，埃及第二任總統，阿拉伯民族主義倡導人。

[4] Julius Nyerere，首任坦尚尼亞總統。

[5] Kwame Nkrumah，首任迦納總統，非洲獨立運動領袖，倡導泛非主義。

開發中與後殖民世界的重要政治領袖)，跟那些自認違逆該傳統的人，像是甘地、法農（Frantz Fanon）與柏克（Edmund Burke），直接涉入啓蒙傳統的程度不分軒輊。

在美國，一如史密斯所觀察，內蘊於「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康德（Kant）的寰宇主義、盧梭（Rousseau）有意志的理性（the willed reason）、休姆（Hume）的實踐經驗論，當然還有洛克關於財產及權利的法律政治學」的啓蒙自由主義，不是「當代保守主義的政治對立面，而是其政治骨幹」。「以康德對寰宇主義公民身分抱持的謎樣渴望爲背景，洛克和亞當斯密一起爲」有關自主、平等和自由的「一連串連鎖信念，提供了雙重的知識靈感」，這些信念「穩定了資本主義的政治榮景，以及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個人主義的自我理解」。這些正是威爾森所代表的，且是布希通過欺瞞或誘拐、經由暴力或和平手段，承諾要施予世界其他地方的信念及政治經濟法則和實踐。

當然，美國政治傳統內部這股持續性的思想理路，曾遭遇反抗。它絕非霸權。民粹國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往往佔有上風，並對自由主義式的國際涉入發揮了強大的抑制作用。1920年代，當時集中於共和黨內部的孤立主義，於國內阻礙了威爾森的國際主義（參議院拒絕加入國聯〔the League of Nations〕），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政策則在國外抑制了國聯。布希的共和主義最初是以民粹國族主義術語鑄造，傾向於迴避國際涉入，像是柯林頓政府試圖在科索沃（Kosovo）及索馬利亞（一場災難）推動的

「建國」。布希公開奚落在海外推動建國，以及 1960 年代晚期透過政府在國內強勢干預與在海外的昂貴冒險（包括在韓國與越南的大規模戰爭），來管理（國內外）市場的自由主義形式。布希後來倡議威爾森式的自由主義國際理想主義，包括試圖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推動民主化和建國，充斥著個人自主和自由的辭藻，標誌出美國這一脈涉外政策的闡述方式有了重大政治突破。9/11 攻擊事件與隨後宣示對恐怖主義全球開戰，使民粹國族主義動員起來支持而非反對威爾森國際主義。這就是廣泛宣稱（在美國境內廣為接受，其他地方則不然）全世界隨著 9/11 事件而有了根本轉變的真正意思。這是新保守主義者向來企盼的境地，這一點也是事關重大。他們存在已久的少數派觀點，如今如果還不算取得全國霸權的話，至少在政權內部暫時佔有主導地位。相對地，絕大多數民主黨人，以及傳統的共和黨右翼，都對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觀點感到自在（最終試圖將伊拉克冒險拋棄給醜惡的命運）。銘記著對他人事務採取非干預主義的深厚傳統（至少能回溯到柏克）的死忠保守派，像是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成了伊拉克冒險的嚴厲批評者。

布希與新保守派提出立足於自主與自由的新世界秩序全球願景，他們並不孤單。新自由主義者與新保守派都同意，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以及穩固的私有財產權，應該構成全球秩序的政治—經濟基礎。1970 年代中期以降橫掃全世界，襲捲一個接一個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論調，不僅許多重要國際機構（世界銀行

和國際貨幣基金)擁抱其基本信條,連左翼政黨都投懷送抱,假定人身與個人自由最好是由穩固的私有財產權,以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制度來確保。關於這一點,除了柴契爾(Thatcher)與布萊爾,小布希和柯林頓也毫無異議。布希向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辯解,以及推動中東地區民主化的方案,都可以在這種背景下局部獲得理解。他說,我們必須「運用我們無與倫比的力量和影響力的地位,打造一股國際秩序與開放的氛圍,促使進步及自主在許多國家開花結果」。他宣稱,美國沒有帝國的籌謀。我們只不過「尋求一種公義的和平,令民主、發展、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壓迫、憤恨和貧窮」。美國的目標在於「促進中庸、寬容,以及不容妥協的人性尊嚴需求——法治、限制國家權力,以及尊重女性、私有財產、言論自由與公平正義」。¹⁰

再者,我們很容易把這種辭令,斥為替國內威權新法西斯主義(authoritarian neofascism)與海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militaristic imperialism)的醜惡面孔戴上的友善面具。儘管毫無疑問,這股潛流除了存在於布希政府內部特定人士,也在美國政治中自由流動,但我認為,如果抱持過於片面的立場,可能有嚴重的誤讀。首先,這當然不是大多數美國公民的自我感知,他們的自由意志論(libertarian)傳統很容易被這種修辭喚醒。這種修辭也無法解釋美國政策於公於私,都對世界其餘地方明顯慷慨解囊的那些面向。對於「在世界上行善»,致力慈善及人道工作(無論是源自蓋茲或索羅斯基金會,或出自美國緊急救助或政府援助)

的廣泛支持，可能會被誤導或錯置（而其通過往往有附帶條件），但不能輕易將它解釋為只是某種卑鄙意圖的假面。

將布希的所做所為棄之不顧，會錯失在我看來極為根本且更為廣闊的要點：所有的普世化計畫，無論是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宗教、社會主義、寰宇主義、以權利為基礎，還是共產主義，當其應用遇到了具體情況，就會陷入嚴重問題。高尚辭令和理想淪為粗劣藉口、特殊請求、誤解，以及更常見的暴力對抗與反控。如果美國嘗試民主化伊拉克的努力遇到了瓶頸，那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穩定阿富汗也有困難，而聯合國將法治與民主治理引進新獨立的東帝汶時遇到的麻煩，大抵如同英國在賽普勒斯、印度和肯亞的經歷；很久以前入侵埃及的法國；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中歐和阿富汗的蘇聯；西藏的中國；大西洋沿岸的桑定民族解放陣線之於米斯基托印地安人（Mesquite Indians）。這類事例不可勝數。這種陰鬱歷史遺留了苦澀滋味。由此衍伸出一種可以理解的保留，避免擁抱普世性的解決方案與任何形式的烏托邦理想。這一點讓我們在貿然界定任何替代性的普世化計畫，像是倡議復興寰宇主義治理或某種基於普世人權的國際體制之前，先停頓一下。這種懷疑主義蔓延廣泛，不僅瀰漫於後現代主義者和傅柯這類思想家的追隨者之間，他們明確拒絕普世解決方案的所有後設理論嘗試，斥之為負面烏托邦。這種保留在會聚於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社會運動中廣泛散播。雖然一方面這些運動堅持主張「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而且有新

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外的替選方案，但另一方面，當中有許多運動極力抗拒提出這種替選方案可能樣貌的任何全球概念，並且強烈拒絕考慮任何全球的組織化權力形式。他們相信，若採取那種途徑，就是展開一項注定失敗的計畫，造成的苦難比它減輕的痛苦來得多，如果不會產生比當前盛行者更糟的威權主義的話。一般認為，隨著人們努力應付日常生活的機遇，尋求明確而務實的方式來改善他們的命運，新全球秩序就會在世界各地都能發現的千萬個微型計畫中浮現。

儘管最終我會質疑這種觀點，但扎實地理解何以看似高尚的普世方案和烏托邦計畫經常失敗，顯然非常重要。布希政府無法實現其高尚辭令的顯而易見失敗，令我們反思這個更一般性的問題。要探究這個問題，首先且最明顯的步驟，就是要檢視失敗在何種程度上，導源於民主化計畫的應用對特殊環境缺乏理解。有無數例證顯示，這件事本身似乎就構成了問題的主要部分。現在多數評論家回溯時同意，在被佔領的伊拉克，即使只是掌理朝向類似美國民主狀態的轉型的微小機會，所必須要有的伊拉克歷史、地理、人類學、宗教傳統等知識，都很不幸地極為缺乏。不出所料，「爛事總是會發生」(stuff happened) (用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令人難忘的說法)，伊拉克的情勢很快就失控了。不過，正是在這一點上，這種失敗的解釋本身失控了。這裡假定有某種能保證成功的、確定的境況 (circumstance) 預知。但是，那會是什麼樣的知識，哪裡可以找到這種知識，這種知識又能有多

確定？

關於境況與當地狀況之充足知識的重要性，經常有人提起。例如，發展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從苦澀的經驗中學到，要應用發展經濟學的系統性理論（當然是源自洛克與亞當斯密所闡述的普遍經濟原則），少不了「承諾徹底浸淫於專業顧問工作所在之任何地方的歷史、民族誌、政治學與經濟學」。¹¹ 沒有充足的地理學（他主要是指物理環境和相對區位）、歷史、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知識，我們最後一定會提出荒謬絕倫的解決方案，來對付全球貧窮與環境劣化的普遍問題。不過，在薩克斯看來，普遍原則保持不變。境況只對應用有影響。相較之下，班哈比（Seyla Benhabib）看見了人權理論的普世性及其於不同文化情境的應用之間的張力——一整套的內部矛盾。她說，我們的命運「經歷了陷入普世願景」與「特殊主義的文化和國族認同」情感「之間的永恆拉鋸戰」。她也注意到普遍理論有其特殊主義起源，而且總是帶著起源的痕跡。畢竟，宣稱「人權」的是巴黎人。經常被當作全球模範的美國憲法，以「我們合眾國人民」（We the people）這著名的第一句話架構起來時，它闡述的觀點屬於「一個時空處境分明，共享特殊文化、歷史與傳承的特殊人類社群；但這群人民卻以『普世』之名行動，將自己打造成民主實體」。¹² 班哈比認為，普遍和特殊之間有種緊張、動態且往往是矛盾的關係。布希現在投射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和自主概念，必然帶有它們在美國歷史上之特殊起源境況的痕跡。因此，以取自某個地

方和時代的特殊籌劃，當作普遍政策基礎的任何企圖，總是涉及了帝國主義化的環節。提到這一點，不必然是要將任何普遍原則斥為不正當，而是要承認，將地方發現轉譯成普遍接受的規範，這件事本身就是個複雜過程，需要塑造共識和理解，而不是粗暴地施加現在用以正當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科索沃的軍事干預，以及在塞爾維亞的轟炸的「軍事人道主義」(military humanism) 理論所鼓吹的東西。¹³

有鑑於當前對於康德式寰宇主義的興趣再起，視其為全球民主與治理的統一願景，也可以提出類似警告。努斯鮑姆 (Martha Nussbaum) 是主張回返以寰宇主義道德作為在世存有新方式的首要倡導者，她拿她的倡議同以下論點相提並論，即主張一種截然不同的教育結構 (和教學)，以迎合全球化世界中理性政治審議的任務。她抱怨，「我們的國家，對世界上大部分其餘地方的無知程度，令人咋舌。」這種無知是理解何以「美國不能經由他者的透鏡來自省，結果必然〔是〕對自己同樣無知」的關鍵。更具體地說，努斯鮑姆繼續主張：「要引導這種全球對話，我們不僅需要其他國家的地理和生態知識——這些知識已經要求大幅修訂我們的課程——還必須多多認識他們的人民，這麼一來，跟他們談話時，我們才能夠尊重他們的傳統與承諾。寰宇主義教育能提供這種審議所需的背景」(強調為本文所加)。¹⁴

努斯鮑姆對於充足而適當的地理、生態及人類學理解的呼籲，有趣地呼應了康德的見解。他認為，年輕人需要了解人類學

和地理學，以便更好地認識世界。他寫道，「地理科學的復興，可以創造知識的整體性，缺了此，所有學習都只是零碎工作。」¹⁵而且，依康德之見，這種知識除了是科學性的，還必須普及（亦即所有人都可以接觸）而務實（有用）。他經常一邊教他的邏輯、形上學和倫理學，一邊教地理學與人類學。很顯然，他試圖言行一致，但我們將會看到，他未能成功。環繞著努斯鮑姆復興寰宇主義道德的呼籲，引發了廣泛辯論，但是在人類學、地理學和環境科學裡，教育所可能扮演的關鍵角色，卻未經檢驗就朦混過關。努斯鮑姆沒有試圖界定這些科目中的「寰宇主義教育」，可能會是什麼。她也沒有考慮對班哈比來說很重要的一種可能，即遭逢地理學、生態學和人類學特殊性的衝擊時，寰宇主義原則本身可能必須修改，甚至要徹底重新擘劃（一如人權理論的案例）。

如果努斯鮑姆曾多加留意這些知識形式，她可能會注意到，作為學科的人類學和地理學有段艱困歷史的惱人事實，它們都源於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密切關聯，並因此烙下難以抹滅的傷痕。雖然努力根除這種污染根源的最糟遺產，但仍留有痕跡。但我們現在還必須面對同樣惱人的事實，就是這些知識繼續被納入譬如軍事機器中，好用來監控、遙測、鎖定目標，並導引飛彈，或藉以塑造弭平叛亂的戰略。地理學和人類學知識深受其鑲嵌所在的制度框架塑造；世界銀行、中央情報局、梵蒂岡與企業，還有媒體，全都鼓吹特定的認識方式，而這些方式往往南轅北轍（觀光產業供應的地理知識，和世界衛生組

織裡找到的地理知識大異其趣)。通俗地理知識(或其欠缺)經常被挪用於粗糙的政治用途,甚至嵌進了政府的宣傳機器。例如,布希以包括伊拉克、伊朗和北韓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字眼來描繪世界,特定國家被武斷地稱為「流氓國家」或「失敗國家」,於是建構出一幅獨特的世界地圖,暗中界定出可以正當地採取先發制人軍事行動的地勢,對此,若無充足的對抗性知識,就沒有人有反駁的立場。那些描繪雷根或布希版世界地圖的諷刺漫畫,真是寓教於樂,不過,它們有時也有致命後果。而且,史密斯指出,這特別是美國涉外政策的比喻,藉此隱匿了陸斯(Henry Luce)在1942年稱為「美國世紀」的真實地理,因為美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向來是全球和普世性的,而非著眼於特定地域。陸斯不願以某種「截然不同地理學」的角度來描述美國的目的,而倡議使用巨大而「雄偉的」字眼,像是「民主、自由與正義」,在這個過程中,還刻意讓各種地理知識顯得瑣碎。史密斯總結道:「他覺察到,握有新興全球權力意味著不必在乎世界地理。正因為地理無所不包——美國世紀是全球性的——也就無關緊要了。」¹⁶在美國,培育出努斯鮑姆抱怨的那種地理無知,多年來正是國家教育政策首要但隱蔽的目標。

但是,當整個地域、文化和民族都被妖魔化或幼稚化為落後且不成熟,當整片居住區域(如非洲)因為沒能生產出足夠價值,而被當成無關緊要而摒棄在外,而且當多數人口由於刻意栽培而造成地理學、生態學及人類學上的無知,從而容許少數菁英

根據他們狹隘的興趣來協調全球政治時，那麼地理知識表面上的平庸無奇和天真無邪，便顯得更加陰險。這不僅僅是魔鬼存在於地理學的細節當中（儘管確實屢見不鮮）。我們必須認識的是，這種細節的政治性質。舉一個最近的明顯實例，全球暖化和溫室效應氣體的科學理解，受到由大型能源公司豐厚合約資助、握有可疑憑據的科學家干預而遭致曲解。不過，這也是對抗性政治向來的集結組織方式。當環保團體挑戰世界銀行對巨型水壩計畫的財務支援時，他們總是將擬建的水壩置於特殊的地理學、生態學及人類學條件背景下，藉此凸顯損失和破壞——相對地，典型的世界銀行報告將水壩描繪成現代性的宏偉象徵，為沿途感恩的居民產出鄉村電力，以實現更優越的生活水準。衝突的核心往往在於，哪一種地理學、生態學和人類學的描述，被視為正確無誤。

那麼，回到努斯鮑姆看似天真的建議，我們要如何將各種矛盾分歧又惹爭議，並且往往倒行逆施、損人利己的地理知識形式，納入寰宇主義計畫？運用地理的描述，不知不覺地部署政治宣傳，這種危險已然隱約逼近。可能合乎努斯鮑姆寰宇主義教育目標的地理學、生態學及人類學課程修訂，亟需嚴格的檢視。但很少人，尤其有權有勢者，願意將這個問題當成具公眾迫切性的事務。在這本書裡，我試圖明確探討這項缺陷。我主要聚焦在地理學的事例，因為這是最熟悉的領域。不過，地理學與人類學，以及生態學和環境科學有無數的重疊，而且我認為沒理由要去警戒任何虛構的邊界，儘管有些人可能想將邊界強加於重疊而

高度互動的研究領域。我的目的是要探索實現寰宇主義地理學（以及生態學和人類學）教育的可能性和困境，這種教育對於推動建立一種適合解放且自主之全球治理形式的新寰宇主義知識秩序，可能做出有意義的貢獻，甚至予以徹底改造。

14

順道一提，洛克也承認，充足的地理知識對於他的普遍計畫具有根本重要性。他寫道，「沒有地理知識，諸君甚至連報紙都沒辦法理解。」¹⁷ 可惜的是，布希總統——根據他自己的說法——甚至不喜歡讀報。

第一篇

普世價值

康德的人類學與地理學

1

我先談康德，因為他帶給當代寰宇主義探討的靈感，無可忽視。我從他討論「永久和平」的文章中，引用或許是最著名的一段文字：「地球上的各民族已在不同程度上加入了一個普世社群，並已發展到某個地步，以致在世界一個地方違法，到處都會覺察。因此，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不是什麼奇幻誇張的想法；它是未成文的政治法與國際法的必要補充，以便轉化為人類的普遍律法。」¹

17

康德的世界法概念，源自某種地理結構的脈絡。由於人類共同佔有了地表，地球的有限特質界定了人類被迫（有時是暴力地）適應彼此而存活的範圍。出於意志，人類擁有漫遊地表，並彼此交往（像是通過貿易及商業）的固有權利。運輸工具（康德提到船隻和駱駝）促進了與日俱增、橫跨空間的接觸。不過，在康德的構想裡，地表被設想為依照領土劃分成主權國家。這些國家最終傾向於演變成民主與共和政體。屆時，居民在他們國內就會享有特殊的公民權利。由於國與國之間通過貿易和商業而日益相互依存，國家之間的關係將由建立永久和平的漸增要求來調節。國

與國之間的戰爭越來越不可能發生，理由有二。第一，在民主國家，必須贏取承擔後果衝擊的公眾同意。君王、皇帝和貴族爲了個人威望或壯大聲勢而發動戰爭的習慣，將受到抑制。第二，隨著國與國之間經濟互賴程度增加，戰爭導致的貿易中斷，將造成越來越嚴重的損失。寰宇主義倫理要求，當個人（假定爲一國的公民）跨越清楚劃定的邊界（尤其是爲了貿易）時，將享有受款待（hospitality）的權利：「款待意指，當陌生人抵達另一國度，不被當成敵人對待的權利。在不會毀了他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拒絕接受他；但只要他和平地佔有了他的地盤，人們就可以不必款待他。人們要求的不是成爲永久訪客的權利。爲了賦予外人在一段期間內成爲共同居民的權利，需要一份特殊的善行合約。所有人都享有的，僅是暫時逗留的權利，以及社交的權利。人類憑藉著共同佔有地表而擁有該項權利，但人類不能在全球範圍內無限散布，因此最終必須容忍彼此的存在。」²

因此，寰宇權利有其限制。班哈比提到，「款待權佔有的空間，介於人權和公民權利之間，介於我們個人的人道權利與我們身爲特定共和國成員而獲取的權利之間。」³ 這種構想的基礎，是假定有以其特定領域來界定的主權（最好是民主與共和的）國家權威。爲了公民身分之故，國家的領域被視爲絕對空間（亦即，它是固定且靜止不動的，有清楚的邊界）。不過，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下，普世的（連根拔除的）款待權向其他人開放了所有國家的絕對空間。

康德的寰宇主義倫理構想，向來是許多分析和辯論的主題。但沒有人想探究康德有關地理結構的假設，對於他所引申的寰宇主義有何含意。我能找到的唯一實質討論，關心的是有限地球的共同佔有，在康德替寰宇權利的辯護中扮演何種角色。共識似乎是，「地球的球體表面構成了正義的境況，但未發揮奠定寰宇權利之道德正當化前提的功能。」⁴ 這種結論是可以理解的。提出其他結論，可能會犯下自然主義的謬誤¹¹，或者更糟，陷入粗糙的環境決定論（認為空間結構——地球的球形——具有直接的因果力量）。不過，將地理境況貶謫為只是「正義的境況」的地位，不是這個議題的終點。這樣好像地理空間的性質，同運用於該空間的原則毫無關係似的。雖然物質（歷史與地理）境況可能是偶發的，但這不表示那些以人類學和地理學知識形式來呈現的境況特徵，跟寰宇主義倫理的構想無關。努斯鮑姆，以及我們將會說明的康德本人，顯然都認為境況很重要。而且事實證明，傅柯也所見略同。那麼，境況是如何及為何重要呢？

康德的哲學教學，集中在邏輯、形上學與倫理學。但他也經常傳授地理學和人類學。這些教學之間有任何關聯嗎？相較於他的三大批判，他的人類學及特別是地理學的著作直到最近為止，

[譯註] _____

¹¹ naturalistic fallacy，指相信一切自然事物必定是良善或好的，西方倫理學上指將「好的」界定為各種自然屬性，有從實然（is）推導出應然（ought to be）的意味。

都遭受普遍忽視，或被貶到無足輕重的地帶。不過，他的《人類學》曾被譯成好幾種語言，還受到一些評論。例如，傅柯於 1964 年將康德的《人類學》譯成法文，允諾在後續的出版中對它會有更深入的分析。他從未兌現承諾（儘管他確實遺留了一份長篇評論，我們現在總算可以目睹）。康德的《地理學》則幾乎不為人知（有趣的是，傅柯幾乎沒有提及它）。過去，每當我向康德學派學者質疑這一點，他們的反應幾乎是如出一轍。它「無關緊要」、「不被當作一回事」，或者「裡頭一點意思也沒有」。目前還未有已出版的英文版（雖然波林〔Bolin〕翻譯了第一部分作為碩士論文）。1999 年，法文版終於面世，英譯本則排定了時程。⁶除了梅（May）的著作，以及地理學家偶爾涉足以理解康德在地理思想史中的角色（但未試圖將其與形上學或倫理學關聯起來）外，迄今仍無以英語撰寫的嚴肅康德《地理學》研究。法文版的《地理學》導言確實嘗試提出評價，最近一場將哲學家與地理學家聚在一起的英語會議，終於允諾認真檢視康德地理學提出的問題。⁶

歷史上對康德《地理學》的忽視，不符合康德自己的評估。為了教授地理學以取代宇宙論，他不辭辛勞以便豁免於大學規定。相較於他教邏輯與形上學 54 次，以及教授倫理學和人類學分別為 46 次和 28 次，他教了地理學 49 次。他明確主張，地理學與人類學界定了各種知識的「可能性條件」。他將這些知識視為其他一切事物的必要準備——他稱為「預備知識」。⁷因此，儘管人類學和地理學都處於「前批判」或「前科學」狀態，它們的奠基角

色卻值得密切關注。我們還能如何詮釋他在形上學與倫理學之餘，如此堅持不懈地教授地理學和人類學的事實？即便他顯然沒有完成使命，他仍明白認定，將人類學和地理學引進更具批判性且符合科學的條件十分重要。問題在於：他何以這麼認為？

凡德皮特（F. Van de Pitte）在他替《人類學》寫的導言裡，為這個問題提出了解答。由於康德日益體認到「形上學不能依循純數學方法」，於是，如康德所言，「形上學的真正方法，基本上和牛頓引進自然科學的方法一樣。」因此，形上學必須建立在人類經驗的科學理解上。但是，如果形上學現在要從經驗中開展，那麼形上學要到哪裡尋找它能據以牢牢建立的固定原則？康德自己表示，品味變化與人的不同面向，使得經驗之流具有不確定且令人迷惑的特質。「我該上哪兒尋找人類永遠無法更動的自然定點，而那些定點能標明他必須前往停歇的海岸？」

依凡德皮特之見，康德求助盧梭的著作尋找答案。他在那裡發現，「由於人可以考慮一系列可能性，以及當中哪些比較令人滿意，他可以努力使他自己及其世界實現他的理想。」這一點是有可能的，因為人類擁有理性思考的能力（雖然僅僅擁有這些能力，並不保證能運用得當）。但這又意味著形上學不再需要是純粹思辨的。它必須「依照源自人類潛能的、清楚界定的絕對原則」⁸循序漸進。如果上帝和傳統宇宙論不能提供解答的話，那麼，人的潛能可以透過什麼手段來確立？

在康德闡述寰宇主義倫理的幾個論點上，他表明了倫理源於

21 自然或人性（他有時似乎合併了兩者）的觀點。因此，寰宇主義倫理奠基於純粹思辨或觀念論以外的東西。康德（不同於布希總統）拒絕召喚任何上帝設計的觀念。如此一來，康德對於地理學和人類學的關注就更有意義了。如果神學和宇宙論不再能替「何謂人」的問題提供適切答案（所以康德決定將宇宙論從課程中刪除，代之以地理學），就需要更科學的東西。如果不是來自人類學和地理學，那麼「人的科學」要來自何方？依康德之見，地理學與人類學的區別，在於經由「人」置身自然界觀察得出的「外部知識」，與主體性的「內在知識」（實際上這種知識有時候比較接近心理學）之間的差異。這種二元論背負了沉重包袱，因為它鞏固了一直困擾西方思想的客體與主體、事實與價值，以及最終是科學與詩學之間假定存在的截然區分。他開始先是教地理學（1756年），而他檢視的大部分事物，是有關影響地球表面及地表上人類生活的物理過程。這顯示出康德起初受到潛藏的環境決定論吸引，並替形上學反思提供了潛在的安穩科學基礎（而且如同我們將見到的，他在其地理學中引述的許多例子，都反映了這種傾向）。他隨後轉向了人類學（1772年開始教授），以及他在晚年更專注於詳細闡述人類學（甚至準備出版），這件事實顯示，他日益發覺主體性的內在知識與他的哲學計畫更相關。傅柯挑釁地指稱，「結果，事先將地理學與人類學組織起來，而且按理能充當自然知識與人類知識之單一參照的宇宙論觀點，必須擱置一旁，以便給具規劃性價值的寰宇主義視角騰出空間，這種視角將世界

設想為有待建立的共和政體，而非事先給定的宇宙。」⁹重要的是，《人類學》的最後一段直接處理了世界法這個大問題，但《地理學》中卻未曾提到這個主題。

既然這樣，我們首先考察他的《人類學》的含意。該著作相當於一份針對我們的類存在（species being）的詳細探究（從而預示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對此概念的考察）。目的夠清楚了。我們不僅必須理解我們過去及現在如何身為人類而存在：我們還必須理解，我們憑藉特殊的能耐與力量能夠成為什麼。人性不是固定不變，而是持續演變，藉由研究這種演變，我們可以對人類命運提出看法。傅柯在他的評論裡，對康德追問這些問題的能耐深表感佩，一如他大力批判康德的實際答案。傅柯問道，「人不僅是『如其所是』，而是『他如何造就自己』。這不正是人類學為其探究所界定的領域嗎？」因此，依傅柯之見，相較於康德貢獻的三大哲學批判，《人類學》位於核心，而非邊緣文本。阿倫（Amy Allen）總結傅柯的論點如下：

因此，傅柯主張，《人類學》（或許不經意地）打開了批判哲學的框架，揭露了我們先驗（a priori）範疇的歷史特殊性，指出先驗範疇根植於隨歷史變化的社會及語言實踐和制度。因此，傅柯對康德人類學的解讀指出，康德的體系包含了自身徹底轉變的種籽，而傅柯將在自己的

著作中承繼這個轉變：亦即，從作為普遍且必然的先驗概念，轉變成歷史的先驗；以及與之相關的，從充當一切經驗之可能條件的超驗主體，轉變為根植於特定歷史、社會及文化境況而受到制約的主體。¹⁰

從缺乏實質的人類主體到根植的人類主體的思考轉化，關係重大，而《人類學》率先提供了這種轉化的載具。康德有關我們的類存在的觀點，不侷限於他的《人類學》文本，所以在這一點上，有必要予以脈絡化。一般而言，康德拒絕任何人類固有良善的概念。他不訴諸高貴野蠻人或虔誠無辜者這類人物。他說，「所有事物，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虛榮心，而且往往是由幼稚的惡意和破壞組成的。」¹¹他在討論啓蒙這個主題的著名論文中說道，啓蒙取決於「人超脫自身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的定義則是「欠缺他人的指導」，就無法運用理解力。康德認為，只有少數人「成功地從不成熟中解放了自己，無畏地往前邁進」，而各種偏見（甚至革命進程中創造出來的新偏見）則「充當控制無思考能力大眾的皮帶」。進步的啓蒙取決於「最無害的」自由形式——「在一切事務上公開運用個人理性的自由」。雖然我們生活在啓蒙時代，但我們不是生活在已然啓蒙的時代。這條思考理路匯入了《人類學》的最後段落。他說，人類

不能沒有和平共存，但他們無法避免持續意見分歧。結

果，他們覺察到天性注定他們要通過相互強制及他們編纂的律法，發展成不斷蒙受紛爭威脅，但大致朝聯盟邁進的寰宇社會。寰宇社會本身是個遙不可及的理念，但不是構成的原則……。它只是個調控原則，要求我們慷慨屈從於作為人類命運的寰宇社會；這並非毫無合理根據，因為假定有朝這個方向的自然趨向……。我們傾向於將人類呈現為並非邪惡的，而是理性的物種，不斷努力排除萬難以擺脫邪惡，臻於良善。就此而言，我們的一般意向是良善的，但實現上卻有困難，因為我們無法期待藉由個人的自由同意來達致目標，其達成只能通過地球公民的進步組織，使人類成為由世界紐帶（cosmopolitical bonds）團結起來的系統。¹²

因此，康德人類學（他堅持是以「實用主義觀點」寫就）的使命，是替「調控原則」界定出「可能的條件」，這些原則可以引領我們從愚蠢幼稚的虛榮心、從暴力和粗野暴行，轉向和平寰宇社會的「吾人命運」。這就需要分析我們的認知能力、我們（愉悅與不滿）的情感，以及慾望（這對傅柯著作的影響顯而易見）。這也要求思索人類實踐如何及為何將自然稟賦（「性情」）轉化為「個性」。康德寫道：「自然對於人的塑造屬於性情（在此主體大致上是被動的），唯有人類自我造就的模樣，透露出他是否擁有個性。」¹³雖然這個觀點在我們的「動物性」存在和我們的「文明化」

存在之間，引入了令人遺憾的二元對立，但它確實開啓了持續不斷轉變個性的工作的可能。謝平（Pheng Cheah）總結康德的論證如下：

24

身為具備熱情和感性傾向的自然創造物，我們跟事物和動物一樣，是既成之世界的創造物，而且受到支配所有自然客體的非關理性（arational）機械因果律束縛。然而，身為道德主體，我們是自行立法的理性能動者。我們屬於我們為自己創造的自由超驗領域，這個世界包含我們通過理性所規定的普遍法則掌理的所有理性存有。道德世界是超越感覺且無邊無際的，因為它不會屈從於有限人類存在特有的、無意義偶然性的盲目機遇……文化提供了通往自由超驗世界的橋樑，因為它提升了人類追求有目標之自決的傾向，將我們的自然束縛降到最低……〔它〕將人類意志從自然慾望的專制中解放出來，並藉由塑造與理性形象相符的意志，將人類技能重新導向於理性意圖。¹⁴

當然，「人造就他自己」這個一般論點，極為強烈地延伸進入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只有在由必要性與世俗考量決定的勞動終止之處，自由的領域才真正展開」，而這「超越了物質生產領域」，¹⁵在馬克思的這番宣言中，也聽得出康德對自由的超驗定義

的迴響。康德檢視國族性格與文化的差別，藉以思索通過文化創造而將氣質重塑為個性的進展程度。這篇文本訴諸的國家刻板印象，輕鬆愉快、富含軼事，有時還故意引人發笑。但這一點無損於康德意圖的嚴肅性。人類在不同地方造就出不同的自己，生產出不同文化。我們的任務——就此而言，康德的論點肯定是切中要害——就是要運用與該過程相關的判斷力（judgment）和理解力（intelligence）：「正如發現普遍性〔規則〕下的特殊性的才能稱為判斷力，從特殊性中找出普遍性的才能稱為理解力。判斷力集中於發覺雜多事物中相對於局部同一性的差異；理解力集中於標誌出雜多事物中相對於局部差異的同一性。這兩種才能中較傑出者，能注意到最細微的相似和差異。能辦到這點的才能稱為洞察力，對這類事情的觀察稱為敏銳，若它們沒能提升知識的話，就稱為空洞詭辯或奇想空談。」¹⁶

根據這種冠冕堂皇的標準，康德自己的構想往往顯得過分粗糙（如果還稱不上是空洞詭辯和奇想空談）。在整部《人類學》裡，我們遭遇各種顯然帶有種族、階級、性別及國族偏見的陳述轟擊。他針對女人本性及女性性格的陳述，極可能激怒即使是最溫和的女性主義者（雖然這些說法可能取悅某些忠實的福音派教徒）。爲了嘗試理解我們類存在內部產生的明顯分化，康德首創了種族問題應該奠基於純科學基礎的看法（後來卻有十分不幸的歷史）。而且，他對於國族認同根源的考察大有問題：「我們用人民（people〔populus〕）這個字眼，指稱在某個區域裡共同生活的居民

總數，而且他們構成了一個單位。那些自認為通過共同血統而凝聚形成市民社會的居民，甚至只是其中一部分人，稱為國族（nation [gens]）；將自己置於這些律法以外的另一部分人（人民裡任性不羈的群體），稱為烏合之眾（rabble [vulgus]），而他們的非法集結則稱為暴民（mob [agere per turbas]），這是將他們排除於公民特權之外的行爲。」¹⁷

根據這種說法，並非所有居民都具有公民的資格。依康德之見，這全取決於個人的「成熟」，即傅柯在他的論文〈何謂啓蒙？〉¹⁸中正面挑戰的，規範性的理性行爲概念。傅柯問道，像波特萊爾（Baudelaire）這樣的人物，基於康德八成會認為他既不理性又不成熟，是否就要革除他的公民資格？誠如康德及大多數其他啓蒙思想家所認定的，既然女人按定義就被視為不成熟，因而不能參與公共生活，那又會發生什麼事？

然而，由於共同血統而組成國族的人類定義和含意，引導康德獲得他最重要的結論之一。單一世界政府只能以君權專制的形式存在，因為它可能必須消除和壓制疆域內部以血統為基礎的國族差異。簡言之，那種世界政府可能會違逆自然與人性。唯一行得通的寰宇政府形式，是以獨立（最好是民主且共和制）的國族國家組成的聯邦為基礎。這或許是個好主意，或許不是，但重要的是認識到，康德的這個構想源自他大有問題的人類學概念，即認為國族國家是以共同血統為基礎的市民社會（更別提將無論如何定義的「麻煩元素」，摒除於公民資格權利之外）。這種假定也

有助於解釋跨越邊界的寰宇權利為何如此受限，而款待權為何非得是臨時性的。外國人的永久居留，與共同血統的要求不符。因此，像班哈比那樣想實質地擴大移民權利的人，就得極力對抗康德寰宇主義框架的限制。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康德論證的可疑人類學根據。不過，如果拒斥了康德特有的人類學根據（我認為必然要這麼做），那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什麼是或什麼可能是理解人類結社之領域結構的適當人類學基礎。事實上，我們可以合理地提問，寰宇主義倫理究竟是否需要任何種類的人類學根據。很顯然，除了康德，努斯鮑姆和傅柯也都認為有這個需要。

檢視康德的《地理學》，則引發了更深刻的問題。研究康德的學者對《地理學》興趣缺缺是可以理解的，因其內容可說是在智力和政治上令人難堪。誠如多伊特（R.-P. Droit）所述，閱讀《地理學》「結果真是一大衝擊」，因為它看似「一團不可思議的異質評論、缺乏系統的知識、不連貫的奇珍古玩的大雜燴」。¹⁹認為它可能替形上學反思提供一個穩固根基的想法，著實荒誕無稽。無可否認，康德試圖從有點事實可信度的故事中，篩掉比較愚蠢而顯然錯誤的故事，但還是遺留了各種比較可能產出歡樂而非科學可信度的材料。不過，它還有更險惡的一面。雖然大部分篇幅都致力於描繪自然地理（的確，這就是他的講題）經常是古怪的事實，他對自然系統內的「人」的評論，卻令人深感不安。針對不同居民的風俗習慣，康德未經批判檢視便重述了各式各樣引發偏見的評論。因此，我們發現：

在炎熱的國家，人在各方面都成熟得較快，但他們沒有達到溫帶的完美無暇。白色人種實現了人類的最完美境界。黃種印度人少了幾分天賦。黑人差得多了，某些美洲居民更在他們之下。

27

炎熱地帶的全部居民都極為懶惰；他們也很膽小，這兩種特質也描繪出住在遙遠北方者的特徵。膽怯引發迷信，國王統治的國度則導致奴役。奧斯托耶克人（Ostoyaks）、撒摩耶人（Samoyeds）、拉伯蘭人（Lapps）、格林蘭島人（Greenlanders）等，在膽怯、懶惰、迷信和渴望烈酒上類似炎熱地帶的人，但缺乏後者的妒忌特質，因為他們的氣候不會強烈刺激他們的熱情。

流汗程度過猶不及，都會使血液混濁且黏稠……。山區地帶的人堅忍、快樂、勇敢、熱愛自由及其國家。遷移到另一國度的動物和人，會逐漸被他們的環境改變……。往南遷移到西班牙的北方人，生下的後代不如他們自己那樣高大強壯，在性情上也跟挪威人和丹麥人不同。²⁰

緬甸女人穿著不雅服裝，並以懷有歐洲人後代而感到自豪，何騰托人（Hottentot）很髒，你老遠就可以聞到他們的臭味，爪哇人（Javanese）偷竊成性、視若無睹、卑躬屈膝，有時滿腔怒火，有時怯懦恐懼。我們很難將任何理性或成熟概念歸屬於這群人。

這當然不可能是努斯鮑姆心目中的那種地理學。當投射到由主權獨立的民主與共和國家組成的世界時，這會喚起一種具威脅性的形象，顯示骯髒的何騰托人、喝醉的撒摩耶人、怯懦且行竊的爪哇人，以及垂涎懷上歐洲人的種的成群緬甸女人，他們全都大聲要求跨越邊界，而且擁有不蒙受敵意的權利。正是在這種地理「境況」裡，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康德為什麼在他的寰宇主義倫理和他的正義概念中，囊括了拒絕進入的權利（只要這項權利不會導致他者的滅亡）、款待權的臨時性（只要進入者不會引起任何麻煩），以及永久定居的條件完全取決於主權國家的善行，而主權國家無論如何總是有權拒絕給予麻煩製造者公民資格權利。想必只有那些表現成熟的人，才會被賦予永久居留的權利。此外，像班哈比那樣因為考慮移民權利而致力於放寬康德式世界法的限制者，實際上必須消除這些地理偏見在康德世界法構想上的隱藏痕跡。

這裡頭沒有哪個偏見已然消逝。關於少數族群的權利，以及甚至只是暫時性的移民「不蒙受敵意」的權利的尖銳辯論，充斥於我們的當代世界。各式各樣有關「異己」和「陌生人」的先入為主和刻板印象概念，甚至存在於受過高等教育的政治菁英中。基於陌生人不成熟而且不像我們的理由，拒絕承認陌生人公民資格權利的情況，可謂屢見不鮮。儘管康德對國族性格觀點的補充說明，可能教人不敢恭維，但是，卓越出眾且受人敬重的作家（例如安德森〔P. Anderson〕、澤爾丁〔T. Zeldin〕與巴齊尼〔L.

Barzini)，加上史詩著作的默許支持，如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格蘭勞工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所為），²¹ 書寫英國人的「怪癖」，法國人、西班牙人或義大利人，以及諸如此類人等的特殊性格，這個悠久的書寫傳統顯示，康德對某些事物瞭若指掌。此外，既然像羅爾斯（John Rawls）（尤其在《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與沃爾澤（Michael Walzer）（尤其在《正義諸領域》〔*Spheres of Justice*〕）這種高度的政治哲學家，都將他們的論點奠基於類似康德在國族性格與文化方面的原初構想，那麼，針對政治哲學（如果不是政治學本身）的人類學和地理學根柢的整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更加嚴肅以待，而非習以為常。²²

當然，康德的地理學敘述，可以辯稱僅僅是引述或呼應了孟德斯鳩（Montesquieu）與其他有環境決定論和種族主義傾向的學者，例如休姆（Hume）和布馮（Buffon）（姑且不論康德從行經柯尼斯堡〔Königsburg〕的商賈、傳教士及船員那裡獲得的經驗知識）。多伊特提到，當時許多普遍理性和普世權利的熱切捍衛者，興高采烈地兜售各種類似的、引發偏見的材料，宛如人種優越和種族清洗可以輕易地同普世權利與倫理學協調（不過康德值得讚揚的一點是，基於殖民主義是未經允許的佔領，因而違背了世界法，他特意譴責了殖民主義）。²³ 此外，還可以召喚各種其他情有可原的境況：康德的地理資訊很有限；他的地理學課程是導論性質，旨在告知和提出議題，而非解決它們；而且，康德從未修訂

材料以供出版（流傳給我們的文本，是由經過學生增補的康德早期筆記——約莫在1759年——彙編而成，而且針對該文本較諸1790年間提出的其他後續文本訛誤嚴重，也有爭議）。²⁴ 無論如何，他後來轉而強調《人類學》的這個改變，展現了一種漸次的進步，遠離他的《地理學》特有的、比較粗略的環境決定論。

不過，康德的《地理學》含有如此不確定的系譜，以及必須驅逐的尷尬，卻不能是忽視它的理由。事實上，這正是為什麼它如此有趣，尤其是對照於他過分自吹自擂的普世倫理與寰宇主義。剔除他的地理學，不符合康德自己對它作為「可能性條件」及一切其他推理形式（包括他的形上學和倫理學）之「預備知識」的定位。問題在於，康德完全無法引領地理學知識脫離其「前批判狀態」（precritical state），再將它安置於理性、科學的基礎上。他後來暗示了原因為何。他就是無法在地理知識的領域成功運用他的目的因（final causes）觀念。他（在葛雷肯〔Clarence Glacken〕視為關鍵的段落中）寫道，「嚴格來講，自然的組織和我們所知的任何因果律，毫無相似之處。」²⁵ 而這個問題妨礙了他以類似牛頓自然科學的風格來建構地理學認識的野心。倘若真是如此，那麼，他的形上學和倫理學就欠缺他視為其構想之根本要素的穩固科學基礎。這兩門學科在關於「人的類存在」的問題上，回返到單純思辨的領域。

努斯鮑姆提出的問題，即人類學和地理學知識如何可能更好地以與「適當的」寰宇主義倫理構想相關的方式來建構和定位，

康德並未回答，但從問題提出到現在，幾乎沒人願意費心研究這個問題。大多數當代評論者要不是忽視這個問題，就是像班哈比和布瑞南（Tim Brennan）一樣，試圖通過特意調整康德的世界法概念，來處理康德某些遺留下來懸而未決的議題。²⁶ 儘管這些調整或許令人讚賞，但這些作家只處理徵候，而非根本的結構性問題，無論是針對康德的原始構想，或是後續有關該主題的幾乎所有研究。那麼，以一種較能激起有關適當之世界法概念鬥爭的方式，重新建構人類學和地理學知識，要付出什麼代價？簡言之，我們該如何嘗試回答，努斯鮑姆對於一套適當的地理學及人類學理解的基本要求？還有，在當代條件下，「適當」可能意味著什麼？雖然這樣的問題，可能看來令人生畏，即使還不是任何單純意義下的無法回答，但這不該成為阻擋我們一探究竟的絆腳石。

30 傅柯在這一點上的立場很有意思。他似乎深受他對康德《人類學》解讀的影響，而且顯然將它視為康德倫理學的預備知識。而且，他的著作全都帶有這種影響的痕跡。不過，傅柯顯然從未讀過康德討論地理學的文本。然而，傅柯卻經常運用空間概念。這一點尤其呈現於他相對較早且長期未出版的異質地方（heterotopia）論文——立即會有更多討論——以及他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和《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等文本中探討監獄和醫院時，仔細描繪了空間形式（例如他著名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應用）。他相信，空間性是關鍵概念，至少起初似乎接受了康德所主張的空間該如何理

解的觀點。但在他晚年，或許是著意於批判康德及他自己的異質地方構想，他公開表示憂慮，「空間被視為死寂、固定、非辯證、靜止不動的」，而「相反地，時間則是豐富、多產、生命、辯證」。²⁷他認為，如果「空間是任何社群生活形式的根本」，那麼，空間必定也是「任何權力行使的基礎」。更出人意料的是，當1976年剛創辦的基進地理期刊《希羅多德》（*Hérodote*）編輯提問，以便釐清他的空間和地理學論點時，整體而言，傅柯針對這些相當合理的刺探性問題，提出了避重就輕且顯然難以理解的答覆。一次又一次拒絕為他大量的空間隱喻闡述、甚至只是猜測其物質基礎，他迴避了適合他自己或任何其他人之理解的地理知識議題（儘管他使用了真實的空間形式〔像是敞視建築〕來建立他的論題）。此外，他沒能針對空間如何作為「權力行使的基礎」，提出具體的物質意義。不過，以下是他終於在結論裡所說的話：「我很喜歡和你們的討論，因為我們開始交談以後，我改變了心意。現在我可以了解，你們問我的有關地理學的問題，對我而言至關重要。地理學是我嘗試串接的一系列因素之間通道的支柱，是可能性的條件。就地理學本身而論，我要麼留下了懸而未決的問題，要麼就是建立一連串武斷的連結……。地理學必然確實位於我關切的核心。」²⁸

儘管多少有點勉強，傅柯在此賦予地理學「可能性條件」的地位，類似於先前分派給康德的人類學的地位。因此，現在必須納入考慮的是特定歷史、社會和文化境況中的地理根植——如果

你願意，可稱為歷史和地理的先驗。既然這樣，我們要如何理解歷史先驗和地理先驗之間的關係，而這些又在傅柯式倫理學（先別提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爲了試圖替這個問題找些答案，傅柯隨後向《希羅多德》的編輯提出一連串問題，涉及他應該如何適當地理解地理學是什麼。²⁹但他的這些問題顯示，他將地理學知識等同於空間性和空間秩序的研究。他爲什麼對於地理學可能是什麼，採取如此有限且非辯證的觀點？

在此，與康德的批判性交鋒提供了一些有用線索，因爲誠如梅（May）的主張，有可能從康德全體著作中，重建出康德地理知識的某些推定的原則。如我們所知，地理學不只是前導，它同人類學一起，也是我們對於世界（理解爲「人類」居所的地表）的所有知識的綜合終點。這個終點在康德眼中，不僅是世界的後驗（*posteriori*）知識。某個意義上，它建構了我們真實生存於世的「命運」。換句話說，我們不僅有必要檢視我們的地理學與人類學過去和現在的模樣，也要考量它們會變成什麼模樣。

然而，地理學將「人」視爲「自然系統內部的自然客體」。在18世紀，這意味了地理學知識帶有環境決定論的傾向，而這些環境決定論可能會輕易突然倒向（我們已經在康德的例子中見到了）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不過，康德提出的一般問題，亦即如何理解人類演化和環境轉變之間的新陳代謝關係，在現在跟以往一樣至關重要。只是因爲康德顯然弄錯了，不能當作忽視這個問題的藉口。而且環境主義完全沒有絕跡。我們稍後會看到，在戴蒙

(Jared Diamond) 與薩克斯的當代著作中，它甚至獲得一種看似科學的尊崇地位。如何將「人」概念化為「自然系統內部的自然客體」，依舊是個核心問題，而我們如何回答它，影響的不僅是世界法應用的技術性，還會影響人類的整體命運。

但是，康德將環境史排除在地理學本身的定義之外。他主張，地理學知識僅僅涉及了空間秩序研究。歷史被認定是獨特的，因為它提供了時間中的敘事。這兩種綜合的知識形式——與分析科學如物理學及生物學截然不同——不應該相互混淆。地理學（連同其他空間科學，如考古學和天文學）從空間角度來綜合分析性的發現，歷史則從時間出發。空間與時間的可分離性，尤其在知識的組織方面，將康德定位於有關空間和時間性質的牛頓傳統中。不過，康德也認識到笛卡兒時空理論的牛頓式挪用有其問題。如果空間與時間被認為是無限、絕對，而且掏空一切物質，我們就無法通過直接感知經驗來加以理解。康德的回答是，我們的直覺能夠觸及空間和時間；我們對於時空的認識，是先驗綜合（*synthetic a priori*）的知識。這個回答基本上替空間和時間的非絕對定義（*non-absolute definition*），開啓了各種可能性，但康德的著述中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人類直覺可以揭開任何其他科學真理，除非是與經驗世界有關的、牛頓絕對系統的真理。實際上，康德運用了萊布尼茲（Leibniz）來封存可分離之時空的絕對牛頓觀。³⁰如我們稍後會見到的，這一點嚴重抑制了康德的視角。於是，康德的地理學被界定成僅僅與空間秩序和空間結構有關的經

驗型知識，而這種定義主導了傅柯向《希羅多德》編輯提問的視角。康德認為地理學是「縱觀全局的學科，通過空間（*Raum*〔地區或空間〕）概念來綜合其他科學的發現」，這個定義在德國和美國的地理學史上影響深遠，但後果很不幸。³¹哈茲宏（R. Hartshorne）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贊助下，於1939年出版的《地理學性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裡，使用康德的想法，從而完全摒除了歷史地理學（除非視為比較靜力學）這個領域的可能性，令騷爾（Carl Sauer）大為光火，他是美國1920年代以降，歷史與文化地理學的主要實踐者。³²再者，哈茲宏認為，空間定位的獨特性留下了偶然性的標記，根據這種限制性的定義，地理學只能涉及獨一無二和特殊的事物。這與普遍性恰成鮮明對比，這種普遍性依附於單向的時間概念，可能會懷有目的地引導我們，邁向我們的寰宇式治理命運。謝弗（F. Schaeffer）後來對哈茲宏的康德詮釋提出質疑，引發一連串刻薄的交鋒，他主張，決定空間秩序的普遍法則完全是可行的（比方說，應用幾何模型於聚落模式，就像克里斯托勒〔Christaller〕與廖什〔Lösch〕中地理論〔central-place theory〕的作法）。根據梅所偏好的、康德的事物圖式的另一種詮釋，空間秩序化（spatial ordering）能產生與普遍性相對的區域和地方性真理與法則。這些地方法則，透過以共同血統界定的國族國家歷史中規範公民資格的特殊法則，而在領域上導引出來。於是，「絕對的」牛頓式空間（與時間）概念，框架了康德探討世界法的領域

化人類學取向，一如它也框架了處理地方正義問題的羅爾斯和沃爾澤取徑。康德的世界地圖相當於麥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帶有清楚界定的國族國家之絕對邊界。空間中絕對實體的觀點，支撐了傅柯的異質地方概念，而這又可能影響了傅柯的觀點，從而主張不能採納後設理論（metatheory），偶然性和地方的政治（包含地方知識）才是真正要務。³³

梅沒有告訴我們，康德到底如何提議將地方真理及法則（如國族性格）和理性的普遍性（抽象的人性）關聯起來。不過，如果梅的說法沒錯，那麼康德的地理學與人類學知識，似乎有可能與他的普遍倫理學抵觸。譬如，在一個國族國家建立迎合其國族性格之獨特法則的世界中，將普遍倫理理想運用於全球治理議題，會發生什麼事？更糟的是，我們要如何將普遍倫理標準應用於世界，但這個世界中有些人被視為不成熟或劣等，有些人被看作懶惰、有臭味，或全然靠不住？要麼，帶有臭味的何騰托人、懶惰的撒摩耶人、做賊的爪哇人和放蕩的緬甸女人必須自我改革，以迎合普遍倫理的規範（因而弭平了各種地理與文化差異，以利於某種關於成熟的規範性定義），要不，就是普遍原則橫跨了不同地理環境，其實是偽裝成普遍良善的高度區別性符碼。推斷康德實際上想的是前者，有很合理的根據，因為在他著名的論文〈何謂啓蒙？〉裡，他費盡心力拿人類「成熟」當作適當地投身公共領域的必要條件，這些公共領域在制度上建置了某些自由，並給予政治保證。康德據以將麻煩元素排除在主權民主共和國之公

民資格外的規則，證實了這個觀點。但是，誠如我們已經見過的，他詳述世界法時所鋪陳的、假定為普遍的原則，要求必須暗中遷就某種版本的人類學與地理學現實。我們不禁懷疑，康德寰宇主義吸引人的地方，正在於它多少可以維繫執著於某些普遍良善理論的虛飾外表，同時允許、甚至合理化對實際的歧視性排除做出無數讓步。由這個觀點看來，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宣稱，布希是個不折不扣的康德派。

誠如許多人認識到的，這在康德整個探討知識的取向上，是個根本而尚未解決的難題。鄂蘭（Hannah Arendt）對這個困局的描述是：「判斷力的主要困難在於，它是『思考特殊性的能力』；但思考意味著概括出通則，因此，它是神祕地結合特殊與普遍的能力。如果普遍性是既定的——作為規則、原則、法則——以致判斷力只不過是將特殊性納入其下，這事就相當簡單。如果唯有特殊性是既定的，而普遍性有待尋覓，問題就困難多了。因為標準不能借自經驗，不能源於外界。我不能憑藉另一個特殊性來判斷某個特殊性；藉以判定其價值。」³⁴

我們已經知道，康德的答案是召喚能辨認細微之處的敏銳理解力。但其危險在於造成「空洞詭辯與奇想空談」。流傳給我們的康德地理學版本，形同一堆互不連貫的奇聞軼事般的特殊事物，而其普遍性還有待發掘。時至今日，地理學知識大致上還處於這種狀態，儘管有地理學家和其他人竭心盡力改革其道。康德的人類學，雖較具系統，但也有嚴重缺陷。當代人類學，儘管有其頂

尖從業者的努力，也很難說已經消除了「空洞詭辯與奇想空談」（尤其藏在所謂的「後現代」偽裝下）。要不是其政治後果總是有如災難（像是在伊拉克、盧安達、巴勒斯坦和達佛〔Darfur〕），這一切都還不成問題。

康德這些看似戲劇化的言論，具有廣泛的政治後果。公共領域（尤其在美國）中的通俗地理學與人類學知識，要不是完全闕如，就是帶有類似康德所描繪的那種偏見特質。有關地理「異己」的刻板印象不計其數，每天的尋常談話中都能聽到帶有偏見的評論，甚至在菁英圈中（仔細聽一下大學的公共休息室裡，任何論及墨西哥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或阿拉伯人的談話，就知道刻板印象不假質疑地提起和傳遞的速度有多快，更別說是在街頭了）。

於是，美國政府（或就此而言的任何其他政府）輕易便將自己描繪成正義、民主、自主、自由與良善之普遍原則的承擔者，實際上卻以強烈的歧視方式，排斥被視為不同、陌生，或某種意義上缺乏適當資格或人類素質的異己。譬如，布希提倡他的康德寰宇倫理版本，與此同時，巴格達上空的震懾威嚇與成千上萬伊拉克人死亡的恐怖惡行，加上阿布格萊布的悲慘景象，將我們拉回到遙測術語裡所稱的「地面實情調查」（ground-truthing），對照著人類學及地理學現實來落實檢驗抽象概念。

因此，康德的寰宇主義及其倫理學的普遍性，與他的人類學及地理學笨拙而難以駕馭的特殊性之間的對比，專關重大。如果有關後者的知識（如康德自己主張的）界定了世上所有其他實際

知識的「可能性條件」，那麼，如果康德的人類學和地理學基礎如此可疑，我們憑什麼可以信賴康德的寰宇主義？然而，有一種方法可以將此當成豐富的討論起點。儘管人們很可能對「黨派之爭和強烈的地方忠誠對吾人政治生活造成的傷害」³⁵ 抱怨不休，但同等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人類熱情」（康德相信其天生具侵略性，並能行邪惡事端）如何總是具有地方性且破壞性的表現。面對這種情況，即使只是要接近至少依康德的判斷，我們有可能達致的寰宇主義狀態，都得費好一番功夫。那麼，我們藉由回應努斯鮑姆所呼籲的，大刀闊斧改革我們的地理學、生態學和人類學課程，便有辦法可以促進這番努力？康德指認出問題，卻沒提出適當答案。他或許生活在一個啓蒙時代，但如他自己所了解的，那肯定不是已經啓蒙的（enlightened）年代。於是，我們面臨一項令人關注的抉擇。我們可以拒絕整個啓蒙計劃，連同所有布希關於自由和自主的辭藻，視之為帝國統治和全球支配的骯髒虛偽理由，或者，接受啓蒙（及其美國旁系）所為何來的基本要旨，但清楚認識到那種特定申論下的啓蒙，其實還不夠開明。而且，仍然有待重建的主要知識領域之一，正是能照亮通往真正寰宇主義未來之路的「適當」人類學和地理學認識。但在這背後存在某種無上命令，要將寰宇主義和聯邦共和主義的整個問題，推到康德關切的最前線。例如，我們何以需要邊界，我們究竟為什麼有必要跨越邊界？在這一點上，很顯然貿易與私有財產的需求最為重要，而這意味著特殊的商業和地產資本，或許甚至是一般資本的

法律要求，在康德的構想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秘密角色。

自主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判

追求康德倫理寰宇主義的抽象概念是一回事，接受自由主義哲學及實踐，卻是另一回事。但正是在這裡，深受史托克斯（Eric Stokes）啓發，並在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和最重要的梅塔（Uday Singh Mehta）的著述中達致頂峰的一群後殖民作家，針對 19 世紀英國自由主義在印度的觀念與實踐，發表了精采絕倫的高見。梅塔這麼說：「自由主義的理論宣稱，通常傾向於跨歷史、跨文化，而且更肯定是跨種族的。自由主義原則宣示的明白指涉對象，直言之就是沒劃定邊界的全體選民：全人類。自由主義原則闡述且捍衛的政治權利，諸如法律、代表、契約等制度，其正當理由都在於避免以姓名、社會地位、族裔背景、性別和種族來標示人的特徵。」¹

自由主義原則所設想的個人主義，是孤立的、普遍的，並以真正的康德風格，獻身於理性和合理行動的寰宇主義。這一點至今仍與 18 世紀時同樣真確不虛。舉例來說，正是基於這種精神，柯林頓總統在歡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可以評論道，這事開啓了中國的法治（彷彿中國沒有既存的法律體系）。我們已經知

道，布希在他的白廳演說中召喚的正是洛克和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傳統，藉此捍衛他將自主和市場自由擴及各處的政治策略。自由主義是普世倫理的有力表達：它拒絕給予任何空間和時間脈絡特權（至少原則上如此）：「藉由將自然和與自然的相遇描述為缺乏情感，洛克拒絕承認地方依附有任何涉及政治認同的個人意蘊。個人『來自』或『歸屬』於某個地方的情感，以及那些構成其認同的情感，全都被視為在政治上不相干……。藉由不承認自然或地理區別，連同與之對應的情感依附有任何政治價值，洛克及繼起的大半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無法相信支撐了多數政治認同與國族主義的領域權主張。」²

地理學和人類學的事實，在自由主義理論（及其衍生性論述，如經濟學）中遭到阻擋，如果還不算蒙受積極抑制的話，因為它們被斷定為無關於自由主義理論基本概念的普遍性。只有在應用的時刻，地理學和人類學的條件才變得相關。不過，反思實際的結果，揭露了一個問題：傑出的自由主義者如彌爾（J. S. Mill），如何能夠在堅守他們原初的自由主義理念的同時，否認自決權和基本的自主權，例如對印度實施代議制治理？他們如何能堅稱，由大英帝國繼續統治監護印度的主張完全正確，以及印度人從一個據信尊崇自由主義的帝國統治下獲得獨立，為何經歷了曠日費時的鬥爭？一如康德的例子，我們發現魔鬼藏在人類學與地理學細節裡，而它們原本遭到阻擋。梅塔寫道，「細節構築了結果，而不必然違反假定的包容眼光。」特別是對彌爾而言，梅

塔認為，地方條件「限定了一般性立法與理論的科學抱負」。那麼，確證這種限制為正當的那些「地方條件」，又是怎麼一回事？³

排除於自治的利益之外，有兩種正當化方式。根據第一種，特殊空間與人民被妖魔化或宣告為「未開化者」或「野蠻人」，在極端的事例中，像是北美原住民就被視為過於接近自然，以致無法納入任何文明化世界的概念。在這種極端例子（如柯雷頓〔Clayton〕對於溫哥華島〔Vancouver Island〕的描述）裡，這意味了抹除提及原住民族存在的所有說法，遑論其政治組織或權利了。⁴整片領域被說成是空無一物，任由殖民拓墾者定居，他們以純正的洛克式風格，將勞動和土地結合起來，藉此正當化擁有地產的權利。如果還有人費心去描述當地人的實際作為，則只是在自由主義架構中，替奪取那些被視為「沒價值野蠻人」的剝奪政治，提供了論述和最終是法律上的支持。因為原住民族被視為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臣服於上帝規定必須生養眾多的命令，是「我們」在世間神聖使命的要旨，於是統治原住民就變得既正當又高貴。

39

第二種形式在印度變得比較普遍，就是認定本土居民的教化和成熟度（康德的用詞在此很貼切）還不足夠，無法將他們納入自由主義的權力和權利體制：「印度是孩童，帝國為他提供了正當且進步的家世前景，而英國身為家長，就此而言責無旁貸且足以勝任。對彌爾和麥考利（Macaulay）而言，除了各種其他帝國禁令外，這一點就是拒絕將民主權利和代議制度賦予印度人的正當

理由。這個想法有著尊貴的系譜，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則源自洛克將監護視爲必要階段，孩童獲得表達契約同意所要求的理性以前，必須先通過這個階段的訓練。」⁵

將全體人民「幼稚化」是很常見的比喻。就在法國大革命後，法國人徹底接受了這個想法，例如 1796 年唐格拉（Boissy d'Anglas）主張，被殖民者的不成熟和懶惰，規定他們永遠「滿足於順服由敵視暴政的公正仁慈之士主持的明智和平政府」。⁶洛克菲勒（Rockefeller）訴諸這種想法，拿它當作 20 世紀初期以新殖民主義介入拉丁美洲（尤其是剛好擁有石油的委內瑞拉）的基礎。20 世紀之交的自由主義傳統內部，銘記了「白人的負擔」。雖然變得比較隱晦，但這個想法持續以發展援助或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 missions）的當代語彙，以及整套「落後」和「低度開發」的論述表達出來。它在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和基進發展主義裡都是個大問題：試想 1980 年代，桑定民族解放陣線將大西洋岸米斯基托印地安人納入尼加拉瓜發展的手法的重大缺失，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諷刺地利用米斯基托印地安人的不滿，將他們導入尼加拉瓜「反政府」運動時，隨之而來的災難後果。康德將啓蒙描述爲人類判斷力「成熟」（或如彌爾所言，「他們能力的成熟」）的條件，便隱含了這種幼稚化政治。梅塔總結，無論哪種方式，其作用都在於將排他政治鑲嵌入同帝國有關的、19 世紀歐洲自由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核心。這種排他實踐的痕跡，遍布於整個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也沾染了當代的新自由主義計畫。

這便拋出了更深刻的分析性與知識論問題，涉及引起這種排他性政治後果的歷史、人類學與地理學知識（「細節」）的角色及定位。在查克拉巴蒂看來，彌爾之所以拒絕授予自治，完全取決於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t）的論點：「印度人或非洲人的開化程度尚不足以自治。在他們能被認定準備好肩負任務以前，必須經歷某些發展與文明化（確切地說，即殖民統治和教育）的歷史時間。因此，彌爾的歷史決定論觀點，將印度人、非洲人及其他『未開化』國族交付到一間想像的歷史等候室。這麼一來，便將歷史轉變成這種等候室的說詞。」⁷

由於歐洲（或是更概括的「西方」）總是進展得比較快，於是無限期延長任何其他人留在等候室的時間，便很容易合理化。梅塔部分同意這項論點：歷史和進步的概念是問題的根源。他寫道，「沒有普遍歷史疑旨的寰宇主義，能產生並渴求倫理，但不會導致家長主義方案和干預主義的集體行動。」⁸只有當康德將普遍歷史觀點嵌入他的論點——「人造就他自己」，以及性情可以讓位給個性的觀點——寰宇主義才逐漸從根本上背離了斯多葛學派（Stoics）的純粹倫理寰宇主義。彌爾也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將自己同洛克的自由主義區別開來。歷史進步觀，以及領導者與追隨者的觀念，產生了會永遠持續的排他性。

查克拉巴蒂回應這個難局的解答，是「將歐洲地方化」。他認為，在歐洲以外存在著分離的空間（如印度或孟加拉），其中保有分離且同等有效的時間性／歷史。進步的開展可能有所差別且不

均等，但沒有拘限任何民族的等候室。然而，查克拉巴蒂並未嘗試正當化他所籲求的獨特空間的存在，將印度或孟加拉這類地理實體視為自明的，很方便就忽略了「印度」這個概念本身，正是大英帝國建構（儘管隨後因為印度國族主義的崛起而自然化且細緻化）的實質證據。梅塔同意，不同地方存在著「多元的既存時間性與生活形式」。不過，他比查克拉巴蒂更進一步，將人類學以及尤其是地理學的條件與知識，視為理解帝國統治如何能在自由主義理論內部取得正當性時，不可或缺的一環。以有點拐彎抹角的散文體（這總是某種概念性困難〔conceptual difficulty〕的有趣指標），他提倡「一種具空間同時性之生活形式的詮釋學，這些生活形式的差異，至少先驗地存在於相同的存有平面上，因而必須以異質之空間同時性的關係性，而非以同質之時間直線性來理解」。⁹我認為，他藉此想表達的意思是，空間是不連續的、社會的及關係性的，而且空間在塑造政治認同上的作用，其重要性不亞於時間。框架了自由主義理論與普遍歷史的平滑歐幾里德幾何學／牛頓式（我會加上康德式）空間與時間，乃是錯誤的虛構，促使彌爾「將世界想像成連貫而光滑的表面，整齊劃一地為固定的知識格網所用」。於是，自由主義理論與實作內部對於人類學和地理學的阻擋封閉，就成了問題。據梅塔之見，空間與地理學的問題「鮮少提升到理論關注的層次」。誠如康德的說法，政治理論所面臨的問題是，「特殊事物，而其普遍性還有待發掘。」

奇怪的是，梅塔全然忽視了對空間與地理學問題賦予高度理

論關注的實質研究，其中有些還是地理學者所為。他的分析裡完全沒提到這類研究發現，當然有可能視為又一樁學科目光短淺的可悲事例而打發掉，但不幸的是，這件事有相當實質的影響，因為正是在這一點上，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理由，梅塔的論證開始嚴重出錯。他反覆指出自由主義理論的缺點，即無法體察地方、地域和地理學對於政治認同形構的重要性：「自由主義者沒能體會到，領域既是獨特生活方式之可能性（或渴望）的象徵表現，也是其具體條件，而且在現代時期，領域將許多結社聚集在一起，個人透過結社才逐漸將自己視為某個政治社會的成員。引用一個早期自由主義理論化的流行隱喻，領域是政體的身體（body），這跟人的身體沒有兩樣，領域標誌了政體的周界，而政體認同是在領域內、並通過領域而建構起來的，領域也塑造出政體自主性的特定表現。」¹⁰

結果，自由主義者「無法認識及體察各種非共識社會的政治完整性」。因此，他們建造的帝國，幾乎注定要遭遇某種形式的地域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政治回應。甚至當反對派「國族主義者援用自由主義普遍主義的語言時，他們混合了由地方想像的實質地景組成的、具有紋理的現實。而且地理學往往是他們強有力的工具。」¹¹ 語言在這裡很有意思。我們再次發現，康德式（甚至傅柯式）的「可能性條件」論證的開展，但它作為批判性交鋒點的潛能，卻立即被埋入具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危險聯想的、問題重重的生物學隱喻裡。這種身體政治隱喻不是沒有可能，但不經批判地

加以援用，卻可能輕易將我們導向法西斯主義的幽冥世界。在梅塔的例子裡，是轉向柏克（法國大革命與大英帝國的偉大反對者）的考量（及許多方面的復興）。據稱，柏克並未迴避普遍性，因為他主張「領域或地方，是集體或個人政治認同的基本條件。再者，它構成了諸如責任、義務、秩序和自由等觀念藉以獲得其政治意義的基礎」。依梅塔之見，柏克「認真看待人們的情感、感覺和依附，他們藉此而得以且渴望『在家』。這種思考心態，承認經驗完整性與其地域及有限性紐結在一起。……這麼做，它就吻合了經驗的心理學向度，而這些向度總是從即使多孔但有邊界的家庭、國族或其他敘事範圍內部，衍生出其意義、熱情和痛苦的強度」。¹² 柏克在他針對大英帝國現身印度的慷慨激昂抨擊裡，三番兩次援用地理事實，因為他視之為否定英國佔領正當性的主要修辭策略。梅塔寫道：「領域或區位，既是隱喻，也是重要的物理事實，掌握自視為不同社會成員的個人的心理及情緒狀態……。儘管伴隨著爭論，歷史和地理都促進了創造有邊界的團結感，分享某物的觀念即透過這種團結感而得以發揮效果，並得以做規範性與制度性的調整。」¹³

經由一連串絕妙的翻轉，柏克將大英帝國視為狂野不羈的兒童，不能成熟地參與僅僅是不同的、更何況根本不熟悉的事務：「柏克的寰宇主義策略，並非取決於將實際上其情感依附乃同時並存的各個社會，按照時間格網來排列，並根據它們的差異來將它們『往後』挪動，以便賦予進步觀念一種直線的連貫性。一旦人

們了解到——和柏克一樣——人類經驗是從生命形式所產生的熱情獻身中獲得密度，那麼寰宇主義的挑戰，就是將這些形式理解為同時發生的在世存有方式。」¹⁴

由此觀點看來，柏克建構了梅塔所稱的「情感寰宇主義」。這個論證裡有許多明顯的正面之處。例如，我們不難將這種情感的觀念，類比為努斯鮑姆探索的，作為文化精神（ethos），以及作為道德立場的寰宇主義；我們稍後會見到，這就是艾比亞（Anthony Appiah）得出他的「根植寰宇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ism）概念的方式。不過，這大多取決於所表達的情感性質。就此而論，梅塔的論證裡有不少問題重重之處：對永恆的籲求，以及假定根基於地方的經驗的「完整」且「有限」；這種歸屬感所源出的絕對空間；以及，最重要的是，柏克認為地方和地理的「奇異特質」（singularities），只能由參加自由談話的「成熟」大人來協商。梅塔令人稱道的是，他覺察到柏克從未解釋「地方據以獲致它與認同之重要關係的那些心理和認知運作」。¹⁵ 基於稍早建立了與空間性質有關的關係性命題，並體認到邊界劃設可以與情感或任何寓居感毫無關聯，梅塔也指出，領域可能有多孔邊界，因此具有流動而非恆定的意義。梅塔訴諸法農（Frantz Fanon）的地方觀，即「人們寓居所在的隱蔽無常地帶」，暫時承認所有地理學與人類學情感依附內蘊的無常。我們可以理解，梅塔賞識柏克對帝國統治印度的抨擊，但他卻沒有看見，柏克偏袒繼承遺產（「天生英國人的權利」）甚於普世權利——誠如鄂蘭指出的——提供了「英國國

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從中衍生怪異的一抹種族感受」及其「稍晚對遺傳理論和優生學的執迷」。¹⁶ 梅塔忽視了這一切潛在缺失，冷酷無情地驅向結論：「人類生來不是白板；反之，他們繼承了受制於時間與地方變異的、源自深不可測過往的眾多素質。正是安置於這些參照點中，使得個人和社群擁有某種完整感和自我理解，僅僅是藉由這種完整感和自我理解，便可能且確實能豐富地體驗生活——事實上，僅僅是通過它們，道德行動便有了可能。」¹⁷

以絕對的結論觀之，有鑑於它強調完整性及深不可測，尤其道德行動的可能性僅僅憑靠著社群位於地方中的排他性位置，這簡直是令人震驚。持平而論，這剝奪了基於任何普遍性（如正義或人權）的所有其他批評形式的力量。至於查克拉巴蒂，他覺察到這種危險，並且靈巧地避開。一方面，雖然他主張「普遍和分析會產生最終脫離了當地地方的思想形式」，但另一方面，他體認到「我們需要普遍事物來產生針對社會不正義的批判性解讀」。¹⁸ 沒有後面這種觀點，就無法譴責排他的社群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暴力。梅塔會採取這種立場，似乎有點奇怪，因為他也合撰了一篇敏銳的文章，批判濕婆神軍黨（Shiv Sena）的活動，這是從孟買的當地本土主義演變而來的宗教性國族主義運動，一般將1992-93年的極度暴力歸咎於它，當時有逾千人（多數為穆斯林）遇害，或許有成千上萬人在暴力肆虐的幾個月間被迫逃離城市。¹⁹ 我想，這不是梅塔會支持或縱容的那種「道德行動」。但除了訴諸

起源於它在那個地方的圈地外頭的道德戒律，以及其成員宣稱自己是唯一的正宗馬哈拉斯特拉邦（Maharashtra）居民外，我們還能如何批評濕婆神軍黨的完整感和自我理解？梅塔不經意地用柏克具有種族意涵的地方化限定繼承（康德的國族感）概念，代替了彌爾的家長主義。

梅塔在此表達的情感，深具海德格風格。實際上，他將海德格解讀為在其感受上具有「深厚的柏克風格」。²⁰ 信奉海德格並非梅塔所專有。晚近，擁抱海德格在後殖民思想家之間普受歡迎。譬如，查克拉巴蒂也試圖在海德格和馬克思的兩極對立之間從事三角交叉檢測，來理解自由主義帝國的經驗，利用前者來喚起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者及查克拉巴蒂眼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此致命地忽略的所有地理事實及片斷時間性。這些作者似乎是提議，除了從康德式煎鍋直接躍入海德格式火堆以外，沒有其他辦法能彌補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普遍主義，以及延伸而來的康德式缺陷。海德格思想何以享有特權，成為明顯相關的地理事實得以納入政治理論的方式，依然是個謎。

梅塔認為相關的地理事實，可以納入「構成人類認同之地方與歷史」的政治與心理學意義底下。無論是否受到柏克啓發，這類關切即使在保守派間也很流行。渴望維護權力和特權的階層與系譜，許多保守分子在意於保存滋養這種社會關係的社會、文化及生態環境。因此，對這些環境的任何威脅，都必須嚴肅看待，並盡可能予以抵抗。地理學者騷爾在 1938 年根據這種觀點，寫出

了憤怒的譴責，不僅指控西班牙殖民主義，也針對隨後遍及整個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導致的破壞與掠奪。騷爾抱怨「由於我們急於取得普遍性」，我們大致忽略了「我們自身自然史的複雜性」，騷爾將「歐洲商業、人員及政府擴張」的特徵描述為開啓了「悲劇年代」，僅僅經過一個半世紀，「比起先前的全部人類歷史，對這個世界的生產能力造成了更多傷害。」²¹ 隨著二次世界大戰開打，幾乎無疑是出於政治理由，他的批判力道熄火，直到《早期西班牙美洲大陸》（*The Early Spanish Main*）才重返批判，佩格登（Anthony Pagden，在稍晚版本的導言中）認為本書主要貢獻，在於理解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的黑暗面。騷爾不是浪漫主義者。他了解社會的變遷與演化。在騷爾看來，悲劇在於該區域的豐饒可能性，被如此「無情且愚蠢地拋棄」，大部分是因為哥倫布「不僅無法知悉他置身何處，也不曉得他置身該處的可能後果」。哥倫布是個無知者，遠遠不是偉大的地理學者，他開創了「一種征服和墾殖的模式，在整個西班牙所屬的美洲大陸反覆進行」，帶來災難性的悲劇後果——「儘管我們擁有科學理性主義，仍鮮少致力於修正」這些後果。騷爾開啓的這些主題，日後在佩格登、米格諾羅（Walter Mignolo）及其他拉丁美洲學者的著作中益發流行，而其教訓在於，拉丁美洲的經驗儘管迥然有異，卻是與南亞經驗同樣真實而具毀滅性的後殖民經驗。²² 米格諾羅主張，界定了後殖民領域的南亞學者，並未獨享啓蒙理性與自由主義如何造成損害的經驗，當然也不會獨佔後殖民

理論化（這是知識生產的地理境況，如何在理論建構中扮演獨特角色的有趣案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地理學者像是在1930年代寫作的騷爾，其批判性及反帝國主義的觀點，在後殖民文獻中已經完全遭到忽視。

有趣的是，有個持相同論點的左翼版本，最清楚呈現於反全球化運動及其理論家身上。例如，我們在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的「後發展理論」裡發現鮮明的反對意見，認為西方發展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普遍性，對地方差異過於麻木不仁，而多半視為公平的貿易，都具有新殖民結構，因而遭受極度的剝削（尤其涉及了自然資源的萃取）。我們還發現一種偏袒當地、以地方為基礎的創制精神，據此或可建構出脫離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真實替選方案，從而徹底拒絕所有普遍發展模型。艾斯科巴提議，「重申地方、非資本主義和地方文化，來對抗位於全球化論述核心的空間、資本與現代性的支配地位。」他相信，這將「導致一種後發展理論，揭明從基於地方的文化與經濟實踐視角，來重新設想及重新建造世界的可能性」。艾斯科巴訴諸環繞經濟與地方主題而產生的「新穎辯論」，其中，「主張地方來對抗空間支配，以非資本主義來對抗資本主義支配。」地方在此被概念化為全球化空間的「他者」。有關地方的討論，據稱能「提供一個重要視角，藉以重新思索……資本主義與現代性替選方案的問題」。²³不過，這立即引發了某些問題，即我們如何能合理地將空間和地方解釋為以某種方式相互對立的概念，以及，為什麼空間能連結

上自由主義理論、全球化與現代性，而地方卻是其對立他者的領域。雖然艾斯科巴謹慎告誡，不能「將地方、地方文化與非資本主義形式，物化成爲『原封不動』或『置身歷史之外』」，但仍然有一種壓倒性的趨勢，將「自然與經濟的地方模型，以及與它們有關的社會運動」，當成後發展主義的獨有資源。就此而論，艾斯科巴幾乎是接受了梅塔將受制於地方的情感，視爲唯一可接受的道德判斷形式的駭人看法。很顯然，這些都是有待辯論的議題。同樣清楚的是，地理概念裝置的部署——在這裡是指空間和地方的適當關係——在構想政理解及轉變的可能性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柏克訴諸地理事實，「因爲他視之」爲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基本論據，而梅塔支持柏克的立場，兩者都引發了問題，即那些事實究竟可能會是什麼，以及要如何做才能獲得最佳的再現和理論化。畢竟，如果哥倫布錯得如此離譜，我們憑什麼假定，柏克對印度的看法會比布希對伊拉克的見解來得正確？在這裡，有另一則來自後殖民世界的故事可說，它既支持又推翻了梅塔的爭論，同時嚴重質疑了艾斯科巴說法中確立的空間與地方對立。根據愛德尼（Matthew Edney）的見解，印度作爲一個連貫的地理實體，大體上是大英帝國的概念，而非源自本土。這種定義的關鍵時刻，是英國測量師繪製了印度次大陸的地圖。製圖

是印度的英國帝國主義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只是總督、

首長、將領和戰場軍官能在戰略與戰術上運用的高效能資訊武器，還是正當化、合理化並定義該帝國主義之「感覺結構」的重要成分。測繪與地圖一同將次大陸從具異國情調且絕大部分未知的區域，轉變為界定明確而可知的地理實體。印度的帝國空間是個修辭與象徵、理性與科學、支配與分隔、吸納與排除的空間。它的水平空間邊界，圈圍、分割、從而將政治意義賦予原本均質的空間，不知不覺地與帝國社會階層的垂直邊界融合在一起。帝國或許界定了地圖的範圍，但是製圖界定了帝國的性質。²⁴

印度的三角測量牽涉了建構及施加空間秩序。它接受康德式的時空分離，剔除所有歷史與集體記憶的跡象。它創造出一種對殖民規訓機器至關重要的新印度知識。「像外科醫生檢驗病人般，英國工程師—測繪師檢視著印度地景，猶如有待仔細調查、量測與戳刺的項目，藉此辨認、理解、調整、控制，繼而治癒痼疾和缺陷。」這兒的弦外之音是，英國文化乃「理性、自由、嚴謹而適當」，對比於印度的概念（如空間性）即使具有數學與幾何上的優雅，仍被英國人認為神秘而屬於宇宙論。英國的計畫有部分是要「解放受不合理信念羈絆的」印度人的「心靈」，為達此目的，印度人受邀順服於英國人以他們為材料製成的地圖邏輯，放棄他們自己的所有歷史感，接受每個天生的英國人都該具備的

「感覺結構」。英國人的目標是生產出一套可用於合理而有效之統治的單一、統一製圖檔案（當然包括通過徵稅來榨取財富），而多數人承認這是製圖史上的重大成就。然而，英國人生產的資訊「沒有像他們所以為的，再現出一種完美的、經驗上已知的真實，而是構成了有關社會建構之現實的有爭議知識」。這並不是因為英國人虛偽假造，而是他們對於世界的空間概念——牛頓式與笛卡兒式——生產出一種特殊的同質、普遍且非歷史的知識（「由倫敦管理和控制」！），而其再現乃是片面局部的：

英國印度地圖的理性一致空間，並非中性、價值中立的空間，而是充滿權力關係的空間，事實是英國人控制（或擁有控制的權力）描繪過的土地，而且他們可藉由一種先前統治者不可能辦到的方式，強加適用全印度的法律和改革。帝國空間是由帝國裁決力量予以理性和固定的邊界空間……。在這方面，帝國空間運用邊界，作為將抽象空間等同具體領域現實的機制。藉由重要的概念翻轉，邊界不再是印度政體核心地區間模糊的爭議主軸（邊境），而是配置成為這些核心地區如今據以界定的手段。政治領域的界定，不再是參照那些使它們具有特性或框限它們的物理特徵；它們不再以其統治者的複雜「封建」相互關係來界定。英國人將那些領域的特質轉化為數學空間，正如他們將政治結構簡化為「法治」。²⁵

經由地圖的視角來管理名喚印度的地方，就是管理據稱沒有歷史、記憶或任何其他認同標記的居民，他們僅僅坐落於通過製圖而強加於遠更為複雜的空間上的、統一的歐幾里德空間格網內的位置。印度國族主義者如何利用這些裝置來建構自己的國族認同感，是印度殖民與後殖民歷史的主要故事。他們不能放棄，實際上也不會放棄地圖。他們的任務是要找出某種方式，去填補他們繼承的地圖，重新填入專屬於他們自己的意義，即使它複製了一部分英國製圖傳授的「感覺結構」。這裡正是強力建構的印度國家地位迷思的起源，這是迄今在印度政治意識裡依然勢力龐大的迷思。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指出的，將英國人遺留的製圖學裡的國族迷思拆解成片段，使得印度的空間、地方與地理感，得以結合有關時間與歷史的，極為抽象的現代主義式理解。²⁶

儘管康德原則上反對殖民主義，但他有關空間秩序化的理性主義願景，卻與時間性和歷史脫節，並證實極能適應英國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因此，它一點也不像表面看起來的那麼價值中立而中性。孤絕的自由主義理論在視空間為抽象、普遍而絕對的製圖理性協助下落實，已證實比理論本身更具破壞性。在這種脈絡裡，而且僅僅憑靠這個脈絡，以地理和地方作為對抗性政治之潛在根源的想法，才有意義。但奇怪的是，眾多關切印度個案的後殖民思想家，偏偏向海德格尋求奧援。柏克心目中所設想的、梅塔也援引的那種「地理學事實」，更別提海德格呈獻的迷思與起源的時空世界，顯然都與笛卡兒和牛頓的空間合理性截然不同。但

這並非涉及地方與地理之凸出特質的唯一對抗性思想。其實，潛伏的危險是後殖民理論將繼續秘密受制於英帝國統治遺留的印度製圖形象，並一直試圖以高劑量的海德格神話來填塞。

莫漢蒂 (Chandra Mohanty) 的「製圖學」論文很清晰地說明了，這不是唯一可行的路徑。她指出，要解除後殖民理論本身的殖民狀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雖然她的研究剛開始是鮮明的女性主義，以及某個程度上是普遍的探索，試圖識別並消除「我們殖民且客體化我們不同的歷史與文化，從而與支配和統治的霸權過程合謀」的方式，但她拒絕普遍女性主義的想法，贊成在「令人耗弱的僵化差異」，以及導致真實與概念性「鬥爭製圖學」的權力與鬥爭之變動關係，這兩方之間協商出一條路。²⁷ 她的製圖學既不固定，也沒有像梅塔的情況那樣，被某種「受制於時空變異的高深莫測過往」挾持。再者，這種製圖學也迥異於帝國統治所施加的製圖學。地方（尤其是「家園」），對我們如何建構及認識世界是極其重要的，但我們建構的鬥爭製圖學不會禁錮於任何固定空間（僅僅因為我們改變了位置，譬如從鄉村搬家到城市，我們往往就會遇到截然不同的經驗，以及對世界的認識）。此外，團結與同盟（這是莫漢蒂構想裡的關鍵政治術語）可以跨越空間而建造，而且已經這麼做了，並將固定疆界轉化成多孔邊界，據此經由政治動力的不均地理發展，實現女性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反資本主義鬥爭。在她的例子裡，自由的追尋不是坐落於固定不動的地理內部。反之，它要求（在概念上及實踐上）建構全新而不同

的地理學，以關係性的歸屬原則為核心，並需要一種截然不同於康德式或海德格式架構的空間與地方定義。雖然英國製圖理性的壓迫極為明顯，但訴諸柏克式或海德格式構想（本身也有特殊的壓迫性質），來對這一切提出錯誤的抵抗，也毫無道理。因此，無論我們從哪個方向看，在建造我們的概念性製圖與創造我們的實際地理的方式上，我們都能發現深刻的含意。在這種努力的核心，有個理論和實踐上的難題，即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及應該如何理解，空間與地方之間顯然有問題的關係。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以描述南印度班加洛（Bangalore）市區高爾夫球場上的頓悟經驗，來展開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他的球友指著「遠方兩棟閃亮的玻璃和鋼構建築，就在第一座果嶺後面」，建議他瞄準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或微軟（Microsoft）。在他抵達第十八座果嶺後（在前面九座果嶺曾遇見惠普〔Hewlett Packard〕和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佛里曼打電話給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他說，自由市場全球化和快速技術變革，造就了這樣的世界：

幾乎所有事物都數位化、虛擬化與自動化了。對那些能吸收新技術工具的國家、公司及個人而言，生產力的提升將很驚人。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階段，比起世界史的任何時刻，有更多人將能取用這些工具……。我認為，這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將證明具有極高的程度差異，以致這種差異最後將被視同種類上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引介世界已經從圓形變成扁平的想法。你所到的每一

處，階層體制都遭逢來自底層的挑戰，或是自行轉變，從由上而下的結構變成較為水平的合作式結構……。此後，越來越多經濟體〔將〕是由人民的利益、需求和願望由下而上來治理，而非秉持狹隘統治集團的利益由上而下來治理。¹

52 佛里曼在不同國家旅行，與執行長、科技怪傑和權威人士會面，他發現他們在每個地方都將自己納入全球網絡、積極培育新技術的部署、創造前所未聞的效率，賺進大把鈔票更是不言可喻。他描述空前的技術和組織變革，尤其在資訊科技（IT）部門（在某個地方，他甚至樂於認罪，接受技術決定論的指責，但誤將這種理論歸諸馬克思，大量引述《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在這背後，有著重大的宏觀經濟改革。最初由「像中國、俄羅斯、墨西哥、巴西和印度這些國家的少數領袖」率先實施（往往仰賴威權國家權力來達成目標），一個接著一個國家被推到「更偏向出口導向的自由市場策略——奠基於國營公司私有化、金融市場解除管制、幣值調整、外國直接投資、縮減補助金、降低保護主義關稅壁壘，以及引進更彈性的勞動法律」。他說，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面臨「不可否認的事實，即更開放而競爭的市場，是扶持國家擺脫貧困的唯一可持續載具，因為市場是使新觀念、技術及最佳作法輕易地流入你的國家，以及令私人企業、甚至政府具有競爭誘因和彈性來採納新觀念，將它們轉化為

工作和產品的唯一保證」。不過，一個國家要成功，還要有其他兩項必要條件。首先，國家必須刺激創新，並建構有利於創業精神，以及個人承擔與負責的管制環境。建立這種良好商業環境，正是經濟成功的神奇配方的由上而下部分。其次，同時也必須有由下而上、基層文化理解方面的轉變。一國人民必須內化「勤奮工作、節儉、誠實、耐性與堅韌的價值」，並且「對改變、新科技和女性平權保持開放」。換句話說，如果他們和他們定居的國家，要在當今競爭環境中獲得成功，每個人都得擁抱當代資產階級美德及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²和康德的寰宇主義一樣，爲了符合進入普世（此例爲新自由主義）權利和福祉體制的資格，我們在每個地方都必須變成一個模樣。

佛里曼的著作，是針對近來極爲盛行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觀，一幅出色但言過其實的諷刺畫。這本書顯然抹除了地理學與人類學差異，雖然偶爾這些差異看似確實造成了有待克服的障礙。私有財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普遍體系，一起構成了享有特權（若非唯一）的制度框架，令自主與自由的普世美德得以實現。這就是據稱的「不容辯駁事實」，依佛里曼之見，我們期盼的美好未來都得寄託於此。布希總統（不在佛里曼偏愛的政治家之列）提出了類似論點：壓迫、怨恨與貧窮，將處處遭遇「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反擊，因爲這些已證實了「它們抬升整個社會以擺脫貧窮的能力」。³

這類理論存在已久，但1947年，以馮·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馮·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和其他幾位為首的一群卓越人士，組成朝聖山學會 (Mont Pelerin Society) 時，才顯露了這類理論獨樹一格的當代特色。他們宣稱個人權利，包括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在各處都因為「蒙受專斷權力擴張」，以及「越來越少人信奉私有財產和競爭市場」而「逐漸削弱」，加以「缺乏跟這些制度相關的分散權力及創制，就難以想像一種能有效保障自由的社會」。⁴因此，挾著壟斷性暴力的國家，其角色在於創造和支持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實作，並促進貨幣健全和良好商業環境。不過，國家不應該做得更多，因為根據該理論，國家不可能擁有足夠資訊來預測市場信號（價格），而且因為有權有勢的利益團體（如惡名昭彰的「K街」說客 [K Street lobbyists]，目前腐化了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將無可避免為了己利而使國家干預遭受扭曲，產生偏見。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在培植私有財產的迷思，視之為自主和自由的擔保人上，格外殷勤。他們將鑲嵌在（當時的嚴肅學者，如葛洛休斯 [Hugo Grotius] 和亞當斯密不厭其煩地詳細說明的那種）道德責任的社會系統裡的 18 世紀私有財產美德觀點，轉變為一種絕對物神崇拜 (fetish)，將財產視為不受約束且排他性的個人權利，即隨個人高興來處置他擁有的東西。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對私有財產權行使的任何限制，都被解釋成違憲的「徵收」形式。在佛里曼讚賞的德索托 (Hernando de Soto) 的「絕妙創新著作」中，闡明了這種物神信念。⁵德索托通常被描述為來自秘魯的

本土「第三世界理論家」，但事實上，他在日內瓦長大並接受教育，而且早期曾獲右翼北美新自由主義智庫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Atla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資助。靠著基金會的資金與建議，德索托在秘魯利馬（Lima）成立他的自由與民主研究院（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旋即成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主導傳聲筒之一。柴契爾、傅利曼和一大群其他新自由主義傑出人士，認可他是本土思想家，他出版的書成了國際暢銷書，在發展理論（包括世界銀行的理論）上極具影響力。

德索托認為，全球南方的貧窮是自找的，而不是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或資本主義造成的：主要的發展障礙是資產的擁有（尤其是土地和房屋）欠缺明確的權利。所有權會向信貸市場敞開大門，並將非正式經濟裡的人整合進入全球市場，從而終結貧窮。德索托想法的落實，剛開始是在他的指導下，但後來由秘魯政府接手，隨後由世界銀行接管，並未替在秘魯獲得所有權的120萬人產出預期結果。一個實質效果似乎是大人工作時間更長，他們的小孩工作時間減少。這一點備受世界銀行和主流報刊，以及佛里曼稱讚為正面結果。不過，誠如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的說明，這個結果比較可能是反映了資料蒐集方式，而非人們的日常生活；我還要補充一點，即使這項結果屬實，但認為這有利於工作時間更長的人，而非裨益於他們為其工作的人，這種想法一點根據也沒有。⁶

無論如何，認定作為普世價值的個人化私有財產，為經濟發展和減緩貧窮的必要條件，是沒有歷史根據的。英國位居起點，主導了逾一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世界，同時，皇家、教會、牛津與劍橋學院，以及少數貴族家庭，掌控了約三分之二的土地。實際上，將財產權授予貧困人口，會使得他們蒙受市場剝削。在埃及，將過去所謂的「非正式經濟」再概念化為私有財產導向的「微型企業」經濟（遵循德索托推薦的路線），並納入「微型貸款」的信貸架構，結果誠如艾利埃恰（J. Elyachar）的報導，一點也稱不上仁慈。它試圖將市場評價和規訓強加於傳統工作坊文化，並以相當高的報酬率從該文化萃取出價值。新自由主義者盛讚這類計畫，但真實的結果如艾利埃恰所述，卻是創造了一個「奪取的市場」（market of dispossession）。隨著小額信貸越來越受吹捧為全球貧窮的解答，現在這種作法在全世界日漸壯大。起初是一種非商業方案，向大量赤貧民眾（尤其女性）提供極少量資本，現在商業金融機構吹噓小額信貸計畫是將大量人民納入市場規訓裝置，同時抽取高額報酬率（某些案例高達 20%）的辦法。將慈善小額信貸轉變為具商業可行性的微型金融系統，有其重大意義。這是嘗試實施佛里曼所主張的，對創造新自由主義之平坦世界至關重要的文化變革（一種自我規訓裝置）。現在，這已折射到慈善實踐裡。葛洛斯（David Gross）指出，一群（以華爾街風格培養出來的）新興慈善家如今相信，「要有效對抗貧窮端賴創辦低薪工廠，並建立索取許多美國人視為高利貸之利率的貸款機構。」⁷

認為窮人越是蒙受市場規訓——以及，附帶地遭受富人剝削——就越能獲益，這種驚人觀點一點也不稀奇。稍早於1970年代中期，透納（John Turner）受無政府主義者啓發的著名倡議，於全世界棚戶區與貧民窟裡興建自助式住宅（self-help housing），麥可納馬拉（McNamara）的世界銀行則欣然地予以利用，當成減輕貧窮和低度發展痛苦的關鍵。眾人預想這能導向一種適用於所有人的民粹主義資本主義，從而消除貧窮。這個方案沒能實現目標（雖然有些中間人變富裕了），貧窮更甚以往，一如最近有關我們「貧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狀態的報導裡，令人難堪的記錄。⁸我們應該要記得，葛洛休斯和亞當斯密很久以前的堅決主張，即唯有調節社會互動的「道德情感」達到必要的品質，私有財產權的安排才有機會運作。因創辦非商業性小額信貸方案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尤納斯（Yunus），納入了這種道德元素，但如今無數以商業為基礎的微型貸款方案，卻沒這麼做。

新自由主義者沒去想像強行實施私有財產權，以及基於各種地理、生態及人類學情境來貨幣化市場機構的後果，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更驚人的自負之一。例如2003年，美國要求佔領下的伊拉克，實施全體國有資產和企業的私有化、外國公司得以握有伊拉克公司的完整所有權、開放伊拉克銀行接受外國控制、外國直接投資伊拉克或將利潤匯回本國零障礙，以及消除幾乎所有貿易壁壘。企圖在伊拉克實施這種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毫不考慮該國的複雜社會結構與歷史，導致伊拉克政治經濟的災難性崩潰。

然而，偏袒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轉向，自 1970 年代以降，在雷根主政的美國及柴契爾主政的英國發動市場改革的大張旗鼓引領下，已在全世界蓄勢待發。從 1945 年至 1970 年代中期止，主導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發展型、干預主義的**統制國家**（dirigiste state），一點一滴地沿著傾向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改革。在某些例子（如 1973 年政變後的智利）裡，則是以激烈方式展開變革。在其他案例中，新自由主義改革則是被迫作為嚴重財務危機之部分解決方案而實施。例如，許多先前成功的東亞和東南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歷經 1997-98 年災難性的債務危機，被迫進入局部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⁹ 其他地方改革的推動，則是結合了外部壓力（通常是由美國財政部來指揮協調，通過它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控制來運作）和內部動力（地方菁英試圖從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獲得政治經濟利益）。

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詳細分析，新自由主義據稱是 1970 年代經濟危機的解藥而崛起的過程。雖然原則上，新自由主義化許諾一個免於過度國家干預的自由世界，但實際上，國家卻積極介入塑造良好商業環境（往往是補助資本，卻抑制勞工的願望）、在金融機構遭受威脅時出手相救，以及通過公私合夥（和其他治理結構）或選舉過程的合法腐敗（於是有那些華盛頓的說客），將企業整合進入政府。新自由主義化也許諾了快速經濟成長和世界市場擴張，而其回報將有益於全體。實際發生的卻全然是另一回事。整體而言，新自由主義未能刺激全球性的成長。¹⁰ 但它確實要求不斷

抨擊各種社會團結形式，因為它們不見容於奠基在個人責任與個人進取上的系統。我們也見到國家大幅度地撤離了社會供應。減少貿易壁壘和開放全球市場，有助於經濟活動區位的快速移轉，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去工業化的巨浪，以及勞工階級社區、甚至整個城市區域裡的社會斷裂。「境外轉包」(offshoring)成了眾所皆知的用語。雖然與日俱增的貿易賺得了收益，但這些收益在地理和社會上分配不均。比如說，金融資本的勢力大幅提升，而組織化勞工的力量則大幅削弱，因為國家紛紛相繼針對勞動市場實施更高的彈性，有時候舉措十分激烈。此外，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倡議者，在教育界(大學，以及富裕捐助者和企業於1970年代期間成立的許多智庫)、媒體、企業董事會與金融機構、重要政府機構(財政部、中央銀行)，以及那些管制全球金融與貿易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中，佔據了極具影響力的位置。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在作為普遍性論述模式，以及全球公共政策基礎方面，都取得了霸權。它逐漸界定了許多人藉以詮釋、棲居及理解這個世界的常識之道。我們現在全成了新自由主義者，還往往無所覺察。

這個霸權轉移——如果我們能這樣稱呼的話——滲透進入了試圖搞懂全球化意思的幾乎所有努力當中。搭上這股全球化的風潮，各式各樣的學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大眾媒體的資訊提供者，建構出一幅世界圖像，基本上與弗里曼描繪的並無二致(這就解釋了弗里曼的文本何以流行)。很不幸地，這一點即使在人類

學陣營也是如此，例如有影響力的分析者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就在描述他認定的全球性的新情勢上，扮演了領導角色。他主張，在這種框架裡，我們如今必須理解的，不僅僅是他所稱的「事物的社會生活」（也就是，萬事萬物商品化的世界趨勢），還要理解獨特景觀的生產，像是「族裔景觀」（ethnoscapes）、「科技景觀」（technoscapes）、「媒體景觀」（mediascapes）等等，這接著提供了某種啓發式地理架構，我們可以藉以詮釋在新自由主義化世界中，既積極生產出來又得以持續的人類多樣性。這種構想的問題，不在於它們本身是錯的，而是藉由假定有個稱爲「全球化」的單一而高度抽象的力量，是這些變遷背後的能動者（agent），它們放棄了「拆解」那種力量跟什麼有關、從哪裡來、誰在推動它，以及爲了什麼理由等問題的必要性。世界在概念上變得扁平，幾乎是預設的。首先，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這類術語，轉變到全球化的語言轉移，發揮了遮蔽牽涉其中的權力關係的作用。不過，就其本身而言，這些概念同樣很抽象且有可能是扁平的，因爲它們傾向於反過來遮掩了既助長又抵抗全球化的階級力量之不均地理發展的競逐與矛盾過程。"⁵⁸

例如，認爲越來越多經濟體將如同佛里曼的宣稱，「由人民的利益、需求和願望由下而上來治理，而非秉持狹隘統治集團的利益由上而下來治理」的想法，與過去三十年來，世界上許多領域出現的私人與企業（尤其金融）權力的巨幅而逐漸升高的集中，可謂大相逕庭。新自由主義出現的地方（從美國到墨西哥、

俄羅斯、南非、印度，甚至是當今名義上的「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不平等就隨之萌發。新自由主義化已經為跨國企業、富豪企業家及投資客階級，創造出扁平世界，卻給其他每個人造就了粗糙、參差而不均勻的世界。如同佛里曼的一名報導人確實的觀察，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使得「待在印度，成為《富比士》(Forbes)雜誌評選為全世界最富裕者之一」，或許是頭一回成為可能。¹²

這種情況形同階級力量在全世界的恢復與重建，它十分重要（但在全球化的社會科學分析中，經常遭到忽視），必須有所記載。階級力量本身很難捉摸，因為它是一種閃躲了直接測量的社會關係。但令階級力量得以存在的一項明顯可見、必要而普遍的條件，是收入及財富累積於少數人手中。到了1990年代中期，聯合國報告已經廣泛注意到世界各地這種積累與集中的存在。於是人們發現，世界358位最富裕者的淨價值，相當於世界人口最貧窮的45%（23億人）的總收入。在新自由主義統領一切，即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風平浪靜年頭裡，全世界最有錢的200人，於直到1998年止的四年內，財富淨值翻了一倍多，超過一兆美元。儘管進度參差不齊，但這些趨勢隨後加快了速度。1980至2000年間，居美國所得賺取者前1%的人，佔全國所得的分額增加了一倍多，頂端0.1%的人則增加了兩倍多。1972至2001年間，第99百分位的收入上升了87%，而第99.9百分位的收入則上升了497%。1985年《富比士》評選美國400名富

豪，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總財富為 2,380 億美元，平均每人的淨值為 6 億元。到了 2005 年，他們的平均淨值是 28 億美元，集體資產總計則達到 1.13 兆美元——超過加拿大的國內生產毛額。到了 2006 年，頂端 1% 的美國人獲得史上最高的國民所得分額（超過 21%）。財富與收入不平等達到 1920 年代以來未曾見過的程度（這或許解釋了何以 2008 年金融風暴如此雷同於 1929 年的危機）。這個轉變很大部分導源於迅速升高的經理薪酬率。1980 年，以 2004 年的美元幣值計算，美國執行長平均一年約賺 160 萬美元。到了 1990 年，這個數字上升到 270 萬美元；2000 年的數額達到幾乎兩倍的高峰後，2004 年大約是 760 萬美元。換言之，相較於勞工工資平均一年增加 0.8%，經理薪酬每年平均上升 6.8%。然後，還有避險基金管理人，他們理應在分散風險上扮演具生產性的核心角色，在 2005 年，他們當中的前 25 人，每個人平均中飽私囊不少於 2 億 5,000 萬美元。到了 2006 年，有好幾個人拿了超過 10 億美元，據報導，其中的佼佼者獲利達 17 億美元（這在紐約市的主要文化機構之間，引發了競相任命他為董事會成員的可憎競爭）。2007 年，領先的四大管理人每人獲得超過 30 億美元報酬。據報導，1990 年代重要性遽增的私募股權公司負責人（他們專門將上市公司轉變為私人公司、加以重組，並將它們放回公共領域以取得巨額利潤），獲得相同的報酬水準。而且，為了避免交易員開始從事他們自己的避險基金投資，大型銀行必須提高它們給高階人員的薪酬率，從 2000 年的標準規格 1,000 萬美元左右，提高到

2006年的5,000萬美元（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首腦獲得5,200萬美元，交易員平均分紅68萬5,000美元）。布希政府的稅收政策可恥地擴大了美國的這些差距。所得賺取者頂端1%的人，以及靠股息紅利和資本收益過活的人，而不是領薪水和工資生活的人，拿走了大部分利益。2006年的稅收改革，給位居所得分配中間位置者約20美元的稅收減免，而前1%裡，平均收入530萬美元的前10名，平均可以省下8萬2,415美元。¹³

60

這種趨勢不限於美國。無論何時何地新自由主義佔據了主導地位——而其地理傳布極不平均——收入與財富的巨大差異就接踵而至。繼1988年墨西哥的私有化浪潮之後，1994年《富比士》全世界富豪名單出現了14名墨西哥億萬富翁，其中斯利姆（Carlos Slim）排名第24。2005年，貧窮率很高的墨西哥，聲稱億萬富翁比沙烏地阿拉伯還要多，到了2007年，斯利姆還被認為超越了蓋茲（Bill Gates），成為全世界最富裕的人。1990年代印度新自由主義改革浪潮之後，12位或更多印度人出現在《富比士》富豪名單。俄羅斯「震撼療法」市場改革的幾年內，七名寡頭便控制了近半經濟，據《富比士》記載，如今俄羅斯有27名億萬富翁（創造出普丁〔Putin〕令人遺憾但可以理解地藉由回歸國家威權主義，試圖極力抑制的權力基礎）。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記錄了1980年代以後不平等的大幅增長，東歐和獨立國協（CIS）國家亦同。雖然堅實而確鑿的數據資料很難取得，但中國有著1980年以降，大量私人財富累積（尤其房地產開發方

面)的眾多跡象。1997年,華南一名貧窮農民創辦的房地產公司,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公開募股,籌資150億美元,「使楊國強的家人成了或許是中國最有錢的人。」持有60%股份的楊家24歲女兒,目前身價約90億美元,超過索羅斯(George Soros)和梅鐸(Rupert Murdoch)。柴契爾在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促使頂端1%所得賺取者佔全國所得的分額於2000年倍增。更可恥的是,我們看見1997至2007年間,在布萊爾(Tony Blair)的工黨政府主政,以及可靠的社會主義者布朗(George Brown)的經濟管理下,英國最頂端的所得賺取者群體的全國所得分額增為三倍。(工黨內閣成員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的名言:「我們對於獲得骯髒財富的人極為寬大。»)剛開始還設法將強勁成長與合理公平的分配結合起來的東亞與東南亞所謂的「發展型國家」(尤其是南韓、台灣和新加坡),1990年以來的不平等指數上升了45%,這個變化多半發生在1997-98年間的嚴重金融危機,以及隨後迫使其經濟體新自由主義化之後。有些印尼貿易大亨的巨大財富,毫髮無傷地逃過了這場創傷,後者造成大約1,500萬印尼人失業,而且像三林集團(Salim)那樣以印尼為基礎(雖然是華裔)的貿易團體,如今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企業集團之一。不平等程度唯一減緩的是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而其減緩幾乎得完全歸功於中國驚人的成長表現,緊接著的是印度。這些國家的人均所得都提高了,即使國內的不平等隨之飆升。¹⁴

在富裕量尺的另一端,新自由主義化幾乎沒有改善世界上大

多數貧困與邊緣群體的處境。1980年以來，資方可以利用的全球勞動力，規模擴增為三倍——約30億勞工。增加的人數中，有四分之一源自人口成長（大部分在較窮困的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另外四分之三可以歸因於俄羅斯、中歐及中國納入全球市場，以及印度與印尼更密切地整合進入全球市場，所造成的無產階級化。僅僅是這些增長的規模，就形成了拉低全球勞工薪酬的沉重壓力，但這個新興可用的全球勞動力在政治上的耗弱，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讓各類型資本家（包括小商品生產者與大型全球企業）得以投入剝削實踐（如我們所見，合理化為減貧的必要手段！）。在其陳述的尾聲，佛里曼承認，「這個星球上有好幾億人被這個扁平化過程拋在後頭，或感覺像是要被它壓垮。」現在，12億印度人口當中，只有2%（據佛里曼估計）參與了濃縮於班加洛高爾夫球場視野的新興繁榮。其他印度人則生活在不是「不平」（充滿痛苦與絕望）、就是「半平」（充斥焦慮，期盼經由奮鬥而找到安身之所）的處境。佛里曼從來沒想過，他提議的解決方案——擴大新自由主義改革，促進扁平化——實際上正是不斷升高的不平等與持續深化的不安全等問題的根源。¹⁵不過，新自由主義理論最擅長遮掩的正是這件事情。

柏克訴諸地理學事實，批判英國在印度的帝國行徑，藉由相同方式，地理學、生態學和人類學的事實，也經常用來作為痛擊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合時宜的棍棒。在某些人看來，問題主要出在應用上。史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曾擔任柯林頓的經濟顧問

委員會主席) 嚴詞指責決策者，尤其像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這類權力極大的金融機構的決策者，不加分別地將一種普遍、「一體適用的」正統新自由主義取向，應用於每個地方的經濟發展。他對於新自由主義於 1998 年在印尼造成的社會破壞深感震驚，公開表達他對國際貨幣基金的批評，隨即被迫離開他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職位。雖然史蒂格利茲注意到印尼災難的結果，有利於華爾街與美國金融界利益，並且惡化而非緩和了當地的社會與地理不平等，但他沒能認識到，階級力量的增強一直是新自由主義向來所作所為的根本。在他看來，裨益於富裕者，是鎖定經濟穩定等其他目標的政策的不幸副產品。薩克斯（與安潔莉娜·裘莉合作在非洲赤貧地區行善）如今也大致同意史蒂格利茲的診斷。「今天的發展經濟學就像 18 世紀的醫學，當時醫生使用水蛭來吸病人的血，病人往往在過程中死亡。」世界的「貨幣醫生」——國際貨幣基金——通常「給那些窮得沒腰帶 (belt) 的人」，開立「預算緊縮 (belt-tightening)」的處方。結果造成「暴動、政變和公共服務的崩潰」。他認為，「面對貧窮的挑戰時」，新自由主義一直「奠基於一種過分簡化、甚至是頭腦簡單的觀點。富國告訴窮國：『貧窮是你們自己的問題。變得像我們一樣〔或是我們想像的自身模樣——自由市場導向、具創業精神、負起財政責任〕，你們也能享受以私人部門帶動經濟發展的財富』」。¹⁶ 不出所料，這正是佛里曼的預設。

其他人的反對則是，忽視資本主義得以蓬勃發展的文化環

境，導致了詮釋和判斷的極致錯誤。直到1997-98年金融危機以前，東亞和東南亞出現的耀眼成長表現，經常歸因於「亞洲」或「儒家」價值（就像新教價值，據稱是17和18世紀英國資本主義崛起的關鍵），以及商人之間長期鑲嵌的互信互惠系統（這幾乎完全侷限於家長制關係內的男性）。中國人的這個系統稱為關係，由於它在不同區域環境利用文化傳統獲得競爭性經濟優勢的方式，而廣受好評。¹⁷新自由主義機構如世界銀行，開始在報告中將它描述為市場經濟如何得以運作的絕佳實例。只有當蒙受危機打擊，這個社會關係系統才遭到嚴厲批評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彷彿華盛頓的K街就沒有擠滿朋黨密友）。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裡的新自由派主張，解決方案是「善治」（good governance），回到私有財產安排、純粹競爭，以及適當運作的市場等基本原則。當然，這是個碰巧對華爾街和金融業者好處多多的解決方案。

針對新自由主義化之暴力與不人道的更根本批判，是通過社會運動來發聲的。在這方面，不尊重地方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問題格外凸顯。貝洛（Walden Bello）、喬治（Susan George）、羅伊（Arundhati Roy）、阿敏（Samir Amin）、桑托斯（de Souza Santos）和組成統括性的另類全球化運動（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Movement）的許多其他人，所提出的銳利分析，揭露了新自由主義的黑暗面，凸顯了位於特定地方，影響特定社會群體的特定破壞（如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Zapatistas〕、印度納瑪達谷

〔Narmada Valley〕的原住民族和印度農民、巴西的無土地農民運動，或是肯亞的綠帶〔Green Belt〕婦女運動)。階層式權力確實遭到了挑戰，不過並非來自佛里曼設想的進取創業過程，而是拉丁美洲查維茲 (Chavez) 和莫拉瑞斯 (Morales) 的玻利維亞革命。¹⁸ 事實證明，世界社會論壇「不滿現狀者」(malcontents) 的組織形式，比起在華爾街或倫敦西堤區 (the City of London)、更別說是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貿易組織裡能發現的任何組織，更吻合佛里曼所理想化的水平與協作結構。反抗國際貨幣基金、世界貿易組織和八大工業國會議 (G8 meetings) 的運動，全都凸顯了這些機構的階級與新帝國主義特質，同時強調，相較於實際存在的人類學、地理學和生態條件，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地方的感覺非常遲鈍。然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不侷限於左派和社會運動。例如，保守派政治科學家葛瑞 (John Gray) 就抱怨，儘管「全球自由市場的烏托邦，沒有像共產主義那般造成人類犧牲」，但是「隨著時間過去，它導致的痛苦卻可能與共產主義不相上下」。他說，「我們不是站在自由市場論者預期的豐盛時代，而是悲慘時代的邊緣，其中，無序的市場力量與萎縮的自然資源，將主權國家拖進日益危險的敵對狀態」，導致「一個戰爭與匱乏的世界，至少不亞於競爭的慈善和諧」。¹⁹ 柏克的精神長存。

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經常召喚地理學、生態學和人類學的事實，來支持他們的批評及另類願景。在地食物及食物主權、自給自足地理學、生物區域配置、地方交易系統，以及新領域結構

中更緊密的新社會關係系統的發展，都是尋找替代方案的部分修辭。有些提議鼓吹全球經濟的電子連結。其他提案，如全球化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of Globalization），這個「對所有利害關係人負責、由當地擁有的企業（locally owned enterprises）組成的全球經濟體系」的新地理，被設想為能夠克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所造成的，人與自然及人與人類同胞的異化。這類提議帶有社群主義和在地主義（localist）的語調，但還是以私有財產權、個人創制和民主機構等形式，納入了強大的自由主義元素，即使它們將這些元素包容進一種設計得更緊密的領域性社會關係結構裡。不過，這類提議認為，生產出不同型態的地理，是達致更平等而令人滿意的、與自然及其他人類的關聯模式的要素。²⁰ 這引起了這種不同的地理如何生產出來，以及由誰生產的問題，而這又要求更仔細檢驗新自由主義計畫的固有地理特質。

譬如，何以新自由主義面臨七零八落的實際成果，以及大鳴大放的多重批評，仍然如此有影響力（如果還未佔支配地位的話）？部分答案在於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智庫、企業主導的媒體，以及學術界許多部門的勢力，主導了討論。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勢力和威望，以及它去歷史（ahistorical）和非空間（aspatial）的理論化方式，也扮演了要角。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所假設的世界，其構成元素為孤立的男女；生產者與消費者；買家與賣家；企業家、公司和大型企業；以及，推定為中立且不具地方特性的市場與法律機構。雖然傳統經濟理論向來

關心如何解釋各國財富的差異（這是個十足地理學 / 人類學的問題），但它顯然沒有提供連貫一致的答案，即使相較於所有其他社會科學的加總，經濟學已經獲得更多資源、聲望及公共政策影響力。儘管最近有頗多創新，探討各國財富差異的經濟學理論，其解釋還是難以捉摸，也總是出自其基本命題的封閉（且完全無涉於空間）觀點。²¹

新自由主義造成不均地理發展的事實顯而易見，比較不清楚的是，它如何利用不均的地理學、人類學和生態學發展（包括它所造成的那些發展）作為促進其世界計畫的普遍性手段，這個計畫同人類整體福祉毫無關係，卻與提升它自身的支配性階級力量關係密切。簡言之，不均地理發展不僅是結果，還是世界舞台上新自由主義化的驅動力量。我們有必要仔細考察情況何以致此。

資本（尤其是貨幣資本）橫越空間移動——例如，介於巴伐利亞、班加洛、伯明罕和波札那（Botswana）之間——的輕而易舉和流動不定，是全球經濟內部空間、地方與生態系統之間動態關係的明證。在這種移動中，與投資需求相關的特定地方（物理、社會及政治）性質的細微差異，可以被充分利用來替那些移動者獲取厚利。同時，地方上固定資本和社會投資的漸增分量，創造出新的地理景觀（譬如建成環境和地方文化），而這要求認真致力維持這種人造地景，使其得以延伸到不確定的未來。這意味了某些資本家階級的利益集團（有時會與強盛的地方勢力結盟），將積極投入保衛享有特權的地方（甚至是班加洛的高爾夫球場）的政

治，使其免於開放競爭的狂風。

領域（國家、區域或城市）之間，有關誰擁有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型或最佳商業環境的競爭，在1970年以後建立的、更流動而開放的貿易關係系統中，變得更為激烈。成功的國家或區域會給其他地區施壓，令後者學習它們的榜樣。蛙跳式創新（leapfrogging innovation）使某個國家（日本、德國、台灣、美國或中國）、區域（矽谷、巴伐利亞、第三義大利、班加洛、珠江三角洲或波札那），甚至城市（波士頓、舊金山、上海、新加坡、巴塞隆納、紐約或慕尼黑），成為資本積累的先鋒。但競爭優勢往往證實只是曇花一現，將劇烈的空間波動導入了全球資本主義。地域化成長的週期性插曲，點綴著地域化創造性破壞的激烈階段，通常在特定年代、於特定地方展現為嚴峻（且往往具社會破壞性）的金融危機。例如，阿根廷於1990年代向外國資本和私有化開放，有幾年還是華爾街的寵兒，1990年代末國際資本撤資時卻崩潰了。金融崩盤和社會破壞，接著是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這種金融危機在整個開發中世界蔓延，很快就壓垮了某些經濟巨人（如南韓），隨後導致照例與階級力量徹底轉型有關的復甦。在其他事例中，如巴西和墨西哥，一波又一波的結構調整和財政緊縮，導致廣大群眾面臨經濟癱瘓，卻授予政治經濟菁英可觀的利益。在某些地方對某些人而言的「成功」，模糊了新自由主義何以整體來說沒能刺激強勁而可持續的全球成長。創造出來的錯覺是，只要我們全都表現得有如當時的成功國家，我們就可望成功。

隨著國家的角色從照料公民福祉（家長式社會民主體制），轉變為提供良好商業環境，領域之間和國家之間的競爭日益升高，於是深化了新自由主義的信奉。政治權力的分散化，成為新自由主義計畫裡極為重要的附屬品。如果自治市、城市、區域和國族國家的運作多少有如自主自足的企業單位，那麼，它們之間競爭的強化，就會迫使它們全都日益傾向提供良好商業環境給資本家，以便維繫或吸引投資，以及希望藉此獲得的工作。政治權力的日趨地理分散，已然成為過去 30 年來，資本主義歷史地理的重要特徵。例如在中國，構成 1978 年以後國家顯著經濟發展基礎的，正是在控制下將經濟決策權下放給區域、省、自治市、甚至是鄉村。

然而，良好商業環境所要提供的到底是什麼，並不全然清晰明白。適當的勞動力是一項必要成分，但資本主義的需求可能有極大變異，涵蓋低薪資與順從的勞工，以及具有純熟技術與創新能力的勞動供應。補貼公司前來投資或設廠駐留，是另一個常見策略，尤其 1980 年代期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地方政府，從政府的公共庫房撥出鉅額補助給企業資本（過程中往往負債累累）。
67 強化都市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會造成某些奇特的地理後果。例如，尋找壟斷租（monopoly rents），會導致強調都市環境之獨有特質（如文化襲產）的商品化。如果這種獨有特質（例如雅典衛城〔Acropolis〕）不是現成的，那麼就得創造出來（例如興建簽名式建築，像是位於畢爾包〔Bilbao〕，由蓋瑞〔Gehry〕設計的博物館；

舉行電影或藝術節慶等獨特文化活動；或是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都市行政部門試圖發展所謂的文化產業、知識產業，或僅僅是由奇觀驅動的產業，來增進象徵資本。城市聲望的行銷，本身就是一筆大生意。²²

因此，強化的區域間競爭遂鎖定於這種需求，即政府（及治理結構）越來越是朝著提供良好商業環境的方向調整，卻不考慮當地居民福祉，而且在某些案例中，全然不考慮財政後果。區域間競爭的強制性法則，確保這種情勢看似別無選擇。如果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接近佛里曼描繪的那般扁平，那麼新自由主義根本不可能運作。

從幾乎每個地方的上層階級立場來看，新自由主義在物質上和意識形態上都已證明是一件巨大而完全的成就。²³ 苦難遍布的國家如墨西哥，經歷了內部階級結構的大規模重整。由於上層階級的利益主導了媒體，某些領域失敗乃因為它們競爭力不足的神話遂得以宣揚——這便替更多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及不斷提高企業利益的補貼水準，作好了準備。領域內部與日俱增的社會不平等（甚至對勞工的極度剝削），被視為鼓勵企業風險與創新，以便握有競爭力、刺激經濟成長所不可或缺的。如果下層階級的環境惡化，是因為他們通常基於個人及文化理由，沒能（通過專心致志於教育、採納新教工作倫理、服從工作規訓、欣然接受靈活彈性，以及佛里曼推薦的所有其他文化調適）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這種想法認定，因為缺乏競爭實力，或因為個人、文化與政

治上的缺失，才會發生問題。在一個達爾文的世界中，這種論點指出，唯有最適者才應該生存，而且確實存活下來。

這便將我們帶往一個主要謎題。如果富裕者變得更有錢，而且如果新自由主義沒有產生多少成長，那麼財富和收入一定是重新分配了，不是從一般大眾流向上層階級，就是由脆弱區域流向了富裕區域。這兩種移動都導致我所謂的「奪取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²⁴ 我用這個詞來指稱，轉向伴隨資本主義興起而來的掠奪式積累實踐。這些實踐包括，土地與勞動力的商品化及私有化，以及強行將農民驅離土地（例如最近墨西哥和印度的情形）；將各式各樣（共同、集體、國家）的財產權形式轉換為排他性的私有財產權；壓制使用公地的權利；壓抑另類（本地）的生產和消費形式；占用資產（包括自然資源）；奴隸交易（一直延續至今，尤其性產業方面）；高利貸；以及當中最具破壞性的是，利用信用系統和債務圈套來獲取他人資產，以始於 2006 年，橫掃美國房市的喪失抵押品贖回權（mortgage foreclosures）為最戲劇性的代表。

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改革計畫的核心信條）的全球巨浪，其首要目標向來是在迄今被視為盈利算計禁區的領域，開闢資本積累的新場域。公用事業（水、電信、運輸）、社會福利供應（社會住宅、教育、健康照護、退休金）、公共機構（大學、研究實驗室、監獄），甚至戰爭（例如在伊拉克武裝部隊旁執行任務的私人承包商「軍隊」）與環境（污染權交易），全都私有化了。1990 年

代，墨西哥共有地（*ejidos*）的私有化，迫使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或（非法）到美國找工作。中國政府同樣剝奪了許多農民的默示土地權，並將這些資產的控制權（即使沒有私有財產權）轉給政黨菁英。在美國，國家行使國家徵用權（*eminent domain*），以摧毀還能發展的社區為代價，釋出土地以從事更有利可圖的用途。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內部，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agreement）而建立的智慧財產權，將遺傳物質、種籽原生質（*seed plasmas*）及其他各種產物界定為私有財產。從那些在發展這類遺傳物質上曾扮演要角的人群中，可以吸取使用租金。有些企業執行長現在相信，對公司而言，相較於房地產、廠房和設備，專利權和智慧財產權實際上將成為具更高價值的成分。全球環境公共財（土地、空氣、水）被耗盡，棲地因自然的全盤商品化而劣化（資本密集的農企業正是一例）。經由觀光而展開的文化形式、人群歷史及傳統的商品化，導致了剝奪。音樂產業因為剝削草根文化和個人創意而惡名昭彰。將歷經多年階級鬥爭贏得的公共財產權（國家退休金、福利、國家健康照護的權利）逆轉回到私人領域，是以新自由主義教義之名追求的所有奪取政策中，最令人震驚的政策之一。資產從公共領域轉移到菁英可以更輕易掌控的私人領域。國家權力經常被用來強行推動這種過程，即使違背了民眾意願。

1970年代以降的解除管制，使得金融體系藉由投機、掠奪、詐欺和偷竊而成爲重分配活動的主要核心之一。股票炒作、通過

併購而拆賣資產、提高債務責任水準，使得甚至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陷入了以勞役償債的地步（在美國，過去30年來，即使工資停滯不前，家戶債務卻增為三倍），更不用說企業詐欺和侵吞退休基金了：這一切都成為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核心特徵。給予經理人股票選擇權當作報酬，令資本擁有者和經理人的利益合流，所促成的對股票價值的重視，導致市場操弄，犧牲了多數人而使極少數人獲得巨大財富。安隆公司（Enron）令人矚目的垮台，就象徵了剝奪許多人生計及退休金權利的一般過程。此外，我們還得檢視避險基金和其他大型金融資本機構從事的投機性襲擊——激起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那種。這些構成了全球舞台上，奪取式積累的前鋒，而它們正是假定要替資本家階級提供「分散風險」的正面效益。為了執行這種功能，如我們所知，頂尖避險基金經理人單單是在2005年，平均便獲得2億5,000萬美元報酬，但這跟好幾位經理人在2007年超過30億美元的收入相比，根本不算什麼。

除了多數新自由主義金融操弄特有的投機性且往往是欺騙性的泡沫外，還有一種更深刻的過程，導致「債務陷阱」出現而成為奪取式積累的主要手段。世界舞台上的危機創造、管理及操縱，已經演變成為一門將財富從窮國審慎地重分配到富國的精緻藝術。1960年代期間罕見的個別國家債務危機，在1980與1990年代卻屢見不鮮，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達到高峰，令許多華爾街人士跌破眼鏡，正因為它給幾乎每個人、每個地方都帶來虧損

(它原本應該要分散風險)。債務危機越頻繁，就越是招徠以債務合理化作爲解決方案，即取得經過謹慎組織的更多債務（這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日益擅長的手法，如今引領著世界各地中央銀行的政策）。危機乃是經過協調、管理及控制，以便合理化整個系統，並大致上是將較貧窮且脆弱經濟體的資產，重新分配給金融大都會，開發中國家則幾乎無一倖免。韋德（R. Wade）與維內羅索（F. Veneroso）如此描述 1997-98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後果：「金融危機往往造成所有權及權力轉移到那些本身資產完整無缺，以及能夠創造信用的人手中，亞洲金融危機自不例外。……西方和日本企業無疑是最大贏家……。大規模貶值、國際貨幣基金推動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國際貨幣基金促進的復甦，三者結合起來，甚至可能促成了過去 50 年來，世界任何地方於承平時期的最大規模的從國內轉手給國外所有權人的資產轉移，使得 1980 年代的拉丁美洲，或 1994 年以後的墨西哥，從國內轉給美國業主的資產轉移相形見绌。猶記得梅隆（Andrew Mellon）發表的聲言：『不景氣期間，資產會歸返它們的合法所有人。』」²⁵

儘管 2008 年金融危機看起來不一樣，但它實際上完全吻合這段長期歷史。唯一的顯著差異在於它規模更大，更無所不包。過去，地域化的危機與貶值會受到調控，以便促進奪取式積累，卻不引起大崩潰或是太激烈的人民反叛。由帝國主義金融強權的華爾街 / 財政部 / 國際貨幣基金複合體掌控的結構調整方案，負責處理頭一件要務，至於確保騷動不會失控，則是遭襲擊的國家或

部門中的買辦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獲得帝國強權的軍事援助支持）的工作。然而，在 2008 年，始於美國的危機迅速蔓延，席捲了全世界。國際貨幣基金依循典型路徑來回應，但這一回是政府與中央銀行（而非國際貨幣基金）替金融機構紓困，同時通過失業、衰退、資產價值喪失（尤其是住宅）及國債巨幅增加等混合措施，把債務留給一般民眾支付。某些華爾街機構破產或被迫合併，但那些存活下來的機構，卻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強大。犧牲人民來拯救金融機構的新自由主義法則，以難以想像的代價嚴密執行。從鞏固專斷階級力量的觀點看，2008 年金融危機遠遠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反而是它的頂峰，即便它揭開了新自由主義理應致力於個人自主與自由的修辭面紗。再次地，資產歸返「它們的合法所有人」！是否會有人民反叛，仍有待觀察。

劃時代的轉變產生，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入當前的壓倒性支配位置，接著很可能伴隨發生各種其他概念、意識形態、政治及文化上的轉變（雖然不完全是佛里曼設想的那種）。例如桑托斯注意到，1975 年之前很少使用的治理（governance）一詞，近來成爲思考和實踐政治的主要方式。治理的意識形態以管理效率與合理性的理想爲根據，匯集重要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這是受到偏愛的用語），以達致「最適宜」但「政治中立的」公共政策。但這是騙人的假面——它是如此迷人，以致王愛華（Aihwa Ong）等人視其爲新自由主義化的本質。基於「公私夥伴關係」（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的概念，以及將各種利害關係人

納入共識聯盟的精巧機制，治理有效地掩飾了通過網絡化且分散化的組織性政經權力系統，重新分配財富與收入給有錢人的階級與社會關係。²⁶但是，王愛華卻從未想過，更別說是質問這種可能性。彭博（Michael Bloomberg）主政的紐約市府，是個典型例子。他本身是億萬富翁，實際上可以不虧欠任何人地買到市長職位，並宣告一種「超越政治」的行政體系。他確實將市政府合理化，達到高水準的效率，並在城市裡以改善的方式供應了許多。但他的目標是要令城市在全球經濟中具有競爭性。無數個高價值開發計畫，正在重新塑造城市。我們知道，他不要補貼公司以期它們落腳城市，而是要吸引負擔得起高昂地段成本的高級企業。雖然他不敢這麼說，但相同原則也適用於人。曼哈頓已逐漸成為富人階級的避風港，他們極為富裕、往往是跨國資本家階級，是「中立」而「有效率的」彭博政府所能供應事物的積極受益人。將這種偏袒單方的階級計畫，概念化成彷彿只涉及了有效治理，顯然有所誤導。²⁷

錢德勒（D. Chandler）強調，在新自由主義化底下有股平行趨勢，是對人權（尤其是奠基於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的權利）日益感興趣。他提到1980年以前，沒什麼人注意這個議題。倡議團體（有許多屬於跨國性質）、非政府組織（NGOs）和草根組織（GROs）同樣於1980年以後倍增繁生。這些組織步入國家撤離社會供應後遺留的真空。在某些情況下，這有助於加速國家從社會供應中撤退，將非政府組織轉變成「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特洛伊木

馬」。²⁸ 法律安排必然得調整以適應這些局勢，而法院目前承擔了更重要的角色。政策圈和治理實踐越來越強調市民社會（相對於國家）的核心地位。如今，市民社會內部的有效行動和組織，比起國家機器，往往被視為更重要的社會變遷所在地。因此，爲了把事情做好而控制國家權力的驅力，就被認為越來越沒那麼急迫了。自願性協會（voluntary association）變得更重要，政黨則衰落式微。所有這些轉變都相互涵攝，並銘記了與新自由主義轉向有關的社會與政治變遷的深度及廣度。

這些轉變與新自由主義崛起的根本關聯，很容易建立起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堅決主張個人是政治經濟生活的基礎，這便開啓了廣泛個人權利行動主義的大門。藉由聚焦於這些個人權利，而非社會團結與民主結構的創建，運動遂以新自由主義角度來表達其反對意見，這意味了立足於法律機器內部，或是採取市民社會的組織形式（尤其非政府組織）。循法律途徑所費不貲且曠日費時，而且法院通常偏袒私有財產權和利潤率，甚於平等權和社會正義。不過，企業被視為法人（除非它們認為在像是國際刑事法庭面前，爲了避免替其一切作爲負責而否認這種地位，乃攸關重大的時候）。甚至國家都被視為國際系統內部的「虛擬個人」（康德的用詞）（雖然國家再度擁有策略性辦法能避免承擔「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之責，就像美國的情況）。屢屢訴諸法律行動，反映出新自由主義對法治的強調，以及偏好仰賴司法與行政權力，而非代議民主。法律取代政治，「成爲在公開

場合表達需要的媒介。」錢德勒總結說，新自由主義菁英「對尋常百姓和政治過程的幻想破滅，促使他們更關注握有權能的個體，將他們的案件交由聽訟並裁決的法官審理」。²⁹不過，還是有一定的操縱餘地。法律可能遭到挑戰並修正，而某些社會運動（如巴西的無土地農民運動）即通過其行動實現法律規範的重大修正。再者，法律也不是在各處領域都同體一致，即便它可能在公告上具有普遍性。跨越國家邊界來協調法律安排的需求，創造了無數個不確定的地區。例如，飛航安全或勞動過程的管制，要擴展到什麼空間？實際上，美國所制定的聯邦航空局（FAA）規則全球適用，因為所有飛入利潤豐厚的美國市場的航空公司，都必須遵守。再者，管制環境衝擊或國際商業的法律，可以為各式各樣其他目的所援用，像是逮捕黑手黨首腦，或是延攔資本家開發商的破壞性運作。

非政府組織有時做得很好，並且促進了進步政治。但它們往往是菁英、無法課責，而且在社會上遠離那些它們試圖保護或幫助的人。它們可能隱瞞它們的議程（往往是由遠在天邊的捐贈組織設定的）。大多數時候，它們尋求整合進入治理結構，最終不得不控制而非代表它們的委託人。它們假定要代表那些無法自己發聲的人說話，甚至界定了它們代言者的利益。例如，當組織成功鼓吹禁止於生產中使用童工（它們視此為普世人權的課題），但在此同時，它們可能損害了以童工為生存基礎的經濟。由於兒童的父母缺乏任何可行的經濟替代出路，兒童反而可能會被賣為娼

(讓另一個倡議團體去謀求根除賣淫)。「權利話語」(rights talk)所預設的普遍性，以及非政府組織與倡議團體為推行普世原則而專心致力的作為，與地方特殊性及政治經濟生活的日常實踐，可謂格格不入。³⁰

74 不過，近年市民社會中強調權利與組織動員的特殊反抗文化，之所以備受矚目，還有另一個理由。奪取式積累所要求的一套實作，大不同於工業及農業通過薪資勞動擴張而實現的積累。後者曾在 1950 與 1960 年代主導了資本積累過程，而其激起的反抗文化（像是鑲嵌在工會與勞工階級政黨中的文化），造就了社會民主的折衷方案（如果還不是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相較之下，奪取卻是零散而特殊的——此處私有化、彼方環境劣化、其他某個地方則是喪失認同或債務金融危機。如果不訴諸普遍原則，就很難對抗這一切地理具體性和特殊性。奪取導致了權利喪失。因此，就會轉向人權、尊嚴、可持續生態實踐、環境權等普遍主義修辭，作為統一的對抗性政治的基礎。這正是跨國倡議團體、非政府組織和草根組織變得如此專精於追尋，並往往能有效達成者。而且，這也越來越是基進對抗性政治的內涵。

然而，權利普遍主義的訴求是把雙面刃。它可能且可以懷抱著進步目標而運用。以國際特赦組織、無國界醫生（*Médécins sans Frontières*）及其他組織為最引人注目代表的傳統，不能當成只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附屬品而予以輕忽不顧。人道主義（包括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與各種非西方版本）的整個歷史太複雜，無法如

此看待。但是，許多權利論述的有限目標（例如直到最近，特赦組織的焦點還是僅關注公民權及政治權，而未及於經濟權），使它們即使是作為反抗文化，也很容易被納入新自由主義框架。普遍主義似乎與譬如氣候變遷、棲地破壞導致生態多樣性喪失等全球環境議題，格外能彼此協調。但是，考慮世界各地政治經濟境況和文化實踐的多樣性，普遍主義在人權領域取得的成效，就比較成問題。誠如桑托斯指出的，比起支持政治經濟的平等權（基本上屬於階級議題），捍衛差異權（因而差異在已有不少成就的女性與原住民族權利，以及認同政治等領域具有重要性），通常已證實更具效果。³¹再者，人權議題已被收編成為「帝國之劍」（採用巴索羅繆〔Bartholomew〕和布瑞克斯皮爾〔Breakspear〕一針見血的說法）。³²更廣泛來看，我們可以用錢德勒的話來總結，「今日以人權為基礎的人道主義之根源，在於一種與日俱增的共識，即支持1970年代以來西方對於開發中國家內政的介入。」³³國內方面，公共政治辯論也變得窄化，削弱了力道。「人權的管制全然沒能挑戰我們原子化社會的個人隔離與消極被動，只能將這些區分予以制度化。」更糟的是，「人權的倫理論述提出的有關社會世界的墮落景象，就像任何菁英理論一樣，發揮了維繫統治階級之自我信念的作用。」³⁴

秉持這種批判，我們很容易迴避一切對普遍權利和法律的訴求，認為它們有致命缺陷，視為站不住腳的抽象倫理，甚至是階級力量復辟的偽裝。雖然這些主張都值得認真考慮，但我們不能

棄守權利領域，將它讓給新自由主義霸權。新自由主義化與普遍性、倫理原則及人權訴求之間塑造出來的關鍵連結，應當令我們有所警覺。馬克思的著名評論是，「兩種權利之間，由力量裁決。」³⁵ 這裡有場硬仗要打，不僅涉及了哪一種普遍性和哪一種權利至關重大，也牽涉到應該如何建構普遍原則與權利概念，並納入法律。如果新自由主義底下發生的那種階級復辟，需要實施一套特殊權利，那麼對這種強制施行的抵抗，也需要有爭取全然不同權利的鬥爭。³⁶ 尤其，它表明了環繞那些權利而建立集體權利與社會團結，而非個人權利，才是真正重要的。

所有普遍宣稱的背後，一如既往，都有如何解釋地理學、人類學和生態學分化的棘手問題。首先，這可以解釋為敏銳運用普遍的新自由主義權利的問題。薩克斯認為，專業經濟學家「要求承諾徹底浸淫於專業顧問工作所在之任何地方的歷史、民族誌、政治學與經濟學」。例如，秉持「一體適用」視野的國際貨幣基金，「忽略了迫切的問題，涉及破壞經濟發展的貧窮陷阱、農學、氣候、疾病、運輸、性別及許多其他病態。臨床經濟學應該訓練發展的從業人員，更有效率地直指經濟困頓的根本原因，並開出根據每個國家特殊狀況量身訂製的適切藥方。」地理情境很重要，因為國家乃「深刻地受到它們的區位、鄰里、地形和資源基礎塑造」。³⁷ 許多試圖打斷與全球經濟之連結的對抗性草根組織，也訴諸它們自身的具體地理情境，來闡明它們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其方式很類似後殖民批評家訴諸柏克和海德格，來挑戰

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的普遍宣稱。

康德認識到地理學、人類學與生態學的分化，會導向地方真相、法律、習俗、環境緊迫性，以及甚至國族性格的建構。這些建構很難同有關權利、正義、自主和自由的普遍宣言相互調和。康德的解答是，聲明某國公民在某塊外國領土短暫停留時受到款待的權利，但不能無限期停留，尤其如果當地居民不歡迎他們的話（因此，康德原則上反對殖民主義）。他的論點的根基，是以領土界定的共和國之絕對邊界內的主權與公民身分。其結果是創造出無數的空間性排他（就此而論，王愛華針對新自由主義體制之例外的分析，至少算是資訊廣博）。國家在其中享有主權的空間之性質——其絕對性質——使康德得以把國家當成相對於構成國家系統之所有其他國家的虛擬個體。這些虛擬個體之間的合作與競爭、貿易與戰爭、和諧與衝突，成為政治理論及地理實踐的當務之急。從西伐利亞（Westphalia）、到創立聯合國，以及當代的全球合作結構（像是八大工業國〔G8〕、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各種合作協議如歐盟，或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這類比較鬆散的組織），不斷努力建構適當的遊戲規則，以便調節承平與戰時的國際關係，以及攸關經濟、文化和社會交換的關係，還有這些交換必然涉及的人員、資本及商品的移動模式。很顯然地，其後果並不總是融洽祥和，而且我們不能忽略葛瑞的擔憂，認為它很容易陷入「一個悲慘時代，其中，無序的市場力量與萎縮的自然資源，將主權國家拖進日益危險的敵對

狀態」。³⁸對此威脅的一種回應，是重新發明寰宇主義傳統，以便超越、或至少緩和，領域間及國家間競爭之強制法則的負面後果。緊接著，我們就要考察這種可能。

地球全體居民可能希望透過什麼樣的成套制度安排——最好是以和平方式——來協商他們對於有限地球的共同佔有？這個就是驅動康德的寰宇主義探索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在 1800 年（當時全球人口不超過 10 億人）就預知了，那麼，在全球人口達到 62 億並持續增加的今天，這肯定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康德主張，除非進入異鄉的商人被授予款待權，否則開放貿易和商業所獲得的利益及衍生的生命機會，將遭到嚴重縮減。貿易關係的擴散滋長，應該會令人放棄暴力衝突，尋求和平手段來解決彼此間的分歧。康德時代以降的貿易大幅增長，看似使得某種形式的寰宇主義變得不可避免。一如謝平指出的，康德忽略的是，相較於當時盛行的專制國家和帝國統治體系，「庶民國族主義作為解放力量的潛能」。康德並未「預見資本主義引發的物質相互關聯狀態，會產生有邊界的國族政治社群」。即使康德開創了國族性格理論，以及經由共同血緣世系而來的國族歸屬觀念，情形還是一樣。康德也不假置疑地接受了主權領域國家位於絕對空間裡的邊界狀態，國家據此可以概念化為國家體系中的「虛擬個體」。康德的學

生赫德（Herder）尋求一種截然不同的人類學，專注於地方中建構出來的文化與政治團結的凝聚力。他以康德未採取的方式理解到，（如柏克與後來海德格闡述的）地方及受限於地方的忠誠，如何能主導（繪製印度地圖時使用的那種）抽象絕對空間的普遍性。² 整個 19 和 20 世紀初期，（如康德應該體認到的，以國族性格建構為基礎的）國族主義崛起，及其與日俱增的、與階級及國家權力的關連性，伴隨著各種破壞性後果，有效阻止了對寰宇主義的任何接納。康德之後，寰宇主義多半潛伏在底層，挑戰強勢現身的競爭性自由主義倫理及其一切階級意涵，或是質疑基於國族主義與階級力量的盛行國族國家政治。

如今，寰宇主義已經離開陰影、重新崛起，擺脫掉許多負面意涵（源自猶太人、共產黨徒和寰宇論者，被塑造為背叛國族團結的叛徒的年代，他們好一點的話是遭毀謗中傷，最壞情況則是送入集中營）。對國家主權力量的質問已經發動（例如，歐盟的形成與新自由主義化），國族和國家觀念的連貫性也遭受挑戰（通過大量的跨界資本流動、遷徙移動和文化交換），這為寰宇主義的積極復興開創了空間，以寰宇主義作為處理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和法律問題的門路。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如努斯鮑姆、哈伯瑪斯（Habermas）、德希達（Derrida）、黑爾德（Held）、克莉絲蒂娃（Kristeva）、貝克（Beck）、艾比亞（Appiah）、布瑞南（Brennan）、羅賓斯（Robbins）、柯利弗德（Clifford）和許多其他人，近年來已針對該主題提出令人信服的著述。

不幸地，人們以各式各樣立場來重構寰宇主義，以致往往混淆而非釐清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科學議程。它獲得了眾多微妙變化和意義，以致令人無法確認任何思想和理論化的核心潮流，只有針對源自國族、種族、族裔和宗教認同之極端忠誠的假想地域主義，抱持著普遍的反對立場。某些概略性的意見分野，確實可以凸顯出來。一如往常，差異可能出於學術分工，例如哲學家（主要關切道德命令和規範性原則）、文學與文化理論家（關心文化混種和多元文化主義批判），以及社會科學家（關注國際法治和全球治理體系），全都針對該復甦語彙的可能意義，找到了他們的特殊切入點。正如學術界經常發生的，這些不同傳統很少溝通。這麼多立場堅定的寰宇主義者迴避交談，說來還真奇怪！

79

例如，努斯鮑姆建構了一種道德寰宇主義願景，藉以對抗一般的地方忠誠，特別是國族主義。受到斯多葛學派和康德的啟發，她將寰宇主義描繪為一種精神（ethos），「一種心智習慣」，一組對人類整體的忠誠，要通過強調全球公民身分之共通性和責任的特殊教育方案（包括未具體說明的地理學、人類學與生態學課程修訂），諄諄教誨。相對於這種普遍願景，有形形色色以連字號連結的寰宇主義版本，各有不同描述如「根植的」、「情境的」、「實際存在的」、「差異的」、「風土的」、「基督教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後殖民的」、「女性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從屬的」、「生態學的」、「社會主義的」，諸如此類。寰宇主義在此被特殊化和多元化，因為人們相信對於抽象

「人類」範疇的超然忠誠，無法在理論上、更別說是實踐上，提供任何政治性的掌握，來理解旋繞我們周遭的全球化與國際干預主義之強勁渦流。某些這種「對抗式寰宇主義」是為反應努斯鮑姆的宣稱而構想出來的。³例如，她被指責只不過是闡明了適用於新自由主義國際經理人／資本家階級「地球村」的意識形態。人們可以輕易拿《共產黨宣言》的一段著名文字——「資產階級通過它對世界市場的剝削，賦予每個國家的生產與消費一種寰宇主義特質」——來對付她。⁴在此，我們聽見了葛蘭西對於寰宇主義的批判性考察的迴響，他認為寰宇主義是「文化上受限的、災難性的超脫，這種超脫具體聯繫上了帝國主義、虛假的天主教會泛基督教主義，以及一個無根、智識化的管理階級的發展」。卡洪（Craig Calhoun）指出，冷戰後非常風行的樂觀寰宇主義，不只承擔了所有它作為「帝國計畫、長程貿易計畫，以及城市計畫」之歷史的標記，還被塑造為反映「經常旅行者（frequent travelers）之階級意識」的菁英計畫。因此，樂觀寰宇主義越來越像是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代裡，「復興自由主義的最新努力」。薩森（Saskia Sassen）同意，「將跨國專業和主管階級的全球主義等同於寰宇主義」，實在是太輕易了。威爾森（R. Wilson）指出，更糟的是這些後現代年頭的習慣，在這個術語裡填滿了「不只是自由主義自我發明與全球旅遊的自願冒險，還有以較不和善的方式裝配起來的移民、遊牧、離散、觀光和難民潰逃的混合物」，以及「『身為全球寰宇人的移民』的創傷，某種自由主義與解放混種的

承載體，而美國當然會將它向世界再現為資本主義先鋒」。⁵

無論如何，縹緲而抽象的普遍主義帶著某種壓迫性，而這種普遍主義通常位於任何純粹道德論述的核心。寰宇主義如何能夠解釋，更別說是同情一個以階級分化、多元文化多樣性、國族或族裔解放運動、多重的認同政治形式，以及各種其他人類學、生態學及地理學差異為特徵的世界？如何提高警覺，留意異己（otherness），巧妙處理梅塔所謂的「陌生」（unfamiliarity），並提升對深刻銘印的文化差異與地理特殊性的敏感度？而且，某些有影響力的理論家問道，既然實際生產與監控任何真正的寰宇主義全球秩序，都得仰賴國家集體（康德的獨立共和國聯邦），那麼，國族與國家觀念為何會如此堅決地塑造成為寰宇主義的對立面？於是，謝平與羅賓斯所謂的「寰宇政治」（cosmopolitics）應運而生，要求「將知性秩序和課責引進」寰宇主義論證的「新興動態空間」，在其中，「適當的識別語彙還沒有時間發展出來。」⁶

然而，目前有個強勢的意見潮流，主張寰宇主義的物質基礎已經建構完成，唯一欠缺的是吻合這些現實的適當理論。這個觀點出乎意料地廣為文化理論家和社會理論家接受，他們深受金融、生產與消費網絡的全球整合，以及產生眾多離散和眾多文化及種族混合的大規模移民所撼動。一般認為，國族國家不再是足以奠定分析的牢固概念，因而有必要採納新的理論構造來處理這種新情境。這於是引發了一個嚴肅問題：新理論僅能反映當前實作的實際狀況，或是該有批判性的介入（並希望有所改變）？當

81 代寰宇主義往往混合了這兩種取向。某些情況下，這種混雜具有生產性，因為它令我們得以看見，比方說 1970 年代以降，迫於新自由主義壓力而產生的國際法變革，如何為國際主義政治批判開闢了新途徑，儘管這同時強化了統治階級利益。然而，危險在於看似基進的批判（如同人權領域），卻暗地支持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化，以及強化的階級統治。

這個困局瀰漫於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的著作。他認為寰宇主義化（cosmopolitanization）已經存在，1990 年代以後更為顯著。它受到

文化與認同之間邊界的後現代混雜刺激，因資本與消費的動態而加速，由侵蝕國族邊界的資本主義培力，為跨國社會運動的全球觀眾所激勵，受到諸如科學、法律、藝術、時尚、娛樂，以及並非最不重要的政治等核心主題的世界性溝通（往往只是誤解的另一個詞彙）的證據所指引和鼓舞。全球生態危險的世界性感知與辯論，或是技術與經濟方面的全球危機（「科學怪人食物」[Frankenstein food]），開啓了恐懼的寰宇性涵義。如果我們需要任何證據，證明甚至種族滅絕和戰爭的恐怖，如今都有了寰宇主義面向，那麼 1999 年春天的科索沃戰爭（Kosovo War）已加以證實，當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了強制實施人權而轟炸了塞爾維亞。⁷

所有這一切「迫切需要一種新立場，即寰宇主義的觀點，讓我們可以掌握我們在其中思考和行動的社會與政治現實」。我們必須「擺脫國族觀點的自我中心式自戀，破除它感染思想與行動的遲鈍及缺乏理解」，並且「啓蒙人類，以察知其生活世界與機構真實的內部寰宇主義化」。然而，「現實的寰宇主義」不能在「反對普遍主義、相對主義、國族主義及族裔主義的情況下獲得發展」；它必得建構為「它們的總結與綜合」。國族主義和寰宇主義可以「相互補充並糾正彼此」。貝克的結論是，我們必須將寰宇主義理解為「非線性的辯證過程，其中，普遍與特殊、相似與相異、全球與地方，不能設想為是以文化的兩極對立，而是相互關聯且相互滲透的原則」。⁸

這種錯綜複雜的辯證構想，委實難以詮釋，而且我們大可懷疑，貝克的寰宇主義觀點試圖魚與熊掌兩者得兼。實際上，他放棄了辯證法，轉而頌揚從第一現代性到第二現代性、從致力於管理生產到關切管理（社會及環境）風險的社會，以及「國際法勝過人權」讓位給「人權勝過國際法」原則的劃時代轉變。第一現代性「以集體性、領域性和邊界的原則為基礎」，第二現代性則訴諸以個人，而非以「人民」和「國家」這類集體主體作為人權承擔者。「少了將這些權利授予所有個人的有效性普遍宣稱——無論其社會地位、階級、性別、國族或宗教——則無法想像」這些權利。貝克承認，存在著為了更腐敗目的而濫用人權的黑暗領域。因此，我們必須防範「為了國族霸權目的（他引述伊拉克戰

爭作為這種『偽』議程的新事例) 而利用寰宇主義修辭——和平、人權、全球正義的修辭」的「偽寰宇主義」。⁹不過，奠定他的寰宇主義基礎的，仍然是個別人權的普遍主義。

細察之下，這些權利跟新自由主義理論假定的那些權利難以區分。貝克不考慮其他類型的集體權利和團結。批評在此變成了辯解。佔有性個人主義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成了據稱是超驗性的寰宇主義的例證。既然權利必須實施，貝克於是接著採納美國「自由主義鷹派人物」倡議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保衛科索沃而轟炸塞爾維亞的那種「軍事人道主義」(military humanism)。貝克甚至贊成民主政府 (大概是他先前描述為無足輕重且無權無勢的國家!) 針對那些侵犯人民人權的領導人，提出先發制人的戰爭威脅，或 (最好是集體作為，而非像美國最近一樣單方面) 採取警察行動的權利。¹⁰ 從布萊爾、或甚至柯林頓 / 布希的實際作為，很難區分這一切。在貝克的事物架構裡，虛假和真實寰宇主義的區別，正如新自由主義與寰宇主義的區分一樣，武斷專橫且模糊不清。

貝克還大肆宣揚歐盟號稱具備的寰宇主義特質。國族情操顯然並未消失，在某些方面，它們在歐盟內部還被抬高了，但是，採納共同法律框架和共同貨幣 (雖然不是所有國家)，將部分國家主權交付布魯塞爾當局及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議員，意味著接受一種另類的社會關係秩序，施展於從波蘭到葡萄牙，橫互許多語言和歷史地理的廣大地域。歐洲整合使得傳統上交戰的歐

洲國族國家間的武裝衝突，多少變得難以想像，因而實現了康德的一項願景：「和平聯邦（*foedus pacificum*）……將不同於和平條約（*pactum pacis*），因為後者終止了一場戰爭，前者則力求永久終結所有戰爭。這個聯邦不像國家那樣旨在獲取任何權力，而僅僅是要維護和確保每個國家自身的自由，以及其他聯邦國家的自由……根據制度性權利的觀念，〔這個國家聯盟將確保〕每個國家的自由，而整個聯盟會逐漸擴大。」¹¹

因此，貝克、哈伯瑪斯和其他人傾向於將歐盟視為某種康德式寰宇主義建構。¹²他們於是考慮在全世界擴展這個體系的可能性。在歐洲，國族意義還同時遭到歐盟內部及外來的移民遷徙挑戰。昔日在種族和語言上相當同質的許多歐洲國家裡，目前鮮明的多元文化主義，使得國族這個觀念可以包含任何事物，包括（如法國的勒龐〔Le Pen〕和法西斯主義運動十分珍視的）據信深植於古代神話的回顧式本真性（*authenticity*），以及立即接納了國家公民身分的前瞻觀念，還有由構成譬如法國足球隊骨幹的新移民晚近建構的文化歸屬。

所有這一切都給最近的歐洲發展增添了一種寰宇主義魅力。但它也模糊了實際創建的聯盟面貌。儘管歐盟有著令傳統交戰國家間的戰爭越來越不可能的偉大目標，但它的實際機制向來主要是經濟性的，始於莫內計畫（*Monnet Plan*）和1952年生效的煤炭鋼鐵協議（*Coal and Steel Agreement*）。1992年歐盟國家間協商出來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Accord*），是個新自由主義而非寰宇

主義的建構。針對 2005 年歐洲憲法提案的抵制（尤其在法國，這部憲法在公投中敗北），許多左翼人士認為這是對其新自由主義特質投下反對票（右翼人士的反對則因為它稀釋了國家認同，以及國族國家主權的喪失）。可以確定的是，由於是新自由主義，歐盟的制度大量參照了個人權利的法律及政治原則。因此，歐盟與貝克所提的「寰宇主義人權體制」理想有部分相符，這個理想開拓了達成進步政治的某些途徑，尤其是跟法律和公民有關的權利，但未及於經濟權利。不過，該理想所促成的特定權利體制，卻禁止對資本家階級與企業力量的不斷攀升有任何嚴肅挑戰。

貝克回應這個問題時指出，「真正的」寰宇主義崛起於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卻與後者大為不同。這是因為寰宇主義化「包含多重忠誠的發展，以及多樣跨國生活形式的增加、非國家政治行動者（如國際特赦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出現、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全球抗爭運動的發展，以及支持不同種類的〔寰宇主義〕全球化。人們從事爭取工作權、全球環境保護、減少貧窮等運動。就此而論，這些是在例如反全球化運動、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和聯合國的弔詭外型下，制度化寰宇主義的開端（無論有多麼扭曲）」。¹³ 桑托斯所稱的「從屬者寰宇主義」（subaltern cosmopolitanism），崛起於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帝國主義的全球對抗。¹⁴ 但要弄懂這一點——我稍後即將嘗試這麼做——需要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帝國主義的霸權理論及實踐，如何與假想的寰宇主義實踐交錯，提出批判性評論。貝克的

解釋裡缺了這個部分。誠如巴迪烏（Alain Badiou）談到法國的密特朗派（Mitterrandistes）（我還會添上英國的布萊爾派〔Blairites〕）時所說的，結果是令任何種類的革命性政治計畫都變得難以想像。政治視域被簡化成爲「人道主義的倫理宣教」，而「人權的自由—民主典律化是政治有可能存在的唯一視域」——這大約就是貝克離開我們的地方，也是努斯鮑姆似乎想要去的地方。¹⁵ 如果這就是當代寰宇主義的要義，那麼它除了是階級統治的霸權新自由主義實踐，以及金融與軍事帝國主義的人道主義面具外，什麼都不是。對貝克而言，巴迪烏和洪希耶（Rancière）經常主張的，「興高采烈促進人權與人道主義干預的主要動力是政治虛無主義，而其真正目的與解放政治理念毫無關係」，¹⁶ 全然無法想像。

雖然這可能聽起來像是過分嚴苛的批評，但我擔心就大半的新寰宇主義而言，這會過於接近舒適的關卡。例如，讓我們考察一下黑爾德（David Held）厚重且非常卓越的作品。和貝克一樣，黑爾德主張全球化的事實必然要求轉向寰宇主義治理形式。回顧這些事實之後，他提出全球治理系統的某些核心原則。這些原則是：「（1）同等的價值與尊嚴；（2）積極能動性；（3）個人責任與課責；（4）同意；（5）針對公共事務經投票程序的集體決策過程；（6）包容性和輔助性；（7）避免重大危害；（8）可持續性。」這些原則落入三個群落。第一群（1-3）關切個人權利和責任，完全是新自由主義的語調；第二群（4-6）陳述個人行動如何能最佳地集體化；以及第三組（7-8）指出公共決策應該導向的

目標。黑爾德說，寰宇主義最終意指，「這八項原則佔有的倫理與政治空間。」他接著承認，「雖然寰宇主義確認了普世範圍的原則，但它還承認這些原則的確切意義，往往是在**情境化討論**（situated discussions）中體現；換言之，道德和政治事務中，有種**不可避免的詮釋複雜性**，會影響這些原則如何詮釋，以及賦予特定紐帶及其他實踐—政治議題的分量。」（粗體字為本文所加）¹⁷這項提醒意味深遠。它不僅提出了一個全然支離破碎世界的觀點，在其中，從個人責任與課責到可持續性的所有事物，都能隨意解釋，從而使得整個架構變得毫無意義，它還打開了康德的隱藏困局，即普遍要求如何與地方法律達成協調。

黑爾德認為只不過是情境化詮釋複雜性的片刻環節，對任何帶有柏克或海德格傾向者而言，卻可能是故事的全貌。黑爾德提議的唯一解答是，假定一種能反映地方、國族及區域聯盟的「分層寰宇主義」（layered cosmopolitanism）。不過，他不想理解這種分層實際上如何生產，以及在何種尺度產生。他也不考察可能與分層有關的「情境化」和「詮釋複雜性」的涵義。這可能需要直接面對努斯鮑姆和康德一致認為的，對任何寰宇主義政治構想而言都很重要的地理學、人類學和生態學先決條件。黑爾德過於簡略地藉由坦承詮釋複雜性的地方形式，開啓了地理學關係論的潘朵拉盒子，卻旋即以他未經解釋的觀察，猛然將盒子關上，這項觀察即他的寰宇主義原則，有效地「界定和治理應於公共生活中發現的多樣性與差異之範圍」。這使他得以（裝模作樣地）宣稱，

不同地理情境中「不可化約的生命形式多樣性」，已充分納入他的寰宇主義，而他的原則依然不可違逆，因為它們是「所有人都可以合乎理性地贊同」的原則。¹⁸這裡的論證中插入了「合乎理性」和「贊同」的用法，頗引人注意。它產生了強大的迴響，附和了康德（與柏克）以「成熟個人」作為唯一可接受之討論參與者的籲求。這種寰宇主義形式的菁英主義（以及潛在的階級內容），因而昭然若揭。

但是，為了使他的寰宇主義治理得以運作，黑爾德還需要其他東西：「若無與公共辯論、民主參與及課責之國族與跨國形式相應的制度化，就不會有平等權利與義務的適當制度化。調控式寰宇主義原則的制度化，要求鞏固民主的公共領域。」最後這一項條件限制，可能本身就能視為一項強烈的基進主張。新自由主義化三十年來，世界上許多地方（除了拉丁美洲、南非，以及過去共產陣營的可疑民主化是明顯的例外）已經大幅降低參與式民主的範圍和效果。尤其在美國，經由合法與非法腐敗的複雜混合，民主赤字急速增長，唯一剩下的民主是原始的貨幣力量。根據這種衡量標準，當布希提到中東的民主化時，他真正想到的其實是難以想像的腐敗。然而，大部分新寰宇主義有個奇怪趨勢，即假定適當的民主模式或多或少已經在主要國族國家的架構中建構完成，剩下的唯一問題，是找出在所有管轄範圍內延伸這些模式的方法。這正是黑爾德的「分層寰宇主義」觀念的嘗試。民主公共領域的嚴重縮減，以及轉向無法課責的司法和行政權力（往

往以治理一詞來掩飾)，甚至是在主要的國族國家發生，卻都未受注意，略過不提。¹⁹

所有這些表現的背後，有著理解資本主義活動及組織之空間尺度轉變的問題。如今，在「全球化」標題底下發生的眾多事情，脫離了國族國家的框限，並且要求（某個程度上已經產生了）更廣闊的法律、管制和治理的領域範圍。環境議題尤其明顯，像是全球暖化、酸性沉降（acid deposition）、平流層臭氧耗竭等。寰宇主義試圖在程序上和實質上合理化這些新系統，貝克認為，這意味了「寰宇主義化的分析，可以且必須在空間與時間這兩個向度上闡述」。但是他相當令人驚訝地聲稱（完全跟梅塔唱反調），空間問題「已經解決了」，只有時間向度仍然是個問題。不過，當我們探索他是怎麼認為空間向度已經解決的，我們只能找到一種平庸想法，即寰宇主義化「以國族—全球與全球—全球的關係模式，取代了國族—國族關係」。²⁰ 貝克顯然不假思索地接受康德式的時空分離觀，並且相信困擾柏克和梅塔（更不用說地理學者及其他空間分析家，像是列斐伏爾）的那些地理學議題，跟他的普遍理論化全然無關。

這裡的困難，有部分源於要能掌握國族國家變遷中的角色。社會學的想像（自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經典宣言以降），以及多數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長期以來都將國族國家視為從事經驗分析與社會理論的穩固而毋庸置疑架構。國族國家並非（而且從來不真的是）研究社會與生態關係的適當地理框架，這種遲來

的體認，促使人們尋找替選方案。例如，貝克研究的溝通對象主要是社會學家，敦促他們脫離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知識研究取向，採用更普遍化的語言。另一位社會學家薩森同樣認為，「既有理論不足以描繪今日倍增的非國家行動者及跨界合作與衝突形式，例如全球商業網絡、非政府組織、離散、全球城市、跨界公共領域，以及新寰宇主義。」她說，問題在於「當我們看見非國家行動者增生、跨界過程，以及國家當局主宰其領土的範圍、排他性與能力方面的相關變化時，模型與理論卻仍然聚焦於國家之間關係的邏輯及國家尺度」。她認為，新興數位科技在這種散布方式中扮演了要角。網際網路也「助長了可以繞過國家間政治的新型跨界政治」，而「這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行動主義，以多重地域為中心，但通過數位而與比地方大的尺度相連結，經常廣及於全球尺度」。²¹

薩森主張，管制、法律、治理與政治行動主義的各種專門網絡及領域，溢出了國家邊界，生產出擾亂既定安排的新空間性和時間性。薩森並未放棄國族國家框架，而是在承認全球交易與治理當中其他重要層次（黑爾德的說法）崛起的同時，試圖重新詮釋國族國家的角色。這一切對於我們如何理解公民身分，具有深遠的含意。基於斯多葛學派的寰宇主義傳統，我們自視為純粹的世界公民，但康德就此做了重大修正，堅持保有國際系統裡的聯邦結構，從而將國族、國家、主權國家和公民身分之間的連結，注入了此一混和體。但是，以往主要是在有邊界的社群裡行使的

公民身分，如今有了多重位置。有些人擁有雙重國籍，有些人持有多本護照，當涉及對國家的效忠、忠誠和參與時，更多人同時與全球經濟裡一個以上的空間有錯綜複雜的關係。譬如，紐約市的居民在牙買加和中國的城鎮裡擔任重要官職。這一點同樣適用於橫跨許多邊界而活動的企業主管及法律／會計專家；負責管理國家間關係機制的政府官員（包括國際機構官員，以及從事國際警察任務及情報蒐集工作者）；大量的合法及非法移工（後者往往扮演積極的公民身分角色，卻無任何法律或政治地位）；以及擁有協調性跨界網絡的社會運動行動者。王愛華提出了有用的觀察，即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擁有各種經濟發展特區的複雜結構，以及（最近廢除的）城鄉的法律區別，在國內建構出一幅公民身分定義的內部鑲嵌畫。班哈比指出（和黑爾德一樣），有似乎在國族國家以外（例如歐盟內部）出現的公民權利之分層結構。她說，世界裡有「多層次的組織、結社及相互依存網絡」，而「多層化治理」可以「改善全球抱負與地方自決之間的鮮明對立」。如果我們以這種多層方式來看待世界，那麼「問題就變成這些不同層次之間的調解中介，以便基於某些共同協定的標準，創造更多聚合……然而這是通過地方、國族或區域性的詮釋、設置及組織的創制」。²²

雖然這一段裡有著酷似黑爾德「分層化」的論點，班哈比還是繼續與強大的社群主義思想家集團論戰，最著名的是沃爾澤，他採取廣義的柏克立場，寫道：「人類男女確實擁有生命和自主

以外的權利，但這些權利並非來自我們的共同人性；它們源自共享的社會良善（social goods）觀念；它們具有地方及特殊的性質。」沃爾澤強調「文化和群體的獨特性」，並主張如果人們重視這種獨特性（「大多數人似乎如此相信」），那麼「勢必要在某處容許封閉」，而且「主權國家這類事物必然會成形，宣稱有權制定它自己的入境政策，並控制及有時限制移民的流動」。班哈比反對這種「共享的文化共通性總是勝過人權宣稱」的「人類學」觀念。結果是創造出能在其中伸張公民身分權利的、過度限定的（空間？）領域。²³

要協調普遍倫理學，與人們對自己家園、地方傳統及各種「想像社群」（例如國族）無疑十分深厚的感覺和情感依附，顯然很困難。清楚的是，人權、職責和義務必然會超出國族國家（或領域管轄權）的邊界。因此，貝克聚焦於寰宇主義人權體制，在原則上完全是合理的。然而，問題在於他和黑爾德都抱持一種十分狹隘的個人主義式權利定義，過於貼近新自由主義倫理而令人不安。相應於公義社會秩序的合宜權利概念，有許多種不同提議。例如，楊恩（Iris Marion Young）在她影響深遠的《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裡，援引都市社會運動經驗，對照著她所謂的「壓迫的五種面貌」²⁴來定義權利，這五種面貌包括：工作場所和生活空間裡的勞動剝削；社會團體因身分認同而遭到邊緣化；無權無勢（缺乏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生活的資源）；文化帝國主義（對人口中特定群體的象徵性詆毀）；

以及暴力（內在於家庭和整個社會）。經由各種集體行動來緩解這些壓迫的權利，超出了新自由主義思維的規範。至於努斯鮑姆，她將思想確立於從亞里斯多德，經由葛洛休斯，擴及青年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在此採納了康德的類存在概念）的哲學傳統。努斯鮑姆採取葛洛休斯的觀點，認為應該將人類理解成「以尊嚴與道德價值為特徵的生物」（應當指出，此乃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根本想法），並且「強烈渴望和同類建立夥伴關係，也就是渴望共同生活，不是任何一種生活，而是安寧的生活，並根據智性標準來組織」。在這裡，努斯鮑姆將具體內容賦予從我們的類存在引申出來的權利。她詳細說明了每個人理應嚮往的「核心人類能力」清單。這些能力包括，

- 1.（正常長度的）壽命
2. 身體健康（包括適當的營養和居所）
3. 身體健全（免於遭逢暴力的移動與探索的自由）
4. 感官、想像與思考的自主
5. 情感（表達性的依附、愛與關懷）
6. 實踐理性（因教育而獲得的辨認目的與手段的能力）
7. 聯繫（適當的社會關係、尊嚴與自尊）
8. 與其他物種（自然界）的關係
9. 自由發揮
10. 掌控個人的（政治與物質）環境

上述構想是以結果為基礎，而不是以過程為基礎，與黑爾德建構寰宇式思維空間的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²⁵

努斯鮑姆在這套能力取向的闡述裡，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主張。一如預期，她的論證具有頗為可觀的哲學深度。針對羅爾斯在《萬民法》（*The Law of the Peoples*）將其正義理論延伸到國家之間關係的深具影響力作法，她的批判可謂尖銳有力。「藉由假設國家固定性作為他的起點」，羅爾斯有效地避開了「經濟不平等與國家之間權利不平等的任何嚴肅考察」。結果是他「在哲學上」批准了「世界強國（尤其美國）無論如何總是想做的事」，拒絕「從內部改變，無論是人權事務、環境議題或經濟政策課題，無論是回應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或是回應國際條約及協定」。²⁶ 努斯鮑姆總結道，我們不應將「哲學的尊敬」授予這種「傲慢心態，其對嚴肅問題的不予回應令人髮指」。班哈比對於羅爾斯主張「在推論全球尺度的正義上」，是民族而非國家「才是適切的道德及社會行動者」的論點所引發的排他性國族主義，發出了類似的反對聲音。不像羅爾斯的預設，民族不是住在有邊界的社群裡，並以同情共感（*common sympathies*）所標誌的清晰可辨之道德性質為特徵。²⁷

努斯鮑姆相信，她的能力取向也增進了我們對人權的理解，因為它強調「人權運動也著重的許多應得權利：政治自主、結社自由、職業選擇自由，以及各種社會與經濟權利」。然而，她界定的能力與新自由主義典型規定的權利，大異其趣（而且，她明確

駁斥美國憲法的新自由主義式詮釋)。它們也建構了一種迥異於黑爾德或貝克之提議的寰宇主義空間。這些能力「給權利語言」提供了「重要的精確度和補充」。²⁸這正是貝克異常欠缺的精確度。他要是採納了類似努斯鮑姆清單的那種東西，那麼他肯定不會淪落到暗中捍衛新自由主義化，以及暗地支持軍事人道主義了。努斯鮑姆甚至宣稱，在她提出的清單條件下，捍衛了多元主義和差異權利。然而，即使就此而言，她的理由比黑爾德傲慢的斷言，要複雜精緻得多，但她在這一點的基礎卻不穩固。儘管沒錯，思想與結社自由是維繫多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它們還不夠充分，而且還有其他能力，像是控制政治環境，很輕易就會往相反的排他方向運作。此外，她沒有考慮到階級、族裔、性別和其他差異，如何體現於社會空間結構（例如富裕和貧窮者的聚居區），並經由人類社會化隔離的地理結構而延續了差異（雖然不是全部，但其中有些差異是不公義的，若還不是徹底令人反感的話）。她的思想模式傾向於孤立而缺乏空間，可以接受批判性的審視，就如同梅塔批判地檢視了自由主義和洛克理論一樣。然而，努斯鮑姆指出另一個原則要點：某些能力（例如壽命與身體健全）沒有平等就無法實現，而其他能力（例如發揮和感官自主）則最好是以某些最低門檻來明確表述，在這個限度以上，各式各樣差異都能蓬勃發展。因此，能力取向只是局部的平等主義。最後，她的取向有個優點，即促進了以實現漸進目標為導向的肯認政治（affirmative politics），而非從責任與義務清單衍生的政治，許多人

可能會因後者過於繁重而退縮。

然而，要明確指出實現這種可欲結果的具體手段，還是有困難。努斯鮑姆承認，「哲學善於規範性推理，鋪展出思想的一般結構」，但是「任何十分具體的執行處方，都需要同其他學科合作」。²⁹ 她的議程是提出一種令人嚮往的美好生活道德願景，使得所有閱讀她著作的人，都能被說服去思索如何實現。就此而論，她算是成功了。如果她的能力取向，取代了源於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個人主義式及市場驅動的倫理學，那麼毫無疑問，我們的世界會是一個更好的地方。

然而，努斯鮑姆提出的「如何實現」的建議，卻大有問題。不只它們看起來既烏托邦、又天真無邪，並以一種她的能力取向原本理當避免的方式，顯得繁重而惱人，而且她建議的某些手段，結果卻證明與其目的背道而馳。依我之見，她首先很正確地指出，雖然我們最終全都對其他所有人的能力實現負有責任，但實際上，我們需要據以完成大部分工作的制度。因此，這多半取決於我們建立的制度的性質與運作。這就是她開始產生困難的地方。例如，她突然針對國族國家發起強大而令人驚訝的捍衛，視之為她的能力取向據以實現的基本制度，理由是「聯合其他人來為彼此制定法律的能力，是人類自由的基本面向。這個意義上的自主性，非同小可：它是有機會過完整人類生活的環節。在我們的時代一如葛洛休斯的時代，人類行使此人類自由之基本面向的基本單位，是國族國家：它是還有機會像樣地為當地居民擔起責

任的最大而最基本單位。……因此，誠如葛洛休斯已經論說的，國族國家及其基本結構，是人民行使自由的關鍵場所。」³⁰

她似乎是在說，我們需要某些區域 / 地理組織形式來實現人類能力，而能落實她普遍而孤立的抽象概念的唯一方式，卻是通過她先前以有原則的寰宇主義之名，公開譴責過其權力的國族國家。貝克、黑爾德和努斯鮑姆，似乎都沒有察覺到問題有多麼複雜，因而遇到了相同的問題。就努斯鮑姆而言，她突然恢復國族國家作為人類結社的正面位址，讓她得以再度肯定康德的「道德信念，即人應當尊重任何以充分負責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主權，無論它的制度是否完全符合公義」。於是，人們將「克制不以軍事介入該國內政，並與其經正式選舉的合法政府協商」。這種作為重要媒介的國族國家定位，儘管抑制了貝克虛張聲勢的軍事人道主義，但由於我們已經考察過的各種原因，它引發的問題跟它解決的問題一樣多。誠如無政府主義理論家慣於正確指出的，還有其他許多建構能擔負責任的「基本單位」的方式。

在努斯鮑姆對於反國族主義的熱切允諾，與她將國族國家當作實現能力所仰賴的主要制度，這兩種定位之間有著玄妙的緊張關係。後者的普遍性有種被主權國家內部的集體自決權利壓倒的危險，而集體自決權利是羅爾斯認為很根本，努斯鮑姆卻大聲反對的。為了挽回她的立場，努斯鮑姆不顧一切地堅持，每個國族國家內部的主要義務是，至少在門檻限度上提升她列舉的能力。次要義務則是擬定為一則簡單的羅爾斯式道德論證：「國家應該

撥付相當比例的國內生產毛額給更窮的國家。」這兩種道德義務都極為繁重，不難想見人們可能會對於支持這些義務畏縮不前。努斯鮑姆甚至沒有（像波格〔Pogge〕一樣，以延伸羅爾斯觀點的方式）援用虧欠的道德原則，比如虧欠非洲，因為帝國強權掠奪非洲大陸的殖民與新殖民歷史，以及通過貿易和資源剝削機制持續汲取剩餘。就當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空間組織的實際狀況而論，這可說是個驚人的天真觀點。她還說，「多國企業有責任促進它們營運所在區域的人類能力」，以及「全球經濟秩序的主要結構必須設計成對貧窮的開發中國家是公平的」。¹¹但是，目前藉以形成這些制度安排的新自由主義形式，正是設計來挫敗她所渴求的能力，因為它們的主要設計和熟練運用，都是為了維持與提升階級力量。過去30年來，企業通過自身的全球化策略，逐漸規避了管制。它們通過創立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納入大多數世界主要企業），有效妨礙了國際上管制它們的所有嘗試。它們不僅投入公共關係運作，還運用社會投入和宣傳的力量，提升它們的新自由主義化議程（例如設立擁護市場的非政府組織，通稱芒果〔MANGOs, market advocacy NGOs〕）。雖然它們在特定情境下將其身分調整為法律個體，但它們有把握這種身分不會進入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因而確保它們不會因為破壞環境，或在他們僱用的勞工或他們生產的產品方面侵犯人權，而遭到起訴。它們保證歐盟內部的企業責任純屬「自願行為」，而其令人驚訝的理由是，它們需要保持足夠彈性，以便敏感地處理地理

及文化差異。努斯鮑姆不加批判地依附有關國家、企業與市場的天真自由主義理論，與啓發她的能力取向的亞里斯多德、葛洛休斯及青年馬克思的政治與集體主義傳統，有著深刻矛盾。

這些新寰宇人將理論有效地奠基於空間與地方（或者，當他們天真地嘗試這麼做時）的長期失敗，沒有比傳統的新自由主義智慧高明多少，這很容易讓人將它們的整個論證路線，斥為不過是爲了延續菁英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另一種道德或法律面具。但我認爲這種摒棄太草率了。首先，我們有必要問：一種反對寰宇主義式新自由主義的寰宇主義計畫，可以如何籌畫構想？我先是注意到，寰宇主義可以通過三種方式產生：源自哲學反思；出於對實際要求及基本人類需要的評估；或者，來自致力於以其特有方式改變世界的社會運動醞釀。努斯鮑姆大量借鑑第一種方式，並通過沈恩（Sen）有關饑荒和糧食安全的卓越研究廣爲承認的影響力，訴諸第二種方式，卻忽略了第三種。我認爲，將社會運動的多樣思想與實踐納入分析極爲重要。這就是楊恩在《正義與差異政治》裡採取的途徑。她在書中最後一章，嘗試推導出什麼德行才是可能且合理的，並立足於她先前有關壓迫之各種面貌的分析，而這些面貌展現於當代城市生活的具體環境中。她不僅詳細說明根除不公平的要求，也指明有道德的結果看起來像什麼模樣。於是，她便通過社會運動的透鏡，以及當代都市生活（儘管是在美國）的地理觀點，賦予普遍概念新的意義。³²

桑托斯遵循了類似策略，但更偏國際主義向度（儘管沒有強

調都市)。他說，世界上遭到排斥的人，需要一種表達他們的需求、反映他們處境的「從屬者寰宇主義」。「只要是地方偏見和歧視的受害者，都需要跨界的寬容與支持；只要是在富裕世界裡過著悲慘生活的人，都需要寰宇主義式團結；只要是國家或世界的非公民或次等公民，都需要另類的國家與全球友誼概念。簡言之，由上而下的寰宇主義計畫排除在外的絕大多數世界人民，需要不一樣的寰宇主義。」³³ 我們身為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任務，不是要替「那些遭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犧牲的人」發言，而是要擴大他們的聲音，「無論他們是原住民、無地農民、貧困婦女、佔居者、血汗工廠工人，或是無證移民。」他正確地指出，大部分被吹捧為「治理」的東西都很可疑，因為即使它將窮人及其代理人納入成為利害關係人時，它都只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政治矩陣」。這是「跨國資本與資本主義列強的霸權」得以「再生產」的主要方式（小額信貸的實例已清楚揭示了這一點）。桑托斯在此指認出來的，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和權力的領域邏輯之間的潛在張力，經常直接導致我在其他地方討論過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帝國主義。³⁴ 1970年代中期起展開的政治轉移，即「從中央國家到權力下放／分散化，從政治到技術；從民眾參與到專家系統；從公共到私人；從國家到市場」，建構了新自由主義體制，華盛頓共識則為其縮影。依桑托斯之見，在這種治理矩陣內，眾人對於超出個人自主之自由主義理想的社會正義、平等及權利概念保持靜默，意味了「批判理論的失敗」。³⁵ 楊恩和桑托斯建構的這種批判視

角，正是貝克和黑爾德的構想欠缺的，很可惜也不存在於努斯鮑姆的眼界中。

有關從屬者寰宇主義可能是什麼的更明確表述，取決於我們如何描繪目前正在推動的反霸權社會運動的特徵。所謂的「由下而上的全球化」替全球體系內的進步變遷，帶來了可觀的政治能量。薩森認為，這些鬥爭在地理上是零散而具體的。它們是：

精明的地方實踐倍增所致的全球性。……這些實踐也是具備全球視野的制度建立工作，這些實踐可能來自掌握有限資源的地域和地域網絡，也源自非正式的社會行動者。在這裡，我們見到以下潛在轉變，即「受限於」國內角色的行動者變身為全球網絡行動者，卻無需脫離他們在社區裡的工作和角色。這些「國內」環境從原本純屬國內與地方性的體驗，轉變成與全球迴路相連的微觀環境。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不需要變成寰宇人：他們可能在定位上仍然是國內和特殊主義的，並繼續投入其家戶與地方社區的鬥爭，但他們卻正在參與新興的全球政治。有可能出現一種創造多邊、水平溝通、合作、團結與支持的實踐社群。³⁶

薩森拒絕以「通往全球的寰宇主義路線」來詮釋這一切，反而視之為「部分而初始的去國族化（denationalization）」或「關係

性國族特質 (relational nationality) 的微案例」。幾乎一定會同意薩森描述的桑托斯，肯定會認為這正好是從屬者寰宇主義應該採取、且將會採取的形式。我提出這一點，是因為若不面對社會運動的地理分散性和經常高度地方化的具體性，以及，若未體認到它們的目標不見得是改變世界，而是改變世界上某些特定地方的有害狀況，就不可能描繪社會運動中萌芽的寰宇主義特徵。如果俄國的礦工、泰國的血汗工廠工人、中國的工廠勞工、歐洲遭非法販運的婦女和達佛 (Darfur) 的失蹤兒童，能夠改變世界的唯一方式是徹底改革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那就這樣做吧。從屬者寰宇主義觀點保持其特殊主義和地域定位，沒什麼不對，只要它維持住與全球環境的辯證關聯。但在這一點上，桑托斯認為批判知識分子的唯一任務，是去「擴大受害者的聲音」，這個觀點本身構成了更深刻批判性介入的障礙。雖然這個角色很重要，但即使是從屬者寰宇主義，都必須批判性地投入翻譯任務，將特殊主義要求及地方參與翻譯為一種共通語言，以對抗位居當前問題根源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策略。但這就需要更深刻地理解空間與地方建構的地理原則，如何與任何寰宇主義計畫的實際開展產生關係。換言之，我們必須拆解黑爾德急忙遞出的「情境化詮釋複雜性」，並回答努斯鮑姆遺留的懸而未決問題，亦即什麼樣的地理學、人類學和生態學知識，才適合寰宇主義教育的知識。

貝克倡議但並未遵循的辯證方法的榮耀，在於若能適當操作，它可以同時在差異內部與外部創造出一種統一性，因為它非

常清楚，以權利、能力和治理的不同概念為核心的情境化鬥爭，其不均發展所引發的壓力與矛盾。要讓這一切動起來，誠如康德早就提過的，需要理解力與判斷力的特殊結合，要有產生敏銳而細緻之理解的能力，而非「空洞詭辯和奇想空談」。我們沒有人可以宣稱，能夠避免墮入後者那種錯誤。因此，確實需要事先在道德和知識上做出承諾的是，我們應該提供彼此互助，以便發展出能夠橫越差異政治而產生解放理論與政治的各種從屬者寰宇主義（這裡的複數形式乃刻意為之）。這便將我們帶回到有明確位置且具體的、「實際存在的」寰宇主義的觀念，如羅賓斯（Bruce Robbins）所言，這種觀念承認「它所從出的真實歷史與地理脈絡」，而且不會認為將其命題予以多元化和特殊化的前景，會損及它的全球影響範圍。³⁸ 不過，這件事要能發生，我們首先必須回答努斯鮑姆和康德提出的問題，也是其他人在某些時候遭遇到（往往滿懷挫折，或在某些情況下任意摒棄不顧）的問題：任何合宜的（這裡是指從屬者）寰宇主義計畫要能成功，需要什麼樣的地理學、生態學及人類學知識？

地理邪惡的平常性

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寰宇主義，全都將康德提出的，要有適當地理科學基礎的建議擱置一旁。它們的普世性宣稱是跨歷史、跨文化的，並且被視為有效，卻獨立於任何地理學、生態學及人類學事實的根植狀態。由這些宣稱衍生出來的理論，支配了像是經濟學（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公共選擇、人力資本理論）、政治科學（理性選擇）、國際關係（賽局理論）、法理學（法律與經濟學）、企業管理（廠商理論），甚至心理學（自主的個人主義）等研究領域。這些普遍的思維形式如此廣泛傳播，又如此普受接納，以至在多數大眾媒體（由商業媒體領軍）及法律界（包括其國際人權變體），以（尤其涉及個人主義、私有財產權及市場的）政治修辭設定討論的條件。它們甚至在那些以差異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領域——如地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提供了基本規範。

批判性地介入這些普遍性理論，有兩種獨立但重疊的路線。第一條路線是政治批判，即指出它們的基本論點和抽象概念，在階級或族裔方面存有偏見（就寰宇主義而言，則是歐洲中心和帝國主義）。馬克思挖苦地提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頻頻援引魯賓遜

99 (Robinson Crusoe) 的故事來闡述他們普遍性論點的自然基礎，但他們沒有留意到魯賓遜是「不折不扣的英國人」，從船難殘骸中很方便地救回了手錶、帳本和筆墨，已經有能力記帳。¹因此，這些普遍理論的運用，導致階級或地緣政治強權之既有結構的強化，產生日漸嚴重的地理與社會不平等（及伴隨而來的所有社會壓力），以及全球公地的掠奪。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裡通過解構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魯賓遜神話及其他一切），十分明智地揭露的事情。第二種批判路線，專注於不參照地理學、生態學和人類學現實而構想之任何理論的固有錯誤。倘若地理學知識果真是所有其他認識形式的「可能性條件」，那麼，普遍理論怎麼能夠對它如此漠不關心？這兩種批判路線相互纏繞，例如英國帝國主義體制以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主義之名，對印度施以保護監管，卻以地理學和人類學條件來推諉卸責（印度人還不夠成熟，無法自我治理）。在這個案例中，地理學和人類學概念替維持大英帝國國家機器內部的階級結構提供了掩護，其方式極為類似布希保護美國超級富豪的收入與資產，同時在阿富汗、伊拉克和中東這些混亂的地理學與人類學世界中，刻意促進了對普遍自主與自由的純粹主義式追尋。在所有這些例子裡，頑強的地理細節似乎永遠挫敗了崇高的使命（要是遜尼派和什葉派可以在伊拉克的新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下理性攜手合作，要是巴勒斯坦人不展現他們的壞品味投票給哈瑪斯〔Hamas〕，那麼一切都會很好！）。看起來，魔鬼和困頓往往都藏在地理學和人類學的細節裡。

這在政治上如何運作，應該是極受關注的事務。例如，2003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布希總統將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戲劇化地描繪為由「武裝威脅世界和平的」特定國家及其恐怖主義盟友組成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² 軸心一詞，雖然便於呼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語言，當時「自由世界」(儘管與蘇聯結盟)面對並戰勝了「軸心國」(the Axis Powers)，但它還暗示由對於一般世界和平，尤其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心懷不軌國家組成的組織連貫的地緣政治圓弧。在以星際大戰和來自邪惡帝國的恐怖威脅，作為冷戰時期流行文化之標準特徵的國家裡，這種形象的直接政治影響力，沒有留下什麼想像餘地。問題在於被指名的伊拉克(當時由遜尼派統治)和伊朗(什葉派統治)這兩個國家，於1980年代發動慘烈戰爭，彼此對抗，儘管海珊(Saddam Hussein)犯下戰爭罪(伊拉克使用美國當時低估了的生物戰)，美國大體上還是支持前者(以1983年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與海珊握手微笑為象徵)。第三個國家北韓，則在地理及政治上遠離其他兩國，但還是被視為同樣偏差異常，而值得納入軸心概念。邪惡勢力似乎就是聚集在這些領域裡。被稱為邪惡中樞的這些國家，必須竭盡全力來施以規訓，或在緊急關頭時予以征服。

訴諸這種伎倆(這正是伎倆)，並非布希專有，也不局限於美國。伊朗政府經常逆轉作為邪惡化身的恭維，並以此稱呼美國，在伊拉克有影響力的什葉派教士埃爾薩德(Muqtada al-Sadr)以「小撒旦已遭罷黜，大撒旦已抵達」這句令人難忘的話，來歡迎美

國的入侵。雷根以前經常指稱當時的蘇聯為「邪惡帝國」，即使不加以摧毀，也必須堅決抵制。將特定國家如古巴和利比亞（現在由委內瑞拉接棒）妖魔化；將某個國家指認為「流氓國家」；即使是昔日盟友，也被摒棄為陳腐保守的「舊歐洲」代表：這一切全都成了論述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論述世界裡，全球地緣政治結盟乃依據良善與邪惡、成熟或不成熟、野蠻或文明化、陳舊或新穎，抑或「支持或反對我們」，來繪製地圖，編予顏色。這是美國長期以來的標準作法，就是佔領某個公眾很遺憾地毫無所知的領域，將它視為有問題或包藏邪惡勢力，以便正當化干預、制裁或其他規定行動。認為可以基於這種淺薄的地理學和人類學概念，來從事國際協商或發動經濟與軍事戰爭的想法，十分可怕。普遍啓蒙理性（通常掩飾了威爾森〔Woodrow Wilson〕直截了當揭露的那種唯利是圖的商業利益）同地理學與人類學細節之間的張力，涵蓋了世界自 17 世紀以降動盪不安歷史的大半。

我們有必要認真重新考察，在這段歷史中，地理學與人類學知識及無知的政治角色。例如，1999 年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人們越認識一個國家，就越不可能支持對該國採取制裁或軍事行動。³有趣的是，這項民調是由艾克森石油公司（Exxon）委託執行的，該公司基於其石油利益，當時正發動宣傳，以解除美國於 1979 年人質危機和革命後對伊朗實施的經濟制裁。這項民意調查資訊的可疑根源，強化了地理知識具有政治意涵的論點，就這個案例來說，此政治意涵是輿論狀態，因為艾克森石油公司

顯然了解，改變地理知識的品質可能具有政治效果。雷根總統之所以深陷美國在中美洲贊助的非法秘密行動，以及所謂伊朗軍售醜聞（Iran-Contra scandal）的棘手困局，部分理由在於美國有眾多教會團體跟中美洲（包括摩拉維亞教派〔Moravians〕和天主教）的宗教組織有來往，因此它們了解那裡的多數暴動，攸關大眾對社會正義的追尋（以解放神學為根源），而不像雷根政府堅持主張的，那不過是古巴共產主義的旁支。至於美國國務院，當時它喜歡用顯示受古巴啟發的，從尼加拉瓜向北蔓延的革命紅潮地圖，來威脅德州（這麼多地方偏偏挑了德州！）。操弄地圖以便創造一種外來的威脅感，是政治宣傳的著名手法。由此看來，情況似乎是，理應資訊充足的菁英團體，可能偏好維持人民的地理學及人類學無知，從而可以輕易操縱人群。但是菁英團體本身的決策依據，通常奠基在極為簡化且往往完全錯誤的地理學與人類學假設上。一旦將伊拉克戰爭的故事完整說出來，就可以清楚顯示，那些（以五角大廈為基地）做出發動並執行戰爭的關鍵決策者，對於他們在現場可能遭遇的事情毫無概念，還輕率否決了政府內部（尤其美國國務院）至少稍微了解現場問題的可能情況的人。尤其布希總統似乎過於全神貫注於他身為上帝在地球上的智慧設計代理人的角色，以致對骯髒的地理學或人類學細節不聞不問。倘若他真的曉得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差異，他似乎相信那是類似德州的衛理公會和浸信會之間的差別。⁴

這種過度簡化並不罕見。例如，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庫柏

(Robert Cooper) 提出一種簡化的地緣政治世界觀點，其中，他將國家分為三大類型：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⁵ 後現代國家願意將它們的國家利益，屈服於由有效的國際機構（如國際刑事法院、世界貿易組織及聯合國）管理的寰宇主義普遍法治的建設性國際合作底下。相反地，現代國家是在國際系統裡，通過與其他國家競爭或犧牲其他國家的方式，有時甚至野蠻（試想利比亞和昔日的伊朗）而到了堪稱「流氓」國家的地步，無情地追求自身狹隘的國族利益。前現代國家則還沒有在國內施行適當法治，其制度與政治結構軟弱無力，面臨微不足道的困難便會解體。庫柏認為，要將這種「失敗的」國家，納入可行的國際系統框架，還有龐大的工作要做（包括由文明的外來強權施加影響力）。當然，庫柏在此重複了簡化的文明、野蠻與原始社會的 19 世紀區分（雖然用了比較文雅的措詞）。文明的後現代國家（如那些建立歐盟的國家）受託背負歷史的重擔，將原始的前現代國家（如阿富汗與剛果）和野蠻的現代國家（如中國與伊朗）雙雙引進文明的（後現代）世界。布萊爾認為，凸顯普遍人權原理的寰宇主義，是後現代版的帝國主義的適當哲學立場（這是他在向美國國會的演說中表明的）。庫柏那種地緣政治的簡化偶爾有用，但結果它們往往都證明是嚴重的誤導。庫柏（布萊爾可能也）忽略了，在眾多其他分析者看來，國族國家不再是任何一種寰宇主義的適當概念基礎。於是，出現了一個嚴重問題，即如何將真實的國家裝進這麼乾淨的箱子裡。既然美國看似在流氓國家和現代國家之間搖擺不

定，（情況有利時）偶爾表現一下假定為文明的後現代性，我們該如何論斷美國的立場？但結果顯示，那就是大多數國家的行事方式，甚至是那些隸屬歐盟，替庫柏的後現代國家定義提供模型的國家。法國和英國終究算不上是屈從於國際法理想的典範，雖然當這麼做符合其利益時，它們隨時準備召喚這種法律。

103

地理學和人類學知識因此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據此，有關這種資訊之品質的鬥爭，是政治過程本身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一點在環境政治上尤其真確，其中大部分戰役正是為了爭奪什麼才是地理學與人類學事實的適當而真實的再現。在世界銀行支持的大壩計畫的漫長歷史中，世界銀行習慣將這種計畫描繪成純樸而閃亮的現代性禮物，送給感恩的落後鄉村人口，他們如今可以期待鄉村電氣化、防洪，以及商業性農業灌溉的可能性。這種計畫的反對者，則通常會列舉大批人口流離失所、原住民權利及生活方式瓦解、棲地破壞及生物多樣性喪失、商業的橫行，以及不受歡迎的社會關係轉變，同時，他們指出多國公司從這份有利可圖的造壩契約獲得的利益，遠比地方居民來得多。例如，印度龐大的納瑪達水壩工程（Narmada Dam project）（已逝的安隆公司也涉入其中），違反了多數地方居民的意願、甚或知識；面對這類修辭，世界銀行發覺自己不得不撤資。如今，世界銀行大致上已停止資助大壩計畫。⁶我們目前還能接觸到類似爭議，其中，地理學和人類學資訊的性質，已證明對於政治判斷和經濟行動的形式至關重大。全球暖化正在發生嗎、在哪裡、有什麼影響（如果不是

在我家後院，那麼誰在乎？）？這件事情有多大程度歸咎於人類行動、主要怪罪在誰頭上？對此可以且應該做些什麼事、誰會在補救政策中獲益或失去最多？主要衝擊會以什麼形式、在哪裡發生？科學社群中有大批專家被動員來為這些問題提供解答，而答案的性質對政治影響很大。問題在於，這便開啓了令科學成為所謂「政策遮羞布」的前景，這也解釋了當科學針對某些公司利益（主要是能源和運輸部門），指出令人不快的結論時，布希政府內部動員的政治力量，為何花費那麼多時間，試圖竄改科學或令其喪失信譽。⁷

104

即使當全球暖化或全球貧困這類令人不快的結論變得不可避免，主流回應還是在市場自由與私有財產權的普遍理論框架內尋找補救辦法，輔以大劑量的帝國政治，來保護支配性的權力結構。據說，透過在世界各地擴展私有財產權和小額信貸機構——不論其人類學或地理學環境及後果如何（包括利馬、孟加拉和開羅）——全球貧窮問題將獲得解決。污染權的國際交易系統，加上新一波的市場導向技術創新，將解決各地所有的環境問題（這向來是高爾〔Al Gore〕在全球暖化辯論中，支持市場與創投資本家的主要貢獻）。但這裡有個弔詭，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主要政治強權，可以隨意誇言自主和（市場）自由之普世原則的重要性，卻將碳吸存造林計畫（carbon sequestration forestation projects）強加於實際上沒得選擇、只能接受的貧困國家，還將武器（布萊爾和以比利時為首的「後現代」歐盟沒有勸阻的交易）、野蠻的反叛

亂訓練（美國的專業），以及慈善的援助形式（通過市場機制來分發，而且往往倚賴捐贈國家的特殊商業利益），出口到許多現代及前現代國家。輸往非洲、利潤豐厚的當代軍火交易，大多以掠奪非洲大陸自然資源為代價，乃是以自由市場之名實施的當代新殖民主義的駭人暴力，但自由市場卻使得彌爾對於英國於19世紀印度實施帝國主義統治的家長式自由主義觀點，顯得正面而良善。

問題在於，針對全球貧窮或全球暖化等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計畫和所謂解決方案，有多少是因為純粹的地理學及人類學無知而失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自那時起，間歇性地對抗全球貧窮的「戰爭」）以降，美國和歐洲強權分派的經濟發展計畫的歷史，充斥著由於誤解地理學及人類學情勢，因而以悲慘失敗收場的宏偉計畫事例（有個記載最詳實的案例，是英國殖民當局在1950年代於東非發起的，不幸的「落花生計畫」〔ground-nut scheme〕）。若要知道真相，世界銀行檔案室裡有個存放這類失敗計畫的龐大卷宗。但就某種意義而言，失敗並不重要，因為像是以環境可持續性為核心而開展的計畫，其真正的議題跟環境一點關係也沒有，就像任何反貧窮計畫也跟貧窮沒甚麼關聯。主要目的是要讓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某種布萊爾版的實字主義奠基其上的那些普遍原則，能夠結合起來，以便維繫透過這種安排而有效地再生產的社會權力關係。就逆轉環境劣化或減少貧困而言，從這種計畫產生的任何好處（不可否認，良好結果偶而還頗為顯著）都純屬偶然。甚至是通過制度改革展開的實質財富重

分配計畫，以及美國 1930 年代災難經驗之後的福利制度安排建構——如羅斯福總統就很清楚地認識到——也比較是跟資本主義的自救，而非與改善美國人民的命運有關。於是，事先知道可能導向成功或失敗的地理學與人類學條件限制，也就沒那麼重要了，因為成功與失敗的定義，跟人們實際發生的事情沒什麼關係。譬如，在哈利伯頓（Halliburton）公司眼中，伊拉克戰爭是個偉大的勝利。在聯合國千禧年計劃（U.N. Millennium project）裡沸沸揚揚，如今在薩克斯據稱仁慈的智識領導下成形的向貧窮宣戰，被賦予在不以任何方式觸及全球財富積累過程的情況下，祛除全球貧窮的不可能任務。

所以，難怪科學和社會科學內部（更別提媒體或那些塑造輿論的場域），對於將人類學及地理學知識安置於康德認為它們原則上應該佔有的「預備」位置，沒有多大興趣。充其量，地理學和人類學條件只是用於解釋在特定地方和時間的某個計畫的特定失敗（卻總是讓普遍原則毫髮無傷，不受批評）。但是，普遍理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總是發現，他們自己不得不以某種方式，針對自身論點的人類學與地理學「適用性條件」（若非「可能性條件」），發表評論。我們已經知道，努斯鮑姆斬釘截鐵地斷言，她的寰宇主義要能行得通，勢必需要地理學、人類學和生態學的某些新教育策略，但她不去探究這樣的教育可能需要些什麼。黑爾德將地方「情境化」與「詮釋複雜性」嵌入他的康德式寰宇主義框架，然後彷彿其中沒有暗含什麼重要事情一樣，繼續下去。班哈比並

不認為容許地方有很大自由度去詮釋普遍倫理原則，有什麼問題，但很顯然地，這一點決不妨礙清楚表達普遍原則的方式。至於貝克，他向我們再度保證空間議題完全解決了（雖然他的評論簡化到令人難以置信），而且毫無疑問地支持全球個人化人權的普遍理論，與此同時，他擔心的是迫切需要處理的時間寰宇主義。梅塔大聲疾呼反對自由主義普遍主義，但她說，若無正當理由，沒人可以規定空間理論的內涵，然後，她繼續信奉柏克與海德格（兩個有問題的人）是提供必要解答的人。當然，佛里曼只是假定（對富裕企業家而言）世界是扁平的，而且形成了水平網絡，而（對其他人而言）不平坦的現實只不過是過渡階段，是一種肯定會過去的文化落後的不幸地方展現。薩克斯強調，發展經濟學的系统理論本身沒有問題，但其應用不能沒有「承諾徹底浸淫於專業顧問工作所在之任何地方的歷史、民族誌、政治學與經濟學」。^{*} 附帶說明，我們或許注意到，當薩克斯投入 1990 年代施加於混亂的俄羅斯經濟上的「震撼療法」新自由主義化這個災難性政策時，他對這些事實所知有限，或根本毫無所悉。此後，他就否認對那裡發生的事情負有任何責任。但當時這也是標準作法。當某件事因為特殊的人類學和地理學條件而奏效，就宣稱這是普遍理論的勝利，如果失敗，就訴諸完全相同的那些條件來辯解。例如，當東亞和東南亞的發展中經濟體在 1990 年代取得可觀的成長數據，世界銀行就將它們描繪為，以當地的網絡化亞洲價值（如同佛里曼不斷敦促我們的，這是我們其他人應該考慮效法的普遍

原則) 潤滑過的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但當它們於 1997-98 年間垮台，卻普遍被貶抑為裙帶亞洲資本主義的範例，它們嚴重違反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屢試不爽原則 (tried-and-true principle)，以至於需要國際貨幣基金協助它們康復。

107 這一切產生了令人不舒服的印象。人類學與地理學 (我們應該再加上歷史) 的事實被投機性地引用，以便使得不喜歡的事物喪失信譽，或促進偏愛的普遍原則，而非視為所有其他認知形式的系統化可能性條件。這個策略可以成功運作，正是因為與其他認知方式有關的地理學與人類學知識的固有位置性，而這是康德曾察覺到、卻無法付諸行動的位置性。剛好也很便利的還有，地理學、人類學與歷史事實可以很具體地彙整起來，令人難以駁斥。一般性理論可能會提出一種結果，但此時此地的特殊性是如此特別而怪異，以致產生截然不同的東西。一般性理論的原則，像是國際貨幣基金的標準「結構調整」處方 (更不用說社會科學裡所有的標準學說)，藉此可以永遠免遭反駁，而同時失敗的話，則可以用地方異常 (local aberrations) 來合理辯解。這條論證似乎是在說，人類學、歷史和地理學境況未能適當地與理論的普遍理性合作。布希將世界導向對抗阿富汗和伊拉克暴政的自由鬥爭 (畢竟，除了暴君，沒人支持暴政) 的作法沒錯，而是當地居民沒有好好合作，還辜負了理性的期望。事實上，他們是如此不理性，直到他們成熟到足以認識邪惡的暴政之前，我們可以召喚洛克、亞當斯密以迄彌爾的每一位，來正當化他們承受某種版本

的帝國監護統治。

由這段慘淡歷史引發的，將地理學和人類學視為基本原則的任何動機，都被兩種主要障礙削弱了。首先，這麼做會削弱選擇性機會主義的能力，從而移除這張如此便利又有效地掩飾並保護隱藏在高貴普遍原則背後的，階級或族裔國族主義權力特殊性的面具。其次，當理論家朝這個方向冒險邁進得夠遠時，他們發現地理學與人類學視角的嵌入，會破壞普遍理論的實際運作。譬如，僅僅是將空間性（更不用說環境動態，以及地方形構的政治）引入經濟理論，就會對該理論的基本命題造成強大的破壞性影響。1957年，庫普曼斯（T. Koopmans）與貝克曼（A. Beckman）發表一篇文章，嚴正「懷疑通過價格系統來維持活動之有效區位分布的可能性」。庫普曼斯指稱，「決定性的困難」在於，「一個人的〔區位〕決定判準取決於其他人的決定，這種依賴似乎沒有給有效的價格引導式配置留下空間。」將空間性投入經濟推理的貯料槽，由於價格無法以有效且最佳的方式來發揮它協調活動的適當功能，整套邏輯就分崩離析了。庫普曼斯與貝克曼深受該結果所苦，他們拖了好幾年才出版。⁹庫普曼斯獲得諾貝爾獎，此後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很樂意避開這種弔詭。直到最近，克魯曼（Paul Krugman）爲了至少提出部分的數學解答，才重返這個問題。但那個解答既不完整，也不根本，而且無論如何，正因爲它令人不安的意涵，致使它在經濟學中遭致邊緣化，成爲一種特殊的地理應用。考慮到經濟學思想的霸權，奇怪的是，一門無法將原始空間

性（肯定是所有經濟活動的普遍條件），遑論真實地理學與人類學納入基本命題，而且（除了訴諸粗糙的地理決定論）無法適當解釋國家財富之地理差異的學科，竟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公共政策和媒體中，佔有影響力如此深遠的位置。這台理論機器最終遮掩了經由市場交換之資本積累的階級特徵，不全是個意外。

將空間性納入一般理論的艱難，並未局限於經濟學。以康諾利（William Connolly）這麼重要的政治理論家的著作為例。¹⁰ 他令人讚賞的基進意圖，是要批判他視為保護了集中化政治權力（尤其在國家內部）的虛假的政治理論普遍性（例如理性選擇）。他將空間性引入他的論點，作為達成目標的工具，正是因為如同庫普曼斯先前的發現，引介空間性會破壞眾所公認的知識。他策略性地使用空間性來攻擊普遍性，並力倡「一種更偏寰宇主義、多向度的民主想像，能將民主能量和認同過程廣泛散布於多重位址」。但是，在面臨定義「民主能量的更多重空間化」可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他對於任何種類的物質地理學或人類學所述不多，只回顧了其他政治理論家針對空間（實在不多）與領域發表過的見解，他的結論則是，不可能在理論上指認出「若無法取代對國家的忠誠，可能會與國家競爭的地方，以至於有時候，新的『我們』會發現自己正以競逐國家對政治效忠之壟斷的方式，將忠誠授予其成員和願望」。康諾利接受迅速變化的空間性對一般政治理論（特別是康德的寰宇主義）的破壞性後果，但他主要將此視為主張一種新的「地下莖式」且「片段的」寰宇主義的新機會，其

中，網際網路特別凸出而成爲民主可能性的工具。爲了完成他的計畫，康諾利必須對空間性與地理（他所找尋的真實地方）如何積極生產出來，以及有什麼人類學後果，有些了解。他訴諸「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普遍原則作爲一種破壞力量，卻沒能指明資本主義—軍事同盟過去所生產、而且持續造成的現代文化「加速」（speed-up），這股趨勢因爲以金融權力革命作爲維護與提高特定階級及領域權力的手段而加劇。網際網路對於十億左右的薪資勞動者而言，不具任何解放潛能，根據世界銀行資料，他們靠一天不到一美元勉強度日。正是在實質的地理學和人類學知識很關鍵的地方，康諾利的政治理論化嘎然而止。「位址」、「空間性」、「速度」、「領域」和「地方」這些關鍵概念，除了拿來作爲合理地破除政治科學之公認智慧（尤其理性選擇理論）的方便隱喻外，沒能讓我們走得更遠。

舉另一個政治理論爲例，夏皮羅（M. Shapiro）也遭遇了類似困難。他著手探討全球差異當中的康德式款待倫理學。他指出，康德「想像一種世界，其中，擴大的款待倫理標準，會削弱邊界化世界的重要性」。問題在於康德的作法，「抹除了康德的全球款待倫理學原本欣賞的大部分差異。」具體而言，康德由於採取了有邊界的空間觀點（這是我的想法，不是夏皮羅的），並將國家視爲唯一相關的機構，因而無法處理國家內部的（宗教、族裔，或只是生活風格偏好）差異：「由於康德的道德地圖將國家圈圍成抽象的『人的社會』，他缺少了對於不是以國家形式組織起來的人

群與國族的敏感性。康德的實際地圖完全是地緣政治性的，不承認不同時是國家的國族……。康德認識到有眾多『島嶼』，繼而尋求方法來創造和平的環境，即這些島嶼能在其中成為和諧群島的一片寧靜海洋。因此，對康德而言，『和平』主要是國家實體之間的關係。雖然他提倡一種抵抗霸權的國內共和治理形式，但他的戰爭觀念，並未認識到國家內部的競逐領域——例如，移居者和原住民之間的鬥爭。」¹¹

110 夏皮羅正確指出的問題，是要使康德的寰宇主義，和遠比國族國家系統複雜的人類學及地理學差異，兩者取得協調。但夏皮羅不是通過地理學和人類學來探查這個問題，反而只是訴諸常見的哲學嫌疑犯（德悉達、傅柯和李歐塔〔Lyotard〕——但有趣的是，德勒茲〔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卻略過未提）所部署的空間、地理及領域隱喻的自我指涉性研究。這種作法將空間生產及真實地理學與人類學的活躍領域，擱置一旁（彷彿唯一要緊的事，是正確地理解隱喻，而非探究人群藉以聚集或分散及分化的物質過程）。夏皮羅要是讀過康德的地理學，他可能會比較擔心康德所述的，對人與地方要有「敏感性」。實際上，有趣的是，夏皮羅的解釋若顯得博學多聞，正因為他承認人類學與地理學條件限制的潛在意義，但可惜他對當代全球化政治經濟內部「空間與論述互動」所引發的偶然性，理解不足。

印度的從屬者研究（subaltern studies）所達致的人類學與歷史的邊界模糊化，可能提供據以提出這些議題的較友善地勢。他們

執意嘗試揭露來自底層的歷史，這種歷史經由不論何種階級或文化的個人生命，發生於真實地方，這股堅持也確實產生了重要洞見。但是，儘管他們處理歷史的方法，展現了許多技能和深度，但對待空間性和地理的方式，卻格外笨拙。這個傳統的當代研究者德什潘德（S. Deshpande），提出了一則有啟發性的事例。¹²他研究全球化、印度國族概念，以及作為橫跨印度次大陸之獨特認同與意義所在的「印度特質」（Hindu-ness）（或「印度教國族主義」〔Hindutva〕）的建構，三者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這些關係的歷史「與地理的交織既緊密又重大」，儘管這段歷史也有階級特性。比方說，尼赫魯的安全發展模式取決於「享有特權的泛印度菁英，他們通常經得起鬆開宗教的牽絆」。這需要一種特殊的空間邏輯（其歷史還有待書寫），「涉及沿著區域之間、鄉村—城市，以及城市—超級城市的軸線而建立的多向度支配關係。」一種獨特的社會地理疊加於印度的國族空間上。但這引發了各式各樣的區域—族裔對抗運動。印度國族主義政黨印度國大黨（BJP）所召喚的印度教國族主義，利用「尼赫魯派國族空間之無地方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弱點」，並試圖「重新燃起對於特定地方的私人承諾，而這些地方總是鑲嵌在印度教國族主義的抽象社會空間裡」。印度教國族主義訴諸德什潘德所稱的「睦鄰之誼的積澱平常性（banality），那是在個人與家庭之間，以及他們與其地方環境之間，長期居住關係的生活親密性」。德什潘德的措辭很有意思；街道與住宅區之世俗日常地方經驗的平常性，定義了獲得「自明之

常識」地位的真實。這構成了與康德寰宇主義大相逕庭的政治（包括社區間暴力的病態表現）的基礎。地方地理忠誠的「平常性」，破壞了尼赫魯派發展主義的寰宇主義理想（猶如空間性破壞了新古典經濟學或理性選擇理論的宏偉和諧）。

這似乎是一條富生產力的研究路線，直到德什潘德開始尋找更好地理解空間性角色的方法。他寫道，「理解空間策略的一種方式，是將它們想像成涉及異質地方（heterotopias）建構的意識形態實踐。」空間策略「試圖將想像空間與真實地方紐結起來，而這些紐結也將人與特定認同及其導致的政治 / 實際後果結合起來」。¹³ 這個構想表面上很吸引人，因為它至少開啓了對於空間與地方實際上如何生產的考察。召喚傅柯的異質地方概念，也有理論的認可戳記。但這種概念對策，最終只是將具豐富潛能的地理學論證，攤平成爲絕對的康德空間，而其呆板的平庸特質不會比它所詮釋的「睦鄰之誼的積澱平常性」還要高明。德什潘德發現，異質地方的完整意涵，很關鍵地取決於「它爲了比日常生活規模更大的活動或運動而動員的脈絡」（也就是說，它仰賴某些非地方的權力資源）。尼赫魯有他的鋼鐵廠，印度教國族主義也有它的象徵中心與地方。兩者同樣都是異質地方位址。那又怎麼樣？是不是沒有比傅柯僵化版的絕對空間更好的理論把手，來處理真實地理與空間性的複雜？

面對這種困局，可以理解的是，某些思想家選擇拒絕寰宇主義，並將康德的普遍性拆解成爲地方的、偶然的，以及單純以地

方為基礎的社群主義意義。例如，沃爾澤在構思一種「徹底特殊主義」的正義理論時，便採取這條路徑。他主張，正義感作為一種普遍原則，可能且確實會隨著地方不同而有極大差別，甚至不同鄰里之間都會不一樣。這種差異往往成為重大政治與司法衝突的明顯根源。「地方正義」(local justice) (埃爾斯特〔Jon Elster〕的用語)，同時是地理生活和制度生活的事實，而且是值得密切關注的事實。就和康德對地方法律的讓步一樣，這似乎引起了棘手難題。我們受困於主張「每個文化團體都有某種掌握其倫理直覺的正義理論」的相對主義，以及即使能明確界定、但依然惹人厭的「道德普遍性」之間。但由於（如沃爾澤認為的）正義可能「根植於對地方、榮譽、工作、各種事物的獨特理解，並構成共享的生活方式」，卻不能逕自推斷，如沃爾澤的主張，「置這些理解於不顧，（總是）等同於不公義的舉措。」¹⁴當然，寰宇主義的誘惑是回到齊諾（Zeno）的「井然有序之哲學社群」夢想，在其中我們不會「按照地方正義架構來劃分彼此」，而是要將所有人類視為「同胞」。然而，沃爾澤的社群主義回應，也是一個烏托邦，因為它建立在「我的社群對錯」的信念上，卻少了清楚的地理學與人類學過程觀念，而正是這些過程使得某種稱為「社群」的東西，起初得以成為政治判斷與經濟活動的可能（更別提連貫一致）實體。

這種抽象的社群主義論點，往往在直接對抗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和寰宇主義普遍性時產生，最後總是（心照不宣，而非明

白顯露地)預設了一個分隔為文化或社群鑲嵌畫的地理世界,並將其理解為艾比亞(Anthony Appiah)譴責的一連串「封閉領域箱」(closed territorial boxes)。他們忽略了發生於迥異時空尺度上的各種縱橫交錯的社會—生態過程,是如何關係性地建構出地方與地域化的生活方式。這種社群主義政治理論,沒有注意到地方和社群建構的實際歷史—地理過程。忽視這些過程,並建立一個地方正義的特殊主義理論,卻將地方和文化視為位於固定絕對空間的具體事物,這麼做就是鼓吹一種拜物教式的政治,試圖(幸運的是,這麼做困難重重)永久凍結地方及其正義之社會規範的既有地理結構。當社群主義箱子關閉後,排他性必然接踵而至。結果很可能是既有壓迫性,又無法發揮功能。相較於地方性社會管制的多重威權主義、甚至新法西斯主義形式,康德的寰宇主義在令人不滿且充斥暴力的地理差異世界中,作為一種介入規範,顯得正面而具解放性。沃爾澤的問題在於,他未能檢視「在地的特殊團結」實際上如何形成與運作。拿掉封閉箱子的假定,沃爾澤的理論就少了清楚的地理學或人類學基礎。把封閉箱子放回去,則會啟動壓迫。

人類學家柯利弗德(James Clifford)長期批評將文化視為一系列封閉箱子的研究,他反思一套有關寰宇政治的文章,從而返回他自己的人類學根源,提出了「差異寰宇主義」(discrepant cosmopolitanisms)一詞,作為他自己對待寰宇主義一詞的模稜兩可立場,最令人滿意的描述。雖然他接受我們生活在一個日趨寰

宇主義的世界，但他不能忘懷「好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沿著社會空間依附的連續體，建構了他們的歸屬感、他們的家庭觀、精神與身體力量及自由的觀念。這些感受和觀念從地方山谷和鄰里，延伸到相遇與相對匿名的稠密都市位址，從紐結於特定領域的國族社群，擴展到橫越邊界和海洋的聯繫。在這些多樣的接觸地帶裡，人們在一個空間總是已經遭致侵犯的世界中，維持著批判的、非絕對論的生存與行動策略。這些能力可以在希望的標識下，重新被視為『差異寰宇主義』。但這是一種淬鍊出來的希望，與生存及接合具在地意義之關係性未來的能力息息相關，卻與系統層次的轉型關聯不大」。¹⁵

不過，針對「具有在地意義之關係性未來」的探索，將我們帶回到梅塔和柏克。柏克沒有否認「成熟個人」（康德的幽靈）之間對話的可能，他們可以基於地方性的特殊經驗，針對共同政策達成協議。柏克甚至設想了經由這種對話而產生系統性轉變的可能性。他寫道，「將情感依附於一小塊土地，喜愛我們在社會中所歸屬的一小群人，是公共情感的首要原則（可說是胚芽）。它是我們進而去熱愛我們的國家與人類的序列裡的第一個鏈結。」¹⁶ 艾比亞總結道，柏克非但沒有敵視寰宇主義，相反地，他還「設定了一種極致的普世價值，亦即包括全人類的愛；這就是正當化對於一小群人的愛的方式，視之為路途上的第一步」。這裡設想的是某種「根植寰宇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ism）的可能性，這也正是艾比亞極力頌揚的。¹⁷ 它看起來大致符合柯利弗德的「差異寰

114 「寰宇主義」構想所要表達的情懷，而且在某些方面，類似於比較顛覆性的「由下而上全球化」論點，這些論點若非奠基於人類學家艾斯科巴支持的、以地方為基礎的革命政治，就是立足於桑托斯提出的「從屬者寰宇主義」。

所有這些我們或可稱為「形容詞寰宇主義」的想法，具有以某種方式將尊重地方差異與強制性普遍原則結合起來的共同觀點。從這種立場看來，根植於真實地方之地理的地方愛國主義，與寰宇主義未必會格格不入。相反地，誠如福爾克（Richard Falk）有點出人意表的主張，它們有潛力「分享共同承諾，替人道的國家、人道的區域重新塑造條件，以及在仰賴成功的跨國社會力量，重塑正派的包容性全球主義的條件」。¹¹⁸ 然而，不同於針對彌爾的後殖民批判，艾比亞可以拿彌爾的理論作為他的寰宇主義的支柱，因為他說它可以跟既有的地方文化傳統（他舉的例子是阿散蒂〔Asante〕¹¹⁹）特性融合在一起。「根植寰宇主義」以及他試圖捍衛的「寰宇愛國主義」，都是公開且坦然地根植於地方忠誠（也就是，根植於某種版本的人類學和地理學事實），並且構成協商差異之全球寰宇主義的基礎。這種寰宇主義不是「指稱靜態封閉文化之間的對話，其中每種文化都具有內在同質性，並不同於其他一切文化：不是讚美一套封閉的箱子」。因此，艾比亞企圖避

[譯註]

¹¹⁹ 迦納的少數民族部落。

開任何基礎狹隘的社群主義政治的指控。他尋找柯利弗德所稱的「接合具有在地意義之關係性未來的能力」。他認為，「地方主義是一種達成普遍理想、普遍目標的工具」，在這個基礎上，有可能建構出「對於歷史脈絡如何塑造某個實踐的意涵，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普遍主義形式」。¹⁹他主張這種雙重基礎（普遍性和特殊性）使得真正的「自由主義寰宇主義」（liberal cosmopolitanism）成為可能。因此，洛克和亞當斯密將他們的自由主義奠基於他們自己的地方世界，一點錯也沒有，因為這就是所有自由主義者在每個地方所做的事。重要的是這項事實，即他們可以在全球各地這麼做，同時協商地方差異。

但這麼一來，就出現了地方歷史與文化傳統該如何理解的問題。艾比亞指出，他父親對於阿散蒂傳統의自豪，與他父親的英國教育及其對彌爾的欽佩，在奠定他的以尊重個人及個人尊嚴作為基本人權的普遍概念，藉此對抗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國家權力之任意專斷上，重要性可謂不分軒輊。但艾比亞也指稱，私有財產權對於脫離貧窮有其必要性，就在這麼做時，他歡快地將有關共有財產權的「傳統」阿散蒂實踐和信仰擱在一旁。艾比亞對於阿散蒂文化歷史衣鉢的宣稱是高度選擇性的，也是誘人的，拿來作為他自身文化純正性的證據，非常方便。到底艾比亞的父親信奉自由主義人權信條，比較是來自阿散蒂文化傳統，還是源於他在後殖民迦納國家裡的鬥爭經驗，艾比亞自己的說法也交代不清。當我們更仔細檢視艾比亞最終抵達之處，我們看到了替自由

主義（不是阿散蒂）信條的延伸辯護的解釋。其核心是尊重個別人權與個性的自由發展（如同彌爾的看法），輔以對多樣的社會、宗教與文化之實踐、價值及信念的容忍。

依艾比亞之見，人類學的重大教訓是，「當陌生人不再是純屬想像，而是真實在場，分享著人類社會生活，你可以喜歡或不喜歡，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但是，如果這都是你想要的，那麼你最後就可以弄懂彼此。」²⁰ 這種弄懂彼此，願意擱置彼此的刻板印象式再現，開啓成熟個人之間對話的能力，在艾比亞的「根植寰宇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幸地，這種能力並未觸及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當代形式的核心，即使它提供了一條走出（賓拉登和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構成的那種）宗教偏執，以及認同政治既強調又奮力抵抗的深仇大恨的光輝道路。艾比亞的提議，有可能化解源自文化和宗教差異的衝突。但這麼做，卻是以忽略資本主義通常會挑起（在新自由主義化底下惡化）的政治經濟不平等為代價。實際上，儘管艾比亞平息我們對於多元文化差異的焦慮，但他最後還是支持再生產階級不平等的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實踐。他的提議在美國針對認同、多樣性、差異及各種歧視展開的長久對話當中，居於舞台中央，誠如麥克爾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多樣性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中指出的，這是一場討論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對話，卻排除了真正重要的關鍵差異：階級權力及其相關的社會不平等。²¹ 麥克爾斯提到，懷著敬意對待他人不花一毛錢，但真實收入與政治權力的重

新分配，卻要付出代價。艾比亞的提議裡，未曾針對近年來在華爾街積聚的龐大財富集中提出半點意見，除了暗示我們也該準備好容忍那種差異。

但是，在艾比亞膚淺的根植寰宇主義內部，潛伏著一種以地方為基礎的領域化認同作用的更深刻且複雜的歷史，伴隨著在政治上位居前線的國族主義，以及在哲學上佔據核心位置的地方現象學。就後者而言，隱約出現海德格（如梅塔聲稱的，他「頗具柏克作風」）威嚴的身影。海德格對「寓居」（dwelling）和「地方」的依戀，加上他徹底拒絕一切形式的寰宇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現代主義），似乎將他置於與康德倫理學完全對立的位置，同時替以地方為基礎的道德理論提供了實質哲學及現象學根基。而且，海德格在學術菁英當中吸引的關注，至少同康德一樣多。這兩大哲學巨人及他們的知識遺產之間的戰鬥，無疑將以類似昔日希臘哲學奠基者（康德與海德格都從不同的前蘇格拉底思想流派中大量汲取靈感）界定主要知識分裂的方式，席捲下一個千年。但是，海德格能夠給康德地理學的頑固特殊性，賦予形上學基礎和哲學聲音嗎？

然而，海德格的著作在某個方面確實很古怪。物體、地方、空間、時間和文化（語言和神話）的現象學經驗，使得「地方」成為「萬物之首」（first of all things）和「存有真理的場所」（the locale of the truth of being）。²² 海德格是我們以**地方**一詞指稱的基本地理概念的卓越理論家。雖然他與德國文化和語言傳統的聯繫

很明顯，而且特別是他在戰後的著述（如《建、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導向於如何在大規模毀壞的世界中，建立一種較穩固地方感的實踐問題，他卻沒有將他的抽象形上學概念，連繫上任何特殊生活地理的物質境況，更別提任何具體的都市設計。最著名的例外是，他召喚了作為「寓居」與「存在」於世之位址的傳統黑森林農舍。不過，他的表述是浪漫化的。再者，他描述的狀況並非當代世界的物質特性，而這個獨一無二的家鄉（*heimat*，德國人如此稱呼他們的寓居所在）不是他或我們117可以歸返的地方。他的著作中沒有真實的地理學或人類學內容。這迫使追隨者須與以下問題搏鬥，即如何定義「真實地方」的「本真」性質，以及道德或藝術品的「根植性」（*rootedness*）可能意味著什麼——簡言之，如何通過實際的地方營造，將更具體的意義賦予海德格的抽象概念。我們也得費力理解，海德格早年支持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意識形態（及其積極的政治實踐），以及他從來沒有明確脫離那種關係的事實。這樣的文化和政治依附，對於他「寓居」於「地方」的哲學論點，有什麼關係？

創造「邪惡的平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一詞的是鄂蘭，當時她目睹在以色列進行的艾希曼（*Eichmann*）審判，而她對海德格持久不變的依戀，也證明是個謎。²³這裡的關連或許看似牽強，甚或異乎尋常（雖然不比鄂蘭—海德格關係的親密來得怪異）。要是鄂蘭針對邪惡特質的描述，與作為人類境況不可或缺之社會建構物的「寓居」、「地方」和「家鄉」的平常性，有某種隱

蔽的關聯呢？如果德什潘德的「睦鄰之誼的積澱平常性」對人類境況十分根本（甚至連傅柯最後都認可了空間），構成世界上一切知識和行動（包括艾希曼的行動）的先決條件——康德式的預備知識——那又如何呢？當代寰宇主義討論迴避了這種可能性。艾比亞完全避免提及海德格，以及那些基於海德格現象學而發展地方及根植性理論的人。即使謝平與羅賓斯的《寰宇政治》（*Cosmopolitics*）全書經常大聲且週期性地籲求某種「根植」寰宇主義，海德格卻只在書中出現一次。不過，僅此一次出現在瑞（Jonathan Ree）所寫的那一章裡的海德格，是在說：「僅僅借助於國際主義，是無法克服國族主義的；它反而被擴大，並藉此而提升成爲系統。」這種想法引導瑞去評論「康德多年來從寰宇主義到永久和平觀念的轉變中，產生了致命偏移。過程中，世界公民身分的耀眼理想被簡化成勉強讓步，即我們應該永遠允許外國人在我們之間平安無事地遊歷，只要他們不會逗留太久——這項義務乃康德導源自『人人皆有的權利……奠基於對地表的共同佔有，地球的球體形式迫使人人必須容忍與他人比鄰維生』。除了這種令人沮喪的人類社會性反思外，永久和平使寰宇主義權利得以再次被它們原本打算取代的舊愛國主義吞嚥。」²⁴

人們立足於地方的明顯根植性，相當笨拙地將我們拉回康德的真實地理世界，其特徵是愚蠢和侵略、幼稚的虛榮和破壞性——這是寰宇主義必須以人類進步之名加以對抗或積極壓制的偏見世界。只需要一小步，就能將地理和空間性（及地方忠誠）不

僅視爲擾亂了秩序與理性的普遍論述，還潛在地破壞了普遍道德和良善，其程度不亞於它們削弱經濟理論的基本奠基性命題。和康德的地理學一樣，它們變成所有偏見、侵略及邪惡（以艾希曼那種人的惡行爲高潮）的源頭。這是何以儘管布希與雷根都再三強調自主和自由的普世價值，但布希卻以像雷根那般輕易陷入「邪惡帝國」語言的方式，訴諸「邪惡軸心」的平庸簡化，卻如此容易脫身的原因嗎？海德格不妥協的誠實，正好帶領我們前往這些（知性上和政治上的）特殊「惡行」可能內容的形上學根源。伊拉克、東帝汶、盧安達—蒲隆地、達佛，當然還有猶太大屠殺，都向我們揭示了這些惡行實際上可能意味著什麼。

但這不可能是事情的全貌。海德格當然不相信自己是在兜售固有邪惡的形上學。他的追隨者也不可能接受，將邪惡的平常性等同於他的形上學。由此觀點看來，邪惡（若如其所是）源自一個可怕的寰宇主義習慣，即將空間、地方和全體居民妖魔化爲多少是在（市場自由、法治、現代性、特定民主願景、文明價值、國際社會主義）「計畫之外」。萬一海德格堅稱的，寰宇主義總是有根基且情境化的主張沒有錯呢？這就是柏克的推測，以及艾比亞現在極力捍衛的立場。至於柏林（Isaiah Berlin），則準備好將康德視爲「國族主義的陌生根源」，並接著評論道，混合了赫德（Herder）與盧梭學說的康德式意志自主理想，如何導致國族主義的「恐怖爆發與病理形式」。²⁵於是，美國寰宇主義的奇特版本才說得通。布瑞南（T. Brennan）說，它是奠基在「與愛國主義有別

的美國主義，但仍謹慎地守護美國的帝國神話，涉及美國作為一種觀念與（做些調整後）高尚渴望的攜帶式精神」。²⁶ 這不就是布希總統在 9/11 恐怖攻擊一週年演講中，清楚表達的邏輯嗎？但是，沒有針對「邪惡帝國」和抵抗空間——「邪惡軸心」——或甚至善惡勢力似乎被鎖進永無休止戰役的有問題空間（如巴基斯坦），予以強力譴責和妖魔化的話，這個神話就無以為繼。

119

這種張力指出了我們的主導再現中的知識僵局。這種糟糕的對稱性，界定了兩種位置。這種對稱性之所以確立，乃因為我們不能處理「邪惡的平常性」（顯見於東帝汶、盧安達—蒲隆地或南斯拉夫遭遇的特殊野蠻狀態，以及中東、南亞和東南亞，甚至在我們自己的城市如洛杉磯和巴黎的社區間暴力），而這又是因為我們無法理解及處理地理學與人類學的差異本身。當我們真正面對它時，這些構想的平常性，卻令人畏懼退縮。例如，努斯鮑姆強烈抨擊美國的價值崩解，以及對寰宇主義目標漠不關心：「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情勢，給了悲觀主義理由；康德充滿希望的論文出版後二百年，我們目睹許多區域淪為族裔、宗教與種族衝突的犧牲品；我們發現康德捍衛的平等、個性及人權的價值，以及實際上是啓蒙運動本身，在某些地方被嘲笑為不過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種族中心遺跡；我們普遍見到身旁的仇恨與侵略，遠遠多過尊敬與慈愛。」²⁷

根據這個視角，要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塞爾維亞的轟炸，（像貝克那樣）正當化為以康德倫理學之名來根除特殊地理邪惡的

偉大努力，真是輕而易舉。甚至，有可能支持美國國務院因危害人類罪而威脅塞爾維亞當局，但爲了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及其無數同僚免遭起訴，卻同時贊成美國拒絕簽署反對該罪行的國際公約。難道我們不都很感激布希總統領導我們擺脫伊拉克之惡的高貴鬥爭，領導這場將自主、自由與民主輸往全世界的偉大鬥爭？這就是我們必須跟隨康德，進入他的《地理學》與《人類學》幽冥區域之處，那裡或許暴露了海德格賦予地理學視角的、執迷不悟的形上學基礎。跳脫僵局的唯一途徑，即打破政治已環繞著它、可怕地旋轉了兩個多世紀的恐怖對稱性的唯一方法，就是敦促「地理科學的復興」，這不僅將「創造出那種一旦欠缺，所有學習就只是零碎工作的知識統一性」，而且讓我們更有能力去處理現場的地理邪惡平常性，這個容易覺察、但顯然棘手的問題。

那麼，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知識是如何建構的，以及，它們同我們通常支持遵行、卻時常導致災難性失敗的尊貴普遍理論，應該有什麼關係？不幸地，缺乏能懇求並努力爭取納入所有其他知識形式之中的適當歷史地理學與人類學知識的框架。當這些研究領域要替努斯鮑姆提出但未加解答的大哉問，提供首尾一貫的實質答案時，基於各式各樣理由，這些研究領域是團可怕的混亂。造成這團混亂的原因，紛雜多樣。我們將會看到，儘管在地理學和人類學的特定學科框架內部，存在著可能對此知識計劃有所貢獻的關鍵要素，但特別是地理學，經常充當國家權力、帝國主義政治與企業利益的卑微女僕，而且持續如此。人類學雖然

在啓蒙的批判性介入傳統中擁有較穩固根基，也無法免於這種指控（像是介入了 1960 年代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對抗叛亂的行徑，以及最近揭露的，有某些人類學家涉足了在伊拉克的軍事活動）。雖然某些個別地理學家（以馮·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爲首）和人類學家（以康德和赫德爲首），勤奮不懈地致力於重大事項，在這些學科框架內累積聚集的主要材料，還是不連貫且以軼事居多，而不具有系統性。²⁸ 例如，如果還不算陳腔濫調，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地理描述，無法啓發深刻的哲學反思——正如我希望表明的——它還掩飾了基本的理解問題。如果海德格花時間描述了真實的平常地理，作爲我們如何可能改善寓居的例證，我們可能就不會懷著同樣的關注和敬意來閱讀他。這麼一來，便產生了以下問題，即我們要如何理解康德的真實地理著述中的地理種族主義和族裔偏見，以及相較於便利的破壞性空間性隱喻的樂趣，各家各派理論家在面對唯物論的地理學、生態學及人類學的平常問題意識時，卻屢戰屢敗。常見的回應是維持對康德的尊敬，但將康德的地理學著作視爲異常、令人遺憾，而且與他的哲學貢獻不相關而予以切除，就像我們能夠接受海德格是一位討論地方的卓越理論家，卻從來沒真正書寫過特定地方一樣。

最後，我們還得承認，若是地理學和人類學理解，相對於所有其他認識形式，確實佔有了「預備知識」的地位，那麼，這些其他認識形式就內化了它們將地理學及人類學理解納入自身陳述的秘密方式。言外之意就是，地理學和人類學本身不會是孤立的

學科，而對其他學科解釋世界的方式有所貢獻，因為它們是四處流動的知識形式，即便我們假裝忽視它們的明顯形式。由此可知，地理學太重要了，不可能讓地理學者獨享，人類學也太重要了，不可能全交給人類學家。反過來說也沒錯，因為任何知識形式若是沒有針對它們運作其中的地理學及人類學世界，提出明確、隱蔽或秘密的假定，就無法運作，一如我們社會秩序的主要制度——無論是國家與軍隊、安全裝置與公共健康、企業、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非政府組織與工會、梵蒂岡與聯合國、好戰的革命運動——無法不受到地理學與人類學的條件限制而運作。如果地理學及人類學描述了所有思考（像傅柯承認的，包含了整套康德哲學）與行動形式的可能性條件，以及在世存有與流變的可能性條件，那麼，我們當然有必要超越這些平凡無奇，進而多加瞭解這種可能性條件的實際建構方式。

第二篇

地理知識

如果當我們面對非意圖後果，或是爲了地方化剝削及支配的卑鄙目的，而任意運用自由、正義與自主這類高尚的普遍原則時，邪惡時常存在於地理細節中，那麼，我們應該格外留意，地理學知識是如何生產及使用的。再者，它們表面上的平常性，使得詰問如此明顯的事物似乎沒有多少意義可言，但結果卻是這種顯而易見其實是某種更成問題的事物的偽裝。地理理性的謀略比歷史理性的策略精巧繁複多了。那麼，地理理性到底牽涉了什麼？

首先，我檢視那些自稱地理學家的人如何訴說他們的所作所爲，以及他們認爲最好應該如何理解地理學知識。1963年11月，向美國地理教育學會（the U.S.-based National Council on Geographic Education）發表的演說中，帕蒂森（William Pattison）很有幫助地指認出他所謂的「地理學四大傳統」（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他的論點是，美國地理學家在實作中交織了這些傳統，從而在他們的著述裡「建立了廣泛的一致性」。他指出，這些傳統「都是偉大時代的產物，作爲西方思想整體遺產的部分，逐漸形成了美國地理學」。此外，他聲稱（雖然沒有提出

任何證據)，這些原則「為當今其他國家的地理學者共享」。他辨識出來的四大傳統是「(1) 空間傳統，(2) 區域研究傳統，(3) 人—地傳統，以及(4) 地球科學傳統。」¹

126

空間傳統，至少可以溯及希臘時代，強調政治及經濟生活組織中，區位 (location)、距離、方向和空間模式的重要性。空間傳統於西元二世紀托勒密 (Ptolemy) 的《地理學》(*Geographia*) 中有系統地編製，並在製圖學與地圖製作的發展中，達致了特殊的歷史表現 (這個主題此後在伍德沃德 [David Woodward] 與哈利 [J. B. Harley] 創始的宏偉《製圖學史》 [*History of Cartography*] 中有徹底探討)。² 該傳統從康德的地理學觀點獲得額外的權威，成為專門處理與歷史有別之空間秩序化的專業空間科學。配備了幾何學作為其獨特語言，這種地理學能夠且往往渴望能達到以數學為基礎的科學地位。譬如，在網絡分析的數學庇護下，可以將運輸網絡、河流網絡、社會網絡全部匯集在一起。

區域研究傳統，可以溯及斯特拉博 (Strabo) 的巨著《地理學》(*Geography*) (「寫給奧古斯都羅馬時代政治家」的政治小冊子，顯然是作為改善治理的輔助)，聚焦於地方的性質、地方的分化，從而關注於地方的獨一無二特質。這種獨特性的起源，既來自歷史，也源於區位。然而，藉由個殊方法 (idiographic method) 而在通則上 (nomothetically) 探討地方及其居民 (其文化，或如康德在他的《人類學》裡比較喜歡描述的，其「民族或地方特色」) 的質化性質，顯然與地理學作為空間科學的自命科學，大相逕庭。

區域和地區研究始終構成地理學研究的一大支柱，近年來，對於「地方」概念的著迷，則賦予這個傳統新的生命。

人—地傳統，至少可以溯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著述《論空氣、水與地方》（*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長期以來試圖釐清「人」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康德同樣視為核心）的問題。儘管該問題的答案變化多端——包括（布希總統明顯支持的）上帝的智慧設計、環境決定論，乃至於人類征服自然的世俗意識形態，不一而足——「人—地」研究傳統向來是地理學科內部的強大存在。例如，帕蒂森寫作的當時，一場溫納格倫（Wennergren）資助的研討會（除了哲學家與史學家，也有地理學家和人類學家齊聚一堂）產出的具里程碑意義的《人在改變地球面貌上的角色》（*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建立了一個延續至今的重要反思基準。葛雷肯的鉅作《羅德海岸的痕跡》（*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全面詳述西方思想裡該傳統的早期歷史。³ 晚近，由於回應日漸崛起的環境議題關注，這個傳統有了明顯的強化和多樣化。

127

但是，帕蒂森觀察到，地球科學傳統「令我們面臨弔詭」。康德不幸未能建立的一門全面而獨特的自然地理學科的想法逐漸式微，專業化的各門地球科學則已然崛起，像是地質學、氣候學、氣象學、水文學、海洋學、火山學、古生物學、地形學等等。生態學、植物學和森林學，也都茁壯成為獨立的專業科學。必須指出，雖然是微不足道，但自然地理學者還是對於一般地球科學的

研究有所貢獻。因此，這個傳統沒有位居核心，地理學家自己有時候也試圖將它排除在外（但並不成功）。不過，連結地理學家與地球科學及生物學的臍帶，很難切斷。地理學這門學科不僅源於和它們（尤其地質學）的關連，它還繼續藉由延伸進入設想得更廣闊的環境科學計畫，或是以被後者吸收的方式，來維持其制度地位。無論如何，如果地理學家要深刻而嚴謹地在「人—地關係」、甚至是區域研究方面，從事他們感興趣的研究，就不能沒有一些地球科學和生態科學的面向。

帕蒂森最終的決斷性結論是，這四大傳統，「雖然在邏輯上有別，但在行動上結盟。」此外，他希望地理學可以通過「根據這些傳統來設想與討論這個場域的更高意願」，更好地確保其「內在統一性與外部明晰性」。

我想，大多數地理學家會將帕蒂森對於不同傳統的描述（儘管它們是天真地假定），視為他們及同事通常投入研究之知識場域（連同重疊部分）的一般再現。但是，這種統一性不總是能夠在地理學者的實際操作中輕易發現。片段化到處都顯而易見。一門除了地理資訊系統、古生態學和沙漠地形學，也同時擁抱都市政治經濟學、後現代主義和酷兒空間理論，以及地景文化美學的「學科」，顯然會有認同問題。認為有某種單一而穩定的方式，用以理解稱為「地理學」的統一學術知識場域，或者，認為有某個等待發掘的、有關其主題的「本質論」定義，這類假定總是令人懷疑。每當某些地理學家群體試圖實施這種本質論定義（例如區域

研究專家於二次大戰後在美國的作為，以及空間理論家在1960年代英語世界的嘗試)，結果都是災難一場。可見，帕蒂森的主張沒錯，即堅持應該將學科內部的多重視角當成優勢，而不是缺陷的根源。

但很不幸地，帕蒂森針對在綜合的神奇符號底下統一起來四大傳統提出的折衷解釋，卻掩蓋了重大困難。首先，四大傳統無法輕易聯合起來，因為它們至少表面上預設了截然不同的知識論，並要求迥異的驗證標準。就前三種傳統而言，帕蒂森默默地將空間、地方與環境概念，視為基礎與根本，卻沒有任何批判性的檢視，甚至未曾嘗試有系統地闡述其可能含義（我們將會看到，它們都是極端複雜的術語）。將地球科學視為雖然位居地理學科以外，卻本然地具備地理學特質，這種敷衍的嘗試似乎特別容易出問題。但這也是徵兆。如果我們檢視空間、地方和環境概念如何更一般性地在知識建構上運作，我們會發現，它們絕對不是地理學科獨有的。這些概念（以某種形式）在幾乎每一個學科裡扮演要角，包括生態學和生物學，乃至於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它們也在人文學科裡有廣泛的運用。有人可能認為這必然如此，因為這種基本而普遍的概念，一如康德和傅柯極為正確的理解，清楚說明了所有其他知識形式的「可能性條件」。它們遍存於一切學科，因為沒有任何學科可以不使用這些概念。於是，專業地理學者如何使用和部署它們，就成了相對次要的問題。但若檢視這些概念在其他學科裡發揮作用的方式，則顯示它們在不同

場合會獲得相當不同的意義。這就是在環境科學的案例裡，帕蒂森暗示卻未加分析的真正弔詭。

但這件事必須進一步追問。學術界各種分支領域所具有的地理學知識，以及在不同制度場合（如國家機器、世界銀行、梵蒂岡、媒體、中央情報局、一般民眾、軍隊、非政府組織、觀光產業、多國公司、金融機構）中運作的地理學知識，兩者之間有著重大差異。作為一門獨特學科的地理學，與在各種制度場合中作為蒐集、使用及理解某種特定知識之方式的地理學，兩者之間的緊張很明顯。⁴地理學知識廣泛散布於整個社會，它們應當就其本身來理解。再者，不同制度要求不同類型的地理學知識，它們本身也會創造截然不同的地理學知識。例如，觀光業在旅遊指南裡不會強調社會壓力或傳染性疾病的地理學，它熱切地想說服我們購買產品和服務，積極生產了心靈中各式各樣的想像與奇幻地理，而這不必然跟實際存在的事物有所關聯。這類活動的一個重要結果，是這些在社會上可以取得且積極運用的地理學知識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在地理學這門學科裡，或是一般的學院裡頭找到。因此，如果我們要理解所有這些認知形式，在管理、維持及改變社會—生態秩序上的角色，就需要一種針對這些認知形式的「批判社會學」。當我們試圖灌輸一種攸關追尋獨特寰宇主義計畫之地理事務的適當教育時，這必須是焦點所在。1970年代期間崛起的，公認的「批判地理學」研究場域，現在自視為與一般批判理論結盟，是可能從事這類研究的競技場。專業地理學家藉由仔

細反思地理學知識的「可能性條件」，如何在他們自己的研究中運作，這樣的位置可能有助於解答一個更大的問題（其中有些人已經辦到了），即地理學知識在維持或改變既定社會—生態秩序上扮演的角色。批判地檢視地理學知識是如何爲了帝國主義或殖民管理，以及作爲軍事策略的附加物而動員，乃近年來的重大成就。⁵

我認爲，帕蒂森正確地指認出前三個傳統，及它們作爲構成所有地理學知識之概念性核心的空間、地方及環境等基本概念。他也正確指出，這些傳統存在已久，但他誤將其起源侷限在西方思想。僅舉一例，來自歷史、人類學及地理學記載的大量證據顯示，空間定位的藝術（包括其象徵使用和再現技術，例如認知性的製圖，如果談不上真正的地圖製作的話），對所有人類社會組織形式而言，都是很根本的。於是，我們必須追問：這些基本地理概念是以什麼方式進入，成爲所有認識形式的可能性條件？必須指出，地理學家在回答這個問題上，沒有特別周到。他們也沒有非常積極地探討他們基本概念的認識論地位。可以肯定的是，曾經有過幾波爭議，討論像是「區域」（它們真的存在而有待科學研究發現，或只是方便我們整合有關世界之資料的知識建構？）和「環境」（它是成因與決定性的能動者，或者只是消極被動的人類行動條件？）這類概念。此外，有關康德將地理學定義爲一門獨特的空間科學是否適當，也有過一回短暫的激烈爭論。⁶但是，很難避免以下結論，即大部分從業地理學家都很滿足地接受他們自身學術領域平常而明顯的觀點，在其固有限制內愉快地埋頭苦

幹。地理學者有個提出重大問題，卻輕忽答案的有趣習慣。因此，深入探究任何只是在狹隘意義上記錄地理學者本身言論的地理思想史，無法獲得多少真知灼見——雖然如葛雷肯在他討論環境思想史的鉅著中指出的，檢視各種思想家針對自然秩序中的人類行動發表的高見，可能會獲益良多。

然而，有個更廣泛的理解地理學知識可能扮演之角色的方式，那就是仔細檢視它們在昔日的社會秩序中，以及社會與生態學變遷過程中的歷史意義。譬如，如果不是更早，至少自 1492 年以來，常伴我們左右的長期商業擴張過程（我們現在稱為「全球化」），取決於某些類型地理知識的積累。這一點在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繪製世界地圖對於人類掌控世界的計畫可謂事關重大），跟今日一樣真確。地理學的理解，互惠地影響了政治—經濟發展和環境改造路徑（例如，藉由承認環境限制、指認新資源及商業機會、理解文化多樣性，或是提倡新城鎮烏托邦計畫等方式）。即使知識不正確，隨後還是可能發生實質的非預期後果。此外，葡萄牙人在他們的早期探險中，尋找想像中坐落於伊斯蘭另一側，由約翰（Prester John）統治的基督教王國。這個錯誤的地理觀念，對全球歷史影響深遠。霍華德（Ebenezer Howard）錯誤地相信，適當的城鎮規畫（一種特殊的空間決定論）可以治癒經濟與社會弊病，伴隨著試圖體現那種信念的都市化過程的重大後果。那麼，一面是這種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態變遷，另一面是地理知識，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回答這種問題的需要，還是跟以前一樣迫切。如我們所見，全球化的最新階段是由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議程推動，其中私有化與向企業及多國資本主義開放世界各地市場，儼然成爲一股由美國軍事及商業力量支持的主導移動力。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自由市場的勝利似乎已經遍及全世界。高度移動的金融資本變得更具主導性，同時，運輸、通訊和資訊技術革命則打破了許多空間障礙。地理結構與關係深刻地改變了。看似穩固的政治—經濟強權的地理組態（configuration），變得流動易變。其結果是世界的再領域化，以及各式各樣的不均地理發展（財富與權力的社會及地理不平等日益嚴重、政治不穩定的拼湊狀態、地方國族主義復甦、地方化的環境壓力）。由於高度移動的資本佔有塑造和利用地理差異的位置，地理差異變得越來越重要，而非不重要。此外，地緣政治的壓力與緊張（甚至區域戰爭），仍如往常一般普遍。結果，全球資本主義的許多重大制度（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七大工業國），都必須調整它們的視野，重建地理願景。但它們也遭遇到針對多國資本主義缺乏靈魂的商業主義，與日俱增的批評浪潮（來自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例如史蒂格利茲和薩克斯，以及來自非政府組織、教會，更不用說西雅圖、華盛頓、曼谷、墨爾本與熱那亞〔Genoa〕的街頭抗議者），指責其不正義、無視於地方文化及其他地理差異。如何將自由、正義、需要與尊嚴等普遍概念，應用於文化與政治經濟分歧的多變空間與複雜地理，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解答。這帶領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要如何

132

理解權利、財產、自由、民主與市場的普遍宣稱，與世界各地充斥的地理特殊性之間的複雜關係？找出該問題之解答的一個可能性條件，有賴於探索關鍵地理概念如何運作。構成地理理性核心的概念三位一體（空間、地方與環境）——無論在部落會議、世界銀行、公司董事會，或是鄰里協會——是著手之處。因此，我們現在要更深入地闡釋這些概念。在這麼做的時候，我們也必須留意帕蒂森提出的總結問題：這些在邏輯上看似彼此有別的不同概念領域，可以通過什麼方式在操作中結合起來？

空間一詞內化了多重意義。由於不同意義以難以接受的方式混為一談，從而產生了混淆。篩選出這些混淆，對於釐清各種實質議題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聲稱，「要決定自然的意義，主要是將它簡化為時間特質與空間特質的討論，這種說法頂多是情有可原的誇大其辭。」¹我同樣主張，我們用來描述周遭世界的許多關鍵術語——像是**城市、國家、社區、鄰里、生態系統和區域**——若未先考慮時間和空間的特性，是無法適當理解的。就是在這種意義下，我認為康德將適當地理學知識——這裡是指空間和時間特徵的適當描述——視為所有人類探究形式的必要前提與終點，是正確的見解。

下文中，我要勾勒一種與時間有關的空間觀點，首先引述我自己針對各種尺度（從帝國主義到城市裡的社會關係）的都市化與不均地理發展議題的實際研究。針對空間與時間性質之哲學辯論的悠久歷史的局部解讀，以及許多地理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與文學理論家有關該主題之新研究的詳細考察，也塑造了這個觀點。²

134 我所援用的概要框架，在兩個向度上運作。在第一個向度，我們遇見理解空間與時間的三種獨特方式：絕對、相對和關係性。在第二個向度，我們遭逢另外三種定義（最著稱者是列斐伏爾提出的主張）：空間是在物質上感覺得到的、概念化的，以及生活的（lived）。我會繼續論述，空間是由所有這些定義的整合構成的。誠如康德所說的，如果我們理解空間和時間概念如何約制了我們認識周遭世界的可能性，那麼，這些理解空間的不同方式，就必須維持彼此辯證的緊張關係。

第一向度

絕對空間是固定且靜止不動的。這是牛頓和笛卡兒的空間。空間被理解為事先存在、靜止不動、連續不斷且不會變化的框架（很容易視覺化為格網），在其中，可以清楚指認出獨特的物體，也可以精確地描述事件和過程。它起初是理解為空無一物。這就是可以輕易適用歐幾里得（Euclidian）幾何學的空間。它可以接受標準化的測量與計算。它是地籍測繪、牛頓力學及其衍生的工程操作的空間。它是個別化（individuation）的主要空間，是笛卡兒所稱的外延物（*res extensa*）。例如，個別的人及事物，可以通過他們於絕對空間與時間中佔有的獨特位置來清楚指認。在既定時間中，沒有其他人可以正好位於你或我的空間。因此，絕對空間和時間中的位置，就是確認人、事物與過程之個別性與獨特性的方

式。譬如，特殊地方可以藉由它們在地圖上的獨特位置來指認（命名）。在這種概念下，測量與計算茁壯成長。當笛卡兒的工程師以一種掌控感來檢視世界時，它是個絕對空間（與時間）的世界，所有的不確定與模稜兩可，基本上都可以從中驅逐出去，人類的計算也可以無拘無束地蓬勃發展。在社會面，絕對空間是由土地私有財產及其他有邊界實體（如國家、行政單位、城市規劃與都市格網）構成的排他性空間。我們可以將有邊界的空間概念化為權力的容器。這種空間明顯有別於時間。空間的秩序化是一回事，往無限未來直線延伸的絕對時間則是另一回事。根據這種視角，歷史必須解釋為不同於地理。我們已經知道，這就是康德的觀點，所以雖然他在將空間與時間知識奠基於先驗綜合直覺上，與牛頓分道揚鑣，他在實際上還是遵循了牛頓式的空間與時間分別。

135

相對空間主要是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大名，以及19世紀開始有系統地建構的非歐幾里得幾何學有關。³這顯然是**過程與移動**的空間。在這裡，空間不能與時間分開來理解。歷史和地理不可能涇渭分明。所有地理學都是歷史地理學，所有歷史都是地理史學。這就要求用語的重大轉變，從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到帶有連字符號的相對空間—時間（space-time）⁴概念。運輸關係以及商品與貨幣流通的相對時—空，與私有財產的絕對空間看起來非常不同，確實也不一樣。絕對空間裡有邊界領域所界定的區位獨特性與個別性，讓位給譬如說，就其花費的往來時間而

論，跟某個核心城市區位等距離的多重區位。相對認同是多重而非單一的。許多人可以置身相對於我的相同位置，我也可以跟許多其他人一起處於相對於另一人的完全相同地方。我們可以藉由區分以成本、時間或運輸模式（汽車、自行車或滑板）來衡量的距離，創造出完全不同的相對區位地圖，我們甚至可以藉由觀察網絡和拓樸學關係（郵差遞送郵件的最佳路徑，或通過主要樞紐的航空系統）等，打破空間的連續性。既然地表的距離摩擦各處不同，我們知道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以耗費的時間、成本、能量來衡量），不必然以傳說中的烏鴉飛行方式（即直線）來確定。再者，觀察者的立足點也在建立視角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就像著名的史坦伯格（Steinberg）漫畫顯示的，紐約客對於世界的典型看法，會隨著某人想到哈德遜河以西，或長島以東的地方，而很快就消散不見。

這一切相對化不必然會減少或消除個性化或控制的能力，但是，它確實顯示了針對考察中的特定現象與過程，需要有特殊的規律和法則。可測量性和可計算性變得更複雜。有好幾種幾何學

[譯註]

¹¹ 爲了符合中文習慣用語，此後將 space-time（空間—時間）譯爲「時—空」，後文的 spacetime 譯爲「時空」。但是，spatio-temporal frame、spatio-temporality、spatio-temporal rhythm、time-space compression 等，爲簡潔起見，皆省去連字號，譯爲時空架構、時空性、時空節奏、時空壓縮等。

可以選擇。空間架構會隨著被相對化了什麼，以及被誰相對化，而有所不同。當高斯（Gauss）首度建立了非歐幾里德球面幾何的規則，來處理精確調查地球曲面地表的問題時，他也肯定了尤拉（Euler）的斷言，即不可能有針對地表任何部分的完美縮尺地圖。如果地圖準確再現了方向，它們就會扭曲了面積（麥卡托地圖上，格陵蘭看起來比印度還大）。每張地圖投影都訴說了它的相對真理，即使它在數學上正確而客觀。愛因斯坦將這個論點往前推，指出一切形式的測量，都取決於觀察者的參考架構。他教導我們，必須拋棄物理宇宙中的同時性觀念。當然，愛因斯坦的成就，是在檢視於光速下運作的時間過程時，找到了檢視這種空間彎曲現象的精確手段。⁴

然而，當我們試圖整合來自不同領域的理解，形成比較統合的努力時，確實會產生困難。適用於再現內在於且穿越了生態系統之能量流動的時空架構（spatio-temporal frame），可能無法與適用於再現穿越全球金融市場之資本流動的時空架構相容。要將瞬息萬變的資本積累的時空節奏，置入理解全球氣候變遷所需的同一個時—空框架中，十分困難。這種分裂雖然難以跨越，但不必然是個缺點，只要我們認識到這些分裂是什麼。不同時空架構之間的比較（猶如地圖投影法的選擇），可以闡明政治選擇的問題。我們何以選擇以紐約、倫敦或雪梨為中心的地圖投影，又何以北半球總是被再現為「上面」？我們偏愛適用於追蹤金融流動的時空架構，還是金融流動經常予以破壞的生態過程的時空架構？當

第二任布希政府八年來拒絕處理全球氣候變遷，因為這麼做可能會擾亂經濟時，這默默顯露了其偏好某種時空架構（例如，資金流動與選舉週期）甚於另一種。相對的時空架構也不必然是穩定的。新穎的運輸及通訊技術，在歷史和地理上都改變了時空關係。紐約、倫敦與巴黎之間的社會互動與通訊的相對距離，隨著時間推移，已然徹底改變。結果，相對位置改變了，有時候還十分迅速。⁵

137 過程會生產其自身的空間與時間的想法，對關係性概念而言十分根本。關係性概念，最常在理論上與萊布尼茲的名字連繫在一起，他在一系列寫給克拉克（實際上是牛頓的替身）的著名信件裡，強烈反對位居牛頓理論核心的絕對觀點。⁶萊布尼茲的主要反對意見是神學上的。牛頓的作法使情況看起來好像上帝位居事先存在的空間和時間中，而不是創造物質的時一空製造者。絕對觀點矮化了上帝的高度。我們有關該爭議的當代版本會追問，假定的大爆炸宇宙起源是否發生於空間和時間中，抑或它本身即為時一空（space-time）的創造。

關係性的觀點認為，物質與過程並不存在於時一空之中，甚至不影響時一空（這是相對時一空觀的看法）。空間與時間內在於物質和過程中。例如，懷海德指稱「觀念的基本秩序，首先是彼此相關的事物的世界，然後是空間，其基本實體乃通過那些關係來界定，並從這些關係的性質來推論空間的特性」。不可能將空間與時間拆解開來。它們融合成爲時空（spacetime，連字號消失

了)。記憶和夢想是這種結合的產物。我們如何以它們產生的關係性時空來理解事物、事件、過程？認同作用與個性化成了問題，若不是全然不可能存在的話。再者，關係性時空隱含了內在關係（internal relations）的觀念，誠如歐曼（B. Ollman）向來主張的，這是辯證分析模式的根本。⁷只訴諸存在於某個單一時點的東西，無法理解事件、過程或事物。它（事件、過程或事物）會從流動場域中結晶具體化，而成爲懷海德稱爲「事件」或「恆存」（permanence）的東西。不過，這麼做的時候，「它」內化了過去、現在、甚至未來，在該流動場域中它周遭發生的所有事物。比方說，聚集在房間裡構思政治策略的許多個人，將他們涉入世界而直接或間接（例如通過閱讀）累積的大量過往經驗、記憶和夢想，以及各種有關未來的預期及希望，帶進他們那個絕對空間內部的討論。根據關係性觀點，不同的影響會在世界各處往來流動。這些影響可以至少暫時凝結而形成「單子」（monads）（萊布尼茲偏愛的詞彙），或「事件」，或可識別之「環節」中的「恆存」（懷海德的措詞）。在此，認同（identity）意味了某種跟我們在絕對空間、甚或相對時—空中所賦予的意義，截然不同的東西。它變得開放、流動、多樣而不確定。簡言之，認同變成「非物質，但客觀」。不過，這就是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之道。

這項論點的含意深遠。譬如，時間（和歷史）是陽剛領域，而空間（地理）是陰柔領域的概念（某些女性主義文獻極爲看重這種概念）——誠如葛洛茲（E. Grosz）曾公開承認的——乃奠基

於接受絕對而可以區分的笛卡兒空間與時間觀。⁸隨著我們對時空的認識，從相對性進展到關係性的理解，我們理解陽剛—陰柔關係的方式，也有了劇烈的改變。之所以如此，如懷海德所言，是因為性別權力關係優先於關係性詮釋下的時空生產。因此，如果空間確實變成陰柔領域，歷史成了陽剛領域，這純粹是因為性別權力關係使然。然而，我強烈懷疑這種簡化區分的效用，因為在我遭逢或閱讀過的幾乎所有社會秩序中，性別關係的歷史地理都生產出更為細緻得多的時空性（spatio-temporalities）。相較於可以輕易從絕對概念中製造出來的領域封閉與排除，時空的關係觀也生產出全然不同的「地方」概念的理解。我們將在第八章見到，凱西（Edward Casey）將他的「地方」優先於「空間」的整套論點，立基於大力反對笛卡兒／康德絕對觀點所預設的空間虛無性（emptiness of space）。⁹遇到關係性詮釋時，他的反對就消散了。而且，如懷海德斷言的，如果所有自然概念都起因於我們對於空間與時間的理解，那麼我們對社會—生態辯證的全盤理解，連同我們對地方的理解，都直接牽涉了我們如何構想我們對於空間與時間的理解。

這對於日常的理解和實作而言，可能意味著什麼？我們可以考察關係性概念具有直觀意義的幾則事例。如果我們順著懷海德，探問什麼是思想或記憶的時間與空間，那麼我們很難找到物質性的解答。我們無法藉由解剖某人的大腦，來找到思想或記憶。思考和記憶本身似乎不具物質形式地在我們腦海中盤旋飛

翺，雖然活躍的大腦很顯然是個物質性的促動結構，支持了思考與記憶的過程。然而，倘若思想和記憶本身是非物質、流動且不穩定的，但當它們激發了行動時，它們可以有且經常有穩固的物質性的、因而是客觀的後果。

在關係性時空中，直接測量若非不可能，也是成問題的。但我們為什麼該相信，時空唯有在可以量化且能夠測量時才存在？夢和記憶不可能因為我們無法量化和測量它們的時空，就被視為非理性而摒除。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和傳統唯物論，除了那些可以測量的空間與時間概念外，沒能發展出適當的空間與時間概念認識，這對於通過時空角色來思考，向來是個嚴重限制。關係性概念將我們帶往數學、詩歌與音樂交融之處，夢想、白日夢、記憶和幻想滋長的所在。從（與美學相對的）科學觀點來看，那是對於傾向狹隘實證主義或簡單唯物論者的詛咒。問題在於，替譬如社會與權力關係的非物質時空性，找到適當的再現。我們已經知道，康德以模糊的形式承認了這種兩難困局。雖然絕對空間的特徵是真實的且獨立於牛頓事物圖式裡的物質，但是在絕對空間所包含的物質與過程之外，還是沒辦法針對該空間提出獨立的物質測量。就此，康德試圖將空間概念納入美學判斷與先驗綜合（*synthetic a priori*）理論，在牛頓和萊布尼茲之間搭建橋樑。在這麼做的時候，康德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矛盾。¹⁰ 康德顯然沒有認識到萊布尼茲關係性概念的潛在力量。萊布尼茲再度廣為流行與深受重視，不僅是網際空間（*cyberspace*）大師，還是心靈一大腦議

題及量子理論的較偏辯證取向的奠基思想家，顯示了回歸關係性觀點的趨勢。許多當代思想家超越了絕對與相對空間及其相對容易測量的性質，也超越了康德的妥協觀點。但是，關係的地勢是個有待成功耕耘的，充滿挑戰而艱鉅的領域。愛因斯坦是其中一位，他可能永遠都不會接受它，直到最後一刻都否認量子理論。懷海德對於促進科學的關係性觀點大有貢獻。¹¹ 波姆(David Bohm)對量子理論的探究，也著重於關係性思考。德勒茲(G. Deleuze)從萊布尼茲和史賓諾莎(Spinoza)那裡汲取靈感，反思巴洛克建築與皺褶(fold)數學，深入討論了這些觀念。¹² 德勒茲與瓜塔里(Guattari)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這類著述中，描繪出一些十分有趣的關係性分析路徑。最近，關係性的概念進入了政治領域，尤其是通過奈斯(Arne Naess)討論深層生態學的著作，以及內格里(T. Negri)討論帝國和諸眾(multitude)的最新著作；應當指出，這兩位作者都大量援引史賓諾莎而非萊布尼茲的關係性思考。¹³ 巴迪烏(A. Badiou)將「事件」理論化為我們理解的基礎，這引領他通往一種特殊的政治批判。¹⁴

但是，身為一名從事研究的地理學家，我為何及如何發現研究時空的關係性模式有用？答案很簡單，有些主題，像是都市過程中集體記憶的政治角色，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處理。我無法將集體記憶裝入某個絕對空間中（清楚地將它們安置在格網或地圖上），我也無法根據無論多麼精細的相對時—空中，觀念的流通與擴散法則，來理解它們的流通。不訴諸有關記憶時空的關係性觀

念，我就無法理解班雅明在他的拱廊計畫（Arcades project）中的大多數作為。不用關係性角度來定位城市，我甚至無法理解城市這個觀念。再者，如果我問這個問題：巴黎聖心堂（The Basilica of Sacré Coeur）、北京天安門廣場，或曼哈頓「歸零地」（Ground Zero）^[2]有何意義，那麼我能夠尋找完整解答的唯一方式，就是以關係性的角度來思考。¹⁵ 這麼做，就必須要掌握在時空中生產了那些地方的事物、事件、過程及社會—生態關係。

那麼，空間（時—空，時空）到底是絕對的、相對的，或是關係性的？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否有存有論式的解答。在我自己的著作裡，我認為答案是三者皆是。這是我在三十年前就得到的結論，我找不到特殊理由（也沒聽過任何論證）要改變我的心意。我當時是這麼寫的：

空間本身既不是絕對的、相對的，或是關係性的，它可以是情境而定，成為其中一種，或同時是全部。空間之適當概念化的問題，是透過與空間有關的人類實踐而解決的。換言之，有關空間性質的哲學問題，沒有哲學上的解答——解答在於人的實踐。因此，「空間是什麼？」這個問題，必須代之以「不同的人類實踐，如何創造和

[譯註]

^[2] 即飛彈投射目標或核武爆炸點，這裡指9/11事件中的紐約世貿大樓原址。

使用了不同的空間概念？」。例如，財產關係創造了壟斷性控制可以操作的絕對空間。人員、貨物、服務與資訊的移動，在相對空間裡發生，因為它使用了貨幣、時間、能源等，來克服距離的摩擦。小塊的土地也可以獲取利潤，因為它們包含了和其他小塊土地的關係……展現為地租的關係性空間，本身成為人類社會實踐的重要面向。¹⁶

有規則能夠決定何時及何地，某個空間架構比另一個更可取嗎？或者，這是任意的選擇，全憑人類實踐的奇想？使用某個概念的決定，確實取決於所要考察的現象性質，或是心中懷抱的政治目標。絕對的概念，在決定地產邊界和國家機器的邊界這類狹隘議題上（的確，約莫在確立歐洲主權國家的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時期，絕對觀點如果不是佔支配地位，也越來越重要，此事並非偶然），或許綽綽有餘，但它對於天安門廣場、歸零地或巴黎聖心堂是什麼等問題，一點幫助也沒有。相反地，著迷於認同、控制和主權的國家機器，再三地求助於絕對的空間與時間概念，作為它們有效治理及控制任務的核心，從而將絕對概念強加於其實是或可能是相對的或關係性的事物上。因此我發現，概略補充選擇絕對的、相對的或關係性參照架構的正當理由，很有用處——即使只是作為內部檢查。此外，我有時候在操作中假定，有某種階層系統在運作：關係性空間可以包含相

對空間與絕對空間，相對空間可以包含絕對空間，但絕對空間就只是絕對，就是那樣。但我不推薦以這種觀點作為工作原則，更不用說試圖在理論上加以捍衛。我認為，維持這三種概念彼此之間的辯證張力，並不斷通過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來思考，這麼做在原則上有意思得多。歸零地是個絕對空間，但它同時坐落於相對時—空中，也擁有諸多關係性的定位。

由此，我得出了初步的決定：如果我們理解空間作為所有其他認識形式的一種可能性條件，那麼，就有必要保持絕對、相對和關係性這三種概念之間的辯證張力。

第二（列斐伏爾）向度

列斐伏爾（H. Lefebvre）建構了一種以人類實踐來理解空間性的迥異方法。他（幾乎肯定是引用了卡西勒〔Cassirer〕有機〔organic〕、感知〔perceptual〕和象徵〔symbolic〕空間的區別，但就像法國知識界常有的情況，並未予以承認）推導出三分法，即物質空間（通過我們的感官知覺而經驗到的空間）、空間的再現（構想的空間）；以及再現的空間（生活的空間）。第二組術語（括弧裡的那些），跟第一組不完全一樣，但是在下文中，我大致上會忽略這個問題。我主要關注括弧裡的意義，因為這些意義具體指涉了人類行為與社會實踐。¹⁷

142

對我們人類而言，物質空間是我們感官知覺的世界，這些知

覺源自我們生活的物質環境：因此，物質空間可以稱為以人類實踐為媒介的首要經驗的感知空間。我們觸碰事物與過程、感覺它們、觀看它們、嗅聞它們、聆聽它們，並從這些經驗推斷空間的性質。然而，我們如何再現這個經驗到的感官知覺世界，則全然是另一回事。我們運用抽象再現（字詞、圖案、地圖、圖表、圖畫、幾何學和其他數學公式），來再現我們感知到的空間。這麼做的時候，我們部署了概念、符碼和抽象性。感官知覺的物質空間及其再現之間的符應，總是問題重重，而且往往充滿危險的幻想。但是，列斐伏爾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如班雅明（Benjamin）一樣，堅持認為我們也有想像、恐懼、情感、心理、幻想和夢想。列斐伏爾相當拗口地稱為再現空間的東西，指的是我們人類——身體上、感情上和情緒上——在我們遭逢的空間裡生活，並且通過該空間而生活的方式。夜晚沿著黑暗街道行走時，我們可能感到一陣恐懼，或是驚險刺激。某人可能歡迎作為自主領域的開放空間，但患有廣場恐懼症的另一個人，可能感覺很不安，以致經歷一場恐慌發作。有些人歡迎為移民開放邊界，其他人卻基於安全理由，希望保持邊界緊閉。段義孚（Yi-fu Tuan）這位地理學家則將他的多數研究聚焦於如何經歷空間的文化與個人歧異上。¹⁸

我們生活於空間中的方式，不可能從物質刺激和感官知覺，甚至從空間的再現方式來預測。但這不表示這三個向度互不相干。列斐伏爾讓它們維持一種辯證張力。相互及互惠的影響，在它們之間自由流動。例如，空間被再現和概念化的方式，可能

(雖然不是以輕易可預測的方式) 影響生活於空間中，以及甚至是實質感覺該空間的方式。如果我剛剛讀了一則恐怖故事或佛洛伊德 (Freud)，那麼，我對於沿著黑暗宛如長廊的街道行走的感覺，肯定會受影響。此外，我的身體經驗可能會增強 (我的感覺可能像我們說的「如臨深淵」[on edge])，恰恰因為我是以一種特殊的恐懼或預期狀態，生活在那個空間。相反地，一場夢、一個幻想、一個潛隱的渴望、一段喪失的記憶，甚或是我們沿街行走時的特殊激動，或一股恐懼的刺痛感，都可能引領我去尋找各種的概念化與再現，藉以向其他人傳達我經歷過的某種東西。藝術家孟克 (Edvard Munch) 可能做了某種惡夢。通過一連串概念化和再現符碼，他生產了一件物質客體，稱為《吶喊》(*The Scream*) 的畫作，向其他人的實質感官經驗開放。我們觀看這個物件 (畫作)，得到了某種以那種方式活在那個當下，可能像什麼樣子的感覺。觀看該畫作之空間秩序化的這種身體與物質經驗，受到了再現的中介，而其中介方式有助於我們理解心靈狀態的非物質性。我懷疑，對維拉斯奎茲 (Velázquez) 名為《侍女圖》(*Las Meninas*) 的畫作的持續迷戀 (這股魅力令畢卡索針對該主題從事持續不斷的變化，也使傅柯在《詞與物》[*The Order of Things*] 裡，拿它當作反思的根本起點)，源於它在畫框的絕對空間裡的空間秩序化，傳達了在那個地方與時間中，某種對於變遷中社會權力的流沙感受。這確實是克拉克 (T. J. Clark) 詮釋對於庫爾貝 (Courbet) 名畫《奧南的葬禮》(*Burial at Ornans*) 的不斷升高敵視的方式，這

種負面回應隨著這幅畫從外省邁向巴黎而展開，巴黎的食利地主階級對於這幅畫所描繪的階級關係性質，是再熟悉不過了，也深感恐懼。¹⁹

日常生活中，環伺我們身旁的再現之空間與時間，同樣影響了我們直接的感官經驗，以及我們詮釋和理解再現的方式。由於我們固守未經檢視的例行公事，我們甚至可能不會注意到，納入日常生活的空間秩序化的物質特性。然而，通過那些每日生活的物質性例行公事，我們吸收了有關空間再現如何運作，以及為我們自身建立特定再現空間的某種意義（例如一種身處熟悉鄰里而發自內心的安全感，或「在家」的感覺）。只有當某事物似乎完全錯位（out of place）時，我們才會注意到它。真正重要的是範疇之間的辯證關係，即使將每個元素凝結具體化為空間與時間經驗的獨特環節，也頗有助於理解。

運用多媒體和動力技術，許多當代藝術家創造出結合了好幾種經驗時一空模式的體驗空間。譬如，以下是展覽手冊上針對巴利（Judith Barry）於第三屆柏林當代藝術雙年展（Third Berlin Biennial for Contemporary Art）展出作品的描述：

在她的實驗性作品中，錄像藝術家巴利調查了私人和公共空間、媒體、社會與性別的用途、構成和複雜互動。她的裝置和理論著作的主題，將它們自己安置在一個觀察場域中，述說著歷史記憶、大眾傳播和感知。在位於

觀者想像與媒體產製的構造之間的領域中，她創造出幻想的空間，凡俗現實的疏離描述。……在《靜音》(Voice Off) 這個作品裡……觀者穿透了展示空間的幽閉恐懼症般的擁塞，更深入到作品中，而且被迫穿越裝置而移動，經驗到了不僅是電影的印象，還有電影美學的印象。分割的投射空間提供了與不同聲音接觸的可能。運用且聽到以聲音作為驅動力，以及心理張力的強度——尤其是在投射的男性一側——傳達了這個無可觸摸且短暫無常的客體的內在力量。這些聲音替觀眾展現了某人可以如何通過它們而轉變，某人如何嘗試控制它們，以及當它們不再能被聽到時，人所感受到的失落。

展覽手冊的結論是，巴利「將過渡 (transit) 的美學空間搬上舞台，令誘惑與反思之間的矛盾心理懸而未決」。²⁰

從這段描述，我們知道確實有必要將我們對於空間和時間的理解，往更深刻的層次推進。在此，有不少回溯指涉了絕對空間與時間（展覽狹窄的物理結構）、相對時—空（參觀者穿越空間而依序移動）和關係性時空（記憶、聲音、精神緊張、模糊難解、朝生暮死，以及幽閉恐懼症）之間的區別。但我們也不能放棄列斐伏爾的範疇。這些建構出來的空間，具有物質與感官、概念及生活的面向。

145 結構化再現

反思巴利作品的描述，引導我在如何最好地理解空間與時間的多向度性上，有了思索層次的躍進。於是，試想若我們將絕對、相對與關係時—空（時空）的三分法，直接對應到感官、概念與生活的三重區分，情況會如何。結果是得到一個三乘三的矩陣（圖 7-1）。矩陣內的交叉點顯示了理解空間、時—空、時空意義的不同模態。很可惜，矩陣的再現模式有其限制，因為它只能描述絕對空間。既然我也訴諸再現性實踐（概念化），我就無法公平對待在物質上感覺到的空間，或是生活的空間。因此，這個矩陣的啟發能力有限。如果我們將它視為構成了一切的固定分類，那麼，我的計畫就會落空。然而，我發現將矩陣內部不同交叉點上出現的組合，當作啟動分析的方法很有幫助。橫向或往下閱讀矩陣，會得出複雜的意義組合。於是，不可能將自己僅僅局限在

	物質實踐空間 (經驗的)	空間的再現 (構想的)	再現的空間 (生活的)
絕對空間與時間 (牛頓 / 笛卡兒 / 康德)	@	@	@
相對時—空 (愛因斯坦)	!@!	!@!	!@!
關係性時空 (萊布尼茲)	K?!@!K	K?!@!K	K?!@!K

圖 7-1

其中一種思考模態。例如，絕對空間裡的行動，最後只有從關係性角度來看，才說得通。矩陣的僵固性，唯有藉由將所有範疇及其組合納入辯證張力中，才有辦法超越。請容我多加闡述。

這個被稱為「歸零地」的曼哈頓位址，坐落於什麼空間或時空，而這件事實又如何影響我們對於該位址，以及那裡該建造些什麼的理解？它顯然是個絕對的物理空間，而且某人擁有這裡的地產所有權。它有待在物質上重建，成為獨一無二的事物。有很多討論涉及了保留牆面，以及承重能力。工程計算（基於牛頓力學）和競爭性建築設計（再現）也被提了出來。有關這個空間一旦轉變成某種物質人造物之後，參觀者或在那裡工作的人，要如何生活於其中的審美判斷，也是重要考慮。只有在它興建完成後，我們才能稍微了解人們如何生活在那個空間裡。問題在於如何安排物理空間，以便產生一種情感效果，同時滿足某些這個空間要如何經驗的期望（商業上，以及情感與美學上）。一旦興建完成，空間的經驗可能會受到再現形式（如導覽手冊、博物館，以及計畫）的中介，協助我們詮釋該重建位址的預期意義。但是，僅僅沿著絕對空間向度而辯證地移動，比起訴諸其他時空架構所能獲得的洞識，報償少得多了。資本主義開發商敏銳覺察到這個位址的相對區位，而且根據交換關係的邏輯，以及與此邏輯有關的人員、商品及資本流動，來判斷這裡的商業開發前景，並賦予該位址潛在的商業與投機價值。它的核心位置，以及與華爾街的指揮控制功能的臨近性，是重要的屬性，而且，如果運輸連通在

重建過程中能夠改善，那就更好了，因為這可以提升土地與房產的價值。對開發商而言，這塊位址不只存在於相對時一空：這塊基地的重新設計，提供了轉變相對時一空的前景，藉此提升絕對空間的商業價值（例如，改善往機場的通道）。營造環境之固定資本投資的攤還率，以及利率／貼現率考慮，則主導了時間範域。

但是，幾乎肯定會出現群眾的反對，由那些葬身該位址的罹難者家庭主導，反對只以這些絕對或相對時一空角度來思考和建設。無論在這塊位址上建造什麼，都必須談談個人與集體記憶。記憶是無形但客觀的，因而是關係性的。很可能也有必須針對共同體與國家的意義，以及未來的可能性（甚至是永恆真理的展望），說些什麼的壓力。這個位址也不能忽略與世界其餘地方的關係性空間連結的議題。我們能夠在那個空間裡，感覺到世界其他地區對於 1980 和 1990 年代，以徹底自私方式運作的美國霸權的廣泛憤慨嗎？我們會知道雷根政府在創造及支持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政權上扮演關鍵角色，以便破壞蘇聯的佔領，而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之所以從美國的盟友轉變為敵人，是因為美國支持腐敗的沙烏地阿拉伯政權嗎？或者，我們只會曉得外頭那些懦弱的外國邪惡「異類」（others）痛恨美國，並試圖加以摧毀，只因為美國代表了自主與自由的價值？只要有足夠心力，這個事件與位址的關係性時空性就能挖掘出來。但是，它的再現及其物質化方式，卻難以確定。其結果顯然要取決於政治鬥爭。重建要召喚的是什麼樣的關係性時空，它將投射出什麼來作為世界的象

徵，關於這些問題，非得打一場最猛烈的戰鬥來決定不可。譬如，帕塔基州長（Governor Pataki）以未來可能會展出批判美國政策的展覽為由，取消了在此地興建自由博物館（Freedom Museum）的計畫，並規定不可於該位址安置任何可能冒犯對於罹難者之記憶的東西。他的用意是要拒絕任何批評美國以軍事及金融介入世界的一切表現。資本主義開發商不會反對將他們的世俗商業考慮，連結上激勵人心的象徵陳述（強調經歷了9/11重擊的全球資本主義，其政治—經濟系統的強大及堅不可摧），豎立起譬如說一個訴說著蔑視的高聳陽具象徵。他們也試圖在關係性時空中尋求他們獨特的表達力量。但是，還有各式各樣其他關係性有待探索。我們會知道那些攻擊者的什麼事情，以及我們能連結得多遠？無論這個位址上蓋了什麼，這個位址現在有、也將會在在世界上的關係性現身，重要的是要反思這種「現身」如何運作：它會成為美國傲慢的象徵，或成為全球同情、和解與理解的符號，而人們藉此而生活其中？探討這些課題，需要我們接受有關歸零地的絕對空間究竟為何的關係性概念。結果證明，這就是最有趣且最具爭議的意義所在之處。

148

馬克思理論的空間與時間

這個一般性框架，提供了一個將空間與時間概念納入所有文學及社會理論分支的起點。且讓我來說明，這一點是如何辦到

的，尤其是跟馬克思理論有關的部分。馬克思是個關係性思想家。比方說，在像 1848 年這樣的革命情境中，馬克思擔憂作為記憶的過往，可能會像夢魘一般，沉重壓在活人的腦海裡。他接著提出關鍵的政治問題：未來的革命詩學，如何可能在此時此地構成？²¹ 他也懇請卡貝特（Cabet）不要將他具有共產主義意識的追隨者帶往新世界。馬克思堅稱，伊卡利派（Icarians）只會重新植入從舊經驗內化而來的態度和信念。馬克思建議，他們應該留在歐洲，當個好共產主義者，在那個空間中為了革命性的轉型而戰，即使總是會有危險，使得「我們這個世界小角落」的革命，淪為環繞周遭的全球力量的犧牲者。²²

在馬克思主義者如湯普森（E. P. Thompson）、威廉斯（R. Williams）和其他人的著作裡，我們發現針對時空性的不同層次評價。²³ 例如，在威廉斯的小說《黑山居民》（*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裡，時空的關係性位居核心。威廉斯用它來將敘事結合起來，直接強調了隨著不同時空感而來的不同認識方式：「如果我們要認真探查生活與地方，就徹底需要對於生活與地方的強烈依附。聚苯乙烯模型及其文本與理論上的等價物，還是與它們重構及模擬的實體不同……。在他於圖書館的書籍和地圖上，或是在山谷的房屋裡，在證據和理性探究的社群中，有一段可以轉譯到任何地方的共同歷史。但是，他唯有在山區行走，才能獲得一種不同的心靈來確認自己；非常頑強的屬於鄉土和當地，但是延展到更廣闊的共同流動，在那裡，感動和寬宏取代了記錄和分

析；不是敘事的歷史，而是生活的故事。」²⁴

對威廉斯而言，在山區漫步的時候，關係性就活了起來。它以截然不同於從檔案建構出來的感受和感覺為核心。雖然它非常頑強的屬於當地，但它超越了更廣泛的共同流動，從而縮短了一方面是地理與地域，另一方面是寰宇主義關懷與某種我們的類存在感覺，這兩者之間的差距。這些正是著名的19世紀無政府主義地理學者雷克呂（Elisée Reclus）的感想。²⁵有趣的是，威廉斯似乎只有在他的小說裡，才能夠掌握這個問題。因此，我以空間和時空的辯證法勾勒出來的更廣泛觀點，如何能夠更緊密地整合入我們對於馬克思理論的閱讀、詮釋與利用？讓我先撇開一切警告及細微差別的關切，以便以儘可能明白的術語來提出論證。

149

在《資本論》第一章，馬克思引介了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這三個關鍵概念。每件屬於使用價值的事物，都位於絕對空間和時間的範圍裡。個別工人、機器、商品、工廠、道路、房屋、實際的勞動過程、能源的耗費等等，都可以在牛頓的絕對空間與時間的架構裡，予以個別化、描述和理解。這是生產體系的物理可計算和理性數學模塑、輸出一輸入結構和系統規劃的領域。每件屬於交換價值的事物，首先都位於相對時空中，因為交換需要商品、貨幣、資本、勞動力和人員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移動。重要的是循環，連綿不斷的運動。誠如馬克思的觀察，交換打破了一切（絕對）空間和時間的阻礙。²⁶它不斷重塑我們度過日常生活的地理和時間座標。它為我們在絕對空間中支配的使用價

值，賦予了不同意義。隨著貨幣的出現，這種「突破」界定了更廣大且更流動的交換關係宇宙，橫越了世界市場（不是理解為一種東西，而是連續的移動和互動）的相對時一空。簡言之，資本的循環和積累首先發生於某個相對時一空中，而該相對時一空本身則藉由在時一空中移動的能力而持續變化。不過，這是個由事後評價（*posteriori valuations*）、投機冒險，以及市場協調的無政府狀態構成的世界。

然而，價值是個關係性的概念。因此，它的指涉對象是關係性的時空。馬克思（有點令人驚訝地）指出，價值是非物質但客觀的。「沒有任何物質原子進入了價值商品的客觀性。」²⁷ 因此，價值並不會「貼個說明標籤，然後高視闊步」，而是將它的關係性掩藏在商品拜物教裡。我們能夠接觸它的唯一路徑，是經由那個人與人之間建立了物質關係（我們經由我們生產與交易的東西而彼此關聯），以及事物之間建構了社會關係（我們生產與交易的東西標了價格）的特殊世界。簡言之，價值就是社會關係，而這些關係總是非物質但客觀的。不可能不經由它們的效果來測量它們（試試看直接測量任何社會權力關係，你一定會失敗）。依馬克思之見，價值內化了世界市場裡設置的無數勞動過程的整個歷史地理。很多人驚訝地發現，馬克思最根本的概念是「非物質但客觀的」，因為他通常被描述為唯物論者，任何非物質的事物都是詛咒。不過，他嚴厲譴責那些不能將歷史（我會加上地理）納入認識的科學家的唯物主義。這種價值的關係性定義，如果以某種直

接且本質論的方式來衡量，就會變得毫無意義，或是誤置了一切努力。我再說一遍：社會關係只能夠以它們的效果來衡量。然而，價值卻可以同時在交換的相對時一空，以及使用價值的絕對空間與時間中再現。這就是貨幣所做的事。

如果我對於馬克思範疇的特徵描述沒有錯，那麼這顯示我們不能賦予任何一個時空架構優先性。這三個時空架構必須彼此保持辯證的張力，就像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彼此辯證地糾結在一起。例如，如果沒有在絕對空間和時間（譬如在工作日的工廠）裡建構的無數具體勞動，就不會有關係性時空中的價值了。如果沒有將相對時空中的全球市場結合在一起的無數交換行動，以及連續的循環過程，價值也不會成爲一種非物質但客觀的力量。所以，價值是內化了世界市場中具體勞動的整個歷史與地理的社會關係。它表現了世界舞台上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主要是階級關係，但不止於此）。標明捲入其中的時間性非常重要，這不僅是因爲過去的「死」勞動（包括一切鑲嵌於營造環境中的固定資本）的重要性，也是因爲內化於價值形式中的無產階級化、原始積累、技術發展的一切歷史痕跡。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歷史與道德的元素」總是會進入商品勞動力價值的決定中。²⁸於是，我們看到馬克思的理論以特殊的方式在運作。紡紗工人藉由在絕對空間與時間中操作具體勞動，而將價值（亦即，沒有具體量度的、作爲關係性決定的抽象勞動）鑲嵌於布匹中。當紡紗工人被迫放棄製作布匹，而工廠沉寂下來時

——因為世界市場裡的條件使得這個特殊的絕對空間與時間中的活動變得毫無價值——價值關係的客觀力量便顯現出來。雖然這一切可能很明顯，但是，由於馬克思理論未能認識到不同時空架構之間的相互作用，經常產生概念上的混淆。例如，大部分所謂「全球在地關係」（global-local relations）的討論，都成了概念泥淖，因為無法理解牽涉其中的不同時空性。²⁹我們不能說，價值關係導致工廠關閉，好像它是某種外來抽象力量。是中國工廠的絕對空間裡變化中的具體勞動狀況，通過世界各地市場的相對時—空中的交換過程中介，才改變了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使得墨西哥工廠的具體勞動過程停止。像**全球化**這個流行術語，正是以這種方式關係性地發揮作用，正如它隱瞞了價值形式及其指涉的階級關係。假如我們追問：「全球化在哪兒？」我們提不出立即的物質性答案。

我們在馬克思針對貨幣如何代表價值的理解中，可以看到這種辯證法的運作。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黃金——是在某個特定地方與時間，以特定方式生產出來的。透過相對時—空中的交換，憑藉其硬度及恆久品質，這個特殊商品開始承擔了貨幣商品（其他商品，像是白銀、黃銅、瑪瑙貝也可以勝任）的角色。它的使用價值在於，它永遠停留在交換價值的相對時—空領域內的循環中。為了充當流通商品的工具而更有效運作，關係性的貨幣象徵（硬幣、紙鈔、帳戶款項）應運而生。貨幣變成關係形式，但還是保留了它在相對時—空及絕對空間與時間裡的位置（我放在

口袋裡的硬幣)。不過，它在這三個領域裡的現身，圍繞著普遍與在地、象徵與實質、功能與超驗之間一整個系列的矛盾。馬克思在特定的地方和時間分析了這些矛盾，但我們今天仍然在經歷這些矛盾，儘管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我們如何理解與我們口袋裡攜帶的硬幣息息相關的，世界市場上的全球貨幣的象徵形式（涵蓋我們報紙財經版的象徵）？馬克思警告我們的矛盾，在什麼意義上可能是金融及貨幣危機的來源，而這些危機依然伴隨我們，甚至比起馬克思寫作的時代，當今情況更為劇烈？

截至目前，我主要將注意力放在往下沿著矩陣的左欄，來從事馬克思理論的辯證閱讀。如果我開始橫向閱讀，會發生什麼事呢？當我們檢視勞工在絕對空間和時間裡的社會實踐與感官經驗時，使用價值和工廠裡具體勞動的物質性很明顯。但是，這要如何再現和構想呢？物理描述很容易產出，但是工作操持所在的社會關係（它們本身不是直接可見或可測量的），也很重要。在資本主義底下，薪資勞動者被概念化（第二欄）為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生產者，而這可以再現為一種剝削關係。這暗示了勞動過程的生活（第三欄）猶如異化。論證接著主張，異化主體很可能成為革命主體。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下——例如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關係——工作可能經歷得像是創造性的滿足，並且概念化為經由集體努力的自我實現。甚至無須在物質上有所改變，就能以非常不一樣的方式來概念化和過活。畢竟，這是列寧主張蘇聯工廠應採取福特主義時的希望。對傅立葉（Fourier）而言，他認為

工作應該牽涉遊戲，以及慾望的表現，並且經歷起來猶如崇高的享樂；他相信，這一點要能實現，就得徹底重構工作過程的物質特性。

在此，我們必須承認有各式各樣相互競爭的可能性。例如，布若威（Burawoy）在他的《製造甘願》（*Manufacturing Consent*）裡，發現他研究的工廠裡的工人，一般而言，對工作的經驗不是異化。³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將工作場所轉變為角色扮演和玩遊戲的所在（傅立葉式的），從而鎮服了剝削的觀念。工人操持勞動過程的方式，使得他們能以非異化的方式來經歷這個過程。對資本而言，這有幾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因為非異化的勞工通常工作比較有效率，而且不太可能充當革命的主體。而且，我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任何極端革命變遷的前景，勞工可能也只是試著以非異化的方式過日子，而且在他們這麼做的時候，盡可能享受樂趣。資本家有時推動一些措施，如健身操、品管圈等，試圖減少異化，並強調團結（日本人特別以此著稱）。他們也產出替代性的概念化——強調辛勤工作的報酬，並且產製否定剝削理論的意識形態。因此，雖然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可能在形式上是正確的，但它並不總是或必然會轉譯為異化和革命。這大致上取決於勞動過程如何被概念化。階級鬥爭有部分是牽涉到把剝削的意義講得更透徹，以便適當地概念化具體勞動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下完成。這裡真正要緊的，再度是物質、構想和生活之間的辯證張力。如果我們以機械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張力，我們就迷失了。

現在，讓我廣泛地（或許狂野地）橫越這整個矩陣，看看當我們辯證地思考矩陣的各種組合時，能得到什麼。例如，考慮一下像是階級意識這種範疇。我們可以在什麼空間與時間中找到它，它如何能跨越時空矩陣，以取得豐碩成果的方式串接起來？首先，我要指出，它主要存在於馬克思理論概念化的關係空間裡，因此，它必須被視為非物質且普遍的。不過，這個概念要有意義，它就必須在特定（即絕對）空間與時間中成為促進改變的客觀力量，同時也在關係上為人所經歷（即我們感情及情緒性的在世存有的一部分）。為了能這麼作，勞工必須將階級意識內化進入他們的生活存在，並找出方法，將那種應然的感覺納入跨越相對時—空的移動中。但是，唯有當一場階級運動現身於街道、工廠、企業總部等絕對空間與時間，這個運動才顯露出直截了當的物質性。這一點甚至也適用於抗議的層次。沒人真的知道反全球化運動意味了什麼，直到人群於某個時間出現在西雅圖街頭。

但是，誰能說勞工的夢想和信念實際上是什麼？例如，洪席耶（Rancière）提出大量實質證據，證明 1830 及 1840 年代法國勞工的夢想及渴望，與許多馬克思主義勞動史學家根據一份勞工物質境況研究所作的推論，大異其趣。³¹他說，他們渴望尊重和尊嚴，渴望與資本建立合夥關係，而不是以革命手段推翻資本。當然，我們可以對洪席耶的發現提出異議，但烏托邦夢想的世界是個錯綜複雜的世界，我們不能自動推測這個世界的構成方式。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唯有當那些夢想轉變為積極的力量，這些非

物質的渴望和慾望才能取得客觀力量。這件事要成真，就需要橫越整個時空定位矩陣的辯證性移動。阻礙可以突然出現在任何一點。將市場交換再現為既有效率又公平的新自由主義霸權式再現，給實際勞動過程的重建造了障礙，因為這種市場概念如果為人所接受，會使人們的日子過得好像只要有任何事情出差錯，都是自己的個人責任，好像任何問題的唯一解答，都存在於強化既有市場或開發新市場（例如污染信貸〔pollution credits〕）。通過技術創新而產生的時間與空間關係轉型，在改變資本與勞動循環得以發生的地勢時，也轉變了認同與政治主體性。資本循環的時間範域隨著貼現率而變化，後者又隨著金融市場的投機性資本循環而波動。其後果則出現在鄰里（例如 2007 年次貸危機期間，抵押品贖回權的喪失明顯集中於美國城市的特定鄰里，尤其是非裔美人地區）、工廠、購物商場及娛樂中心的絕對空間裡。不過，正因為市場主要（但錯誤地）被概念化為個人自由的先驅及守護者，因此，接受了市場邏輯，就是將發生的事情詮釋為既不可避免，又公正合理。

動態

任何絕對的空間再現形式，例如矩陣，都有內蘊的限制。萊布尼茲的關係性概念的核心想法，認為物質與過程界定了空間與時間。這便提出了以下問題：在矩陣內部運作的過程是什麼？如

果有多重過程，可不可能有多種時空世界，以及多重矩陣？雖然萊布尼茲訴諸夢境和童話故事，來說明許多時空世界的可能存在，但他認為智慧的上帝實際上只選擇了一個：由於上帝對「充足理由原則」(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的接納，使各個時空彼此調和。懷海德則避開了神學，勉強承認不同過程有可能產生不同的時空，但他認為，很幸運地，不同時空的差異很微小。至少在物理世界中，不同時空變得相互「共變」(cogredient)¹³¹ (交織而一致)。這個推測(幸或不幸地)在社會實踐領域中站不住腳。在這裡，和諧一致與共變，讓位給了對抗、反對、衝突和矛盾。資本主義的時空，與古代宇宙論、甚或人類再生產的時空，根本不協調一致或共變(哈瑞文〔Hareven〕針對20世紀美國工業時間與家庭時間對比的令人信服描述，闡明了這一點)。因此，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有一種依附於不同過程的不同時空性的混亂狀態，以及它們彼此間極有可能存在著巨大的斷裂與分離。就此而論，人類學、地理學與史學的證據十分明確。中世紀僧侶、努爾人(Nuer)、阿善提人(Ashanti)、索爾特族印地安人(Salteaux Indians)、嘎哇島(Gawa)居民和華爾街金融家的時空世界，彼此迥異。³² 紐約市的遊民、領救濟金者、散工、學校教師和

155

[譯註]

¹³¹ cogredient 為數學名詞，指一組變數與另一個變數系統經歷了相同的直線性轉變，有同一步調的意思。

金融家的時空世界，同樣天差地別，住在同一座城市裡的墨西哥、海地、孟加拉、韓國與菲律賓移民，當然也不例外。華爾街金融家工作時可能在某個時空，當他回家並盤算他有多快可以退休去釣魚的時候，則置身於另一個時空。他的戰利品妻子¹⁴則會建構一種相當不同的、不迷戀釣魚的時空世界，而且無疑最終將會要求住在裡頭的贍養費。公司資本可能會堅持某個可再生資源（如魚群）的開採率，卻與遭破壞資源的再生產率乖離。

既然如此，我們如何弄懂在我們的社會世界裡共存的無數且顯然不一致的時空性？這個問題有兩種答案。第一種回答指出，我們就是無法任意將秩序強加於這團混亂，這團混亂其實是新社會生活樣貌得以持續建構的騷動的一部分。這就是譬如摩爾（D. Moore）調查辛巴威凱瑞齊區（Kaerezi）交錯的時空性時，明顯浮現出來的圖像，在這個地區「情境化鬥爭產生纏繞的地景，多重空間性、時間性和權力關係則於該地景中結合在一起：求雨和酋長統治；殖民牧場和後殖民定居計畫；特定位址的土地權利主張與國族解放論述；祖傳遺產與種族化的掠奪。纏繞意味了疙瘩、節瘤與黏著，而非平滑的表面；是誘捕的糾結羅網；一種挑戰性的妥協關係，令撤退若非完全不可能，也顯得很困難」。³³

156

第二種觀點認為，縱然有許多混亂與矛盾，但特殊社會形構

{譯註} _____

¹⁴ 通常指嫁給年長富裕男人的年輕貌美女性。

裡的社會生活最終會變得井然有序，致使某個特殊的時空性組態，既是主導優勢（作為規訓裝置而在社會上實施），又是支配霸權（往往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內化於我們的存在中）。因此，特殊社會形構內部的不同時空性，傾向以懷海德設想的方式成為共變——彼此交織而相互連結。但又不盡然如此。社會形構內部的抵抗和異議，可能展現為建構和依附某種另類時空性的渴求與慾望（有時轉變為積極的鬥爭）：生態運動在這一點上經常格外鮮明，因為它以保護生態過程之名，遏止資本積累的時空性（例如，棲地再造及特定種類的生態群集）。在摩爾的解釋裡，通過探討「在地化的土地權利，如何經由關係性的國族歷史、區域性反殖民運動、南非的帝國計畫遺緒，以及有關發展、人權和社會正義的全球化論述，而連接起來」，才浮現出某種共變。時空性的不同形式，雖然在治理術（governmentality）之網、政治經濟過程，以及種族化掠奪中凝結起來，但這些形式也提供了據以爭議主流社會秩序的資源。

我大致上支持第二種觀點。但是要提出論證，我們首先必須弄懂，資本主義的獨特時空（本身是動態的，絕非固定而靜止不動），為何在大部分情況下被當成強勢全球規範而廣為接受（儘管接受度各地不一）。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是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廣泛流傳故事。⁴⁴我們當代世界裡的強制共變，首先源自國家機器與資本的雙重力量。其效果就是將獨特的時空秩序給予（在某些例子裡是強加於）資本循環與積累，以及國家藉以維

持資本積累所需基礎建設的必要官僚協調機制。這種強制施行，具有廣泛的次級效應。譬如，要追溯標準化時空規訓穿透日常生活的方式（比方說我們的飲食與睡眠習慣），其實不難。可見傅柯的提議沒錯，他指出普遍的規訓裝置，以及各種機構場合（醫院、監獄、學校、工廠、家庭）中特別建構的那些裝置，共同構成了經由特定時空秩序化而運作的治理術體系。結果，我們全都傾向於內化了某種具規範性意義的霸權時空性。不過，這個過程不是沒有內在矛盾（和外部抵抗）。首先，資本循環和積累不是穩定的過程。由於競爭的壓力與週期性危機的瓦解，這個過程會不斷變化。一個針對此危機趨勢的解決模式，是促進循環過程（加速生產、交換與消費），並且轉變空間關係（開闢積累的新領域與地理網絡）。因此，資本主義的時空性是不斷流動的。交換關係的相對時一空，對於移動的中介技術（主要是運輸和通訊）格外敏感。然而，其結果卻是橫跨矩陣而重構了定義。工廠的絕對空間，如果當真繼續存在的話，隨著相對與關係時空性的更迭轉移，不再擁有它曾經擁有的意義。城市的絕對空間，必須適應循環中快速變化的迫切需要。時空性藉以顯露的主要尺度（現在這方面的文獻不計其數）也變了樣。世界市場的時間和空間被壓縮。隨著相對時一空中經濟行動的尺度變化，國族國家的絕對空間因而獲得不同的意義，提出主權國家和公民身分之當代定義的問題。像是 2003 年 2 月 15 日的全球反戰抗議這類事件，設定了一種不同的關係性（取決於如今因通訊技術變革而成爲可能的相對

時一空世界)。再度地，壓力從另一個方向動員起來，施加在領域性權力的絕對空間上，這便限制了領域主權國家作為主要權力容器的觀念。此外，還有抵抗和分歧的議題。不是所有活動——誠如摩爾正確指出的——都納入了變化多端的資本主義積累時空邏輯中。

政治

柯恩（Margaret Kohn）在她的《基進空間》（*Radical Space*）中，開始探討空間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她特別關心空間如何蘊含於轉型政治計畫（transformative political project）的闡述之中。這與眾人比較熟悉的想像，即大多援引自傅柯的空間是權力規訓體制一環的想像，有著鮮明的對比。柯恩聚焦於往往身處逆境的從屬者階級，探討他們「創造充當公共生活節點之政治空間」的方式。例如，她檢視 20 世紀初期許多歐洲城市裡的「人民宮」（houses of the people），如何在實際上及象徵上去塑造基進社會主義民主的理想與實踐，以對抗階級力量的主導形式。她主張，空間「影響個人與群體如何在事物的秩序中感知他們的地方。空間組態將偶然形式轉變為看似不變而非可以爭議的永恆地景，藉此自然化了社會關係。空間形式藉由提供共享的背景，發揮了將個人納入共享的現實概念中的功能。……政治空間創造出一個可以發展新認同與實作的獨特地方，從而促進了變遷。地方的政治力

量，來自其連結空間的社會、象徵及經驗向度的能力。轉型政治出自於分離、並置，以及重組這些向度。」³⁵

和列斐伏爾一樣，柯恩接受空間具有物質、象徵和認知的向度。她特別關注關係性（relationality）：「空間的意義，大部分取決於其象徵價（symbolic valence）。一個特殊地方，就是一種定位故事、記憶和夢想的方式。它連結了過去與現在，並將它投射到未來。一個地方可以各種不同方式來捕捉象徵意義：在設計中納入的建築暗示、作為重要事件的背景，或者，將自己定位於反對其他象徵的立場。它的力量是人類傾向以提喻法來思考的徵候；勞工的廳堂，猶如紅旗，代表了社會主義或正義。它是轉型慾望的貫注（cathexis）。物理環境是政治神話的實現、體現及物質化。它灌輸了一套持久的性情，使行動者即使在沒有任何明確規則和限制下，都以常規方式來行動與反應。」³⁶

柯恩特別執著於勾勒出相互關係的整體性。雖然歷史不忘1917-18年的都靈工廠議會（Turin Factory Councils），但多半忽略了都靈合作聯盟（Turin Cooperative Alliance）的關鍵角色。正是通過後者，勞工才得以將「對生產控制的爭議」連結上「消費和休閒，在勞工與潛在同盟者之間建立聯盟，並將根植於日常生活的鬥爭轉變為政治」。通過這些大部分經由人民宮而非工廠來串聯的機制，勞工「創造了地方和區域的權力地理」。人民宮是「外部世界的縮影，結合了消費、生產與社會及政治生活的領域，但其形式更為公正、理性而具平等主義」。它「既是抵抗的組織，也是建

立普遍性的嘗試」。簡言之，人民宮為界定進步寰宇主義計畫的在地嘗試提供了庇護，並給予象徵意義。³⁷

雖然主要是關注特定地方（義大利）和時間（1890年代至1920年代晚期，社會主義運動形成期間），但柯恩的研究還是支持了我想提出的論點的一般性質。它顯示出，對於那些試圖維繫和鞏固既有權力的人，以及那些反對他們、尋求替選方案的無數社會團體、黨派及階級而言，政治空間與時—空辯證法對鬥爭活動有重大影響，並且形塑了這些鬥爭活動。奠基在這個過程上的另類寰宇主義可能性，昭然若揭。但在闡述這種可能性的時候，還是必須小心謹慎。例如，柯恩無法提供我們可以遵循的指定訓誨或機械模型。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學的演變，已到了使過去抵抗的時空形式，與當前局勢越來越不相關的地步。雖然人民宮仍是指導性的歷史標誌，但若嘗試在當代重建其社會與政治意義，則會被視為懷舊的舉措。這不是說類似努力是多餘的。例如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義大利，女性主義行動主義者建立了類似的中心，作為政治行動之網絡化組織的一環。因此，確保這種政治工作的時空性理論正確無誤，就更重要了。在這一點上，柯恩同許多其他分析者一樣，過度受到傅柯將異質地方（heterotopia）當成適當理論架構的構想影響，因而有點搖擺不定。那麼，就讓我們更仔細檢視傅柯對這個問題的構想。

傅柯在1966年出版的《詞與物》裡首次闡述異質地方的概念。他在1967年向建築師發表的，名為「論異類空間」（Of Other

160 Spaces) 的演說中，進一步反思異質地方的可能性。那篇講稿從未修訂出版（雖然傅柯辭世前不久確實同意出版）。他的追隨者從他汗牛充棟的畢生著述裡，抽取出這篇堪稱隱藏寶石的異質地方文章，成了烏托邦問題得以復甦，又遭到瓦解的手段（尤其在後現代主義內）。傅柯訴諸異質地方來避免「位於地方」(placeful) 之烏托邦的「無地方」(no place)。異質地方包含了以「大相逕庭的方式置放、定位及安排」事物的各種位址，「以致不可能在其全體底下界定出一處共同場所」。這一點直接挑戰了1960年代理解的理性都市規劃實踐，也質疑大幅鼓舞了1968年運動的烏托邦主義。藉由研究空間的歷史，並理解這些空間的異質性，便有可能指認出各種絕對空間，而差異、他者和「異己」則在其中發展繁盛，或實際上（由建築師）建構出來。這個想法很有吸引力。它使我們得以將歷史流傳給我們的多重烏托邦圖式，想像成不是互斥的（女性主義、無政府主義、生態及社會主義烏托邦空間，都可以作為潛能〔*potentia*〕而並存）。它助長了馬林（L. Marin）稱為「空間遊戲」(spatial plays) 的想法，強調選擇、多樣性、差異、不協調和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它使我們將都市空間裡的多種逾越行為（往往被常態化為「偏差」），視為重要且具生產性。傅柯把諸如墓地、殖民地、妓院和監獄這類地方，都納入了他的異質空間 (heterotopic space) 清單。³⁸

傅柯在這篇文章裡假定，異質空間是以某種方式外在於主流社會秩序，或者，它們在該秩序裡的定位可以被切割、削弱，或

者像監獄裡那樣，從內部反轉。它們被理解成絕對空間。於是，異質空間內部無論發生什麼事，都被假定為具顛覆性，而且有基進政治意涵。但是，我們其實沒有特殊理由去接受這個假設。法西斯主義者會構築和運用獨特的空間，天主教徒與新教徒（教堂）、穆斯林（清真寺）及猶太教徒（猶太會堂）也是如此，藉以作為他們自己版本的普遍性且在很多方面是寰宇主義的計劃的基礎。在傅柯的構想下，墓地和集中營、工廠和購物中心、迪士尼樂園、教堂、瓊斯鎮（Jonestown）¹⁵¹、民兵營、開放式辦公室（the open-plan office）、新和諧鎮（New Harmony）（印第安納州）和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都是另類處事之道的位址，因而是某種意義上的異質地方。乍看之下因為多樣性而顯得如此開放的事物，突然之間顯得平庸無奇：這是由異質而不同的絕對空間構成的一團折衷式混亂，任何「不同的」——無論如何定義——事物都可能發生。最終，整篇探討異質地方的論文，將自己簡化到逃脫（escape）這個主題。「船舶是出類拔萃的異質空間。」傅柯寫道。「沒有船的文明裡，夢想枯竭，諜報偵查代替了冒險犯難，警察代替了海盜。」但是，傅柯異質地方概念的平常性，在

[譯註]

¹⁵¹ 或譯瓊斯敦，是美國加州人民聖殿農業計畫的實施地點。1974年人民聖殿教教主瓊斯（Jim Jones）領導教徒，於蓋亞那西北部建立農村人民公社。1978年在瓊斯指揮下，瓊斯鎮鎮民集體服毒自殺或被迫服毒殺害。此後，瓊斯鎮成為恐怖事件代名詞。

這裡變得太顯而易見。如果真有異質地方的話，商業郵輪確實是個異質地方位址；所以，這裡能有什麼批判性、自主性及解放性？傅柯的文字可以輕易用於加勒比海豪華郵輪的商業宣傳。他的異質地方遊覽，結果變得跟康德的地理學一樣平庸。更糟的是，空間的絕對性有所侷限，指向了隔離和停滯，而非進步的運動。我不意外他沒出版這篇論文。令人意外的是，這篇論文卻如此廣為引用，當成某種決定性的界定自主空間的方式。

然而，傅柯很顯然覺察到空間性多少有其重要性，因此，他也不可能讓這個議題憑空消逝。或許心裡記掛著對他自己的異質地方概念提出批判，他稍後還擔心「空間被視為死寂、固定、非辯證、靜止不動」，而「時間，恰恰相反，是富饒多產、生命、辯證」。雖然表明了批判立場，但這種設想卻再度確認了他接受康德主張的，空間和時間彼此分離的觀點。他後來觀察到，如果「空間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裡都很根本」，那麼，空間必定也「在任何權力行使上，極為根本」。另外，在他出版為《安全、領域、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的演講中，他承認於 17 和 18 世紀出現，作為規訓裝置（他稱為治理術）一環的絕對空間秩序化的重要性，以及這種秩序化與一方面是商品及人員流通動態，另一方面是環境（地方與環境）結構化之間的張力。但是，當他接受地理學刊物《希羅多德》的編輯訪問時，他拒絕闡述他提出的大量空間隱喻的物質根據，他迴避了與他的理解相搭配的地理學知識的問題（儘管他使用了真實的空間形式，像是全景敞視建

築和監獄，來說明他的主題)。最重要的是，如同我在第一章主張的，他沒有為空間如何「在權力行使上極為根本」³⁹，提出確切的意義。

然而，列斐伏爾塑造了另一種異質地方觀點。晚於傅柯的演講（幾乎可以肯定列斐伏爾從他的建築界朋友那裡得知這場演講）一年，列斐伏爾在1968年出版的《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裡，提出了一個對反定義。他把異質地方解釋為差異的空間，是失範（*anomie*）及潛在轉型的空間，但他將它們鑲嵌於辯證的都市化概念中。他讓異質地方這個觀念，與作為表現性慾望的烏托邦之間保持張力，也跟同位性（*isotopy*）（資本主義與國家已實現且理性化的空間秩序）之間保持張力（而非只是位居其外）。列斐伏爾充分了解「空間〔與時一空〕隨著時期、範域、場域和主導活動而改變」，而且空間充滿了「對比、對抗、重疊和並置」。結果，「同位—異位（*heterotopy*）的差異，只能以其動態來理解。……失範的群體建構了異質空間，而主流實踐最終會要求歸還該空間。」⁴⁰ 在異質空間裡掌握到的差異，不是關於隔離與分離，而是攸關和所有其他空間的潛在轉型關係（如柯恩的例子）。這裡的政治問題是，面臨替主流實踐回收異質空間的那些強大力量，如何找出實現它們的短暫潛能的方法。19世紀末，成立像是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這類教育機構的都市女性，認為它們是能夠推展獨特的女性主義教育的地方，但這些學院的故事泰半卻涉及它們如何被重新吸納，成為主導的階級與性別關係

再生產的位址。列斐伏爾對於相對及關係性意義的召喚（以「空間的生產」這個概念來強調），與傅柯對於絕對空間概念的偏重（即使他曾援用循環過程的相對時一空）形成對比。在列斐伏爾手中，時空概念變得既辯證又充滿活力（兼有進步和退化的潛能），而非死寂且固定不動。

不幸的是，列斐伏爾的辯證概念並未廣為流傳，由於經常訴諸傅柯的靜態且貧乏的異質地方概念（相對於傅柯後來比較寬鬆的構想），對於進步可能性的理解，肯定造成了有害的、麻痺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稍早見過的，德什潘德研究全球化、印度國族概念，以及「印度特質」（或「印度教國族主義」）建構之間關係的情形。至於柯恩，她不理會傅柯，採取了一種更強大但未言明的理論，而列斐伏爾的辯證取向在其中所佔分量較重，因此她勉強避開了類似命運。摩爾也採納了傅柯治理術理論中，有關空間性與權力如何連結的洞見，但他將列斐伏爾的關係性觀念注入了分析架構，藉此讓傅柯的洞見從其絕對特質中解放出來。

或許，所有政治議題中最艱鉅的一項困難，就是去理解關係性到底如何運作。當然，最簡單的答案就是「追蹤過程」。這實際上是艾利埃恰（Julia Elyachar）在她《奪取的市場》（*Markets of Dispossession*）中的作法。她發現，不同過程不僅在開羅勞動居民的生活裡，創造出不一樣的關係時空性，還產生了南轅北轍的價值觀念。工作坊文化不是通過競爭來極大化獲利，而是在有限的時空地域中，獲得尊重和社會地位，即使那意味著將潛在有利可

圖的生意讓給別人。國際金融機構和小額信貸制度，企圖將開羅工作坊的這些勞動過程的生產力，納入一般資本循環，不僅要求轉變價值的結構，拆毀相互支持的社會關係，還要創造出「奪取的市場」，在這個市場裡，爲了支撐資本主義國際金融機構對於剩餘價值的貪婪胃納，而從社會某個部門汲取了某種價值（主要是通過信貸系統組織）。對於這種掠奪的抵抗，立足於串接起各種另類的價值結構，而其依附的社會關係，也全然不同於資本主義通常界定的那種。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不是規範性或普遍性的量度，而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獨特產物，這些社會關係正是「時間就是金錢」和「片刻是利潤的要素」等格言明確適用的所在。不同的價值關係源自不同的社會關係。當時間不再等於金錢，不同的價值理論勢必會出現。相互競逐的時空性，誠如葛瑞伯（D. Graeber）的清楚闡述，正是因此無可避免地連繫上彼此競爭的理解價值的方式。⁴¹

神話與記憶、道德、倫理和權利，對於想像社群與地方的情感忠誠，這類難以捉摸的無形物，在政治鬥爭的動態裡作了許多事情，造成深遠的客觀後果。在這個非物質領域裡展開的概念性政治戰鬥，變得很關鍵。我實際上（或我能夠）最有效籲求的是哪一種神話、記憶或情感忠誠？這就是貝克抱怨對於第二現代性的時間性缺乏理解時，心裡惦記的東西，但他同樣落入了認定康德式的時間與空間區分爲適當合宜的陷阱。大哉問是：道德、倫理和權利，存在於什麼樣的時空裡？答案不會以立即的物質形式

164
在我們面前現身。努斯鮑姆邀請我們，去跟住在地球上的每個人建構關係性的忠誠。這個理想能有任何物質指涉對象嗎？誠如康德指出的，某個特定類型的寰宇主義，必然會隨著民族之間貿易與商業關係的物質擴散而出現。這便支撐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提及的資產階級寰宇主義。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認，資產階級建構的世界市場，也有積極和建設性的面向。這就引起了以下問題：一種更為深遠而進步的寰宇主義計畫——例如普遍共產主義的計畫——如何能夠建立在資產階級秩序的廢墟上？再次地，這僅僅是抽象概念嗎？或者，由於它是在特殊地方與時間建構的，我們藉由辯證地通過時空性矩陣來運作，其實有辦法可以思考它如何可能獲取客觀的物質形式？

讓我們考察一則實例。對於住在先進資本主義世界，以及越來越多在那個世界以外的每個人而言，我們的食物從哪裡來，誰涉入了食物生產過程的簡單問題，會急遽地往外（當我們考慮所有能源、機械、肥料等的輸入）擴展到世界幾乎每個角落裡的億萬勞動人民。資產階級確實給了「一切生產寰宇主義的特質」。當然，我們對於售予我們日常飲食的所有人員，負有某種道德或倫理義務。然而，市場體系的才華，在於它能遮蔽事物之間社會關係（亦即超級市場裡的交易）背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要建構出一種道德及政治命令，以便超越馬克思所謂的「商品拜物教」，並想像一種跨越整個社會勞動世界的關係性連帶，作為我們道德義務的核心事實，其實不困難。但是，食物生產者對於我們負有什

麼道德義務？當我們突然理解到，有惡劣作法和危險原料納入了我們的食物供應，那會發生什麼事？看起來美味多汁的檸檬和蕃茄、看似非常誘人的蝦、超便宜的雞肉，還有其實是基因改造的玉米……。突然間，食物政治，即食物主權議題，不但是物質性的關切，也成了攸關政治騷動與道德的事情。

在我看來，這是馬克思價值理論提出的，沒有明言的道德問題。在這個基礎上，比較正義的寰宇主義計畫版本的綱要，變得顯而易見。不過，恰恰是在這個關係性的要點上，努斯鮑姆迴避了議題。畢竟，布希和新自由主義者徹底支持藉由實施私有財產安排、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將自由與自主帶往世界的綱領性嘗試。但是，努斯鮑姆的論證卻缺乏批判的分量，能破除這種拜物論證，並且認識到對於這種非物質觀念的追尋，當經由市場交換之相對時一空的中介，進入了私人所有權和政治控制的絕對空間時，其客觀後果將是社會不平等與不均地理發展層次的日益擴大。我們已經知道，那種寰宇主義計畫只不過是意味著，掌握在位居少數精選區位的一小群全球（寰宇主義？）菁英手中的，壓倒性階級力量的復辟。

面臨這種結果，我們很容易主張，從群眾的角度，尤其從住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遭剝奪且邊緣化的空間裡的人的觀點來看，所有寰宇主義計畫都是徒勞無功，還適得其反，有不良後果。但是，我要大力反駁這種結論。舉例來說，努斯鮑姆的出發點，看起來大約跟其他人一樣良善。但問題在於她沒能闡明，需要什麼

樣的適當人類學與地理學理解，才能實現她的崇高目標，她也無法掌握，當從關係性世界的非物質性，穿越交換的相對時一空，進入工廠、學校、家庭和領域的絕對空間時，時空性的辯證法如何會產生各種非意圖（或者，在布希的例子裡是刻意的）後果。我在本書第一部分已經說明了，當高尚的計畫與目標落到現實面時，非常容易就會扭曲成爲剝削、不平等的骯髒政治，並被視同不正義。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於時空辯證法的更佳把握，是追尋任何自由地理學的必要先驅——即康德所說的可能性條件。

「地方是一切事物之首。」亞里斯多德如是說，而影響深遠的廿世紀哲學家，像是海德格和巴舍拉，也同意這個看法。凱西（Edward Casey）最近探索了這個觀念的歷史與當代關聯，也許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為深入。他有力地批評了啓蒙思想賦予空間凌駕地方的優先地位，他也在過程中質疑了康德寰宇主義的根基。凱西認為，康德的典範性陳述「普遍知識必然先行於地方知識」，「替空間優先於地方設下了舞台，事實上在許多方面依然支撐著舞台。」誠如我們所見，在康德的觀點中，空間是空曠、原始而純真的，等著分割和區劃為具有獨特性質的地方。但是，凱西詢問，「如果事情是另一種情況呢？如果空間觀念本身出現於地方觀念之後，甚至導源於地方觀念呢？如果地方知識……先於空間的知識呢？」

地方是基本的，因而是普遍的，而空間是偶然且特殊的，這種想法正是現象學取向的核心。凱西在他溯自希臘以降的博學的觀念史中，替這一條思想路線描繪了扣人心弦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系譜。批判自由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評者之所以轉向海德格，就

變得比較容易理解。實際上，他們要求「地方充盈」(placefulness) 必須優先於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寰宇主義理論所預設的「平坦地球」的原始空間。凱西的轉向主張十分有力。「生活就是在地生活，而認識首先是認識自己所在的地方。」因此，「地方知識與生活經驗是一體的。」地方，亦即「生活經驗和日常生活的特權位址」，必然位於我們的世界認識的中心。¹像康德那樣令抽象普遍性優先於地方知識，是柏克和其他同道反對的做法。誠如梅塔所述，由於海德格「非常有柏克作風」，我們可以通過召喚海德格和柏克，來扭轉自由主義和寰宇主義理論的優勢局面。

凱西論證的問題在於，他接受了笛卡兒、牛頓和康德的絕對空間與時間概念，當做他的鈍頭劍。根據這個立場，地方確實顯得像是在一個空虛、固定且抽象的空間裡頭後來建造的東西。再者，凱西宣稱「地方」是空間和時間匯聚之地的論點，唯有在康德/牛頓的空間可以和時間分離的預設下，才說得通。如果安置於相對時一空 (space-time) 和關係性時空 (spacetime) 的脈絡下，地方就會有相當不同的意義 (參見第七章)。關係性時空從物質和過程著手，因此既不空虛，也非固定。再者，空間和時間在關係性時空中並未分離。根據這個立場，時空和地方是從物質和過程中共同生產出來的。因此，就像我們在第七章發現的，我們若不經常指涉紐約歸零地，以及其政治角色成為柯恩細究主題的文化中心²等真實地方，就不可能理解關係性時空。唯一有意思的問題——我們稍後會回頭討論——是如何能夠有效地區分地方與

時空。

然而，空間與時間之絕對觀點無庸置疑的歷史霸權，導致認定地方迥然不同於空間的長遠對抗性思想傳統。這種對抗性的文獻，值得仔細探討，但要記得，以地方為根基的國族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經常是針對寰宇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最猛烈攻擊的核心。可能出於這個原因，自由主義者和寰宇主義者傾向於全然忽略地方的問題意識，或是在提到的時候過分謹慎。但這並非解答。地方的問題必須予以協商，而非忽略不顧。畢竟，未能根植於（且顯然冷漠看待）特定地方之日常生活的物質與情感境況，一直是批評寰宇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焦點。例如，在回應努斯鮑姆時，辛梅法柏（Gertrude Himmelfarb）認為努斯鮑姆模糊了「生命的既予」，並指稱「父母、祖先、家庭、種族、宗教、遺產、歷史、文化、傳統、社區——以及國族特質」，不是「個人的『意外』屬性」，而是「本質如此」。艾斯科巴同樣拒絕了新自由主義和發展主義，理由是它們永遠無望實現潛藏於在不同地方生活，並且塑造自身獨特文化的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類潛能。我們也見到柏克提出了更根本的論點，他寫道：「若憑著一種物的簡單觀點，剝除掉所有關係，僅剩形上抽象的赤裸與孤獨，我無法站出來讚揚或指責任何牽連人類行動與人類關切的事物。環境（有些紳士全然不當一回事）實際上賦予每個政治原則獨特的色彩，以及有所區別的效果。正是這類環境使得每個公民與政治架構對人類有益或令人作嘔。」³因此，根據艾比亞的說法，唯一

有效的寰宇主義乃是「根植」寰宇主義。⁴

但是，「根植」寰宇主義究竟根著於什麼之中？愛國主義、國族主義、地域主義，以及宗教、族群、性別或種族優越性的教條，都同樣符合要求嗎？如果愛國主義的寰宇主義全然可以接受，那麼為何不來一個國族主義、神權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寰宇主義呢？例如，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就認為，天主教寰宇主義（其上智之座位於梵蒂岡）是他的一大敵手。艾比亞擁護的扎根地方文化的原則性根植，最後會將他的寰宇主義（理解為對多樣性的欣賞和尊重），經由多元文化主義而摺疊回到個人權利的古典自由主義，便宜行事地忽略資本積累的政治經濟過程，那難以馴服且受制於階級的世界。因此，艾比亞最後只是支持了菁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秩序，灑些多元文化主義香料，卻無視於在個人化自由市場中崛起、且持續深化的階級與社會不平等。在更晚近的時期，許多寰宇主義理論的父權主義和家長作風，也得到了適當的關注。為此，許多明白擁護「純粹」寰宇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的不同流派者，偏好不給根植性清楚的角色。一旦開了門，各式各樣的討厭傢伙就會蜂擁而至。但門戶還是洞開。畢竟，康德教導人類學和地理學，是希望以科學的認識，以及最終是對於身為人類學和地理學之類存在的「人」的「根植性」認識，來取代宗教、宇宙論和超驗的人類主體概念。努斯鮑姆接受了（比方說，針對我們的孩童教養法），「給自己的領域特別關照，就普遍主義角度而言是合理的。」更晚近，她主張國族國家

形構是個凝聚的有效辦法，藉以邁向更具公義的全球秩序。如果像漢納茲（Ulf Hannerz）的評論，「家園不必然是個寰宇主義遭放逐的地方」，那麼，我們無可避免會認真看待我們對特定地方的情感認同，即使我們試圖擁抱開放性的寰宇主義。⁵

假使將地方定義為我們身為個體而度過日常生活的場所，那麼，地方情感和忠誠，就不可能視為本然地會逆反於寰宇主義或自由主義倫理，這種觀點可說是稀鬆平常。但是，誠如我們不只一次指出的，面對地理學概念的時候，平常性卻經常會掩蓋深層的問題。因此，「地方」作為一種相對於寰宇主義的類屬概念的意義，幾乎未受檢驗，至少直到最近都是如此，使得這個字眼（及其諸多同源詞）在塑造我們的再現和概念世界，以及我們的實踐上，從事龐大卻經常是隱匿的工作。因此，它紛雜多樣且有時候荒誕空想的意義，需要更仔細的檢視。那麼，地方忠誠（環繞特定地方的情感豐富的社會生活），相較於寰宇主義計劃的角色會是什麼呢？地理差異和領域歸屬，在这一切事務中能扮演什麼角色？對特定地方和領域的情感依附及政治忠誠，實際上會如何運作？這些真實不虛的現象，在置入了寰宇主義計算或納入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時，會有什麼後果？

地方、區域和領域的觀念

一如「空間」和「自然」，「地方」這個觀念是多層次且混雜

的地理學概念。首先，我們使用許多類屬字眼，像是**地方**、**區域**、**地區**、**領域**和**地域**，來指稱一個獨特且通常有邊界的空間，猶如它是相對恆久且可以分離的實體，具有特殊獨有的性質。有一系列同源的描述性字詞，像是**城市**、**村莊**、**小村**、**國家**、**封地**、**行政區**、**鄰里**，甚至是**社區**及**家園**（home and hearth），還有聽起來更富技術性的限定用詞，像是**生態系**、**微氣候**、**地形區**或**地景**，有效地描述了有界空間內，特殊現象的某種獨特而連貫的聚集。**地方**的隱喻用法也很重要——我們都知道覺得「格格不入」（out of place）或「知道分寸」（to be put in our place）是什麼意思，這些隱喻性意義經常會蔓延到物理指稱，像是「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方」，或是「在軌道錯誤的那邊」。但是，「家是最好的地方」的諺語，顯示了深刻情緒（包括正面和負面）在塑造我們的概念、認同及行動上可能發揮的作用。歸屬和無所歸屬（以及認同和異己）的感受，與地方和領域的相關觀念糾纏難分。**地方**有如此眾多的同源詞，似乎本身就需要一部交叉意義的小型索引辭典。

地理學家傳統上偏愛**區域**一詞勝過**地方**，有時候試圖以區域地理實作為核心來界定他們的學科（帕蒂森的「地區傳統」正是源自於此）。不過，誠如威廉斯在針對**區域**的文學用法研究中指出的，這個字詞裡有著「明顯張力」，「介於獨特的地區（distinct area）與明確的部分（definite part）之間」，如果是後者，那麼立即出現的問題是：是什麼的部分？以及在什麼程度上，部分會臣

屬於某種整體。**區域的** (regional)，連同**外鄉的** (provincial)，「相較於認定的中心，是相對次級的字詞。」因此，區域研究經常被認為沒有自由主義或寰宇主義理論等更普遍、因而更靠近中心的研究重要，即使沒有在知識上較低劣（因而將地理學科安置於譬如說比經濟學低劣的學術位置）。但是，**區域的**也「傳達了珍貴而獨特生活方式的意味」，因此使得「區域的獨特優點成為新的認同形式或自治程度的基礎」。區域的或在地的已被視為真實性與鮮活意義的所在。⁶這是 19 世紀法國區域地理學家白蘭士 (Vidal de la Blache) 採取的思考路線，他的想法影響了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家（例如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 有關地中海的研究，就屬於這個傳統）。這是所有對風土建築、區域傳統的力量，以及限於地方的集體記憶在奠定我們的世界感受上的角色感興趣的人，會採取的道路。白蘭士不認為區域是既定的，而是特定環境場景中，人類長期純熟的文化努力共生的實質成就。獨特的區域和地方是創造而致，並非既予。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使得羅西 (Aldo Rossi) 這樣的著名建築師，會以白蘭士當作他的都市化取向的奠基思想家。⁷

在地理學家之間，**區域**一詞作為研究對象，相較於更偏主觀且具現象學意味的**地方**，負載了一組不同的涵義。區域可以在經驗層次指認和描述，視為具空間獨特性的集體現象，包括經由人類社會行動而隨時間演變的生活方式。在許多人看來，區域地理學以**領域**為基礎，要求將全球各地遭遇到的不同生活模式加以分

類。這裡運用了康德式的區分，即一方是地理學，是作為自然一環的人類活動的「外部知識」（而且可以用類似林奈氏分類系統的方法來描述），另一方是人類學，是回應經驗的人類的「內在主體性」。地理學的主要爭論，曾經牽涉了區域是不是真實存在的實體，有待經驗探究來發現，或者，區域只是分類地理現象分化的便利方法。然而，康德有關客觀和主觀意義的區分，在掌握政治組織的時候，往往就站不住腳了。如果集體生活方式達致了某種結構連貫性，社會組織客觀的、物化的領域形式，就跟社區、身體政治或國族（後者包括康德有關國族特質的觀念）的情感性人類歸屬概念，彼此便有了連結。雖然區域、國家或國族在某個層次上好像只是想像的抽象體，但是領域牽絆的感受，以及對領域的效忠情感，都有深厚的政治意蘊。在這裡，區域、國家和國族的概念，便與領域與地方的概念匯流了，並要求我們稍微反思後面這些字詞的複雜歷史。⁸

例如，**領域**（territory）這個詞有著豐富而具說明性的歷史，闡明了同樣豐富的「地方」和「區域」概念的問題。當然，領域化行為向來被指認為是自然世界的特徵，靈長類和人類都不例外，在歷史和地理方面都展現出各種尺度上驚人的廣泛領域化行為。雖然這類行為經常是以競爭邏輯來解釋，它們卻顯示出強烈的合作成分：例如美洲知更鳥在標記領域邊界時，是通告其他知更鳥此處食物供應已有所屬，而且耗用掉一部分，所以沒有理由進入該領域。領域化行為的自然特質（已有生物學家和民族學者

的無數研究)導向了「領域必要性」(territorial imperative)的便利迷思，聲稱所有領域化行爲都只是自然推力的表現。⁹ 這個迷思很便利，因爲它自然化了人類領域化行爲的特殊形式，也就是歷史上起於17世紀歐洲的形式。現代國家形式的崛起，以及國家管轄權和主權的政治宣稱(以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爲典範)，結合了私有財產權之法律與行政系統的具體化，形同領域化行爲的一場行政與制度革命，也是領域化行爲的法典化，其基本要求是建立明確、固定且穩固的領域形式。這最終便要求訴諸絕對的空間和時間理論，並發明確認固定性且排除曖昧不明的再現實作(製圖和地籍調查)。此後，絕對國家理論的主導地位，以及相對和關係向度的遭貶抑淪爲輔助角色，就在西歐獲得了政治保證。後來，這種領域化行爲模式通過殖民化的作爲，而延伸到世界多數其餘地區。很顯然，這種特殊的領域化形式，或是其絕對空間與時間理論的支柱，一點也不自然：它是個社會建構和政治成就。譬如，建立凝聚的領域化國族認同的關係性感受，就是漫長、辛苦且總是容易碎裂的工作。誠如帕西(A. Paasi)舉芬蘭爲例來說明的，這要一整支由製圖學家、文化生產者、史學家和政治工作者組成的軍隊，耗費整個19世紀，才能打造芬蘭國族認同感。一旦這項任務完成，這在意識形態上總是有效果，可以憑藉牛頓或笛卡兒的領域概念，加上神話起源和血統系譜的時間故事，「自然化」國族感受。即使康德做了一切基礎的「調整」來理解空間和時間，這依然是他用以解說聯邦共和國寰宇主義世界秩序的絕對架

構，每個共和國各擁自己獨有的領域主權。

根據迪藍尼（David Delaney）的摘述，結果是領域變成「一項裝置，藉以簡化和釐清其他事物，像是政治權威、文化認同、個人自主或權利」；「爲了具備這種功效，領域本身必須被當成相對簡單明瞭的現象」——因此，必須仰仗絕對的空間和時間理論。其一般後果不僅是預設了有清楚劃分的領域實體（稱爲國家），可以行動、彼此建立關係、宣戰、協商條約等，而且這些實體在絕對空間和時間中具有某種「自然」且毫不含糊的存在，甚至這些實體之間的競爭和戰爭（相對於合作），也是完全自然，因而無可避免。迪藍尼又指出，一旦領域變得「物化且相對簡單而毫無疑問」，這種情況就會發生，它「代替我們做了大部分的思考，並且封閉或遮掩了〔關係性的〕權力和意義、意識形態和正當性、權威和義務的問題，以及經驗世界如何持續創造和再造的問題」。¹⁰就「國族」（nation）這個觀念連結上「國家」觀念而論，我們實際見證了凱西抱怨的，空間思考凌駕以地方爲基礎的經驗，這種情形已然逆轉。拿以色列爲例，一個關係性觀念（猶太復國主義）通過定居與掌握全球金融流動的領域化實作而具體化，以便在1948年的地表和世界地圖上，物質化及絕對化以色列國家。更一般地說，康德的寰宇主義視野在政治上輸給了國族主義，而他邁向聯邦共和國之間永久和平的願景，也退讓予自然化國家實體之間的地緣政治領域競爭。現在，許多人太晚才察覺到，這種思路落入了泰勒給予適當名稱的「領域陷阱」。¹¹

藉著假設國家領域性、主權和私有財產權是毫不含糊、明確無疑的，便能創造出一個虛構世界，並假定它不會因為譬如說相對時—空中的商品、貨幣與人員交換，以及資本積累的複雜空間動態而有所變動。它同樣也假定不會受到發生於關係時空中的，人類的非物質關係性（例如主權、忠誠，以及政治權威的投射）影響。這種固定的想像世界，成了政治決策的基礎。例如，一旦某個區域在政治上界定和物化，它就可以成為具有各種後果的國家經濟與社會政策的主體。一旦某個領域被界定為國家，它就可以被理解為積極的能動者，有時候產生了災難性後果（例如兩場世界大戰，大致上就設定於這種理論框架中）。

然而，資本積累時空動態的深入分析，顯示出一種截然不同的不均地理發展的地緣政治動態，這是 18 世紀以降，反覆的「空間修補」和持續的去領域化和再領域化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清楚地指認了固定和移動的這種張力，並將這個論點延伸到資本主義在相對時—空中的動態，因而有可能說明資本積累過程如何必然內化了獨特的「領域必要性」，創造出一種地景和領域結構，以便適應它在特定地方與時間的動態，卻在稍晚的某個地方和時間裡，將這些地景和領域結構破壞並完全取代。¹²隨後，在德勒茲與瓜塔里去領域化和再領域化（有鑑於歐盟的形構過程，這是個明顯的政治問題）之概念化的正式認可下，被賦予哲學上的尊貴地位，這種對於領域化實踐與行為之流動性、關係性和懸而未決的認知，穩定地替代了先前占主導地位

的，絕對空間和時間中固定而僵化的領域概念。¹³ 當前對於傳統國家理論的不滿，出現在包括國際關係、人類學、史學、寰宇主義及馬克思理論中，乃源於覺察到先前有關國家、主權和私有財產權的破壞性虛構，有必要轉變，才能建構一個更理智且安定的全球政治秩序。就本書使用的詞語來說，這意味了將領域概念整合到空間與時間研究取向的絕對、相對和關係性模式的辯證中。

事實上，「領域」作為一個概念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絕佳範例，說明絕對、相對和關係性空間與時間概念，如何通過物質性社會實踐（邊界和邊界建立）、再現（製圖實踐），以及生活意義（對於國族國家之領域單位的情感忠誠），以特定的方式辯證地整合起來。雖然以前強加絕對定義的主導作為可以受到質疑，經常十分急迫的清晰定義（例如國界）的政治需要，依然沒有消失；然而，它必須安置於資本主義或其他相對時—空生產方式的連續過程（通過金融及商品流動與遷移），以及全球政治權力與爭議性道德權威之普遍關係性的視角中。譬如，有趣的是注意到，目前美國政治上正在崛起的「美國堡壘」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心態，與長期以來通常致力在相對沒有邊界的世界中，鼓勵及促進資本積累的開放時空動態的國際政策，有著嚴重抵觸。這種日益尖銳的張力會如何解決，還有待觀察，但是這對於美國和全球政治經濟未來的影響，將十分深遠。國家權力繼續強調公民資格概念的絕對領域性，許多移民群體（如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則生活在關係性的世界中，而邊界對他們來說沒有情感意義，即使邊界是越

來越難以克服的物理障礙。

相對於領域，地方通常被界定為現象學經驗和探究的首要場域（課題被牽制於領域形構的絕對理論中，因而局限於衍生性特徵，例如對既存領域實體的忠誠）。誠如凱西可能會宣稱的，這種現象學基礎使得他的地方理論免於領域和區域觀念（無論它們本身有多麼重要）的污染。雖然領域和區域顯然都是情感忠誠的對象，但他可能會說，如果要予以適當理解，需要的是大不同於現象學的方法論取向。但是，地方、領域和區域之間的區分，比起凱西和其他置身海德格傳統的學者所願意容許的還要千瘡百孔。將這些概念視為互斥的根基很淺，它們之間有很多重疊之處。當我們檢視其他概念（如地景）時，這一點就格外鮮明了。例如，人類學家巴索（Keith Basso）在他針對西阿帕契人（Western Apache）的研究中，與凱西和海德格的思想同盟。他說明了何以「幾個世紀以來，地理特徵成為這個民族無可取代的記憶掛勾，掛起他們歷史的道德訓誨」。地景中地方的恆久性，結合了關於這些地方的故事，提供了延續文化認同的手段：「阿帕契人將地景視為精粹智慧的貯存所，是堅定但仁慈的傳統守護者，是個人和整個社群致力實踐一套獨特而專屬於自身的社會生活標準時，永不懈怠的盟友。在西阿帕契人替自己建構的世界中，地景特徵成為這種生活方式的象徵，也為這種生活而存在，那是文化的象徵，也是該民族恆久道德特質的象徵。」¹⁴

在這裡，於象徵層面上，我們遇到了地方經驗的社會與環境

176 面向，與對於領域化地景的心靈依附之間的辯證。阿帕契人在領域中棲居與建構的天地，投注了道德價值。阿帕契人以特殊方式來理解他們與物質世界的關係，投身於想像的道德行動，從而構成對自身的認識。在這種狀況下喪失土地（領域），形同自己的認同遭到剝奪。現代化、資本積累和空間整合的過程，深深破壞了這種文化認同的特殊領域化標記。「一如地方令出沒其間人們的想法和情感活了起來，這些想法和情感也活化了被賦予關注的地方，這個過程的運動——往內通往自我的面向，朝外觸及外在世界的面向，彼此交替又併行——無法預先得知。」自我知道什麼以及如何知道，是個社會事務：「無論是否深思熟慮，人們總是以經過文化中介〔關係性〕的、他們的寓居所在及方式的意象來相互呈現。或多或少，他們總是操持著複製和表現他們自己地方感的行動——以及與此分不開的，他們對於自己是誰及他們是什麼的理解。」因此，會有陌生人經常問的老問題：「你打哪兒來？」在這裡強烈迴響的，正是這種連結的無可分割性質。在創造地方（像是家）時，我們創造了自己，而隨著我們重塑自己，我們也不斷重塑我們所在的地方，包括物質面、概念面，以及我們生活其間的方式。這意味了地方不是、也無法是固著而穩定的，而是隨著概念、物質實踐和生活經驗的變化而不斷轉變。巴索在此提起的辯證，原則上可以和列斐伏爾的空間性研究取向相容，一如可以和海德格的觀點共存。但不幸地，巴索仰賴的是後者的理論指引。他很危險地瀕臨重蹈梅塔的觀點，即認為地域是

道德判斷得以立足的獨有地勢。因此，雖然巴索的描述取自觀察細膩的民族誌作品，很容易融入第七章鋪展的時空意義基底，他卻無法利用通過空間物質實踐、概念化，以及最重要的，明顯達成的道德價值和文化認同的鮮活感受，而彼此辯證糾纏的絕對、相對和關係性意義。誠如摩爾的觀察，巴索的地方感是「遭封鎖而脫離了塑造美國西南部地景的跨地域知識、經驗和多重空間性」。結果，地方被視為具有穩固的單一感受，而「文化成爲掏空了情境化鬥爭的共享意義系統」。¹⁶因此，巴索無法將列斐伏爾式的批判和爭議，納入他原本看來令人信服的陳述，造成了一連串嚴重問題。

177

地方的關係性

無論是個別或集體，地方的意義既是強大地呈現出來（絕對），又是不穩定的（關係性），取決於地方和人類能動者所處的脈絡。摩爾寫道，「文化實作、社會關係和政治經濟過程，跟環境的物質性融混一起，生產了地方。」「正如多重空間性在地方的某個片刻裡同時並存，地方經驗也跨越多重主體位置而有所分化。」小說家狄利羅（Don DeLillo）在他的書《名字》（*The Names*）裡提過一個有趣的例子，顯示了絕對和關係性意義的緊張。雖然身在雅典，但主述者一直避免參觀衛城。從遠處看，「陰沉的岩石」令人怯步。「那些切削石頭的重量和力道，預示著

觀看它們是件複雜的事情。那麼多東西匯聚在那裡。那是我們從瘋狂那裡搶救下來的東西。美、尊嚴、秩序、比例……如此清晰精確的潔白火焰。」但是，當他最後攀上了岩石，他大為驚訝。「我們催眠般地靠近，走在平滑的石頭上，完全沒看腳下。得用力扭轉，才能讓我們移轉目光……大理石宛如會滴下蜂蜜，氧化鐵在石頭上留下黯淡的衰老色調。」他對這個地方的感受大幅改變：「我走到神殿東面，空間廣大而開放，毀壞的牆、山形牆、屋頂，為所有的失落感到哀傷。我在上頭學到的事情主要是，帕德嫩神廟不是讓你研究的，而是要讓你感覺。它不是疏遠、理性、永恆、純粹的。我無法標定這個地方的沉著，即邏輯和穩定的感覺。它不是死去希臘的殘跡，而是底下鮮活城市的一部分。這真是令人訝異。我原本認為它是個孤立的東西，神聖的高地，在多利安柱式上紋風不動。我沒預期從石頭中會浮現人類情感，但我就是找到了，比體現在結構、光學精確性中的藝術與數學還要深刻。我發現了同情的懇求。這是襯著周圍藍色的石頭剩下的東西，這種公開的籲求，我們知道那是自己的聲音。」¹⁶

在這裡，客觀的衡量（康德在絕對空間與時間中的精確性）與關係性的時空意義碰撞，但碰觸是環繞著特定地方而發生。迪利羅接觸了我們在第七章見到的，威廉斯在黑山裡行走時，體驗到的那種廣大的共同流動。這是關係性時空在地方上（如列斐伏爾的說法）活歷（lived）的方式，而非物質層面的經驗和抽象的概念化。那麼，地方的特質裡有什麼內在的東西，能引領我們到這

種更廣泛的理解，如果有的話，那到底是什麼？

在有關地方的眾多文獻裡探索，不久就會遇到記憶與認同的關係性，迪塞陶（Michel de Certeau）寫道，「將歷史聯繫上地方，是任何社會分析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在《空間詩學》（*Poetics of Space*）裡，巴舍拉（G. Bachelard）是這麼說的：「所有真實棲居的空間，都承載了家園觀念的本質。〔在此〕記憶與想像依然彼此關聯，任何一方都發揮了相互深化的作用。在價值層面上，它們共同構成了記憶和影像的社群。因此，家屋不只是日復一日的經驗，也位居敘事的線索，或是存在於我們訴說自己故事的時候。通過夢，我們生活中的各種寓居地方，共同滲透且保存了往昔的珍藏。……家屋是整合人類思想、記憶和夢想的最宏偉力量之一。……沒了家屋，人只能四散流離。」¹⁷

但是，這種地方的意義，只侷限於作為家的房屋嗎？當我們隨著時間而在不同房屋之間搬遷，在每間房屋裡創造和找到不同類型的家，那會發生何事？這種思維模式可以延伸到「家鄉」或德國人所說的故鄉（*Heimat*）嗎？瑞茲（Edgar Reitz）這位拍了1984年名為《故鄉》的影片（稱得上是198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產物之一）的導演，指出這個詞「總是連繫了強烈的情感，最主要是追憶和憧憬」。墨利（D. Morley）和羅賓斯（K. Robbins）評論道，它「涉及了保存文化和認同的『根本』」，並且「維持了文化邊界和局限性」。¹⁸因此，這似乎只是指向侷限於地方的國族主義、區域主義和社群主義的排他政治，正因為環繞地方而建立的

記憶，無法輕易同外人分享。這裡的排他頗為麻煩；排他性國族主義和地方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聳然出現。但是，過往的記憶也涉及了未來的希望。戈登（Mary Gordon）說：「希望和記憶之間有所扣連。人若記不起任何事物，就無法期望任何事情。時間因而就是空無。」¹⁹ 因此，地方感的保存或建立，是從記憶通往希望、從過去到未來的積極環節。我們不禁懷疑，這就是為何有很多人將政治的可能性定位於真實地方的緣故。地方是集體記憶的位址，呈現了不同未來的展望。建築領域所稱的「批判的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經常喚起了風土傳統和地方圖像，被視為抵抗政治的基礎，對抗商品流動和貨幣化的均質化力量。我經常倡導的「戰鬥性特殊主義」（militant particularism），攫取地方的特質，重新活化環境和社會之間的在地接合，復甦集體記憶，並試圖讓建構時空的社會過程，轉向全然不同的普遍目的。巴舍拉說，「想像既讓我們脫離現實，也脫離過往：它面向的是未來。」想像的地方，無數人的烏托邦思想和慾望，因此在激活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²⁰

地方中的歷史和記憶彼此差異極大。²¹ 歷史通常會在絕對時間中建立穩固的敘事。「在歷史上闡述過往，並不意味承認『實際存在的』過往。」班雅明如是說。波意爾（C. Boyer）這麼解釋：「記憶與歷史相反，它反應的比紀錄的要多，它以無法預期的方式爆開了場面，要求更動既定的傳統。記憶只以片斷運作，是結合分離事件的藝術；它憑著驚奇、斷裂和倒轉的策略而成形，揭露

它的真實力量。」這種記憶不僅是巨大的撼動者。「從傳統的自然鏈結蹦出來的記憶，應該有如頓悟，於危機的瞬間迸發，搜尋以便在那個特殊時刻顯露世界之道，從而指引邁向未來的道路。」²² 未來時間是由在過去時間中建構的記憶來片斷地闡明。因此，主導的權勢費盡力氣要控制、收編、敗壞、展演、挫敗和管理關鍵事件（例如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的記憶，將它們轉換成爲歷史敘事，並且在絕對空間中予以紀念。巴迪烏指出，保持事件的感受鮮活，拯救它免於這種紀念化和納入標準歷史，對任何基進政治形式都很重要。如果像巴爾札克說的，「希望是有所慾望的記憶」，那麼引導記憶的就不是希望，而是受到慾望激活時會產生希望的自由漂浮記憶。雖然當下的慾望是積極能動者和催化劑，記憶和事件則是關鍵資源，而地方是「記憶和意義的定錨」。²³

神話、宗教、集體記憶，以及國族或區域認同的世界，聚焦於獨特的地方（神殿、祭拜場所、圖像、故事、節慶），象徵了獨有的信仰、價值、想像和社會—制度性實踐。這些都被動員而用於政治目標。許多傳統制度，像是教會和國族，都深刻取決於整個象徵地方網絡的存在，以便確保它們的權力，並表達其社會意義。巴索有關西阿帕契人的發現，其實是很常見的現象：我們經常預設智慧應該置身於特定地方（麥加、梵諦岡、聯邦儲備銀行）。但是，要預設這些智慧相對於特殊意義與文化認同，真的置身於這些地方，可能是推斷過度。畢竟，是什麼樣的智慧置身於關塔那摩灣、奧斯維茲（Auschwitz）、美萊（My Lai），或是古拉

格（Gulag）？再者，雖然特定意義和文化認同很可能導源於我們與這些地方的關係性，但它們不必然是我們會歡迎的那些意義和認同，更別說是將它們視為我們道德覺知的肖像了。巴索毫無警覺地假設，置身他的報導人敘說之處的正是智慧而非壓制，以及，來自地景的道德權威令人欣慰，而非束縛拘限。然而，海德格的陰影在此巍然聳立。因為海德格所提議的，實際上是一個視地方為寓居的本質性理論，而寓居是純正而真實之意義（因而是所有真實智慧）的獨特泉源。

舉例來說，這種海德格式推論，顯現於場所精神（*genius loci*）概念。每個地方據推測都擁有某種「本質」，或是一種「守護精神」，不僅賦予該地特殊品質，還會喚起承認且最終揭顯了這些本質特徵的人類行為。諾伯—舒茲（C. Norberg-Schulz）說，建築物、建築和都市設計的「存在意圖」，是要「揭露潛在地呈現於既定環境中的意義」。這並非意味著地方無法改變。「保護和保存場所精神，事實上意味著將其本質體現於日新月異的歷史脈絡中。」即使人類行動表達了對於地方獨特性質的尊重，也恆常地揭露了新的可能性與潛能。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說有一種**活躍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能將變遷關聯上一套立足於地方的特徵，而使變遷有了意義。²⁴自由在這裡並非理解為任意耍弄，而是地方固有特質與人類抱負及行動之間的創造性對話。在這種詮釋中，關係性的主題位居核心。建築物和地方匯集了社會、象徵、心理、生物和物理意義，以便建構場所精神。這麼一來，它們就創造出一種

特殊的關係性認同，我們則從中汲取意義與自我的定義。

這種論證方式無疑具有危險，且不僅因為這條路太容易通往某種排外的、以地方為根據的法西斯主義。反而，危險出自於它並非總是如此，而這正是亟需批判性介入的難題。首先，場所精神概念很含糊，如果像羅西（Aldo Rossi）所堅稱的，我們的建築環境史「總是統治階級建築的歷史」，而且，如果「紀念物」（都市脈絡中，記憶與認同的關鍵元素）是通過各種（不必然是統治階級的）活動而於象徵上構成的，那麼諾伯一舒茲必然要賦予地方概念的意義流動性，可以採取更具建構論的傾向，意味了從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立場來探索可能性。比如說，誰的認同，以及哪一種階級、信仰或性別的集體，主導了地方建構的特殊實踐？再者，如果集體記憶坐落於地方，而這種集體記憶對於某些壓迫性社會秩序（或某種被寄予厚望的未來另類出路的視覺化）的延續事關重大，那麼，所有場所精神的本質論設想就會消失，而被競爭性定義的爭議場域取代。

這正是羅卡奇（A. Loukaki）在她有關衛城隨時間變化的競爭性處遇和視野的研究中，所採取的推論。²⁵ 建築師、考古學家及藝術史家之間，有關如何理解此處場所精神的論述爭議，在橫貫希臘歷史的政治權力鬥爭面前，相形遜色。羅卡奇說明了，這種爭論不僅涉及了對過往的合宜詮釋，某種集體記憶的真實性，還牽涉了一切期許未來的希望。釋放出有關過往的不同想像，就是釋放對於未來可能性的不同想像。場所精神，亦即任何地方的鮮明

特質，無法免於爭議，無論是在理論上（涉及其意義），或是在實質上（涉及如何建立一個特殊地方）。缺乏積極的政治爭論，通常是某些霸權力量支配的跡象。令衛城所在地如此有趣的，不僅是基於階級、國族情感，以及地域的競爭性宣稱，還有外來力量（像是德國、英國和美國）的競爭性宣稱。每個力量都試圖爲了自己的特殊目的，挪用衛城作爲西方文明起源的象徵，而非尊重它是鑲嵌於希臘地緣政治與政治經濟鬥爭史中，一個活生生的紀念物。衛城同時「屬於」截然不同的想像共同體。而它「真正」屬於誰的問題，也沒有簡單明瞭的理論答案：這須通過政治爭論和鬥爭來決定，因而是個不穩定的決定。誠如狄利羅的說法，一個看似死寂的紀念物，因意義而生氣蓬勃。

海德格時刻

在这一切背後，大抵是矗立著海德格的偉岸身影。我們不能不討論他的思想，因爲那是眾多反寰宇主義思想的根源。海德格（呼應亞里斯多德）說，「地方是存有之真理的所在。」但是，這個所在不會外在於一個特定的空間關係世界：「所有時間和空間中的距離都在縮減。……但是，一切距離的狂亂廢除，卻不會帶來鄰近；因爲鄰近並不在於距離的短淺。某些由於電影中的影像，或收音機中的聲音，因而至少就距離而言，十分靠近我們的事物，依然離我們很遠。而就距離而論，離我們難以計算地遙遠

的事物，卻可能很靠近我們。……每件事物都混同為均質的無距離性。……鬆動一切，因而令人恐懼的是什麼？它顯露自身和掩藏自身的方式，猶如每件事物的現身方式，亦即，事實是即使完全征服了距離，事物依然缺乏鄰近性。」²⁶

海德格擔心失去認同，失去與真實感官世界的接觸，這是因為社會生活的時空座標，在市場關係和理性計算盛行下變得不穩定。他指控，「技術支配的客體特質，越來越快地在世上蔓延，無情而徹底。」結果，「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溶解成為工於計算的市場價值，這個市場不僅橫越全球而形成世界市場，猶如有所意欲的意志，交易著存有（Being）的本質，令一切存有著臣服於計算的生意，並且在不需要數字的地方，計算的主導力量最為堅強。」²⁷海德格抨擊自由資本主義的物質力量及商業的環宇主義精神，也正是在抨擊亞當斯密和康德視為進步而歡迎的過程。對海德格而言，世界市場的形成，以及後續時空關係劇烈而快速的轉變，所造成的恐怖驚駭，可謂無所不在。物理上的接近不再能夠帶來理解，或是欣賞、甚至合宜地挪用一件「物」（並藉此關聯上另一個人）的能力。因此，海德格抵制世界市場，試圖以現象學方式揭露地方中的人類存在真理。他訴諸的概念是「寓居」（dwelling）。他對此概念的最著名闡述，是描寫一棟黑森林農舍：

183

在這裡，安排屋舍的是讓天與地、神與人，融入物之渾然一體狀態的自足力量。它將農場設立在避風的南向

坡，置身鄰近水源的草地。它令農舍的木瓦屋頂寬大低矮，坡度合宜，能承受積雪，又往下深探，替屋舍抵擋漫長冬夜的風暴。它也沒忘記共同餐桌後頭的祭壇角落；它在房間裡騰出位置，安放兒童床和「死者之樹」——當地人稱呼棺材的說法；死人樹（Totenbaum）——如此一來，它就替同一個屋簷下的不同世代，設計了人生旅途的特徵。這是源於寓居的技藝，依然將工具和框架當成物，建立了這棟農舍。²⁸

寓居是達致人與物之間精神統一（例如，和場所精神協調一體）的能力。順此，「唯有我們能寓居，才能建築。」實際上，商業營造的建築物，「甚至可能在其本性中否定了寓居，因為對它們的追求和獲取，都純然局限於其自身尺度。」雖然就狹義的無家可歸而論，或許可以通過建造庇護所來緩和，但現代世界卻有更深刻的無家可歸危機；許多人失去了他們的根，他們與家園的連結。即使是那些實質上駐留一地的人，也可能因為現代通訊手段，像是收音機和電視的侵入而變得無家可歸（無根）。「人的根植、原生狀態，今日打從核心受到了威脅。」海德格主張，如果我們失去了寓居的能力，便喪失了自己的根柢，也脫離了一切精神滋養的泉源。存在的困窮難以計量。海德格相信，真正的藝術作品唯有根植於當地土壤才能繁茂滋長。「我們是植物——無論我們是否樂意承認這一點——必須將根柢扎入大地，以便在大

氣中開花以及結果。」沒了這樣的根柢，藝術就會淪為毫無意義的拙劣模仿（現代主義的國際主義正是這麼回事）。普遍的道德判斷，除非同樣有所根植，否則也是空洞而不真誠的。這也是梅塔呼應的觀點，他指出了人類如何「繼承了眾多的癖性，源自受時間與地方變異拘限的深不可測過往」，並且注意到這界定了「完善和自我理解，單憑這種完善和自我理解，就能夠體驗到豐厚的生命——事實上，單憑此，道德行動便成為可能。」²⁹

根據這種視角，地方建構必須涉及根柢的回復，以及寓居藝術的恢復。深不可測過往的神話，在此成為海德格理論的疑問之鑰。他專注於地方如何「在我們的記憶和情感中，通過反覆的遭遇和複雜的關聯而建構」。他強調「地方經驗必然隨著時間而深化，並且受到記憶的修飾」。他創造了「一種談論和關照人類本性與環境」的新方法，因而「對於地方和大地的關愛，除非一切技術和物質問題都解決了，否則幾乎談不上是多愁善感的耽溺。它們是在世存有的一部分，因此先存於一切技術性事務」。³⁰ 海德格逆轉了康德的事物架構下，傳統上賦予空間凌越地方的優先性。空間「從區位、而非從空間，接受了它們的存在」，或者，依照凱西的說法，「空間和時間包容於地方之中，而非地方含納於時空中。」³¹ 因此，空間的積極生產和塑造是通過建造和寓居而發生。列斐伏爾在建立他的空間生產理論時，從海德格那裡獲得的啟發，於是變得清晰了。然而，列斐伏爾將海德格式的「寓居」概念，轉變成為「棲居」(habiting)，以便讓它脫離神話和形上學的

預設。他也將海德格對於距離狂暴縮減的恐懼，轉變為針對他所稱的資本主義與國家之「抽象空間」的建設性批判，並且將階級元素導入了另類空間生產的對抗性政治。³² 在海德格那邊，是退縮到地方的現象學，到了列斐伏爾這邊，則激起了反擊精神，以便生產另類的、更具人性的空間與地方。列斐伏爾採取了空間和地方的關係性理論，但賦予它更鮮明的政治意義。

但是，海德格也悲嘆失去了與自然之間親密而真誠的關係。這激發了一種以地方為根據的環境主義政治傳統。海德格派這麼說，「藉由恢復地方感，我們或許可以激活對於環境的關愛。」一種「重新甦醒的對於在地之美的感受，或許能燃起深刻的精神關切，保存每處地方的生態多樣性和獨特性」。這種信念不僅見於神學文獻。它也強烈顯現於生物區域論者、社群主義者，以及無政府社會主義者的生態政治中。因此，地方是多數環境主義政治偏愛的領地。³³ 某些對抗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最激烈運動，便起源於保存特定地方的有價值環境特質（不僅是自然環境，還有營造環境）的鬥爭。

然而，這些論證有其困境。海德格的處方既抽象又模糊，可謂惡名昭彰。例如，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現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世界裡，「本真的寓居」（authentic dwelling）的條件會是什麼？我們無法回歸黑森林的農舍（海德格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但除此之外，我們還能追尋什麼？對於某種想像過往的懷舊，不是萬靈丹。地方（及地方中的自然）經驗的本真性（根植性）議題，是

一種專屬於現代的關注。段義孚指出，「真正根植的社群，可能擁有神殿和紀念碑，但是不太可能會有保存過往的博物館和協會。」³⁴刻意努力喚起地方與過往的「本真」感受，是當前時代的關切。它甚至會成爲開發商和社區振興支持者的賣點，是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壟斷租金來源，他們允諾塑造本真的社區，以及同自然的和諧關係。海德格自己的論據，似乎立足於反對商品化、現代化、全球化，以及時空壓縮的世界（雖然有些人相信，這些論據明顯旨在批判主要深受美國啓發的，1945年以後的西德現代主義重建）。他沒有提供例證，說明在我們當代的實際存在狀況下，本真性的寓居到底是什麼意思，因而埋藏了一項嚴重危險。結果，對於本真性的追尋，本身就是一項現代價值，還等著被建構的本真性、發明的傳統，以及商業化襲產文化的市場供應所逆轉顛覆。這是華茲渥斯浪漫主義的最終命運，他從在他摯愛的湖區寫詩，浪漫化對於自然的親近，轉變爲替該地撰寫商業性旅遊導覽。³⁵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最終勝利，並不是非現代世界的消失，而是其人工保存與重建，既呈現於海德格派理論，也出現在實際的文化實踐。

但是，問題比這一點還要深遠。例如，誰是這些伴隨天、地和神靈，融入「物的渾然一體」的「人」？海德格的類存在（他從來沒用過這個詞）概念，嚴格限制適用於人，其存在僅僅在於尋找本真性和個人自我實現，辦法是學習同天、地、神靈和諧寓居。在這種追尋中，文化變異（連同所有語言和藝術）不是輸入

項，而是輸出項。閱讀一部具有海德格氣質的著作，所遇見的世界，沒有預先的階級區分，沒有社會權力的層級結構，沒有複雜的身體政治和社會制度，而且，當然沒有市場評價和統合，沒有軍事—工業技術，也肯定沒有通過不均地理發展的資本積累動態。實際存在的物質論歷史和地理，包括曾經遭受數千年人類行動劇烈改變（若不說毀壞的話）的大地，在虛構的海德格宇宙中被沖刷掉了，這個宇宙脫離了日常生活的實際狀態，藉以批判我們目前在社會、文化和自然關係方面的處境。海德格主義運用了毫無疑問的人類能力，即在特定地方和特定時間，覺察和諧、和平、精神寧靜（若談不上極致喜樂的話）的時刻，以及同他們生活所在地方發展出深刻依附的能力，但是它接著假設，這就是與人們生活有關的一切。當然，問題在於如果市場系統，連同貨幣估價、當代技術（組織及物質論層次），以及資本積累，明天全部消失，假使全世界的銀行家突然都致力於海德格的計劃，那麼能夠閱讀這本書的多數人，以及此外的許多人，就會在幾個星期內餓死。海德格的「人」概念，每一分一毫都同自由主義主體一般抽象又無根，只是擁有截然不同的野心：不是要通過財產、財富和權力的積累來達成自我實現，而是要通過學習如何寓居來自我實現。

生態情感與地方之間假定存在的連結，同樣值得予以批判細察。認定地方是生態感受性的佔優勢（若非唯一）地點的傾向，依託於人類身體以毫無中介而直接的方式，成為「萬物的尺度」。

身體及其環境之間的感官互動，肯定會帶有廣泛的心理覺察，以及社會洞察與意義。但是，許多以地方為根據的陳述，其親密特質——梭羅著名且影響深遠的華爾騰湖（Walden）探索，是經典案例——只產出了涉及在小尺度運作之生態過程的有限知識。這不足以掌握更廣闊的社會—生態過程（全球暖化或臭氧層破洞，無法直接通過現象學手段來偵知）。就「同自然疏離」被設想（而且，這種設想跟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為當代社會的普遍現象而論，那麼，有個誘惑就是將特定地方（譬如，逐漸將其保留作為荒野）當成能同自然發生假設為非疏離的、直接感官互動的所在（生態旅遊就是利用這一點）。結果就是將自然和人體、自我和人類感官的領域都物神化了，成為特殊的地方，成為一切在世存有的所在。雖然有辦法將這種看法轉化為全球與普遍的立場，像是奈斯（Arne Naess）提議的「深層生態學」作法，但從個人經驗到同情自然整體，這僅憑信心的一躍，可真是巨大。但是，這正是許多深層生態學者和環境倫理學者的信心跳躍，還經常被重述為一種頓悟。不過，有很堅實的理由，來懷疑這種甚至19世紀無政府地理學者雷克呂（Elisée Reclus）也採取的全知觀點：「人類即對自身有所覺察的自然」，而我們——並且唯有我們——可以通過聰慧的干預，了解自然計畫的深刻和諧。³⁶

海德格宣稱（請注意，這是一種宣稱，而非經過證明的生命事實），寓居和根植的本真性，正遭受技術、國族主義、大量生產和大眾價值的流傳所破壞，這對那些關切針對資本主義底下的地

方提出批判性認識的人，影響十分深遠。例如，瑞爾夫（Ted Relph）¹¹認為，地方正遭逢系統性的破壞，由於市場與資本的組織力量和深入穿透，而變得不真實，甚至變得「無地方」（placeless）。不幸地，這條思考路線無法避免淪為蔓延的菁英主義。據說，某些人可以宣稱本真性的地位，僅僅因為他們有能力寓居於真實地方，至於我們其他人——大多數——則在一個「無地方」的世界中，過著空虛而無靈魂的生活。當然，這種菁英主義的標誌，在於它與資本主義或甚至傳統意義下的階級，毫無必然關係，而且甚至能以反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及市場估價作為其政治立場。本真性的美德經常是賦予那些過著接近土地的簡樸生活，能吸收那些根據巴索的說法，假定坐落於地方的智慧的人。這裡的回應是一種地方建構的政治，然後堅持其為邁向本真經驗的樂土，以及與自然和他人的非異化關係的道路。塞爾（Kirkpatrick Sale）寫道，「能提出任何救贖希望的唯一政治願景，奠基於對地方的認識、根植、深切承諾，以及再神聖化。」肯斯勒（R. Kunstler）在他廣為流傳的《烏有之鄉地理學》（*Geography of Nowhere*），同樣嚴厲譴責資本主義開發商和他們輕易受騙的顧客，竟允許一種擁抱粗糙的購物中心，以及缺乏靈魂、缺少面孔，因而「無地方」的郊區居民文化的都市化過程。³⁷

[譯註]

¹¹ Ted 是 Edward 的簡稱。

但不幸地，肯斯勒除了拿開發商建築師（像是杜安尼〔Duany〕）宣揚的「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及其同樣虛假的「生活社區」概念，以及人造的「親近自然」（景觀化設計）作為解毒劑外，並未進一步尋求替代出路。充盈豐富的地方，成了建立一樁有利可圖的事業。

但是，在海德格提供的洞識中，還是有些正面而進步的東西，特別是批判既有秩序的立場。許多援引海德格觀點的後繼作家——包括列斐伏爾——取用的是抵抗的可能性，直接拒絕且積極對抗任何單純的資本主義式、以市場為基礎（或現代主義）的地方和空間建構邏輯。技術理性、商品化與市場價值，以及資本積累逐漸穿透社會生活，加上時空壓縮，激起了抵抗。許多基進運動和生態運動中，對於某種「本真的」社區感，以及與自然的非異化關係的追尋，正是抵抗的尖端。艾斯科巴主張，地方不僅是抵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所在，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地方是可以積極尋找和建立初步替選出路的位址。這是追尋真實的自由領域之旅的起始點。³⁸ 列斐伏爾和艾斯科巴的關鍵差別在於，前者以空間的生產角度來概念化這個問題，後者則是從生產出生活於地方的新方式來理解問題。我們將見到，這裡的差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蘊。

開放與封閉的地方

堅持地方優先於空間的當代作家，通常都宣告他們不會將地方推斷為排他性、文化上同質的「封閉箱子」（這是艾比亞的說法）。我們不禁懷疑，他們如此自我定位，是因為他們很清楚排他性國族主義和地域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因此，他們所設想的地方乃描繪為開放而多樣的。凱西宣稱，地方必須是對外界可以滲透的，而且對內部而言，必須是多樣到「狂野」的地步。然而，為何它們必須如此（相對於為何我們或許得通過鬥爭來讓地方是如此），則未言明。凱西說，地方必須理解為「既是具體的，又是關係性的」。³⁹但是，這也提出了難題：相關於什麼？實際上，他在這裡藉由召喚關係性的地方觀念（接近列斐伏爾的辯證的異質地方概念），脫離絕對空間中的封閉箱子邏輯（傅柯的異質地方）。這算不上是陌生的謀略。近年來，多數有關地方的思考都充斥著這種招數。例如，瑪西（D. Massey）正確質疑了本質論的海德格觀念，即地方可以從內在歷史、恆久認同或固定邊界來界定的觀念。她寫道，「地方的認同總是不固定、有爭議而多重的，根據這些角度，任何地方特殊性的建構，都不是在地方的周圍設置邊界，並相對於邊界以外的他者來界定其認同，反而是（部分地）通過『以外』的一組連結與相互關聯的具體特性來建構。以這種觀點來看待的地方，是開放而多孔的。」她說，如果地方有任何獨特性，那麼它總是混雜的，源自「社會關係的特殊混合」。⁴⁰

這種構想嚴重犧牲了「地方」概念最初設計來掌握的東西——地表某些部分的獨特性質和特徵，以及人類活動匯合形成某種具獨特結構的連貫體。德利克（A. Dirlik）頗富同情地回顧了有關開放性和多孔性的過剩論證，最終歸結到地方也必須理解為具體且有界的觀念，因為單純的關係性構想變得太「模糊」。他寫道，瑪西「太熱情地」要「令地方脫離固定位置」。「邊界的多孔性不等於廢除邊界。」如果每件事物都完全開放，那麼「地方就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了」。德利克在這裡辨認出一個根本問題。他主張，雖然依慣例會將地方與空間推斷為彼此相反但相關的術語，但是地方的轉變「如果沒有空間的同步轉變，則可能難以設想，因為地方與空間雖然在分析上可以區別，但依然以緊密的方式彼此扣連」。⁴¹

但是，它們如何扣連呢？我們一開始就遇到的問題，乃是我們若不理解空間，就無法理解地方（或區域、領域）概念。凱西的康德式絕對且虛空的空間概念，支持了他特殊的地方理論，他也正試圖藉由逆轉方向，來打破這個有限的概念。「地方不是絕對空間和時間的奴僕，反而是它們共享之矩陣的主宰。」他如此寫道。⁴²但是，我們在第七章已經見到，如果沒有喚起凱西所提議的，關於地方「既是具體的，又是關係性的」想法，也不可能對關係性時空有充分的認識。這就帶領我們抵達了存有論問題的關鍵。我們改變我們的空間和時間概念，理解地方的方式也會隨之改變。懷海德直接採取了關係性的時空理論，針對地方的關係性

理論的可能樣貌，提出了最令人滿意的解答。他將「地方」解釋為在其劃界及其內部過程秩序化中，達到相對穩定度的「實體」。他稱呼這種實體為「恆存」(permanences)。這些恆存以一種排他的方式(暫時)佔有了一處空間，因而在一段時間內，界定了一個地方——它們的地方。因此，地方形構的過程(包括劃界和內部秩序化)，是從同時也創造出獨特時空性(spatio-temporality)的諸過程之流中，切割出「恆存」的過程。⁴³金融之流界定了新的時空性，但也仰賴在華爾街、芝加哥或倫敦西堤區等地方，建立獨特的實體市場。這些獨特地方以排他性為標誌：例如，只有某些人能夠進入證券交易所的大廳。要「切割出」獨特的地方，就必須有劃界、建造排他標記(像是圍籬和牆壁)的活動，並且建立空間關係的內部秩序化，但也涉及了通過橋梁與門戶，讓地方與更廣大的世界產生關係，建立通訊連繫，投射出聲望的意象等等。邊界和界線，一如聲望，並非既定，而是要塑造。但是「恆存」——無論看起來多麼堅實——並非永恆不朽。它們總是臣服於時間，處於「持續不歇的毀壞」(懷海德的用語)。簡言之，地方總是取決於創造、維持和解離它們的關係性過程。地方中「多重空間性」的共存，破壞了任何簡單、統一的地方意義。即使如此，最終的重點還是必須放在有邊界的實體或「恆存」，一個特殊地方所需要的獨特形狀、形式和內部秩序化，它所顯示的屬性與獨特性質，以及這對於在恆存內部及周遭支持和演變著生活的社會—生態過程造成的後果。雖然摩爾正確地堅持，「在一個地

方，社會行動者屈服於多重的權力矩陣」，而且地方的性質永遠有所爭議，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存在霸權性的關係組態，讓我們藉以經驗和界定我們遇到的地方。基於這種精神，凱茲（Cindi Katz）提議建立「對抗地誌」（countertopographies），提供一種「理論化極度不同地方之間連結性的多面向方法，這些地方由於歷史與地理而人為地分離開來，但是也在它們經驗到的共同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過程中，以不同方式複製自己」。她宣稱，以這種方式來解說空間和地方之間的關係，讓我們得以「在地方中，以及跨越地方」來分析特定議題，同時，它也能啟發創造「一種不同的政治，在其中，跨越空間和『跳躍尺度』成爲義務，而非遭受忽視」。⁴⁴

再者，地方形構在時空性的生產方面，並非中立的。城市在貿易的流動（相對時空）中凝結成爲「恆存」（具有內在秩序化的恆存），但是它們接著成爲創新活動和新全球想像（關係性）的焦點，這些活動和想像改變了時空形式，以及在它們周邊進展的社會—生態動態。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起初是以呂貝克（Lubeck）爲核心，成長爲超過一百個崛起中城市（每個都有邊界，以及某種的內在秩序化）的貿易網絡。同盟的活動於14至15世紀，替諾夫哥羅德（Novgorod）到倫敦的政治經濟生活，創造出新的時空性。我們這個時代的金融資本在都市之間流動的變動全球網絡，由新資訊技術所推動，受到紐約、芝加哥、倫敦和法蘭克福等獨特地方的新型態市場（奠基於包括證券化、信用及貨

幣衍生性商品的金融創新) 驅動, 鬆動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舊時空性, 並且在全世界創造出新的都市化動力(上海、孟買和雪梨)。簡言之, 空間的生產既伴隨著地方的生產而前進, 也藉由地方生產而推行。地方之間的競爭, 繼而產生了新的時空性。⁴⁵ 揭露這種空間—地方連結的辯證特質, 十分重要。

我們可以回溯空間和時間概念的矩陣(參見圖 7-1) 來將以上論點系統化。地方顯然具有列斐伏爾所描述的物質、概念和生活的向度。它們同樣可以設想為絕對的(有邊界、固定且命名的)、相對的(相互連結、經由眾多流動而互動), 以及關係性的(將來自其他地方的力量、權力、影響和意義予以內在化)。如果我們問: 稱為「巴黎」的地方是什麼? 那麼, 答案應該會隨著我們置身於可能性矩陣的不同向度的何處而定。巴黎的純粹物質性, 會在工作、再生產、休閒和尋歡作樂的絕對空間中有所體驗。這些絕對空間可以用無數種方式再現(主要是通過製圖學, 但不全然如此), 而且可以保存這類概念(過去與現在)的檔案。我們以各種不同心理狀態(愉悅、恐懼、厭倦)棲居於這些絕對空間。這可能會引發再概念化——像是詩歌和文學——也許接著是新的建築倡議(首先構想為製圖計畫), 以更適合我們的需求、需要和慾望的方式, 來重建城市的絕對物理空間。在將城市標明為絕對笛卡兒空間時, 我們固定了它的行政製圖形式, 並且建立了內在秩序化的原則。它的絕對性可以在物理上由壁壘、邊界和城牆標示出來, 而其內在秩序化可能反映了階級、族裔和種族區分, 以及

分工導致的分化。

作為位居相對時空的實體，巴黎具有了某種「恆存」的特質，是一個向全球的貨物與服務、人群、商品、貨幣、資訊、文化價值，以及移動資本的全球流動漩渦開放的、不斷演變的容器。城市居民通過位於特定區位的物理、物質實踐和遭遇，來同這些流動交手，這些區位本身也「持續變動」（例如受到都市更新的威脅）。這些關係可以用圖表和圖解，用輸入與輸出資料，用像是「城市的新陳代謝」等概念來概念化。我們想方設法，來將城市再現為速度、奇觀、移動和運動。我們生活在雀躍或枯竭、屈服或抵抗的狀態，視情況而定，我們也在城市內部或外面到處奔忙。在奇幻的藝術作品中，將巴黎再概念化成為移動的城市，可能導致嘗試提煉建築計畫，以便重建城市的恆存，使其能夠同時反映和激活各種流動（這是哈蒂〔Zaha Hadid〕試圖生產、但總是失敗的那種建築，因為她是以絕對空間角度來體現作品）。

最後，巴黎的關係性唯有通過主導的過程及效果的物質性，方能體驗。這些過程不僅是物質性的。例如，當我們走在街上，可以認知到都市奇觀、巴黎聲望之象徵的重要性（艾菲爾鐵塔、聖母院和其他形象化場址，或是棄置於不滿郊區的焚毀汽車殘骸）。關係性是以名聲的召喚性語言來概念化，這種語言投射到了整個世界（召喚追求藝術自主或政治自由的人，吸引尋求文化與浪漫的觀光客，驅退那些驚駭於巴黎的壓迫殖民史，以及持續鮮明展現的種族歧視的人）。巴黎被投射成為「光之城」，是「春日

的浪漫」，但也是革命過剩的城市，是死囚運送車和斷頭台的城市，也是移民不滿和種族歧視壓迫之城。巴黎可以體驗為記憶，對於一位身陷巴格達轟炸的伊拉克醫生，產生強烈的愉悅或痛苦感受。它可以被幻想，視為慾望或厭惡的對象，無論置身近旁或遠處，卻不必親歷其境。它可以通過藝術或文化形式來再概念化（猶如馬內〔Manet〕的畫作，或狄更斯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由於同這些概念化的遭遇，我們沿著街道行走、夢想都市烏托邦的新奇想時，認出了新的形象化場址。我們甚至可以嘗試運用這些幻想，重建巴黎的絕對空間，使其更加迎合我們的慾望，柯比意就曾打算這麼做。

幾乎每個嘗試理論化地方的人，都是從時空可能性矩陣的某一點出發，但當他們試圖拆解這個觀念的豐富複雜度時，就轉移到了他處。凱西一開始接受了絕對的康德式空間和時間定義，最後卻將關係性引介到他的地方概念中，以便令其更具動態。假使他一開始是從關係性的時空概念出發，他或許會創造出一個類似懷海德理論的非亞里斯多德式地方理論。反之，他必須將地方從絕對空間性中解放出來，宣稱地方對外界是多孔而可以滲透的，內在則十分狂野！諾伯一舒茲是從看似固定且本質論的場所精神定義出發，隨後將它從凝滯和恆存中釋放出來，辦法是實際上追隨羅西的觀念，承認甚至神話也能隨著時間而改變意義和影響力。海德格雖然「頑固地堅持在地」（威廉斯的說法），但也了解地方和事物（像是橋樑）創造了空間，而且地方會通過建立於時

空中的關係性而獲取特徵。雖然海德格駁斥了商業、通訊技術和現代性帶來的更廣大的共同流動，但是他也訴諸神話和宗教世界，喚起了對於這種更廣大共同流動的感受，而康德則曾試圖令地方從神話與宗教中解放出來。德利克表明了對於瑪西相對和關係性構想的某種同情，但溫和地提醒她，不能忽視絕對向度的獨特性。傅柯不斷地陷入他的康德主義絕對空間，幻想了一種關係性的、逃避主義的自主和自由願景，來探索監獄牆壁背後，或海盜船上的差異與不受羈束的他者性。德勒茲通過精神分裂人格這個形象來脫離康德的歷史性，並且通過萊布尼茲的皺褶（the fold）的關係性觀念，來脫離絕對空間，但依然將他有關去領域化和再領域化（可以理解為地方形構的過程）的關鍵哲學沉思，奠基於孤立且絕對主義的荒島隱喻上。⁴⁶ 看來，似乎沒人能夠只占有時空性矩陣的一個位置。從某一點出發的每個人，都會發現自己無可避免地被捲入橫越互補之各種時空性領地的辯證之舞。根據這個立場，那些和亞里斯多德一樣，聲明有某種本質論的地方理論（「地方是一切事物的原初」）的人，或者，和海德格一樣，主張「地方是存有之真理的所在」（但並非流變之所在！）的人，完全錯了。唯一有道理的地方概念，乃是視地方為偶然、動態且具影響力的「恆存」，但同時被整合進入創造、維持及拆解一切區域、地方與時空，使其成為複雜組態的過程。

地方的政治

許多身處另類全球化運動中的人士鍾愛的論題是：地方不僅是存有真理之所在，也是面對普遍化而抽象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掠奪與破壞力量，形成對抗意識和組織的關鍵場所；相對於這種論題，以上的分析令我們置身何處呢？回答這個問題的基礎工作，已鋪陳在第七章，我在那裡贊成柯恩的話，並加以引述：「政治空間創造出一個可以發展新認同與實作的獨特地方，從而促進了變遷。地方的政治力量，來自人民力量連結空間的社會、象徵及經驗向度的能力」，從而促成轉型政治。⁴⁷但是，從列斐伏爾那裡，我們也獲得了有益的提醒，即失範團體所建構的異質空間，可能會在某個時點上，「被主導性的實踐改造」，而空間和地方的生產，在每個時刻都會受到不確定的社會鬥爭動態穿透，其結果取決於社會群體之間變化不定的權力關係之流。在這個社會鬥爭的汽鍋中，我們也必須加入一項充滿張力的事實，即對於政治替選出路的大部分展望，不是奠基於一種有待建構的、完美和諧地方的不同烏托邦願景，就是立足於某種版本的、以地方為根據的社群主義理論與實踐，作為追尋美好生活的合宜適切解答。

因此，要討論地方的政治，就要進入一個爭論的場域，那裡充滿了錯誤概念，而且經常是以錯誤概念為其標記。舉例來說，據說我認為勞工階級運動必然會侷限於地方，而且我對於以地方為基礎的政治懷有敵意，因為它無可避免會成為排外且反動的。⁴⁸

我實際上說的是，勞工階級和群眾運動有成功主宰地方的長遠歷史，但是遭受似乎更善於主宰空間的資產階級力量擊敗。這正是發生於1848與1871年的巴黎、1918年的西雅圖，以及1968年的圖庫曼（Tucumán）的事情，我們近年來也見到了智利和尼加拉瓜的革命運動（名單可以一直延續下去），都是以這種方式失敗。當然，解答在於勞工階級和群眾運動，必須更關注地緣政治和普遍的策略（像是第一國際的做法，以及世界社會論壇當前作為中的某些要素）。如果他們不這麼做，就會更容易遭受來自外界的壓迫傷害。國際勞工運動目前不是金融資本的國際勢力對手。這種不對稱並非無可避免，但是進步的運動必須直接對付這個問題。我曾主張，地方總是進步和解放運動的關鍵基礎。例如，在《希望的空間》（*Spaces of Hope*）中，我認為地方是一個關鍵中介因素，置身於從個人即政治的基本運動，到位於特定地方的地域團結組織，再到權利與正義的更普遍政治的轉變中。⁴⁹ 這個模型類似斯多葛學派的提議，也類似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模型。努斯鮑姆如此描述斯多葛派的立場：「他們建議我們不要將自己想成缺乏在地關聯，而是要設想為受到一連串同心圓包圍。第一個圓圈包含了自我，下一個包含了直系家庭，接下來是擴大家族，然後，依序是鄰居或地方團體、同一座城市的居民，以及本國同胞。……在這所有圓圈之外，有個最大圓圈是全人類。我們身為世界公民的任務，將會是『把同心圓往中央拉近一點』，……讓全體人類比較像是與我們同住一座城市的市民……」

「〔而我們〕賦予界定我們人性的圓圈特別的關注與尊敬。」⁵⁰

196

努斯鮑姆說，所有圓圈都必須給予適當的尊重。馬克思和恩格斯提議的模型（可能援引了斯多葛學派，因為伊比鳩魯〔Epicurus〕是馬克思博士論文的焦點），始於異化的個別勞工，穿越集體凝聚的形成，先是在工廠，然後是在城市區域，接著，轉變尺度到對國族國家權力的追求，最後止於呼籲全世界的工人圍繞著共同人性而團結起來。⁵¹ 這一切鬥爭的「層次」或圓圈，都必須彼此保持辯證的張力。若無法扣連而回到個人即政治，或集體凝聚在特定地方達致的方式，那麼這種普遍政治若還談不上是壓迫性的，至少會空洞化。再者，在某個尺度上對於政治或生態良善的，不必然能在其他尺度運作良好。倫敦（或俄亥俄河谷）當地長期的煙霧問題，在 1950 年代是藉由興建具有高聳煙囪的發電廠來解決，卻使得酸雨降到整個斯堪地那維亞（或新英格蘭）。一個在地問題造成了區域問題。相反地，政治權力下放到地方層級，在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經常淪為獲得或維持集中化階級控制或壟斷力量的超級工具。我的以地方為基礎的政治（place-based politics）理論，正是源自這整套概念。

根本的論點是，如果沒有適當的以地方為基礎的政治，就不會有普遍的政治。再者，在挪用威廉斯的戰鬥性特殊主義概念時，我提議地方政治實質上幾乎總是某種有條件的普遍主義的基礎。⁵² 誠如古老格言的說法，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不同層次之間的辯證消失了，問題就會出現，若政治卡在地方，它本身就

成了目的。在這個時候，反動和排外的危險就會凸顯出來。假使我對這些危險的警告過於明白，以致冒犯了那些喜歡極度浪漫化地方者的感受，我這麼做是因為我看過太多地方、甚至鄰里的法西斯主義和排外主義、反移民和門禁社區熱潮、「鄰避」政治等等的例子。如果我們不仔細注意具有進步潛能的事物，如何輕易變得保守反動，那麼，我們就看不到動員地方力量，以之作爲追尋自由地理的一個環節，必然能夠發揮的更大政治可能性。

例如，試想局限於地方的社群主義解答的政治。各種社會實踐在地方費力地建立獨特的社區，經常包含了威權力量的運作和循規蹈矩的限制。這種地方永遠無法保持完全開放，德利克最後就承認了這一點。一個特意成就的「社區」，是個封閉的絕對空間（無論尺度大小，或甚至無論邊境如何定義），裡頭有某些社會往來的規則佔了上風。進入這個有邊界的空間（劃界活動本身就很重要），就是進入了一個（默會和明示）規則的空間，我們必須認識、尊重且遵守這些規則（可能是志願的，或是通過某種強制）。「社區」營造要求生產出這樣的一種地方。規則會遭受顛覆或公然質疑（劃界也是如此），但這就會挑戰了社區作爲「相對恆存」的存在，接著，這很可能會引起至少部分居民的防禦性抗拒。所以，社區是有所爭議的場域。在當代的新自由主義霸權狀況下，它們很少能夠長保穩定。

要界定進步的社群主義地方政治與排他而威權的作法之間的差別，並非總是容易的事，例如，捍衛自己的產權，對抗投機

者、開發商，以及「錯誤群體」移民的房東協會。艾茲歐尼（Amitai Etzioni）是新社群主義的一位主要提倡者，積極支持像是封閉和門禁社區的原則，視之為社會生活組織的進步貢獻。對於享有特權者而言，社區經常意味了確保和提升特權，以及一種已經獲得的生活方式。對於無權無勢者來說，社區常常意味了「控制自己的貧民窟」（但至少這是「他們的」貧民窟），作為一種殘餘空間。社群主義的解答相較於霸權的新自由主義實踐，並沒有任何進展，除了能通過小規模的集體凝聚，來質疑倫理上的個人主義，但這種集體凝聚時常轉化為加強保護個人私有財產權利和價值，而非產生新型態的社會關係。⁵³

新自由主義下的地方形構，如同空間的生產，是個積極活躍的過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必須關注另類的、以地方為基礎的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前景。資本的循環和積累，動搖了地方和區域的「恆存」，正是因為貨幣力量摧毀了所有其他類型的社區，使得貨幣自身成了唯一的社區。都市成長、持續變化的區域分工，去工業化、縉紳化、區域階級聯盟的形成等，都是這個過程的產物。地方創建和不均地理發展的生產，攜手同行。⁵⁴但是資本的循環和積累，並非唯一重要的過程。例如，我們可以考察能量穿越社會—生態系統的循環、文化動力與資訊的循環、地緣政治鏈關係的轉變動態、彼此關連而崛起的衝突性（國族主義、族群、種族、性別）認同，它們通過絕對空間中的地方形構而（經常暴烈地）衝撞。有關地方的爭議（建立界線、障礙、壁壘，以

及巡邏的邊界)，是我們世界的無所不在特色。人們如何連結與建立集體和社區（有時候位於有邊界的領域中，但並非總是如此），有極大的變異，一如組織形式（地下莖式或階層式、集中或分散、民主或威權）和具體目標（絕非侷限於政治—經濟目標）的變化。權力如何在集體中聚集，它如何在集體之內與之間循環，以及政治組織的特定領域形式，也很重要，因為正是對照於這種過程的背景，另類可能性才會出現。地方的不穩定，以及社區的持續崩解，意味了總是會有對抗性政治崛起、甚至壯大的開放空間。關係性連結的不穩定和無法控制，使得徹底成功的壓迫性集權控制變得不可能。總是有可能開闢一個空間，讓人們聚在一起，界定出遠離新自由主義貨幣化規範的，彼此產生關連的方式與評價方式。

雖然動員「地方力量」是政治行動的重要面向，但總是有將這個環節物神化的危險。地域主義和鄉土觀念的政治，絕非新自由主義剝削和奪取式積累的普遍壓迫的解答。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空間和地方之間的緊密關係。獨特的地方確實會構成個人相遇的關鍵位址，藉此，個人之間的共同性和凝聚力得以建立，從而串聯形成對抗支配性秩序的反霸權運動。從這些位址出發，有「可能為了政治計畫而動員參與者」，超越「地方性的關切，但依然保有對於基地的責任承擔」。此外，隨著時間過去，位於地方（從鄰里到區域及國家）的長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紐帶，提供了「政治活動的實用錨定」。當然，問題在於這個錨定可能成為運動

的拖累，除非有凱茲展望的那種「受啓發」政治的配合，那是一種準備好要跨越空間、跳躍尺度的政治。⁵⁵

199 即使如此，重要的還是要認識到，這個過程會有各種不同展現方式，取決於意識形態定位和特定政治目標。這是基督宗教建立根據的方式，社會主義也是如此。反動的法西斯主義、印度的國大黨（BJP），以及美國進步的公民權利運動，都動員了地方力量，作為追求其政治議程的手段。再者，由誰控制地方力量的爭議和鬥爭，在每一處都很明顯。1920年代，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崛起，猶如1973年以後的智利，都伴隨了全面破壞左翼據以組織的地方和空間，並代之以不同的政治控制的領域組織，以便維持權力。美國城市裡的威權派市長，傳統上會將地方——選區系統——組織成為領域化的政治機器，來維持他們的地位，他們也會試圖摧毀其他以地方為基礎的政治組織形式。所有的政治、社會和宗教運動，都會利用地方營造的領域策略，來達成它們的目標。自由的地理和威權壓迫的地理，在它們訴諸地方營造的領域策略時，可說是攜手並進。我們不可能逃脫領域性和地方營造的邏輯，正如無法逃離政治。

以地方為基礎的社區，要求在流動的時空過程（兼有相對性和關係性）與建立於絕對空間中的相對恆久歸屬和集結（像是國族國家正式施加的那種）之間，有細緻微妙的關係。界定社區界限和範圍（有時候甚至是領土和邊界）的明確鬥爭，以及通過集體權力諸如憲法形式、政黨、教會、工會、鄰里組織、地方政府

等等，來創造和維持其規則與制度，皆已證明在超越新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理論所預設的、個人化市場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進而提出替代出路上，十分關鍵。問題是，「自在」(in itself)的社區意義在於身為更廣闊政治的一部分，而「自為」(for itself)的社區，幾乎總是會墮落成爲退化的排外與片斷化（有些人稱其爲空間形式的負面異質地方）。強調這個危險，並非提議所有以地方爲基礎的政治組織形式，都必然是反動的。

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社會型的無政府主義者，對地方的建構深感興趣，即使他們棄絕了一個特殊的地方建構的領域形式，即國家。例如，布克金（Murray Bookchin）倡議創造「一種人性尺度的自我治理市鎮，和其他人性尺度、自我治理的市鎮，通過邦聯制度而自由結盟」。這種「分散化社區，通過自由邦聯或網絡方式結盟，以便協調某個區域的社區的無政府主義願景，在現代的激進脈絡中，反映了傳統的參與式民主理想」。再者，「一個生態社區可以將其經濟納入市政管轄，並且結合其他市鎮，以便將其資源整合到區域性邦聯系統。土地、工廠和工作坊，應該由自由社區的人民議會控制，而非由國族國家，或可能會發展出產權利益的勞工生產者控制。」⁵⁶ 布克金提議的是一種特殊的地方建構形式，藉此取代國族國家。他的構想實際上以有趣的方式，橫跨了時空形式矩陣。他的市鎮結盟主義（associationism）願景，始於絕對的領域層級，由權利相等的個人組成的地方議會，然後藉由區域議會網絡而轉移到相對時一空的向度，然後通過「共同流動」

觀念而表達出關係性，藉由在市鎮結盟中過著一種非階層性社會關係的生活，同自然有著親密關係，每個人、每個地方，都應該感受到他們與其他每個人的團結凝聚。

地方的地理理論告訴我們，布克金的提議無法免於遭遇源於所有地方建構形式（包括國族國家）的一切弔詭和矛盾。這種無政府主義理想的具體化，如何在絕對空間和時間的基礎上實際運作？自治的市鎮有邊界，有圍籬，並且防衛外來的掠奪者？適用的是什麼樣的成員身分／公民資格原則，成員的出入要如何管制（如果有的話）？必然會在高階尺度形成的權力結構（區域邦聯議會）實際上要如何運作，以及分散化會確保隱匿的集中權力形式續存，這個危險該如何避免？楊恩評論道，「如果整個社會都要組織成爲自主市鎮的邦聯，有什麼能防止社區之間的大規模不平等和不正義，以及因而對於不是住在較優勢而強大社區裡的個人的壓迫？」就此，我還要補充另一項困難：一個超過六十億人口的世界，若是以這種方式生活，要如何保護譬如說熱帶雨林的生物多樣性？布克金警覺到許多這類問題，並且在他的眾多著述中，盡力回答了其中部分問題，但不幸地，未能提出令人徹底信服的答案。

201 地理理論教導我們的是，一切形式的地方建構，無論是由社會主義者、自治論者、社會無政府主義者、宗教團體、市政府、開發商或獨裁者來組織，都會面臨類似的根本問題。地方的地理理論直接提出了這些問題，因而有助於我們避免立意良善的另類

地方建構形式，所會犯下的嚴重錯誤。根據特意設計而建造的地方，誠如烏托邦傳統的例證（及其一切缺失），是我們最偉大的力量之一。它也是我們無法迴避的任務之一。因此，它要如何作為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環節，整合進入寰宇主義計劃，便具有重大意義，是人類解放的可能條件。

戴蒙（Jared Diamond）的書《槍砲、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冠以預兆式的副標題「人類社會的命運」，自1997年首次出版以來，已經暢銷逾100萬冊。2006年10月，當它終於不在排行榜上時，它已連續205週躋身《紐約時報》前20名最暢銷書之林。戴蒙在書中主張，「不同民族的歷史之所以依循了不同的歷程，乃導源於各民族環境之間的差異，而非各民族本身的生物差異。」他認為，地理乃是經由食物生產、畜牧飼養、冶金術（技術）、疾病體制和語言的「最近原因」而運作的「首要原因」。戴蒙認為，地理學（相對於遺傳稟賦）塑造人類歷史的角色問題，是個唯物主義的科學問題。在找尋答案的過程中，他動用了自己的專業（包括分子生理學、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以及廣泛的科學資訊（揀選自考古學、人類學、知識論、語言學、行為生態學，以及科學與技術的歷史）。戴蒙致力於提供一種統一而綜合的解釋，一種唯物主義科學史，「與諸如天文學、地質學和演化生物學這類公認的歷史科學，同等重要。」¹他也使用通俗易解的科學術語來撰寫。

戴蒙的書，就是康德如果知道怎麼寫，可能就會寫出來的那種「通俗預備知識」。它開展出人類歷史的地理「可能性條件」，因此，看似替爲了令吾人對於我們的類存在及人類社會演化的理解奠下良好基礎，需要哪一種地理學知識的問題，提供了完美的世俗答案。戴蒙聲稱就環境決定論的嚴格意義而言，他不是環境決定論者。「沒有人類的發明才能，我們所有人今日都還是使用石器割肉生吃，就像我們百萬年前的祖先一樣。所有人類社會都有善於發明創造的人。只不過，某些環境比其他環境提供了更多創始原料，以及利用發明的更有利條件。」²他如何調和這段結語，以及開頭對地理學作爲主因的堅持，可說是有點玄妙。該書第一部分針對促進植物與動物馴化的生態條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論點很簡單：適合馴化的植物與動物相當少；那些適合的物種裡，有一些比其他物種更有營養且服從馴化；而且，物種的地理分布，嚴格受限於全球九個小區域的環境限制。約莫西元前 8000 年，首波植物與動物馴化的浪潮，因而只出現在這些少數有利的地區。在這些地區中，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又比其他地區更合適。戴蒙有技巧地運用他的證據來描述農業的起源，並且不經意地展現出他的科學信譽。儘管評論者指出錯誤，並提出了批評，戴蒙針對首波植物與動物馴化的解釋，可能跟我們現有的任何其他解釋一樣優秀。但是，他據以架構其解釋的環境因果關係論題，卻沒有任何證明。我們頂多能夠推論，馴化要能夠在它們已經出現的那些地方發生，適宜的環境條件是必要的「可

能性條件」，但絕非充分條件。

當該書隨著時序繼續推演，這個以環境作為原因（environment-as-cause）的論題，就更成問題了。戴蒙認為，當前經濟發展與全球財富分布的地理不平等，大都可以根據引起馴化的初始環境條件來解釋。如果這點沒錯，那麼，種族差異和人類遺傳天賦，就無法解釋目前各國財富的差距。不過，這也意味著西方殖民與帝國主義實踐本身，與例如當代非洲發展的淒慘狀態，沒有什麼關係。相較於非洲環境遺產的沉重分量，無情地榨取非洲資源的掠奪式資本主義，就黯然失色了。僅僅在一個世代的殖民統治內，非洲熱帶與亞熱帶土壤的脆弱肥力就橫遭摧毀的確鑿歷史，戴蒙完全沒有提及，一如更早遭奴隸販子破壞的西非蓬勃發展的分散稻作農業的陰鬱歷史（儘管奴隸將稻作技術帶到南北卡羅萊納州而留存下來，替白人主子建立了有利可圖的繁榮稻作）。比利時對剛果的殖民劫掠，以及以石油巨頭（big oil）之名，暴力鎮壓尼日河三角洲奧貢尼人（Ogoni）的毀滅性歷史，都沒有出現在戴蒙的解釋裡，因為「沉甸甸重壓在我們身上的，是西元前 8000 年的歷史進程之手」。³比利時利奧波德國王（King Leopold）的幽靈與殼牌石油公司（Shell Oil）的現任董事，毫無疑問會歡迎如此輕鬆就能脫困。對於許多與高采烈地耗用世界三分之一資源（有些來自非洲），卻為這種揮霍無度的實際後果擔負微弱的責任、或根本毫不負責的美國人而言，戴蒙的故事想必是令人欣慰的消息——令人安心且無憂無慮。難怪這本書在美國受到

如此熱烈的歡迎。

那麼，戴蒙是如何航越動植物馴化的發軔（這一點他可能是對的）與全球經濟體內部社會不平等及不均地理發展的現狀（就此而論，他可是大錯特錯了）之間的一萬年？很顯然，世界並非停滯不前，動植物馴化的某些初始區域（例如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月彎，如今是伊拉克），相較於沒有發生馴化的西北歐、日本或美國，幾乎稱不上是先進發展的模型。戴蒙說，某些追求馴化的人類群體比其他群體更具優勢。譬如，肥沃月彎擁有特殊的營養食物來源（小麥比高粱好），以及一塊夠大的適合耕作區域，以便利用剩餘糧食來養活大量人口，並且支持其他活動。這種初始優勢促使技術、病菌、讀寫能力和軍事硬體發展，從而讓這些特殊群體得以「犧牲其他群體」來往外擴張，「直到其他群體遭致取代，或者每個人最後都分享了新優勢。」⁴ 人群之間的競爭與征服，位居這個過程的根柢（有限的康德派、甚或文化傳播之微妙過程的寰宇主義式合作，在這裡都起不了作用，雖然這裡明白提示了一個關於康德的「類存在」的隱藏理論，即人類群體總是試圖支配其他群體）。戴蒙的解釋，將帝國實踐、戰爭與征服（在科學上予以自然化）併入人類群體之間爲了爭取成長和生存的達爾文式鬥爭，但擁有初始優勢的群體勝出。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政治—經濟選擇沒有左右大局的作用。

此外，地理條件（主要以固定不變的物理特質之空間秩序來呈現）引導了遷徙移動和創新的空間擴散。在此，大陸的軸向扮

演了重要角色，因為作物體制沿著氣候帶而橫向移動，要比跨越氣候帶容易得多（因此，擁有某些最初的植物和動物馴化發生地的非洲和美洲，由於跨越氣候帶南北移動要困難得多而居於劣勢）。相同的條件影響了技術和讀寫能力的擴散（雖然在這些案例中，氣候帶為何重要的原因不明）。移動的地理與生態障礙據說最低的歐亞大陸（Eurasia），因此能夠掌握優勢、開發技術，最終發展出據以征服其他地方的槍砲（也攪動了病菌）。如果我們回顧肥沃月彎，視之為唯一起源（the origin），這是因為從那裡往外擴散的地理路徑最為簡便（尤其在原始爐床的生產能力由於過度使用而耗盡後——有趣的是，這裡的解釋訴諸人類偏好而非環境原因）。最終，這些優勢令少數的西班牙征服者便能擊敗美洲一支數千人的武力。歐洲混亂的自然地理，也巧妙地避免任何集中化國家權力（即使有來自中國的當代證據，這仍是新自由主義年代的一項負面特徵）的發展，這一點又促成了更多競爭（當然，據信這是一項正面特質），以及此後歐洲比其他地方擁有更多創新。通過這些方式，在一個經過選擇的植物與動物馴化爐床裡最初的「文明」突破，沿著大致可以預見的地理路徑，不均等地擴散到世界各地。戴蒙引領我們跟上最新局勢，他甚至懷疑，「核子武器是否會經由相同的充斥暴力過程，在世界各地增生擴散。」⁵

相較於該書的第一部分，為後繼論點提出的證據，大多屬於推測，而且頗為膚淺。要在二百頁的篇幅裡，建構這種超過一萬年的人類歷史宏觀解釋，顯然需要極高層次的概括和抽象，但是

206 在這裡，任何類型的科學方法都讓位給了粗略的臆測和一廂情願的想法。展示出來的地圖是絕對的那種（請回想第七章的區分，以及圖 7-1 的呈現），戴蒙沒有試圖採納相對時一空的根本轉變，而這種轉變是由刻劃人類歷史地理特徵的運輸及通訊創新造成的。我們不禁懷疑，由於讀者將本書第一部分建立的科學權威，延伸到了第二部分，所以他的解釋才顯得可信。例如，考察他針對中國與歐洲命運的比較研究，兩者都應該曾受惠於源自最初馴化關鍵區域之創新的橫向移動（戴蒙完全忽略西藏 / 喜馬拉雅山脈橫互的障礙）。透過仔細打量地圖，戴蒙注意到歐洲的海岸線比中國來得曲折破碎，他斷定這就是中國「長期統一，而歐洲長期分裂」的解釋。⁶基於絕對空間中特定尺度地圖的粗略簡化再現，被賦予牽涉物質性社會實踐與現實歷史的因果力量。中國之所以喪失政治與技術上的卓越地位（以及它未能追尋海外探險與發現的早期可能性），被歸因於海岸線平直而導致的國家權力過度集中。這是極為粗糙的空間決定論。這種論點很容易斥為無稽之談。仔細瞧瞧美國和中國的海岸線，就可以指出美國應該比中國更加中央集權才對。鄧小平於 1978 年以後將權力下放到各省、自治市，甚至鄉村，於是啟動了中國驚人的經濟及技術發展過程，可見他顯然是忘了中國的海岸線。任何國家或帝國機構內部過度的官僚主義中央集權，有時候（但只是有時候）在創新與成長方面會有負面後果。就此而言，戴蒙依循標準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教條，認為過度的國家控制總是不好（卻忽略了一項事實，

即官僚化的威權政府，如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以及現在的中國，主導了多年的當代資本主義成長曲線，而美國在像是軍事科技這類關鍵領域上，幾乎算不上是國家不干預經濟的模型)。這個有關國家過度中央集權的危險的「發現」，令戴蒙獲得來自蓋茲 (Bill Gates) 的如潮好評，使他得以接近微軟工程師 (幸好西雅圖周圍的海岸線夠曲折，足以維繫他們壟斷軟體界的努力)。然而，蓋茲與鄧小平的共通之處，在於他們發現有適當組織的分散化，可以是高度集權控制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這裡的重點，必定是強調「有適當組織」的意義，因為 1989 年以後俄羅斯發生的那種混亂分散化無法運作，只有利於冒出頭來掌控了絕大部分經濟 (在過程中聚集了龐大個人財富) 的七名寡頭。混亂的分散化在非洲許多地方是長期存在的問題，雖然當地菁英往往從中撈到不少好處。有適當組織的分散化，是個與海岸線無關的政治—組織選擇。在稍晚版本的後記裡，戴蒙承認了「最佳」分裂狀態¹¹的問題

207

[譯註]

¹¹ 這裡是指戴蒙討論了促成歐洲分裂 (fragmentation) 和中國長期統一的終極地理因素，對於科技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亦即分裂有助於各國之間的競爭。但戴蒙承認，其他學者向他指出，分裂是多面向概念，必須和其他因素搭配；其效果也取決於分裂出來的各部分之間的相似和差異程度；政治分裂可能在建設之餘，也具有破壞性；何謂最佳，有賴於評斷最佳的判準為何；以及，對於某個領域 (例如技術進步) 而言最佳的分裂狀態，對於其他領域 (經濟生產力、政治穩定、人類幸福等) 可能並非最佳。

題，而且與他以絕對空間中的空間形狀來解釋政治組織的假定，毫無關聯。⁷他對於海岸線因果效應的堅持，全然不可信，更不用說有任何「科學」基礎。簡言之，它們都是胡說八道。

經濟學家薩克斯——有影響力的聯合國顧問——在他的暢銷書《終結貧窮》（*The End of Poverty*）裡，說了一則很不一樣、但同樣涉及環境力量的故事，談的是中國崛起的經濟力量。相較於俄羅斯和東歐，告別共產主義之後，賦予中國優勢的不是「政策決定的差異」，而是中國「截然不同的地理、地緣政治和人口」。薩克斯認為，中國綿延廣大的海岸線「支撐其出口導向的成長，但蘇聯和東歐沒有廣大海岸線的好處，以及隨之而來的從事國際貿易的低廉成本」。⁸主張缺乏可航行水域對俄羅斯構成了問題，這種論點實在太簡便了，因為薩克斯在1990年代初期，替前蘇聯造成重大災難性經濟及社會後果的，以市場為基礎的「震撼療法」中，扮演了管理的要角。（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案例的主要優勢在於，薩克斯對那裡的政策無從置喙，而俄羅斯卻得等待全球暖化啟動其北極海岸線之後，才能發展起來。）不過，薩克斯繼續主張，中國的大問題不是它的同質性（戴蒙的認定），反而是它的地理多樣性，尤其是南北區別，以及更重要的，以距離可航行水域遠近來區分的東西差異。這一點呼應了薩克斯更普遍的地理決定原則：利用看似精密的統計技術，他說明了世界各國經濟開發程度的幾乎所有變異，都可以透過與赤道及可航行水域的物理距離來解釋。⁹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他認為「地理優勢可能

包括近用關鍵自然資源、鄰近海岸線與海洋——可航行水域、鄰近其他成功經濟體、農業的有利條件、人類健康的有利條件」。此外，雖然多少比較謹慎，但他追隨戴蒙的觀點，主張農業和健康技術，在以氣候帶界定的生態區域內部，比起橫跨這些區域，更容易傳播。然而，在他們的分析裡，薩克斯和戴蒙都忘了，不同現象之間的空間連結（例如，母牛與牧草地的空間分布之間，或者，筆直海岸線和權力集中之間），並無法證明因果關係。他們也都使用空間、區位和環境（主要是氣候）條件的絕對量度，彷彿它們毫無問題。對他們而言，時一空相對性無足輕重，關係性也顯然毫無意義。

有趣的是，薩克斯稍後在同一本書裡，針對中國的歷史地理，提出一種非常不同的解釋，奠基於戴蒙也提出來的良善自由主義神話，認為中央集權不利於經濟發展。薩克斯（在一則有關中國複雜歷史地理發展的粗糙簡化解說裡）寫道，「使中央集權國家在中國得以可能的因素，是次大陸規模的龐大村莊社會。分布於廣袤空間的村莊，本身看起來都差不多模樣：它們是由住在成千上萬村莊裡的數百萬人民組成的種稻社區，具有共通的經濟和文化特質。在這種同質的環境裡，中央集權的管理策略蓬勃發展，由上而下傳遞的命令層層過濾，直抵基本內部組織十分相似的眾多社區終端。」¹⁰他說，在這種基礎上出現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成就（薩克斯欣然擱置了他先前認為至關重要的所有地理南北與東西變異）很了不起，但要達到「政治及經濟權力總是分散的」

西歐那種經濟發展，卻不可能（不管是哪個政權）。中國的中央集權國家，「與分散且多元的市場經濟動力及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無法相容，後者仰賴移民、權力與財富的多元基礎，以及區域多樣性。」然後，他接著告訴我們，因為「賦權給省和地方政府在其層級從事實驗，容許多樣性、創造更複雜的分工，並促進移動」，才出現了中國當代的經濟成就。中國的集權國家致力於分散化、實驗、「看看什麼行得通」的意願極為重要，這使得政策選擇（薩克斯先前否認的決定因素），而非可利用的海岸線，成了快速增長的主要解釋。¹¹

戴蒙和薩克斯提出的通俗且深具影響力的解釋，其怪異之處是地理（總是被理解成自然環境的某個面向，包括土地的固定空間秩序）的角色，在他們的論點之間滑出移入，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充當解釋性的、有時是積極的因果能動者。儘管屢屢（以康德的風格）訴諸自然地理學條件作為其他一切事物的「可能性條件」，但他們描述的實際動態，總是需要人的能動性（例如，在戴蒙的例子裡是人的創新能力、技術，以及群體間的競爭，在薩克斯的例子中，則是市場相對於國家的行為，以及政策選擇）。其結果是以直接、甚或間接的環境控制以外的方式來推動發展，除非我們像戴蒙所敦促的，準備好要假想與一萬年前事件的某種深刻而隱祕的關連，而這無異於將當代全球不平等一路溯及宇宙大爆炸的起源。

但是，將全球不平等歸因於地理效應——亦即歸諸自然環境

和區位條件，而不是歸因於比如說市場力量、政策選擇與帝國主義實踐的結果——結果是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思考政治可能性的方式。如果海岸線決定論勝過了政策選擇（如薩克斯起初的構想），那麼何苦要擔心政策？結果這成了一種長期的伎倆。它還具有通俗性的迴響，像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裡一篇題為〈壞緯度個案：地理何以導致貧窮〉（*A Case of Bad Latitude: Why Geography Causes Poverty*）的文章，大膽宣稱全球不平等的環境因果論點，再以慣常的學術參考文獻佐證。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牧師早已根據人類生殖的自然傾向對抗著自然資源限制的角度，解釋了貧窮和失業，進而根據這種自然阻礙，而拒絕了理性主義和平等主義／社會主義解決方案的可行性。李嘉圖（David Ricardo）訴諸農業報酬的遞減，來解釋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性，引致馬克思的苛刻評論：「面臨危機時，李嘉圖就往有機化學裡避難。」李嘉圖可以藉此迴避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產生內在矛盾與階級不平等，來解釋資本主義不穩定的任何討論。¹²再者，中央集權國家控制不利於人類發展的神話，在這些新自由主義時代只能橫加斷言，以便在毫無科學理由下獲得接受（然而，若斷言與其對立的觀點，則會招致強烈懷疑，繼而要求有嚴格的科學及經驗證據）。至於中國，環境主義論的命題，即權力過度集中乃源於環境條件，這種主張可謂歷史悠久。1930年代，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起家的魏特弗格（Karl Wittfogel）主張，爲了掌控在那個環境裡生存所需的大規模灌溉工程，中央集權國家官僚乃

屬必要，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以「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 為主要政治形式的「亞細亞生產模式」(甚或更一般性的「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 的普遍論題(在馬克思那裡，也能找到這種元素)。¹⁴ 相反地，西歐靠雨水澆灌的農業，據稱能創造出個人自主、分權式民主及市場社會的條件(這點讓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崛起令人費解，因為沒有證據顯示雨停了——雖然西班牙大部分地方是挺乾旱的，所以這或許能解釋佛朗哥的崛起)。因此，藉由將自然環境條件(自然)視為一切人類活動形式仰賴的根基，魏特弗格將歷史唯物論轉變成某種歷史地理唯物論。相對地，戴蒙只是檢視海岸線形狀，薩克斯(在他的諸多版本之一)則聚焦於氣候條件和可航行水域的可及性。

有關地理學重要與否的辯論，還有另外一個奇怪的角度。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於2005年榮獲頒給四十歲以下最有前途經濟學家的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award)，某個程度上，由於他針對戴蒙和薩克斯的論點提出異議，證明全球不平等跟地理、氣候及生態因素的關係不大，卻與制度密切相關而聲名大噪。他指出，由於地理因素(空間區位和氣候帶)自1500年以來便維持相當穩定，這些因素無法解釋當時迄今全球財富分配的重大改變。「歷史證據顯示，歐洲殖民主義不僅破壞了許多國家的社會組織，而且實際上導致在先前繁榮的區域建立榨取性的制度，以及在先前的貧窮區域發展私有財產制度。」結果造成尤其在19世紀期間，「歐洲殖民主義影響下，國家之間相對〔財富〕

等級的逆轉」，以致貧窮且相對空曠的地區（像美國、加拿大和澳洲）變得更為富裕，而先前富裕的人口稠密國家（如印度、中國、印尼和玻利維亞），都在榨取制度體制下變得貧窮。¹⁴有趣的是，他的財富測量標準倚靠都市化（本身當然是個地理現象）程度，雖然該論點的後續版本，是以比較傳統的收入及財產估價為基礎。不出所料，最後勝出的較窮困國家，就是那些建立強大的私有財產權體制以便鼓勵投資的國家。

戴蒙的罐裝歷史，完全且便宜行事地忽視了1500年以降全球財富地理的巨大轉變，而且，確實很難運用戴蒙所訴求的地理術語，設想出對於此事的任何解釋。雖然阿西莫格魯將全球貧窮的辯論領域，從地理（假定我們對地理很難有所作為）轉移到社會及政治問題的關切，很值得讚賞，而且將殖民與帝國主義的榨取行徑帶回討論核心，也很有幫助，但是阿西莫格魯採用的類別區分，與戴蒙使用的那些分類同樣嚴重誤判。首先，地理形勢自1500年以降沒有多大改變的宣稱，顯然有誤。甚至可以說，在不費心評估證據的情況下，它就否認了自1942年以來發生的大規模生態變遷——（綿羊與山羊造成的）森林砍伐和土地清理、摧毀大部分墨西哥和非洲農業能力的土壤侵蝕、土地剝蝕與外來物種入侵、沙漠化、農產品國際貿易的迅速轉移，以及都市化的快速步調——都跟不平等的變化息息相關。更誇張的是，沒有體認到距離和區位的相關量度是運輸及通訊的相對時一空，而非阿西莫格魯訴諸的絕對空間的簡單物理距離。後者確實持續存在，但前

者發生了巨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相對空間關係裡最劇烈的變革，發生在 19 世紀（蒸氣船和鐵路），正值財富分配出現了阿西莫格魯所謂的「大逆轉」之際。不過，這也指向了更深層的困難，因為阿西莫格魯也假設制度（像是國家的制度）不是地理事務，而且地理可以同制度分開來考察，然而制度其實是「多少具持續性的社會關係所生產出來的空間。在最明顯的意義上，它們是領域化——控制與監視的領域、管轄區域，以及組織和管理的範域」。¹⁵ 例如，暗示國家（地方政府或中央國家）不是地理現象，進而將國家的榨取制度，再現成好像它們沒有地理基礎似的，顯然是個錯誤。我們的許多關鍵制度（國家、軍事、宗教、教育），都是藉由創造特殊的地方、空間及環境品質（新地理）而積極生產出來的。軍隊有兵營，牧師有教堂，教師有學校和大學，諸如此類。對於物理和社會基礎建設的投資，與制度的建立攜手並進。反過來，空間（19 世紀徹底改變相對空間關係的鐵路建築）和地方（城市）的生產，以及 15 世紀以來，人類在整個地表造成的環境變化，都十分仰賴制度形構，例如國家與金融制度。阿西莫格魯錯誤地假定了一個二分的世界，在其中，一種據稱為靜態的地理（被理解成絕對的區位空間與固定的氣候帶）與動態的社會制度形成強烈對比。當然，相對於後者，一開始就被描繪成固定、死寂且非辯證的前者——誠如傅柯對所有傳統康德式構想的不滿——無法產生變化。但二分法徹底錯誤：空間的生產與自然及地理的根本轉變，是通過人類制度與勞動組織，經由領域化和

去領域化（如 1885 年的非洲）、新技術（例如設計來克服距離摩擦的技術），以及全新生活方式的出現而塑造的。實際上，阿西莫格魯所做的一切，就是去證明他已經假設為真的事情：地理（被錯誤地推斷為永遠不變的自然條件）是被動的，而且在人類事務中不活躍。

我們不該忽略這些論點的政治。將我們的不幸歸咎於自然的環境原因與固定的空間秩序（據稱我們對這些能做的很有限，甚或無能為力），而不是歸因於社會性的功能失常（就此我們可以採取強勢行動），在我們面對全球不平等與政治壓迫時的可能理解、責任感，以及試圖應對的方式上，產生巨大差異。而且，即使如薩克斯所言，我們有可能對付跟熱帶氣候有關的疾病體制（給窮人廉價的蚊帳），但是所援用的政策，卻全然迴避了折磨著全球南方的貧窮的政治及經濟根源。在這些方面，戴蒙的文本、馬爾薩斯的論點，以及較小程度上，薩克斯有關處理全球貧窮問題的提議，都有很大麻煩。如果納入寰宇主義計畫的就是這種地理學，那麼，我認為我們可謂深陷困局。如果有得選擇，阿西莫格魯對這類論點的逆轉顯然比較可取，但他最終只是訴諸嚴重誤導的「地理」定義，使得問題更加複雜。晚近在經濟學與政治科學內部熱烈展開的，針對「地理」相對於「制度」問題的廣泛辯論，絲毫不關切一般科學內部的漸增趨勢，即拋棄作為自然地理（自然）與社會制度（文化）二分之基礎的笛卡兒 / 康德框架。¹⁶自 16 世紀以來，時一空關係、地方營造、區域與領域結構的組織，以及

環境條件的轉變，聯合起來形同世界地理的大規模重塑。但我發現經濟學或政治科學文獻裡，竟然未曾討論這些現象，真是令人驚訝。

環境決定論

戴蒙和薩克斯恢復了主張地理與環境影響人類行動的悠久傳統。在康德胡亂摸索的《地理學》裡古怪再現的這個傳統，至少可回溯至希臘人。葛雷肯不朽的《羅德海岸的痕跡》(*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提供我們全面性的解釋，討論環境影響的觀念如何帶著其他傳統穿梭在西方思想裡，這些傳統不是著重「人類支配自然」的理念，就是強調某種自然—人類—天國的連續體，其安排乃依據上帝的智慧設計，讓人類在「存有的巨鏈」(great chain of being)中佔據頂端、接近上帝（這是福音派基督徒和布希總統似乎有意重振的中世紀觀點）。例如，孟德斯鳩和盧梭經常提及環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有時還變成徹頭徹尾的決定論（孟德斯鳩主張島嶼會產生個人自主的條件，盧梭認為沙漠氣候造就了一神論和專制的政府形式）。¹⁷德國地理學者拉茲爾（Friedrich Ratzel）的學生森普爾（Ellen Churchill Semple），大概是英美地理學界決定論式思考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她在1911年出版的《地理環境影響》(*Influenc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中寫道：

人是地表的產物。這不僅意味著他是地球之子，是她塵土的灰塵；而且地球如慈母般照料他、餵養他、派他任務、指導他的思想、令他遭遇能強化身體並磨練機智的困難、給他導航或灌溉的問題，與此同時，輕聲提示解決之道。她進入他的骨頭與組織，進入他的精神與靈魂。在山上，她賦予他鋼鐵般的腿部肌肉以攀登斜坡，沿著海岸，她則任其虛弱鬆弛，卻令他胸腔與手臂強健發達，好操縱他的槳和櫓。在河谷，她令他依附沃土，用一股沉悶的冷靜、苛求的義務，限制他的思想觀念和雄心抱負，將他的眼界縮小到農場的狹隘範圍。登上迎風吹拂的高原，在一望無際的草原和一片乾涸的沙漠上，是他跟他的畜群在牧草地與牧草地、綠洲與綠洲之間漫遊的地方，是生命歷經許多艱難但逃脫乏味苦差事的地方，是看守放牧牲畜給他沉思空閒，以及廣袤地平線上壯闊生活的所在，藉此，他的觀念體現出某種龐然巨大的簡單明瞭；宗教變成一神教，上帝變得如沙漠之沙和草原之草那般無可匹敵，連綿不斷，互古不變。將他的簡單信念當成他飢渴心靈的一份糧食，反覆咀嚼反芻，他的信仰變得狂熱；他那脫胎自無盡漫遊的恢弘特殊觀念，成長得比餵養它們的土地還大，在廣闊的帝國征服中結出正當的果實。¹⁸

這個段落的性別化傾向顯而易見，但這其實反映了母親大地（地理）對抗父親時間（歷史）的悠久傳統。培根（Francis Bacon）毫無保留地主張，人類對自然的主宰，全然等同於男人支配反覆無常且倔強任性的女人（這充分說明了莎士比亞在《馴悍記》〔*The Taming of the Shrew*〕裡的行徑）。但同樣有趣的是，森普爾援引的各式各樣自然環境特質。這一點說明了環境決定論者享有的某種優勢，因為對於人類社會組織或歷史轉變裡的每一個可察覺變化而言，必然有與之相關的某些獨特自然環境特質（氣候、地形學等）。如果這種關聯被當成證據，那麼環境決定論的論點就變得無可反駁。因此，要注意森普爾推論的元素，是如何由薩克斯（所有那些中國河谷裡的單調村莊）及戴蒙（中國平直的海岸線，以及由「成長得比餵養他們的土地還大的」人群實現的帝國征服）所重製。戴蒙書中第二部分的論證模式，從一種環境關聯翻轉到另一種，而薩克斯則隨其方便與意願而援引海岸線，或是訴諸政策選擇。戴蒙書中第二部分的機會主義式環境決定論，與第一部分開展的較為單一而有系統的理論形成對比（這部分他值得讚譽）。事實上，理論越單一、越有系統，就越有生產力，我們也就越容易予以評價和駁斥。例如，杭亭頓（Ellsworth Huntington）在1925至1950年間出版的一系列書中，試圖將所有的環境影響形式簡化為氣候決定。氣候決定論具有從希臘時代延續至今的悠久歷史（譬如，薩克斯極度仰賴它，雖然並非只依賴氣候決定論，甚至卓越的19世紀經濟學者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也把它視為自

明之理)。杭亭頓不遺餘力仔細探究氣候變異的性質，這麼做便促進了精確氣候分類法（一種回溯至19世紀柯本〔Köppen〕先驅工作的活動）的發展。問題在於，杭亭頓的氣候資料成了宣稱溫帶氣候區，以及居住於該地帶的歐洲裔白種人口優越性的基礎。當他試圖定義最有助於知性活動的氣候條件，並產製一張最適區位很可疑地落在他任教多年的哈佛大學附近（儘管有另一個極端值落在愛丁堡）的地圖時，他的整個事業看起來已自私到了荒謬地步。但他更廣泛的研究發現，確實與理解農業生產力的問題息息相關，而且，考慮到美國1930年代「黃塵地帶」（Dustbowl）的駭人經驗，很難否認農業實作過度延伸到高旱災風險區域，多少與隨後出現的社會災難有關。史坦貝克（Steinbeck）的史詩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所銘記的，從奧克拉荷馬州與堪薩斯州前往加州的大規模遷徙，某個程度上是對於氣候事件的回應，雖然在史坦貝克的小說裡，以及在真實歷史中，迫使奧克佬（the Okies）¹²¹離鄉的，是乾旱狀況和機械化農企業的結合體，加上銀行家取消土地抵押品贖回權的逼迫。¹³最近幾年的一個類似案例，可能是將2005年紐奧良的災難單獨歸咎於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彷彿社會—政治與經濟情勢都跟該事件無關。但事實證明，沒有純粹的「自然」災難這種東西。²⁰

[譯註]

¹²¹ 奧克拉荷馬州的移民農工。

積極運作的地理決定論中，比較著名的實例之一，是圍繞著地理學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著作而崛起，泰勒在1920年代基於環境理由，強烈反對大規模移民澳洲以利人口擴張的政治計畫。泰勒運用證據確鑿的氣候、水文循環和土壤條件的科學數據，繪製詳細且相當精確的地圖，據以主張澳洲所能達到的人口分布與密度，有著嚴格的环境限制。他針對2000年人口密度與分布方式的可能狀態所繪製的總結地圖，出色地預測了當前的模式。然而，在1920年代，普羅米修斯般的技術必勝論，結合了白種殖民者心態，助長了一種要與美國匹敵的，數百萬人群聚的新澳洲形象。在這個脈絡下，泰勒的著述在大眾媒體上引發一股反對的狂熱，以致他遭驅離雪梨大學（Sydney University），甚至遭驅逐去國；他前往加拿大，他後來在那裡宣揚「走走停停決定論」（stop and go determinism）想法。他承認，人類社會確實有可能偏離環境決定論，但是長遠來看，我們注定要屈服於環境限制與控制的必然性。²¹這就是許多當代環境主義者抱持的立場。泰勒對澳洲聚落的預測，大致吻合日後的現實，於是似乎證實了他的理論立場。然而，這可能意味著，後來成為能源密集且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都市化形式的動態，以及澳洲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貿易關係及遷移潮流（僅舉幾個產生目前地理分布的要素）的演變，可以歸因於環境原因——或者，以較不誇張的說法，它們都以某種方式受制於環境施加的限制。如果泰勒和推而廣之的戴蒙與薩克斯，對他們的環境主義抱持合乎科學精神的嚴謹態度，他們應

該能夠指認出，環境條件限制（environmental conditionality）（它們無疑存在，也絕不能視為必要條件而予以忽視）在有待解釋的結果裡，扮演積極主動而非消極角色的過程。相關性和關聯可能會有所暗示（例如，抽菸與肺癌，或是胃癌與供水品質的關係），不過，在能夠辨認真實機制與生產過程以前，環境決定仍然全屬推測，環境限制依然是偶然的、而非決定的因素。例如，在戴蒙的例子裡，他未曾嘗試說明海岸線據以影響政治組織的機制。

217

從嚴格的環境決定論（在核心有少許的人類主動性），到人類行動的完全自由（置身於輕微的環境限制氛圍），構成了論證的連續體。例如，泰勒的走走停停決定論理論，變形成為湯恩比（Arnold Toynbee）的鉅著《歷史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中的挑戰與回應觀點。湯恩比的想法很簡單：獨特的地理環境提出了不同挑戰，但回應則取決於有所分化的人類能力和力量（像是康德所召喚的那種人類「性格」，或是薩克斯在他討論中國發展的某個版本中提到的政策選擇）。湯恩比藉由指認對於相似環境條件的不同回應，來證明他的論點，但誠如史佩特（Oscar Spate）指出的，湯恩比辨認「相似」的方式，留下許多不足之處。認為尼羅河（Nile）與格蘭德河（Rio Grande）是相似的河流環境，因而它們之間的人類發展差異，可以用不同的人類回應方式來解釋，但只需要隨意檢視這兩座河谷的自然差異，就知道這種想法錯得離譜。²²但在這裡，我們再次遇到了要如何判定究竟是何種環境差異對人類行動造成影響的問題。

光譜另一端是截然不同的思想學派，稱為「可能論者」(possibilist)，這個詞主要來自法國史學家費夫爾 (Lucien Febvre)，他在1910年的最著名陳述是，「沒有必然性，到處充滿了可能性；作為這些可能性主宰的人類，則是其實際效用的判官。」在此，因果的箭頭逆轉了。「人主宰自然」，並且依照他的意志來塑造她（過去，這個關係通常以這種性別化方式來闡述）。培根和笛卡兒因而頌揚「人」通過科學、工程和技術來支配自然的潛能。這種普羅米修斯式論點，很少認為任何事情絕對都有可能。不過，它確實堅決主張，人類的作為根本上仰賴了技術、成本、資金、人類組織、文化偏好等等。誠如地理學者包曼 (Isaiah Bowman) 曾經嘲諷的，我們總是有可能移動山脈，但你首先必須發行債券。²³ 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有著眾多針對世界的普羅米修斯式和生產主義取向表述，而它們繼續存在於蘇聯發展的史達林階段的實際作為中，導致某些災難性後果。它們甚至影響了科學研究，在不幸的李森科事件 (Lysenko affair) 裡，蘇聯的農藝學遭禁錮於習得的特徵可遺傳的錯誤教條（當時身為法國共產黨成員的列斐伏爾拒絕認可這種觀點）中，約達四十年。然而，從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推導出普羅米修斯觀點是否正確，卻是個當代的爭論問題。其他的可能論形式則較為節制。例如，法國地理學者白蘭士認為法國的特殊區域地景（包括布列塔尼〔Brittany〕和勃艮地〔Burgundy〕）都是人為建構，但他認為它們的崛起過程，是人類行動最終匯聚形成了獨特的區域性格，即人類行動與自然可能

性的和諧共生。獨特的區域不是既定的，而是人類行動從自然中開鑿出來的。²⁴ 有時候，這接近我們在第七章遇到的場所精神 (*genius loci*) 觀念的區域版本：人類行動揭顯了自然世界的基本固有特質。於是，區域地景與城市形式都被理解為經年孜孜不倦的人類機巧造就的藝術品。

然而，這個良性觀點卻與哀嘆非意圖後果的大量文獻形成了對比。這個論點早在 1864 年，就由馬許 (George Perkins Marsh) 這位環境變遷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非凡先驅提出了。馬許認識到，要區分由人類造成的與自然發生的環境變化，往往很困難，但他認為「確定的是，人類已經做了很多塑造地球表面形式的事」。我們現在遇到的大部分地理形勢，都是人類活動產物 (對戴蒙和阿西莫格魯兩人而言，這是全然陌生的概念)。雖然這些變化絕非總是有害於人類利益，但我們經常忘記地球被賦予我們，「僅僅是爲了使用權，而非爲了消費，更不用說是爲了揮霍浪費」 (連柴契爾都發表過類似意見，雖然她說這番話是作爲關閉煤礦，以及粉碎長期穩定英國勞工運動的礦工工會的漂亮掩飾)。馬許指出，人類行動將「自然的和諧」轉變成「不和諧」。「相較於刻意改變所導致的偶然性、非意圖後果」，及其伴隨的所有破壞性後果，刻意改變本身顯得相形見绌。²⁵ 恩格斯提出了相同論點：「然而，切莫因爲我們人類戰勝了自然，就過分自以爲是。因爲每一回這樣的勝利，大自然都會報復我們。真的，每一回勝利，一開始帶來我們期待的結果，但接二連三卻產生截然不同、出乎意料

219 的效應，而這往往抵銷了第一回的收穫。……因此，每一步都在提醒我們，我們可沒有統治自然，像個征服外國人的戰勝者，像個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人——相反，由血肉與大腦構成的我們，屬於自然，存在於自然之中，我們對自然的所有掌握，都在於這個事實：即我們掌有凌駕所有能夠學習自然法則、並予以正確運用的其他生物之上的優勢。」²⁶

社會可能努力替自己創造有利於自身生存的生態條件和環境利基，但它們無法在不引發非意圖生態後果的情況下這麼做。從支持人類活動的觀點來看，這一切並非全都是普遍有害（世界上有部分地方〔如西伯利亞〕可能藉由增加農業生產力而從全球暖化中獲益，但同時其他區域〔如美國中西部〕卻可能蒙受巨大災害）。但我們很難看到更廉價的穿越北極海運航線的可能性（給了俄羅斯那種薩克斯認為對其發展至關重要的海岸線），能夠抵銷海平面上升一公尺以上的全球衝擊。

因此，從環境決定論、走走停停決定論、挑戰與回應，乃至於人類支配自然的這一切意見，最終只是加倍回報於己身，崩塌成爲通常頗爲可悲的非意圖後果與大自然報復的說法。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社會科學家——196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成員之一是馬庫斯（Herbert Marcuse）——進一步主張，支配自然無可避免會導致支配其他人類，甚至支配了人性本身。²⁷但是，幾乎所有這些立場都有個共通想法，即一邊是「人」與「文化」，另一邊是「自然」、「環境」、甚至「地理」，這兩方之間必須有清楚的分析性區

分。意見相左之處在於因果箭頭的方向，以及其中的互惠性互動與反饋的程度。不過，事實與價值、事物與心靈建構、物質與非物質世界之間的笛卡兒／康德式二分法，延伸至「人」與「自然」彼此永恆鬥爭的觀念，並且假設這些獨立實體之間有某種因果互動。將地理學與人類學分開的康德式區別，於是有了道理；前者是研究自然系統中的人，而人在驅動各處之社會秩序的自然力量大海中備受衝擊翻攪，後者則是研究身為積極主體的人類，如何造就自己，從自然氣質中鍛造出性格（有如康德所言），並克服他們原初環境條件的缺陷，朝向區域共生邁進（有如白蘭士關於區域性之生產的討論），甚至在重塑社會與自然關係的過程中，邁向寰宇主義理性（貝克的烏托邦夢想）。

220

因此，所有與自然之關係的詮釋，都需要嚴肅的批判性審視，不只牽涉它們的說服力與「真值」（truth value），也要探究它們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涵義。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大力讚揚戴蒙的文本，以及該書的成功（它被製作成美國公共電視台的迷你劇集），既是個科學真實性的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儘管環境主義的（其實還有遺傳學、種族主義或文化主義的）解讀，不能單單因為它們令人不安的政治意涵，或因為它們冒犯了某些人們深切珍視的意識形態信念，就予以摒棄，但是，某些勢力龐大的群體急切地在政治上擁護和推廣戴蒙的文本，應該提醒我們注意以下關鍵問題：我們如何知道，我們與自然的關係，以及我們與環境條件的關係，在什麼時候是吾人行動的關鍵決定因素？據此，我

們要從哪裡展開批判性分析，又該如何進行？

事物的自然秩序

像**自然**和**環境**這種字眼，與「**地理**」這個觀念有著密切關係，猶如**空間**和**地方**，有著諸多的競逐、爭論，還充斥著多重意義。威廉斯的著名說法是，「雖然往往受到忽視，但自然包含了……既複雜又變化多端的鉅量人類歷史，隨著其他概念和經驗而變化。」²⁸ 這個「受到忽視的」面向造成了特殊的困難，因為很難辨認出洛夫喬伊（Arthur Lovejoy）所謂的「在個人或某個世代的思維裡運作的不完全明確的**假設**，或多少是**無意識的心理習慣**」，它們定義了「一個年代的主導知識傾向」。戴蒙的書所產生的那種受忽視的意義轉變，可能有廣泛的政治和環境後果，正是因為它們開始被納入政策與行動中：「這泰半是因為它們的曖昧性，單單文字就有在歷史上身為力量而獨立行動的能耐。各種術語、措詞、公式中的其中一種意義或其所暗示的思想，由於跟普遍信念、價值標準、特定年代品味合宜相容，而廣為流傳或接納，可能有助於改變信念、價值標準和品味，此乃因為沒有被使用者明確區辨出來的其他意義或暗示，逐漸成了其意蘊的主導元素。不消說，『自然』這個詞就是最極致的事例了。」²⁹

針對自然的意義的當代鬥爭，不僅是語意學的問題。假使連馬克思都承認，如果我們有關世界的心靈概念，會轉化成塑造人

類歷史與地理的物質力量，那麼，針對這個世界的意義的鬥爭，就會成爲政治與文化衝突的前鋒，一如索珀（Kate Soper）在《何謂自然？》（*What Is Nature?*）裡的說明。³⁰

環境這個詞同樣有爭議，但理由卻有點不一樣。環境是環繞於，或更確切地說，是存在於某個存有的周遭，而同某特定時刻之該存有狀態**相關**的任何東西。直言之，就**環境**的定義而論，某個存有之空間「情境化」及其內在條件與需求，和周遭條件本身一樣重要，雖然相關性的判準變化多端，並取決於時空性之複雜組態中的區位。商業領袖掛念政治和法律環境，政客憂慮經濟環境，城市居民擔憂社會環境，罪犯肯定會擔心執法環境，污染者則煩惱管制環境。我們每個人都被定位於某個「環境」（雖然往往只是暫時性的，因爲我們會遊歷四方），因此，我們所有人都有「環境議題」可能涉及了什麼的某種觀念。當我們連接**自然與環境**這兩個詞，構想出「自然」或「地理」環境的概念，就像戴蒙和薩克斯一樣，我們就會發覺，自己將所有的曖昧含糊倍增，到了極易導致困惑而非澄清的地步。長期以來，這個問題展現於無數且時常衝突的方式中，而一個普遍接受且看似中立的概念如「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就是藉此框架於環境辯論內，並且獲得詮釋。不過，困惑和曖昧也開創了大好時機，因此，如洛夫喬伊指出的，有可能從事批判性介入，以便生產出思考與行動的新可能性。其結果不必然是良善或進步的，而且它們絕非輕易能與對寰宇主義的道德允諾共存。譬如，倘若戴蒙的適當地理知識版本

222 正確無誤，那麼，努斯鮑姆的全球正義之能力取向，就需要我們先抬起那隻重壓在我們身上的一萬年前歷史的沉重之手，作為其先決條件。

啓蒙以降針對自然問題的處理方式，多半將自然視為既外在於人類行動，又是人類行動可能性的普遍條件。³¹雖然我稍後會駁斥這個觀點，但我們當代的自然知識大多源自這個構想，卻也是事實。它源於自然與文化、心與物、天然與人造之間長久的二元區分，也來自自然相對於培育、事實相對於價值、人類支配自然相對於環境或基因決定論等，這類同樣長期未歇的爭議。既然許多我們有價值的「自然律」知識都出自該取向，而且這種知識所產生的爭議與區分，繼續支撐著我們的常識觀點，那麼針對這類知識的地位，以及這種知識引發的自然概念，表示一點意見，就變得很重要了。對它的根源提出異議，不是要否認已經獲致的自然律的重要洞見。然而，牛頓和笛卡兒的機械世界觀，假定空間和時間都是絕對的，而且如懷海德所言，一旦做出這種排他性的推斷，一種十分特殊的「自然」建構就會隨之而來。空間和時間的絕對版本，促進了可測量性與可計算性，還支持了精密的技術與實作，可以極好地應用於修築橋樑，而其機械化效率可以同爲了擊垮橋樑而發展出來的軍事技術媲美。絕對觀點所支持的解釋模型是，可以發現的實體（於絕對空間和時間中個別化），有如因果能動者般運作，對其他實體引發可以測量的效果，並造成了更大型的構造（就像人類個體在存有論上被視爲優先於稱爲社會的

創造物)。雖然，像萊布尼茲這類人物不同意牛頓 / 笛卡兒的觀點，但趨勢是將上帝視為至高無上的工程師，是個最終必須扮演替宇宙機械裝置上緊發條的唯一角色的鐘錶匠。笛卡兒式工程師是個理性計算者、中立的觀察家，可用「宛如上帝般」的精確度來主宰世界的偉大建築師。

藉由將自然視為所有人類活動的普遍可能性條件，啓蒙科學遂以吻合自由主義理論的方式，建構了自然（洛克和牛頓的關係最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世界及其內部所有事物，如果不是在實質上，就是必須在概念上予以扁平化、同質化、簡化（像佛里曼一樣），以便吻合牛頓與笛卡兒式科學的絕對主義。偉大的笛卡兒式工程師遇到的一切，都必須變得能夠共變且共存（*cogredient and compossible*）（懷海德可能會這麼說）。自然的普遍化，最容易在私有財產權、商品化和市場交易的標誌下展開，如此一來，就可以隨意購買和販售近用自然之構成部分的管道，以及爲了獲取有助於滿足人類願望、需求和欲望的任何一切事物，而侵襲並掠奪自然的倉庫。一如海德格後來的苛刻抱怨，大自然只不過被視為一個巨大的加油站罷了。扣接上這種認識及其所容許之技術的新興企業化資本主義，其後果十分驚人。結果，整個社會—生態世界很可能遭逢劇烈改變，也已然有了改變。

這種科學的問題，在於它既零碎又化約。它在由互動部分（清楚界定的實體，解釋了對於絕對空間與時間理論的依賴）構成的封閉且界線分明的系統中，運作得最好，而互動部分的行爲決

定了有邊界整體的行為。這種科學無法輕易處理開放系統，或是相對時—空過程（雖然它最後學會了如何處理這兩種情況，即徹底重構可計算性的數學，訴諸非歐幾里德幾何學、系統和複雜理論等），如今，它則努力要掌握關係性。當這種與外界隔絕的封閉系統世界中發生的結構與動態的有效發現，投射到其他領域時，就會產生最大的危險。馬克思在一篇尖刻評論中寫道，「自然科學的抽象唯物論，排除歷史及其過程的唯物論，其弱點立即顯現於它的代言人冒險超出自身專業範圍，而發表的抽象且意識形態的概念中。」³² 這則評論無疑也適用於戴蒙。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歷史，或是當前訴諸的基因決定論或混沌理論中，我們同樣遇到非專業者採用確定的自然法則概念並視之為普遍真理時所引發的危險。例如，有人僅以熱力學第二定律規定的熵增（increasing entropy）來詮釋當前的環境難題。³³ 在封閉的物理系統裡，能量隨著時間推移而消散。問題在於，如果這是我們宇宙中至關重大的唯一法則，那麼大爆炸就永遠不會發生，而且以日益增強的（雖然無可否認是局部的）能量集中為特徵的地球演化過程（包括整個文明史），就不可能發生。這一點無損於分析所指出的，歷經萬古的生物過程而儲存於地球內部的能量，因為猖獗的資本主義而迅速消散，石炭紀儲存的能量（煤炭）是 19 世紀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基礎，而白堊紀儲存的能量（石油和天然氣）在 20 世紀後半嶄露頭角——這為 21 世紀末可利用能源的庫存看起來像是什麼，留下一個大問號。但是，如果樹木和甲殼綱動物可以儲存能量，那

麼我們也可以。技術問題可能很龐大，但當前情況依舊是每年使用的巨大儲存能量數量，還不到我們每年直接從太陽取得之能源總量的5%。直到太陽燃燒殆盡以前，這種能量來源都在我們身旁，且具有利用的潛能。認為我們應該完全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單一而僵硬的限制來節制我們的生活，這種想法就跟主張我們應該接受我們的行為受到基因支配一樣荒誕無稽。

普里高津（Prigogine）與史騰格爾（Stenger）的《撥亂反正》（*Order Out of Chaos*）清楚指出，熱力學第二定律與自然科學的其他主要成就——達爾文的演化論——有著深刻矛盾，他們盡心竭力應用機率理論來調和兩者。相反地，萊文斯（Levins）與勒文廷（Lewontin）認為別無其他選擇，只能完全放棄笛卡兒主義，以謀求一種更具辯證性的論證形式，其中空間與時間除了絕對意義，還具有關係性和相對意義。考慮到第七章有關空間和時間的論點，顯而易見的是，若再次引述懷海德的評論，牛頓／笛卡兒的科學概念儘管在許多方面達致輝煌成就，而且在建造和破壞橋樑時仍舊管用，但這種科學概念卻因限制過多，而無法支持什麼構成了自然的任何完整定義，即便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內部。但是，誰說自然科學鎖死了自然的定義？科學爲了某些目的而建立有關自然之特定面向的模型。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模型在它們的範圍和定位，以及正式語言上，都有了劇烈轉改（例如，從決定論到機率論的數學，或者從歐幾里德到非歐幾里德幾何學的轉變）。科學內部不時會發生重大的「典範轉移」（追隨孔恩初版發表於1962

年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我們現在都如此稱呼）；此外，對於科學事業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基礎也有漸增的認識，使人質疑身為觀察者的科學家原本假定的中立和純粹客觀性。³⁴ 例如，取自社會生活的隱喻，在科學探究中扮演要角（如達爾文援引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正是著名案例）。可見，在所謂的自然科學內部及其各種學科之間，「自然」具有異質的且經常會快速轉變的意義。在幾乎每一處轉折，自然的意義也會被各種社會意涵滲透。

這一切都沒有使科學事業失去效力，也無損於根據我們認識的「自然律」而獲致的驚人進展。但它確實在我們將科學發現推論到適當的社會意義上，插入了某種告誡。譬如，當貝克的理想主義人權寰宇主義，被用來反駁人類遺傳學的當代研究發現時，會發生什麼事，以及，我們如何在社會與政治上回應某些疾病的遺傳基礎的發現，並將這種觀念擴及有關人類侵略、暴力及掠奪本能之遺傳基礎的信念？編碼到我們基因裡的是合作與互助（如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的信念），還是競爭性企業主義與競逐支配的鬥爭（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典型主張）？

類存在與事物的人類秩序

如果自然的觀念，即使從自然科學視角內部看來，都是異質、不穩定且有爭議的，那麼，人類本性的概念就更是如此了。

諸如遺傳學、神經生物學或演化心理學這類領域，直接涉及我們對人類天賦和能力的理解，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令心靈與大腦、生物需求與道德律令之間的舊笛卡兒式二元對立，變得千瘡百孔。康德遺留下來的，在地理必然性（由自然賦予且內在於自然）與人類學（由人類創造力所構成）的不安二元性之間徘徊的，有關我們類存在的棘手問題，長伴我們左右。無論採取什麼視角，若如同努斯鮑姆和黑爾德假定的，認為我們可以在完全不了解我們生物性存有的社會後果下，追求某種邁向寰宇主義存在的道德要務，似乎顯得荒謬可笑。但這就是他們的做法，其實也正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內部大多數從業者所做的事。不願意涉入其中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任何人性本質概念具有的不確定性，使得任何進入該領域的旅程都充斥著眾多危險（除了科學的，還有宗教和政治的危難），並以眾多尖刻辛辣言論為特徵。其一般結果就是，在幾乎所有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寰宇主義理論的詮釋裡，完全迴避了關於我們類存在本質的任何嚴肅討論。

226

近年來，興高采烈挑戰這些議題的一個人是威爾森（E. O. Wilson）。威爾森於1970年代塑造了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這個領域，激起了強烈反對（尤其是來自左派），而且他在他最近同樣讀者廣多的著作《融通》（*Consilience*）中，繼續引發了對生物決定論的指控。在我看來，這本書因為結合了兩種自我設限的信念而有所缺失。首先是對於化約論的絕對信仰（他坦率承認這是一種信仰）。「所有實質現象，包括恆星誕生與社會制度的運

作，都奠基於最終可以化約為物理法則的物質基礎，無論其間的序列有多麼漫長曲折。」³⁵ 其次是他對因果解釋模型的深刻依戀。使「回溯穿越行為科學，以迄生物學、化學，乃至於最後的物理學」成爲可能的是「連結因果解釋的線索」。³⁶ 這種對於因果關係的正式依附，與他批判且部分拒絕了牛頓 / 笛卡兒式二分法（尤其是心和腦的二分），以及堅決抵制以邏輯實證論作爲理解框架的做法，顯得格格不入。威爾森也擁護笛卡兒和康德式空間與時間建構的絕對主義（這一點，如懷海德可能會有的觀察，顯然影響了他的自然概念）。這種絕對理論繼而支持了他對因果鏈解釋的訴求。不過，威爾森具有廣泛的當代生物科學知識，當他開始將那些研究發現注入我們對自然和人性的理解時，我們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他因爲社會科學有關人類類存在之生物基礎的概念太「平庸」，而予以粗暴攻擊，即使往往訴諸誇張手法，但仍必須嚴肅看待。然而，近年來，他的政治立場轉向環境杞憂論（environmental alarmism），涉及了我們身爲一個物種，如何成爲一股地球物理學及演化的力量，以致「遺傳演化即將成爲有意識且有意志的，並將開創生命歷史的新時代」。³⁷ 這導致他邁向倡議環境倫理，從而與基進環境主義結盟。他猛烈抨擊近來許多美國保守主義運動墮落到「虔誠」且自私的自由意志論，以及經濟學家「目光淺短」，也有助緩和某些針對他的生物化約論的反對聲浪。

化約論在原則上並沒有錯，但那些用化約論者（reductionist）一詞來將論證斥爲無法接受的人，顯然錯了。不過，化約確實有

必要謹慎地加以證明。和馬克思一樣，威爾森認為唯一真正的科學方法，是從唯物論基礎（在馬克思看來，是人類勞動實踐的組織，對威爾森而言，則是物理法則），進展到所有其他東西（包括文化、藝術、法律、語言、政治）的「預測性綜合」方法。然而，威爾森的實質研究及他闡述的無數例證，顯示這種形式的化約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某個程度上，問題源自複雜性的指數增長，但另一個因素是，當問題涉及基因改造，更不必說文化適應時，分歧的選項就變得無限大，使得人們無法預測出某個特定結果。實際上，馬克思和威爾森都承認，往另一個方向移動要簡單得多，並且辨認出比方說，宗教信仰在物質勞動實踐（馬克思）或物理法則（威爾森）裡的「世俗核心」（馬克思的說法）。³⁸然而，探究威爾森懷想的那種無法達致的預測性綜合，導致了重大研究發現，還發揮了有用的功能，就像烏托邦的觀念一樣。

威爾森非常重視要了解橫越各種時間與空間尺度（以絕對的角度來界定）的關係。在生物學裡，其步履乃從宏觀移轉到微觀，跨越「演化生物學、生態學、有機體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及生物化學」。威爾森承認，要令這些知識系統彼此能夠「融通」，相當困難。「融通的程度，可以用每個分支的原則嵌套到其他分支原則的程度來衡量。」³⁹威爾森舉了夠多的實例，證明至少在生物科學領域，這種融通的化約論可行，而且能獲得豐厚成果。但是，將微生物學的研究發現嵌入演化的研究發現中，不等於聲稱演化過程是由分子生物學或生物化學造成的，或甚至

可以通過分子生物學或生物化學來解釋。我可以將人類身體殘疾之基因起源的研究發現，嵌入「特殊奧運」這類事件是如何發生的理解，但後者不能在因果關係上歸因於基因。戴蒙的馴化研究（威爾森給予慷慨的讚美，想必是因為他只讀了該書前半部，沒有讀到海岸線決定論這種蠢話），可以嵌入我們對當代全球不平等的探查，但不能充當後者的解釋。問題在於，威爾森（不同於避免因果推論而轉向了辯證法的馬克思）將嵌入套疊等同於因果關係，而這個等式引起了各種難題。

然而，當威爾森推敲他的例證細節時，他從嚴格控制的化約論轉變為比較寬鬆的後生論（epigenesis），指的是「有機體在遺傳與環境的共同影響下發展」。文化在塑造環境過程方面日益重要。於是，他的論點就成為：基因規定了後生遺傳學（epigenetic）規則，但是文化協助決定哪一種指定基因能存活和繁殖；成功的新基因改變了後生遺傳規則，這些規則進而改變了文化習得管道的方向與效果。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但其方式是令文化得以發揮塑造的作用：「基因鏈的性質和文化的角色，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下。某些文化規範也比競爭性的規範存活且複製得更好，這促成文化在平行於基因演化且通常比基因演化快得多的軌道上演化。文化演化的步調越快，基因與文化的連結就越鬆，儘管連結從未徹底斷裂。文化使得通過沒有相應的精確遺傳規定而發明及傳遞的微調適應，來快速調適於環境變遷成為可能。就此而論，人類與所有其他動物物種，有著根本差異。」⁴⁰

我們將會看到，這一點很接近辯證的論證模式，其中基因（遺傳）與文化（環境）構成了威爾森所謂的「共同演化循環」。他接著繼續說，「文化源自人類行動，而人類行動源自文化，這種說法一點矛盾都沒有。」⁴¹不過，威爾森無法下定決心放棄因果模型。正當因果模型的基礎鬆垮的時候，他堅決重申因果模型的力量。當人類變成一股更強大的地球物理與演化力量，能夠策劃巨大的環境轉變時，遺傳律令的因果角色就顯得越來越微不足道。他說，如果人類以及支持人類的自然，要在適切狀態中存續的話，就必須有意識地控制人類文化行爲。這個論點充斥著混淆不清的成分。最終結果是，「人類本性仍是難以捉摸的概念，因為我們對於構成它的後生遺傳學規則的理解，還很粗淺。」⁴²

人們很看重威爾森的訓令，即要求我們留意空間與時間尺度的問題，以及我們穿越時空尺度而移動時引發的問題。社會科學裡有個麻煩趨勢，就是將一群特殊研究者據以進行研究的特殊空間與時間尺度，當成唯一有效的分析尺度。這會創造出它自己的化約論形式，以致某些人類學家、地理學者與社會學家，將地方民族誌或區域文化尺度，視為所有理解的真正根源。某種意義上，這種尺度選擇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這個尺度上，文化差異的複雜精緻最容易識別出來，所以，極具啓發性和知識性的研究，就在這個尺度的文化分化上產製出來。然而，當它推論理解帝國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唯一方式，就是克服地方民族誌細節的雜亂無章，這時問題就出現了。既然這些雜亂細節從未能針對較

大的論證提出乾淨俐落的反思，那麼，可以推定帝國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宏觀構想（主要是以政治經濟學和地緣政治學，而非從文化角度塑造），必定是錯的。⁴³相反地，僅僅是通過地方研究，很難評估於世界各地金融市場遊蕩的大量剩餘流動性（融資併購、將全球利率推至歷史新低，以及引發投機性建築熱潮，或嚴重擾亂阿根廷、印尼，和現在美國數百萬人民日常生活的大規模週期性危機）的意義，但這樣的認識卻無法據以將地方尺度的資料豐富工作，斥為無關緊要，或者須以某種方式屈從於更廣遠的故事。偏好某種尺度而反對所有其他尺度的傾向，要不是在政治上運作的話，就不會那麼成問題了；人類學家如艾斯科巴的著作，以及在吉柏森—葛拉罕（Gibson-Graham）名下共同發表的地理學家的著作便是如此，導致了宣稱可能從事政治的獨特地方與視角，正是獨特「存有真理」所在的地域（地方）。⁴⁴誠如威爾森的正確定義，任務就是要在不同尺度之間運作（一如斯多葛學派的暗示、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建議，以及我在《希望的空間》中的提議），以及要找出辦法，能將某個尺度上積聚的政治洞察與能量，「嵌入」另一個尺度上的政治洞見與行動。但是，就像史密斯曾多次指出的，我們還沒找到這麼做的令人滿意方式，或有共識的方法。⁴⁵

自然的辯證法

除了通過因果性的笛卡兒化約論以外，還有其他能滿足威爾森的反對理由並實現其目標的方式嗎？我們可以在懷海德所闡述的，以過程為基礎的哲學中，或是在辯證法中找到替選方案。目前為止，後者顯然爭議最多，某種程度是因為任何有關辯證法的話題，都立刻讓人聯想到黑格爾、馬克思，以及更慘的是史達林強加給世界的辯證唯物論恐怖，所構成的密不透風的推理系統。不過，如巴斯卡（Roy Bhaskar）指出的，有許多不同的辯證推理形式，因為參照某個異常的流派而將它們全數拋棄，是毫無理由的。⁴⁶這一點也顯示，有必要清楚說明目前所採用的辯證法形式。在相互排斥的區別及因果關係以外，總是還有思考自然—人類關係的其他方式。舉例來說，史賓諾莎就提出了一種基於拒絕這種區分的哲學與倫理學論證（當代深層生態學，以及內格里、德勒茲和許多其他思想家的著作，都受到史賓諾莎影響）。1930年代，所謂法蘭克福學派陣營的好幾位思想家，在他們針對自然與人性的探究中，推展了更具辯證性的構想。⁴⁷大約在相同年代寫作的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udwell），將這種與自然的關係視為

一種雙重過程——有組織之人的環境化，開啓了所有人類價值（語言、科學、藝術、宗教、意識）；以及自然的人性化，引發自然的物質變化，以及人類自身對於現

實的更多理解。因此，人類的發展並非人與「自然狀態」的逐漸分離。它是人類逐漸與自然相互滲透。歷史並非如資產階級所以為的是人類自身或人類「本性」的故事……而是人類逐漸與自然相互滲透的故事，是他與自然鬥爭的結果。它是經濟生產的故事。人的故事不是人的自由與個性逐漸臣服於組織以便應付自然，而是他通過組織而增長了自由與個性的故事。……歷史是有關人—自然之客體—主體關係的研究，而非將兩者分開的個別探究。⁴⁸

231

考德威爾提出的這種歷史，迥異於戴蒙的歷史。有三件事情凸顯出來。首先，「文化」與「自然」之間的邊界是多孔隙的，而且隨著時間過去而益發如此。自然與社會不是分隔而對立的領域，而是更大整體之動態統一中的內在關係（這便是考慮到後生論的共同演化循環時，威爾森所偏向的概念）。考德威爾藉由檢視經濟生產與再生產，來消解笛卡兒／康德式的二分法。因此，誠如史密斯的堅持，以跟列斐伏爾概念化空間生產完全相同的方式，來仔細檢視「自然的生產」，不只具有意義，也十分根本。⁴⁹人類通過其勞動活動，在自然與環境的生產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是威爾森承認且擔憂的事實）。這意味了，將社會—生態世界概念化為受到在不同尺度上運作的，各種相互交錯的社會—生態過程（有部分是人類活動與欲望的私密表現，但非全部）

的積極塑造與重塑。創造、維繫或解消社會—生態世界的過程、流動及關係，必須是探究的焦點。西元前 8000 年的地理環境，此後就開始徹底轉變（尤其源於人類行動），成為全然不同於最初蹣跚邁向植物與動物馴化期間的地理環境（當人類活動通過像是育種、土地改良與用火，積極生產自然的諸般面向時，它本身就是個清楚的環節）。

再者，必須積極投身於物質實踐（實質經濟生產）、自然的概念化（譬如科學、哲學和藝術的產出），以及世界的生活意識（如考德威爾所謂的「所有人類價值」）之間的列斐伏爾式辯證。「我們文化的宇宙，是同〔古〕埃及的宇宙不一樣的環境」，因為物質實踐、概念化，以及我們經歷與自然的關係性的方式，連同物質環境本身，都隨著空間與時間推移而徹底改變了。第三，個性及自由的成長（社會關係的轉變），是通過與自然互動且相互滲透，而非脫離自然的組織形式達致的。考德威爾堅稱，認為人類越來越疏離自然，甚至從曾經如此密切依附的自然中解放出來，實在錯得離譜。人與自然之間的紐結，隨著時間而日益相互滲透且深化。如史密斯所言，隨著主張遺傳物質和生物過程的財產權，以及新的化學和基因組合（像是基因改造食物）誕生，如今我們都捲入了「『徹底的』自然金融化與商品化」。包含農業整地和人類產生的氣候變遷在內的萬事萬物的歷史顯示，其後果非常深遠且問題重重。⁵⁰ 例如引起龐大倫理問題的基因工程，如今將人類放進一種蓄意干預演化過程根源的位置，而非經由早期那種基因改造

的緩慢過程：植物和動物的育種，或是逐步改造環境，以便創造有利新物種萌生的棲地。同時，隨著財產權體制和市場交換（如碳交易）強加於環境之上，有越來越多環境面向融入資本循環。

考德威爾預示的觀點，驅動了我所謂的「歷史地理唯物論」。這個觀點就是像布勞恩（B. Braun）所說的，從根本上反對亞里斯多德（anti-Aristotelian）。⁵¹ 亞里斯多德主張，世界是由獨特而自主的事物（像是地方）構成的，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本質。相對地，辯證法和以過程為基礎的哲學（如懷海德的哲學）都主張，「元素、事物、結構和系統，不存在於創造、維繫或損害它們的過程、流動與關係之外，也不先於這些而存在。」事物沒有不變的本質，因為誠如懷海德的簡明說法，「現實即過程。」或者，如萊文斯和勒文廷極力主張的，異質性無所不在，「變化是所有系統，以及系統的所有面向的特性。」⁵² 因此，沒有一個穩固且獨立的「外部自然」，讓我們可以拿來當作權威（如馬爾薩斯和森普爾的作法），或是對它發動戰爭（如眾多普羅米修斯的行徑），或與之和諧互動（像是生態烏托邦主義者的作為）。自然與社會是更大的社會—生態整體動態中的內在關係。

將那種關係放回分析裡，會產生一種截然不同於戴蒙所提議者的歷史地理學。克羅農（W. Cronon）在《土地的變遷》（*Changes in the Land*）裡，提供我們一則這種替代方式可能看起來像什麼模樣的例證。他描繪殖民時代的新英格蘭環境，那是超過一萬年的印地安人佔據及森林使用（通過燃燒，促進有利物種多

樣性的森林邊緣條件)的產物。殖民者將自然誤讀成原始、純潔、天然、豐饒的，而且原住民未加以充分利用。歐洲的治理和財產權制度(配上累積財富的獨特歐洲式渴望)植入，造成了深遠的生態轉變，導致原住民被剝奪了居所和生計。印地安人基於他們的社會關係而建構的自然，遭到了破壞，這也意味他們的文化毀壞。土地本身和土地上的變化，使得游牧且極為靈活的原住民生產與再生產模式的維繫，變得無以為繼。克羅農反思這個過程，藉此展開了驅動他的解釋的辯證原則(在戴蒙的研究裡完全缺席，但威爾森的後生理論中則有所暗示)。適當的生態史，「始於假設環境與文化之間的動態變化關係，那是傾向於產生有如連續性的矛盾的關係。此外，它假定兩方之間的互動是辯證的。環境一開始可能塑造了人們在某個時刻可以獲得的選擇範圍，但隨後文化重塑了回應那些選擇的環境，重塑的環境提出一組新的文化再生產的可能性，從而建立了新一波相互決定的週期。人們創造與再造其生計的方式的改變，不僅必須從他們社會關係裡的變化的角度，還要以其生態關係內的變化的角度來分析。」⁵³

這種辯證法所建構的取向，完全不同於笛卡兒/康德式二分世界觀奉行的那種。這種辯證法，既以史賓諾莎、萊布尼茲和許多其他人的傳統為焦點，也以馬克思的關係性、基於過程且動態的思考方式為核心。如今，波姆(David Bohm)的量子理論詮釋、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的微生物學研究取向，以及萊文斯與勒文廷針對一般生物學的研究取向，都接受辯證法是基本原

則。連威爾森也不得不承認，當代神經科學完全免除了「心與物」的區分，現在是以關係性角度來構想研究。此外，經由內斯（受到他對史賓諾莎研究所啟發）的「深層生態學」，以及哈特（Michael Hardt）與內格里（Toni Negri）在（同樣受史賓諾莎啟發的）《帝國》（*Empire*）的構想，關係性思考直接進入政治領域。⁵⁴這意味有種廣泛的對抗文化，正從談論自然與環境的傳統方式（戴蒙和薩克斯的因果分析提供當代例證）中浮現出來。如今，跨越政治光譜的生態理論化，已經瀰漫著更具辯證性的研究取向。

社會—生態轉型的辯證法

234 那麼，有沒有任何更有系統的方式，能建立研究社會—生態轉型動態的辯證取向？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安於適當的辯證方法，以及隨後需要解決的實質問題。例如，我們可以考察溫納格倫研討會（Wennergren symposium）「人類改變地貌的角色」（*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所出版的論文集。⁵⁵這場於1955年舉辦的研討會，是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在尤其是地球科學家、哲學家、史學家、規劃師和神學家的協助下，嘗試探索據以理解人類活動影響下全球環境轉型之歷史地理學的人類學與地理學基礎。這是當時最具系統性的一次嘗試（在許多方面都尚未被超越），試圖回應康德所呼籲的，有系統地檢視據以理解我們周遭世界的地理學與人類學可能性條件。主題是自然與文化

(強調後者)的共同演化。因此，這裡有許多地方接近威爾森要求的後生理論精神，卻沒有威爾森所堅持的驅動所有事物返回基因層次，若非粒子物理學層次的話（這在1955年，幾乎是不可能的想法）。但是，一如可能的預期，這些論文集裡闡述的文化觀點超越了威爾森的看法，因為它承認，在界定不同的人類社會如何看待自身與自然界的關係上，起源神話、宗教、象徵實踐與信念的力量及重要性。這裡清楚地認識到，牛頓／笛卡兒式世界觀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從古特金德（Herbert Gutkind）所謂的「我—汝」（I-Thou）關係性觀點，轉變為疏離且非人性化的「我—它」（I-It）客觀觀點（從而預見了莫欽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的女性主義論題，此乃培根的革命性經驗主義所塑造的命題）。這裡也有先見之明地闡述了威爾森的論點，即控制文化演化的自然鏈結，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鬆弛，人類影響的規模則大幅增強到人類成為主要演化力量的程度。比起五十年前，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對未來演化方向更有自覺且負起責任，這是我們自身所處時代裡反覆宣告的主張。

濫納格倫論文集裡有許多事情有待批評。令人驚奇的是，少了對於性別（沒有任何女人在研討會裡發表論文）、種族歧視、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持續作為，這類重大社會與政治問題的關切。冷戰的動態，國族自決的鬥爭，更別說是資本主義易致危機的特質，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規律這類帶有特定傾向的任何事情，全然沒有提到。畢竟這是1955年，正值美國麥卡錫主義猖

獮之際，即使在普林斯頓的神聖殿堂裡，都有審查的（往往是自命的）分支。結果是過度強調了針對世界環境狀況，據稱為客觀的科學與經驗調查，儘管經由都市規劃專家蓋迪斯（Patrick Geddes）的作品而與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傳統有深厚淵源的孟福（Lewis Mumford），確實設法針對他認定的當代都市化災難軌跡，敲響警鐘。在許多直接政治批判的缺席下，當時（如今猶然）許多發表人遂投身於美學與倫理學的抽象概念，來表達他們的關切，憂慮他們所見到的對自然關係的揮霍無度、漠不關心態度。不過，回溯來看，比較積極正面之處乃是，許多發表人準備好介入的各種實質主題與關係性的範圍。例如，閱讀神學家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針對人類活動引發「演化過程的革命」的評論，可謂獲益良多，該評論描述「勢不可擋的整體化」，繼而遭逢強大科學力量的挾制，該評論也注意到「人類」如何「突然變得壓縮而匯聚」（預示了我後來有關時空壓縮的論點）。他指出，意識轉變的職責落在「反身性發明」的人類力量上（令人想起貝克討論的作為核心寰宇主義價值的反身現代性）。建築師兼規劃師古德金（E. A. Gutkind）的焦點是，我們的世界觀念和願景如何隨著空中旅行（和航空照片）的近便可及，而產生了劇烈變化。這遠非只是技術突破而已：它要求我們的世界文化視角，產生根本而深遠的革命（猶如晚近太空旅行、衛星監測和遙測為我們辦到的）。葛雷肯審視了紛繁多樣的自然論述，指明了變化的歷史，以及關於我們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有著經常衝突的宇宙論和意

見。他的總結懇求是，文化和環境的歷史不應分道揚鑣，而是要認識到它們的整體關係（後生理論）。史波荷（Alexander Spoehr）在一篇簡潔有力的文章裡，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張，即所謂「自然」資源，是針對對於特定社會秩序及其主導階級有用的自然元素，所做的技術、經濟和文化評價（有點預見了當代的社會建構論）。孟福堅持主張都市化可以視為自然史不可或缺的一環（預示了我自己的觀點，「紐約市沒有任何不自然之處」）。其他人則堅稱，農民社會的歷史和文化習俗，應該視為不僅是社會和文化現象，也是生態現象。十分適合一場致力復興馬許精神研討會的是，有許多針對人類行動的非意圖後果，以及相關風險的論著。騷爾和其他人特別強調，火的使用如何以非意圖方式劇烈改變了世界地景。雖然每位作者都傾向在他們特殊且有時過於狹隘的田地裡耕耘，但這套書的集體影響力，還是遠遠大過其部分的總和。實際上，它相當於針對充當理解地球環境史地之基本「預備知識」學科的人類學與地理學，提出了在當時看來適切與否的解釋。由「柏克風格」地理學者騷爾最佳地闡明的虔誠希望，就是它也可能成為建構政治—生態替選方案的搬演舞台。他說，我們應該拋開我們對身體舒適與展示的關切，創造「穩健的實踐者可以確實將美好地球傳給後代子孫，所需依據的倫理和美學」。⁵⁶

環節方法

研討會的參與者一再回到以人類實踐改造自然的觀點，以及這些轉變對於人類生活的意涵。當然，這是馬克思將其辯證取向運用於社會—生態關係的核心論點。「人將自己同作為她自身力量之一的自然對立起來，啟動胳膊和雙腿、頭和手、他身體的自然力量，以便以合乎自身需求的形式來挪用自然產物。藉由如此這般對外在世界施加行動、並予以改變，他同時改變了自己的本性。」根據馬克思的構想，人類生產且居住是哪種經過改造的自然世界的問題，不能同哪種人類社會興起的問題分開。這是馬克思辯證地重構社會—生態整體如何運作的核心。當然，這是從人類立場建構的核心，但是就馬克思而言，那是身為人類的我們可以抱持的唯一可能觀點。使我們的勞動成為人類獨有的是，我們在實際上實現計畫以前，會籌謀計畫。馬克思說，「最糟的建築師和最佳的蜜蜂的區別」，在於「建築師在地面上實際建造以前，就能憑想像立起構造」。⁵⁷ 當我們能夠意識到這個核心辯證，並且在概念上和理智上爭論替選方案時，烏托邦環節（moment）就變得不可避免，就像它在界定人類行動與自然世界之間的辯證關係如何開展上十分重要一樣。

237

這個簡單的辯證及關係性觀點，支持了我在其他地方詳述過的普遍論點：所有政治和社會計劃都是生態計畫，反之亦然。⁵⁸ 不過，如果我們要實現這種取向的全部潛能，就需要更深刻的詳盡

闡釋。馬克思提供我們一條如何辦到這一點的有力線索。馬克思將他的方法和達爾文的自然科學演化論方法相比較，在他針對其「科學」版本歷史唯物論的真實意義提出某些指引的罕見時刻裡，他寫道，「技術透露了人處理自然的模式，以及他藉以維持生活的生產過程，從而也揭露了他的社會關係的形構模式，以及由此生成的心靈概念形構模式。」⁵⁹ 這個段落的設想意義含糊，但若經由辯證和過程哲學的透鏡來閱讀，它便開啓了理論闡釋的豐富領域。他其實建議了六種以人類勞動過程組織為核心的獨特而可以分辨的「環節」（懷海德可能會如此稱呼）。讓我們依序考察這些環節的每一個。

1.就技術而言，馬克思的意思不只是硬體（工具、機械裝置、固定資本設備，以及生產和消費的實質物理基礎建設），還有軟體（將知識、智能，以及我們時代的科學，予以程序化與整合進入機器和一般性的生產活動），以及所採取的獨特組織形式（包括公司和官僚管理結構，以及以科學管理為後盾的更明顯的合作與分工形式）。通過這一切手段，人類勞動的生產力理應提升。⁶⁰

2.自然首先是指某個程度上總是處於不穩定且不斷流變狀態（也因此以其特有的動態為特色）的現象和過程，所構成的整個極度紛繁多樣的世界，以其原始狀態環繞我們周邊（有時稱為「第一自然」）。隨著時間推移，人類行動逐漸改造、引導並重新安排這個自然，從而塑造了直接或間接帶有刻意與非意圖後果之人類行動標記的「第二自然」。人類，和所有其他有機體一樣，是自然

238 的一部分，因而是「根據自然法則來轉變自然的積極主體」。⁶¹與其他有機體的唯一差異——馬克思和威爾森都同意這一點——在於人類可以有意識、有知識且反身地投入這個過程。這就是最糟建築師和最佳蜜蜂的區別。

3.生產活動指的是，我們據以將可用原料轉化為對我們有用的項目的勞動過程。在資本主義下，這些勞動過程也必須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利潤），不只通過生產供直接使用和消費的財貨和服務，也通過製造生產工具（中間財貨和技術硬體）、象徵形式（書籍和藝術品、宗教與文化肖像、大教堂、皇宮，以及財務、學習、國家和階級力量的殿堂等）、實質基礎建設（農業地景，以及作為資源系統的整個城市）、運輸與通訊空間，以及造成不均地理發展和區域分化地景的一切土地轉型。生產和維持空間、地方和建成環境所需的勞動過程，也屬於這個類別。

4.日常生活的維持指的是，個人和社會群體在社會與生態上，通過工作、消費、生活、從事性關係、生殖、溝通，以及在感官上／存在上投入世界，從而再生產他們自身及其社會關係的日常過程。這一點要求解釋我們個人和集體如何鑲嵌於持續進行的社會—生態生活之網——葛蘭西稱為「群眾中的人」（the man in the mass）的「實際活動」，列斐伏爾稱為「日常生活」，布勞岱稱為「物質生活」，哈伯瑪斯則描述為「生活世界」（the lifeworld）。這個領域也納入某些女性主義者概念化為社會再生產的東西。⁶²這個領域長期為馬克思理論所忽略，但成為一個可以聯繫上社會再生

產過程，而更完整地探索性別關係與性傾向問題的重要領域，並將其納入一般理論。⁶²

5. **社會關係**發生於個人和社會群體之間，而這些關係被建構成爲網絡、階層和制度安排時（內在於企業和國家行政體制、官僚組織及軍事機構）。儘管馬克思主要是關心階級關係，但這些社會關係顯然很複雜，而且往往不穩定，也包含環繞著性別與性傾向、種族認同、宗教與語言關聯、以地方爲基礎的及政治性的忠誠（身爲國民，或身爲公民和主體）等等，而結構起來的再生產單位（家庭和親屬結構）及群聚。性別與種族化的區別，顯然在地方及全球資本積累動態中扮演要角，因此，如果沒有考慮據以建構階級關係的整個複雜的社會關係場域，我們不可能理解勞動剝削或奪取的階級特性。⁶³

239

6. **世界的心智概念**不僅指涉個人日復一日的思考方式，還意味了整個承襲而來的大量語言、概念，以及儲存的象徵、文化、宗教、倫理、科學和意識形態的意義，還有美學及道德判斷。這些影響了世界是如何由特定時代、特定地方、置身特殊社會情境下的特定人民所再現和概念化，從而生活、詮釋並作用其上。這些思考和認識方式的龐大異質性和多樣性，以及有關世界的理解與行動之適當方式的無數爭論與衝突路線（對於階級、性別、從屬性等的社會情境性極爲敏感），不只確保了大量的衝突性知識活動，也保證了具備跨越所有其他環節之強大迴響的思想實驗能力。心智概念總是必須接受社會關係、生產體系、日常生活及技

術世界的現實檢驗，以及遭遇自然律時的檢查。

240 溫納格倫研討會援引了這六個不同環節當中的許多課題。例如，史波荷在他的自然資源定義中，引用自然、技術、心智概念、社會關係和生產活動。從那時起，所謂的「自然災害」，就是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來分析，強調它們的社會性、技術性中介，以及概念上框架的特質。那麼，我們要如何概念化這六個環節之間的關係？馬克思將技術置於名單首位，看似在某個程度上支持了主張技術——或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通常指稱的「生產力」——乃決定因素的馬克思主義版本（最清楚呈現在柯恩〔G. A. Cohen〕的《馬克斯的歷史理論》〔*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並為佛里曼所接受）。⁶⁴不過，馬克思實際提到的是技術「披露」和「揭示」了什麼，而非導致了什麼。技術和所有其他環節相互連結，並內化了所有其他環節的效果。例如，軟體面向顯然與心智概念環節有所重疊，而社會關係基本上牽連於組織形式（例如分工的形式）之中。硬體必須要生產出來，而技術總是必須根據自然律來調動自然力量。技術變遷以類似方式產生且傳遞了轉型的衝力，將其納入社會關係、日常生活及心智概念，這反過來又會彈回到技術環節。因此，我們必須概念化所有環節（包括自然本身）內部及其間之衝突性轉型的連續過程。這就是我稱為馬克思「環節方法」（method of moments）的東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裡清楚地概述如下：整體內部的「個別環節，向內決定彼此，往外尋找彼此；但是……它們可能會

或不會發現彼此、相互平衡，符應彼此。這種環節彼此相屬的內在必要性，以及它們彼此間漠然而獨立的存在，已然是矛盾的基礎」。⁶⁵

讓我們聚焦於技術環節，以利說明。在我們的世界裡，對於新技術的恆久追尋，主要是由競逐軍事優勢的地緣政治對抗，以及資本家之間爭取經濟利益的競爭所驅動。掌握優勢技術的那些人，較有可能在競爭情勢中脫穎而出。這些長期存在的社會壓力，導致對於新技術抱持一種物神信念，一種盲目信仰，認為新技術是每一道難題的可能解答（例如，可以注意最近幾年，全球暖化這類環境問題的解答，有多麼頻繁地據說存在於新技術中）。馬克思早就指出了，技術創新本身成了一種事業，以這種物神信念為糧食，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社會及政治關係下往前驅策。⁶⁶因此，新技術在我們演化動態中（尤其是通過生產與消費系統、與自然關係的快速變遷，以及人性本身的變化）扮演的角色，不論好壞，都是我們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關係（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及其伴隨的心智概念的副產品。技術不是什麼自由漂浮的天降神兵（*deus ex machina*），在各種人類進取活動的混戰中，或經由無論是普羅米修斯、或充滿創意的企業家這類神話人物的奇特努力，而隨意演變。它脫胎自所有其他環節內部及其周圍交互作用的混亂騷動，由部分源於地緣政治與經濟競爭之強制法則的物神信念推動前行。

不過，且讓我們想一想，我們對於世界的心智概念，如何取

決於我們藉助望遠鏡和顯微鏡、X光 and 電腦斷層掃描機，來觀看、測量、校準的能力，以及所有這些技術能力，如何有助於改變我們對於人體（及附屬的身分認同）與其環境（宇宙）之關聯的理解。在先進資本主義世界中，我們以汽車、手機和黑莓機這類技術為中心，重新校準我們的日常生活（更不用說我們如何使自己適應於企業和官僚組織形式），持續創造新的技術需求，來應付日常挫折和矛盾（我們城市裡的交通堵塞引發交通擁擠付費的需求，而這需要實施新的監測和監督技術）。哈洛威（D. Haraway）在她討論該主題的著名宣言裡問道，由於我們快速捲入了同新技術的糾葛，在什麼程度上，人性已經變形成為人機合體（cyborg）的性質？⁶⁷但是，我們接下來從望遠鏡另一端回望，想想看，為什麼在特定時間和地方的某個人，會擁有這種心智概念，認為有某種重要的東西，可以用特定方式來觀看，還發現了有透鏡研磨機和金屬工匠的物質與社會情境，以及有贊助者願意支持並欣賞（往往面臨社會敵意及反對）藉助望遠鏡與顯微鏡的新觀看之道的發展。然後，再想想著迷於加速和擴大資本流通領域之競爭需求與欲望的資本家，如何找出並即刻採納能促進提升速度、縮減移動空間障礙的技術（如手機），而非偏好探索其他涉及休息與停滯的技術。

界定了技術環節的自主與物神力量，其鮮明存在不意味著技術環節相對於所有其他環節，擁有決定作用。事實證明，從這六個環節中選出某一個環節作為主導的決定力量，有著悠久的歷

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每個環節都內化了自主的變遷力量，並且會在其他環節上引發廣泛的後果。這些影響很容易追蹤，留下一種運作中的主要驅動力量的印象。若賦予自然環節（有大量自主轉變的壓倒性證據）優先性，便會帶給我們環境決定論（雖然，整體而言，鮮少有隔絕於其他環節的情況，戴蒙的「軟式」環境決定論便是一例）。還有甚至沒有引用馬克思反對的黑格爾哲學觀念論，便將觀念與心智概念的自主性，置於所有變化前鋒的那些人（如溫納格倫研討會裡的古特金德）。然而，馬克思不否認「心智環節」的自主性，承認觀念有可能是創造歷史的物質力量。馬克思還寫了一句名言「所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支持將有爭議的階級（或性別、種族和宗教）社會關係，擺進歷史的駕駛座。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採取階級關係作為終極決定因素的路線，有著非常深遠的傳統，這也是某些無政府主義者和自治論者抱持的觀點，他們相信這是社會變遷的主要決定因素。某些女性主義者偏好優先以性別關係作為主要動力，而以通俗領域的霍肯（P. Hawken）為代表的其他分析者，則指稱自主動力源自日常生活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來自特定地方的生活世界，確實、可能或將會在社會—生態演化中扮演決定角色。⁶⁸

這些決定論見解，沒有一個奏效。甚至在戴蒙的例子裡，他的書第一部分確實很合理且運作良好，默默包含了不是他所宣稱的簡單地理因果關係，而是一種辯證移動、共同演化，其中的技術創新、新社會關係形式，以及新的世界心智概念（象徵性學習

系統)，在特定自然環境下以相互支持的方式匯聚在一起。因此，唯一適當的前行方式，就是要看到並保持每個「環節」與其他環節的辯證張力。在他文本的一個奇妙的片段中，戴蒙幾乎有了相同的認識：他突然將他的語言從環境因果關係，轉為演化變遷的「自動催化過程」，描述其為「在正向回饋循環中自我催化，一旦啟動，就會越來越快」。這形同於召喚了過程哲學，而不是因果關係！不過，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採納戴蒙解釋肥沃月彎農業起源這個最合理的部分，並且在共同演化過程的「環節」理論框架中予以重鑄，其實是相對容易的。最近，針對我們與自然的演化及共同演化關係，所做的最富洞見研究，像是哈洛威在《靈長類視野：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與自然》（*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的絕妙分析，便來自於探索若非全部這六個環節，至少是其中某些環節之間的交錯辯證關係。⁶⁹ 例如，面對經濟或環境危機時，我們必須聚焦於這六個環節之間的動態相互關係，即使我們認識到它們之間有著某種不對稱。譬如，關切環境正直（environmental probity）的心智概念，在實體化為譬如新的生產技術，以及具體化為日常生活行為的徹底重構之前（如環境主義者經常充滿挫敗地提到的），一直被認為毫無價值。技術創新，在經由生產與消費的世界而被採納和擴散之前，都沒有意義（中國史已經再三地如此表明），再者，在令日常生活能夠接納新技術，並獲得政治與法律認可（涉及介入人類性傾向和生殖時，就成了棘手問題）的社會

關係與心智概念沒有轉變的情形下，這些技術創新也不可能改變。在特定的歷史和地理時勢中，不同環節之間的不均張力和不對稱性，可能會影響社會—生態整體內部的全盤轉變方向。在某個地方和時間，技術變革可能看似先驅，而其他環節不是落後，就是成為排拒和抵抗的積極場所，但是在另一個時刻，社會關係或日常生活的革命卻可能躍居前台。心智概念和烏托邦思想，往往超出其他任何環節可以承受的程度，但是在其他情況下，觀念確實成了變革的主導力量，至少能在特定地方維持一段時間。

因此，我們不能將某個環節簡化為其他環節的單純折射。自然秩序的突變——過去產生造成原住民嚴重人口浩劫的天花和梅毒病菌，以及晚近滋生對全球健康構成直接問題的愛滋病毒 / 愛滋病、西尼羅河病毒、禽流感和 SARS ——並非人類行動的直接產物。但是，這些變異為日常生活的再生產、我們的心智概念，以及社會關係和生產過程，造成了重大問題，喚起對技術回應的即時需求。然而，即使在這個案例中，我們都不能假定看似自主的突變，沒有人類影響的痕跡。比方說，中國珠江三角洲人口與人類活動的極高密度，創造了各式各樣新病原體出現的完美棲地，如戴蒙提到的，古美索不達米亞似乎也是如此。各個環節的回應性質，也不能預先決定：無論愛滋病毒 / 愛滋病在我們的心智概念中，是再現為上帝給同性戀罪惡的報復，還是伴隨巨大社會後果的突變事故，都很重要。以特殊地方的日常生活再生產（例如，性認同與性偏好問題）為核心而興起的運動，同樣期待新

技術的生產，要求新的社會關係和心智概念，並暗示一種不同的自然關係。所有六種相互滲透的環節若未改變，就不可能發生整體性的轉變。沒有任何自動回應，能確立環節之間可以預期的（更別說是決定性的）互動模式。社會—生態整體性的內在固有特質，並未冷酷無情地促使它朝向某種目的論式目標移動。演化是偶然的，而非事先決定的。

根據這種解讀，這六個環節合在一起，並未建構出黑格爾那種組織嚴密的整體性，其中每個環節緊密結合得像是所有其他環節的內在關係，以致沒有移動的自由或自主。馬克思的「環節方法」導向一種共同演化的生態環節理論，內含於列斐伏爾可能會稱為「全體」（ensemble），或德勒茲稱為互動過程的「組裝」（assemblage）中。列斐伏爾將這個過程，想像為與空間的生產有著綿密的關係（史密斯在《不均發展》〔*Uneven Development*〕中將這個觀念闡述為自然的生產與轉變，同空間的生產之間的明確關係）。德勒茲則以領域化和去領域化過程的觀點來看待此過程。例如，他將組裝定義為「由異質項目構成的多樣性」——我則稱為環節——「並且建立了它們之間的聯繫關係。……因此，組裝的唯一統一，是共同運作的那種：它是一種共生、『同感』。它絕對不是重要的親子關係，而是聯盟、混合：這些不是血脈繼承，而是傳染病、疫病、風。」⁷⁰ 德勒茲在一個協助連結地方生產與組裝觀念的段落裡說道，組裝「既有穩定它的領域面向或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ed）面向，也有衝散它的去領域化鋒緣」。⁷¹

馬克思針對社會—生態環節組裝的處理，可能藉由這種方式影響地方形構的過程。換句話說，若未審視這六種社會—生態環節之間有邊界的交互作用，我們就無法理解地方形構、解體和更新的過程。這就是我設想城市形構和都市演化過程的方式。有趣的是，當我們回顧某些最好的歷史區域地理學，例如白蘭士創造的那種，我們看到的理解方式，乃是通過馬克思所界定的環節隨空間與時間推移的共同演化，來看待區域性的生產。

245

我們要如何調和這種思考方式，與勞動過程存在於同自然的辯證關係核心的主張？馬克思堅信，勞動過程——轉變自然時，社會關係與生產力的緊密協調——是產生法律與政治的上層結構，以及相應的社會意識形式的真正經濟基礎。應該注意的是，「從中產生」不必然意謂了「被決定」。但馬克思繼續說，「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了他們的存在，而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⁷²馬克思在這裡似乎否定了我們的心智概念具有任何自主性。觀念不是終極決定因素（如黑格爾與唯心論者的預設）的看法，與我們闡明的環節架構全然一致，但完全拒絕心智概念有任何自主性的想法，則非如此。再者，這種否定也與馬克思的建築師關鍵隱喻抵觸，建築師跟蜜蜂不同，建築師在地面上實際建造以前，就能憑想像立起構造。馬克思在其他地方承認，觀念可以成爲歷史變遷中的一股物質力量（否則，他爲什麼要如此雄辯滔滔，費心撰寫他自己的觀念？）因此，我們應該拒絕認定心智概念缺乏任何自主性的論點，視其爲表現了馬克思過度熱衷於探索

一種不可能（但往往富有成效）的化約論，也展現了他正確地專注於駁斥黑格爾的觀念論。心智概念及其相關的文化轉型，在環節的社會—生態系統內部，具有一種創造性的、但並非決定性的角色。

不過，馬克思在同一個段落裡也主張，經濟基礎的變遷，終究會導致整個龐大上層結構的變化。這種化約論陳述（要記得，並非所有化約論都可以視為不合法而自動排除），旋即有所修正，指出「總是有必要區分可用自然科學精確性來決定的生產經濟條件的物質轉變，以及法律、政治、宗教、藝術或哲學——簡言之，人藉以覺察這種衝突並鬥爭到底的意識形態形式」。⁷³ 針對這個構想的某種詮釋，完全能吻合環節理論。個人和社會群體據以覺察到衝突，並鬥爭到底（例如在心智概念的領域）的形式，是關係性的，因而是非物質的，但這些鬥爭如何解決，在實作世界中卻有著客觀後果。有時候有人倡議的那種基礎與上層結構之間的機械因果模型，必須分解成爲這六個環節之間互動且內化的關係的辯證。然而，社會—生態演化過程中唯一的客觀之處，即我們可以實際測量其影響且找出我們置身何方的，乃是通過人類勞動而實質地轉變自然。這很類似馬克思將資本概念定義爲移動中的價值（一種非物質但客觀的社會關係），其物理形式包括買入的商品（勞動力和生產工具）、生產過程、供應市場的商品，以及最後是貨幣（理解爲價值之非物質性的物質再現）。只有在貨幣這個階段，才可能知道資本家是否獲得剩餘價值（通過貨幣利潤來實

質地衡量)。不過，針對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或是在資本積累中的位置，取得唯物論式的測量（「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是一回事，弄清楚我們如何抵達那裡卻是另一回事。而「我們如何抵達那裡」，需要各式各樣的特質，包括像是辯證地穿越馬克思辨認出來的所有六個環節。這個例證中清楚採納的馬克思唯物論觀點指出，如果我們終究免不了要與實質上令我們厭惡、或有實際危害的自然（飢荒、臭氧層破洞、有毒污染物、全球暖化）為伍——或者，與可以衡量的無利可圖之資本循環產生關連——那麼，「整個龐大的上層結構」（或我寧願稱為「所有環節」）中的某物就必須改變，無論那是社會關係、心智概念、日常生活、法律與政治制度、技術，或是與自然的關係。在這種概念下，決不會違反我們稍早概述過的環節方法。與自然之關係的物理測量，確實提供了據以判斷的穩固底線，而這似乎是將某種不對稱性，引入了環節之間關係的開展方式中。簡言之，觀念不能拿來吃喝，我們身為自然中的類存在的物質再生產，必須承認這項基本事實，就像我們能坦率承認，我們的類存在意義遠非只是吃喝而已。但是，在不同環節之間的所有這些辯證互動的中心，在共同演化過程的核心，存在著人類勞動組織的根本問題，因為就是透過勞動的實質活動，才顯露出與自然之間的重大關係。任何計畫若未正視誰有權力去組織人類勞動，又是為了什麼目的與原因等問題，就沒有掌握到重點。不去闡述這一點，就是令我們自己注定置身於外圍政治，只是尋求以一種不妨礙全球尺度資本積累之當前實

作的方式，來調節我們與自然的關係。

那麼，適當的寰宇主義計畫構想，需要哪一種地理學和生態學知識？更明確地說，我們對於人類—自然關係的概念是什麼？答案是針對世界的歷史地理採取辯證的、以過程為基礎的互動研究取向，也就是克羅農實踐的、勒文廷宣揚的、馬克思通過辯證環節方法而予以理論化，而懷海德在他以過程為基礎的自然哲學中推進的那種方法。如果任何寰宇主義計畫要有一點成功機會的話，就必須將歷史地理唯物論的這種本質納入其中。再者，任何替選出路的概念化，都必須回答以下問題：哪種日常生活、哪種與自然的關係、哪些社會關係、什麼生產過程，以及哪幾種心智概念和技術，足以滿足人類的需要、需求和欲望。任何改變策略，都必須考慮如何共同推展各個環節的變遷。這一點對於地方建構，或是構成社會—生態辯證，以及時空性生產之模式與習性的轉變活動而論，都同樣真確。脫離事物既存狀態的革命，就是藉由跨越這些整合性環節的辯證法而辦到的。⁷⁴革命的地理理論，必須將這種辯證理解納入其理論核心。那麼，是否有某種我們可以稱為「地理理論」的東西呢？如果有的話，是些什麼內容？

結語

地理理論與地理理性的謀略

我們現在可以回到努斯鮑姆遺留未決的問題：需要什麼樣的地理學、人類學和生態學知識，才能適當地建立一個解放的寰宇主義政治？帕蒂森對於不同地理學探究傳統的界定，開啓了批判地探究支持一切地理知識形式的三大基本概念的道路——空間、地方與環境。在地理學科中，趨勢是分別處理這三個概念領域。空間通常被視為是系統性、數學的（幾何學的），可以從事空間秩序的科學研究（時間則歸類到比較統計學的研究）；區域（地方）則遵循法則、獨特、取決於時間，並且比較容易從事人文主義和詮釋學探討；至於環境，雖然也適合從事詮釋學和文學探討，則是依循地球科學的演化傳統，涉及氣候、地形學和其他土地變遷之時間動態的科學研究。這種傳統的地理知識結構，即使其部署並非公然支持國家權力、資本積累，以及帝國主義與軍事行徑（但它們經常如此），顯然無法建立解放的寰宇主義教育所需要的批判視角，更別提能夠對抗地理理性的無數謀略，後者自康德以降，就容許高貴的普遍原則，搭配著極度令人痛苦的地理細節與分裂。帕蒂森提議，所有這三種視角可在實務工作中匯流，但這

比較像是充滿希望的姿態而非系統性的結論。

250

然而，在第七、八和九章，我們經常遇到的情況是，一旦拋棄了康德派和實證主義的架構，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將空間、地方和環境這三個概念場域，看待為不僅彼此相關，還是潛在的相互整合。例如，如果懷海德說「自然意義的決定，主要是將它簡化為有關時間特質和空間特質的討論」，只是局部正確，以及，如果像德利克和凱茲所堅持的，不可能在空間和時間的理解之外，詳述地方的意義、定義與性質，那麼，這三個概念場域的統一，就不只是有可能，還是無可避免。我宣稱，這種概念上的統一，替地理理論界定了一個適當的核心，使其可以擔任一切其他認識形式的「可能性條件」，同時批判地照亮了地理理性危險但隱匿的謀略。問題是：這三個概念場域的統一，要通過什麼辦法才能夠達成？

回想一下，這三個概念場域是：

1. **環境**，是以構成社會—生態辯證的六個環節——科技、與演變中自然的關係、生產與消費過程、轉變的社會關係、變化中的心智概念，以及日常生活的再生產——之間的動態相互關係來理解。
2. **時空性**，是以絕對、相對和關係時—空的辯證角度來理解，這三者與物質社會—空間實踐、競爭性的概念化和再現，以及大相逕庭的生活時空模式相互交錯。

3. **地方與區域**，理解為各種不同尺度（地域、區域、國族等）上，地理景觀中作為「相對恆存」之獨特且有意義實體的人類建構、維持與拆解（領域化的組裝，像是鄰里、城市、經濟和文化區域）。

持續不斷塑造著地表社會生活之歷史地理的交錯力量，可在理論上簡化為空間、地方和環境的生產過程。這種簡化需要配置一種以過程為基礎的哲學，並且在再現與探究方面採用辯證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夠組合起一個稱為「地理理論」的統一知識場域。

過去三百年來，在先進資本主義世界及其他地方，塑造了主
251
導性的詮釋和政治實踐（包括通俗和學院層次）的大部分主流社會理論（包含歷史唯物論），很少關心或批判地關切空間、地方和環境的生產，如何衝擊了思想和行動。實際上，我們幾乎在每個地方都可以發現未言明的預設，涉及了空間和時間的性質、地方（國族國家）的凝聚力，以及何者由自然給定、何者不是的觀念。問題在於這些地理學概念的部署運用缺乏批判，而且是特別設定的，卻沒有考慮地理假設在塑造思想與行動模式上的重要性。這種情形很像是試圖拿舊地圖來航行世界，不管地圖有多少武斷或錯誤之處。¹我認為，嚴重的詮釋錯誤（戴蒙犯下的那類錯誤），以及政策和政治方面同等嚴重的過失（薩克斯和弗里曼持續必須負責的那類過失），大部分要歸咎於未能承認、更別提理解所運用之地理知識的重要性。地理理性謀略的運作，未受質疑。

我在這裡倡導的地理理論，容許批判地檢視時空、地方，以及社會—生態關係的觀念，如何在所有研究場域中開展。例如，它詳述了地理理論的全部力道，明白地運用於檢視隱含的地理預設時，經濟理論、努斯鮑姆的寰宇主義、共產黨國際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還有生物政治、女性主義和各種認同政治的抽象理論，會發生什麼狀況。當納入這些理論化的普遍真理宣稱受到地理學檢視時，如我們所見，它們總是有所欠缺。由於對這些理論及其普遍性宣稱的主要反對，聚焦於它們缺乏物質根據，以及它們的奠基概念的「孤立」性質，納入地理理論應能針對這些反對提供解藥。但是，這種會遇的結果，經常是改變這些理論，到了認不出來的地步。我將通過考察社會科學史中，以及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寰宇主義理論中，兩個根本但有爭議的術語——「個體」和「國家」——來闡明這一點。選擇這兩個術語是格外有意義的，因為它們彼此相關，而且傅柯令人注目地解說了「現代主權國家和現代自主個人〔如何共同決定了〕彼此的崛起」。²後文將逐漸清晰的是，傅柯所說的「共同決定」，若還談不上只能以地理理論角度來理解的話，至少最好是以地理理論來掌握。

252

個體

「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實踐，向來是哲學反思和論證的主題。運用到人類群體，這種實踐所定義的個體概念，不僅在社

會理論和社會—生態理論，以及行政實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奠定個人行為和行動的意識形態及感知中，扮演要角。我如何思考我自己的個體性，對於我在世界中的行動和期望，有重要影響。近年來，隨著後結構主義對認同政治的關注、對於流動性和未決定性的關心漸增（像是酷兒理論），以及焦點從結構轉向過程和敘事，越來越常見，個體化這個主題也越來越有爭議。這些轉變對於日常生活，以及政治宣稱的提出，都有明顯的實質影響。例如，在美國，過去一度認為很清楚的種族和族群人口普查類別，逐漸被視為是無法回答的問題。連經濟學也逐漸轉向，求助於行為理論和心理學，以便更清晰地理解個體實際上會做什麼（相對於虛構的經濟理性個體假定會做的事）。因此，個體化不是一種穩定的實踐，它的歷史地理必須予以探究和闡明。不過，我在此比較狹隘的關切，則是如何運用地理理論視角來理解個體。

假想有一個征服勢力，控制了一個界定清楚的領域（譬如一座島），並對當地原住民施展權力。征服者希望擁有完整而適切的土地清單，以及治下人民的帳目，以便實行一個以土地所有權為基礎的課稅系統，來籌資維持軍隊與皇室及其眾多隨從的花費。他要訴諸什麼空間和時間的再現，才能完成這項任務？答案很明顯：絕對的空間和時間理論，可以清晰分辨土地所有權，並指派清楚的地址給居民。這是1066年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後，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於不列顛實施的著名末日調查（Doomsday Survey）生產背後的暗藏理論。這是英國後來

於 17 世紀的土地繪製工作中系統化的理論，而這個理論性的空間架構，通過佩帝（William Petty）當時在愛爾蘭的調查工作，支撐了政治經濟科學的誕生。可以理解的是，殖民行政（如在印度的英國）和拓墾者政權（如美國及其各種形式的農場法案¹¹），此後便訴諸空間理論的這個特殊面向。持有財產之民主體制的政治制度，挾其支持了從公民身分、投票到徵稅的每件事物的個體化實踐，完全仰賴這種理解空間和時間的方式。譬如說，在這個系統裡，「沒有固定地址」是個嚴重問題。

我們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某種類型的政治權力運作，以及基於特定的理解空間與時間方式的個體化實踐，彼此間有強烈的關聯。我們這些生活在這種政治權力體制下的人，傾向於認為絕對的空間和時間理論是自然的、根本的，而且也許是唯一存在的空間和時間理論。然而，將這些特定的個體化實踐，放在第七章概述的時空可能性矩陣內，便能顯示這只是幾種可能性的一種。當喚起絕對、相對和關係的時空性時，個體的界定看起來就相當不同。雖然我的獨特認同牢牢坐落於絕對空間和時間中，但我變化中的位置（相對於譬如說貨幣和商品、生產系統和勞動過程，

[譯註]

¹¹ Homestead Acts 是指美國嘗試令耕作者擁有土地的公地放領法案，首次於 1862 年 5 月 20 日由林肯總統簽署，後續有多次修訂增補。成年人或戶長可以向聯邦申請無人占用之公有土地（免費或付出低廉代價）作為自耕與居住之農場使用，最初規定總面積為 160 英畝。

或是維持生命的基本新陳代謝生物過程)，則生產出一種相對化的個人認同——儘管可以觸知，但並非獨一無二。認同是多重、變化而不確定的（我可能今日是富人，明天是窮人；今天我在太陽底下曝曬，明天可能在冰冷的雨中著涼）。我在相對時—空中的移動（這些移動實際上有助於建構相對時—空組態，雖然影響不大），令人很難以任何清晰不含糊的方式固定我的地址。我的生活並未侷限於一個固定地址。爲什麼我在移動的時候，或者無論我在哪裡，不應該擁有某種公民權利？我從某種團結感，或是對伊拉克戰爭犧牲者的同情、或像南亞海嘯這樣的悲劇，或者更模糊地來自歸屬於某種事物（國族、「女人」或「勞工」、全體人類、整個自然，或是神性）的感受等等內化而來的、非物質的空間關係性，提供了一種全然不同的，定義我是誰的關係性方式。雖然是非物質性的，這些忠誠還是對於我如何在世界中行動和思考，以及其他如何看待我，有著客觀的影響。再者，我如何回應抽象的呼喚，像是凱旋的國族主義、伊斯蘭神學家的訓示，或是氣候變遷或恐怖主義的威脅，是個關係性的問題，而這些關係性是流動、多重而未決的。即使如此，它們依然很重要而強大，因爲環繞著這些關係性而建構的個人認同，具有即使不穩定卻客觀的影響（看看布希政府多年來如何動員抽象恐怖的關係性憂慮，來迎合自身的利益）。我們在這裡也遇到了時刻的政治（politics of moments），誠如班雅明的說法，記憶可以在危險時刻出乎意料地閃現。³我們唯有以這種方式，才能了解群眾的瘋狂、革命的奇

觀、輿論的情緒迸發（有時候僅僅因為單一事件而引燃，像是帕克斯〔Rosa Parks〕拒絕移到巴士後段，或是2003年2月15日嘗試阻止伊拉克戰爭的全世界遊行中，令人震驚的全球輿論展現），或者，多年來住在隔壁、相互幫忙而友善對待的個體，在一陣族群或宗教仇恨的狂熱中，突然殺死了對方的那種個體行動。唯有在關係性模式下，努斯鮑姆的那種道德寰宇主義視角才有可能扎根，而對於寰宇主義治理的非物質要求，也才成為客觀的。

地理理論堅持，個體不會存在於空間和時間的複雜向度以外。突然殺害彼此的鄰居，可能是在絕對空間和時間中這麼做，但他們是在其時空遭遇的相對空間裡，出於非物質的關係性動機而行動。

現在，試想時空性矩陣的其他向度。列斐伏爾強調，為了再現和概念化，以及應該如何經歷空間與時間而開打的政治戰役，跟在物質性社會實踐場域中發動的戰爭一樣重要。就關係上而論，個體可能身為愛國公民，某種「想像共同體」（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歸諸國族觀念的那種）的穩固成員，過著肯定而快樂的生活，而且他們可能對這個世界再現自己為守法而順服的主體，向某個更大的社會—空間力量效忠（例如國家或國族）。⁴ 或者，他們可能將自己再現（或發覺自己被再現）為古典自由主義主體，假設賦予了法律和司法地位與權利（有時候是違反其意願，例如佔領下的伊拉克）的獨立自主能動者，超越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權威，即使他們承認自己通過市場交換而同其他人

相互依賴。於是，他們可能在相對時—空中再現自己，成爲自由移動的地理能動者，既願意也能夠利用、甚至推動新的商品與貨幣流動模式。或者，隨著資本之流而離開了他們所在的空間，他們可能視自己爲蕭條、去工業化，以及金融家掠奪活動的消極受害者。

誰是個體，不僅取決於他們自己和其他人如何理解空間和時間，也取決於時空關係本身，如何被宏觀過程塑造和持續不斷重塑，像是文藝復興以降的再現的製圖技術、全球金融貿易系統中資本流動的當代演變，或是促進一般人類再生產的社會—生態新陳代謝過程。如果後面這些過程，一如它們的常態，內化了某種社會區分，並奠基於這些區分——例如性別和種族的區分——那麼，生產出來的時空性本身也是性別化和種族化的。這個基本而明顯的事實，解釋了爲何許多女性主義理論家經常訴諸關係性的時空性理論，來具體化她們的論證，以及爲何那些試圖理解種族化移民所受壓迫的人，發覺自己不得不質疑像公民身分這樣的法律概念的時空框架。然而，危險在於，若將關係性的時空性取向置於優越地位，卻將絕對視爲附帶現象，解放政治的實際面向就會縮減，甚至喪失。布迪厄（P. Bourdieu）在他的《實作理論綱要》（*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中的時空性取向，助益甚大，因爲他努力將柏柏人（Berbers）之間的關係性意義，放置在跟田野、住屋，甚至住屋中房間之絕對空間的辯證關係中，橫跨了日曆所界定的絕對時間階段。⁵

個體也無法視為孤立於且脫離了社會—生態辯證，以及地方形構與重構的持續活動。他們相對於衝擊著日常生活的自然、生產系統、社會關係、科技和心智概念的位置，不斷轉變，一如他們的情感、感受及實際牽連的脈絡。簡言之，如果，我所提議的地理理論正確無誤，那麼，什麼構成了一名「個體」的整個問題，必須以徹底不同的方式來重新概念化，脫離那些典型上是以簡單的康德／笛卡兒邏輯來說明的概念，後者支持了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大部分法治主義版本的寰宇主義理論（像那些將個體人權和公民身分視為核心理論）。

地理理論拆解了時空的包覆，因而也拆解了「個體該如何最佳理解」的以地方為基礎的和環境的建構。它詳細闡明了，按照康德的古怪說法，氣質如何形成個性，以及後果如何。時空矩陣中，地理情境性（situatedness）的辯證，框架了個體是誰，以及他們可以如何、在何處，以及在何時行動。再者，情境性並非常數，反而本身總隨著空間、地方和自然的持續生產而處於變動中，有時候變動很迅速。這是地理理論安置在如何理解個人認同與能動性周邊的系統性架構。個體並未預先在抽象層次上設定，而是有待通過合宜研究規範的運用，從所有這些角度來發現、界定與闡述。

有些人可能會主張，將個體概念化為總是以這種方式在地理上置入情境，是侷限了個體行動，以致真正的自由和自主成了無意義的展望。就此，我得說，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

論，以及康德派寰宇主義中預設的抽象、孤立及隔絕的個體，是注定導向幻滅和絕望的虛構怪物。例如，它直接導致布希有關自主和自由的修辭，相形於關塔那摩灣而特有的一切矛盾，以及彌爾針對帝國統治印度的自由主義辯護，那令人驚訝的怪異之處。例如，試想洛克有關個體的定義，替諾齊克（Robert Nozick）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中的贊成論點開場。自然狀態中的個體，據推斷是處於「一種完美自由的狀態，可以隨自己的意思主導自己的行動，處置他們的所有物和身體，只要不違反自然法的限制，不需要允許或仰賴任何其他人的意志」。請注意，這裡的孤立個體概念，如何無可避免地連結上獨特而排他的資產階級自主和自由理想，替我們時代的大部分政治辯論奠定了基礎（參考我們在前言中檢視過的布希演講）——馬克思（僅舉一例）立即指認出了這種連結並嚴加批判，他注意到魯賓遜即使是漂流到了荒島，還是按照「天生英國人」的原則組織他的生活。根據洛克的說法，市民社會之所以演變，正是因為有些人踰越「沒有人應該傷害別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物」的規則，而這會導致那些受到冒犯者的嚴格報復。必須有國家來調控這種報復，以防止淪入報復仇殺的無盡暴力。在這種想法背後，有著身為絕對空間和時間中之完全自主存有的個體觀念。從地理理論的立場來看，這既是荒唐的概念，又是危險的幻覺，因為它承載了不可能存在的個體自主性和絕對個體能動性觀念。連亞當斯密都承認，這種想法的虛幻性質，但他接著卻替根據這種

觀念來行動辯護，在同樣危險且充滿幻覺的基礎上，認定如果每個人的行動都宛如他們是自由、自主且沒有拘束的個別能動者，即使他們顯然不是如此，還是有益於整體社會。

傅柯的治理術理論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說明了個體若內化了這些幻覺，會產生什麼樣的險惡後果。16世紀以降，主要是在歐洲演變，此後更深切地銘刻於我們心靈的政治實踐，有系統地否決了真實的自由，卻讓自由猶存的幻覺絲毫未變。這麼做的時候，傅柯實際上是詳細闡述了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On the Jewish Question*）中的關鍵洞識：「在政治國家達到真正發展的地方，人——不僅在思想中、在意識中，而且在現實中、在生活中——過著雙重生活……政治社群的生活（他將自己看成是社群的存有），以及市民社會中的生活（他以身為私人個體來行動、將他人當成工具、把自己降級為手段，且成為異己勢力的玩物）。……在這裡，他認為自己是真正的個體，別人也這麼看待他，但他是個虛構現象。另一方面，在國家裡，人被視為一個類存在，他是一個虛幻主權的想像成員，被剝去他真實的個體生活，賦予一種不真實的普遍性。」⁷

不過，地理理論走得比傅柯和馬克思還要遠，並揭示了治理術及相關的政治經濟學的一項關鍵壓迫性特徵，如何將我們對於空間和時間的理解，局限於絕對的向度，因為唯有通過這種削弱的空間和時間理論，「自由的」自主個體（以及他們擁有的特質），才能夠清晰而毫不模糊地定義、劃界、計算、定位、徵稅，

以及當然還有治理和控制。個體化和原子化公民的生產，是隨著某種形式的國家權力崛起而構成的。絕對空間和時間理論的霸權，與絕對資產階級行政權的假設之間，有著強烈的相關。當代美國是個典型案例，說明了這種權力會發生什麼事，亦即當個人逐漸認真看待洛克式的虛構，最後卻發覺自己正在捍衛自身空間的絕對性（他們的身體、他們的財產，以及，就像所有門禁社區和當前的反移民風潮都清楚說明的，即使集體層次也是如此）。傅柯沒能讓自己脫離康德的絕對空間概念（體現在他的異質空間概念中），不幸地令他繼續拘禁於他試圖推翻的治理術中。因此，絕對的空間和時間理論，自啓蒙運動以來就主導了我們的思想，有個非常好的理由。現代國家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崛起，極深刻地仰賴這種絕對的空間和時間理論，使其規訓機器可以運轉無礙。區分康德的環宇主義和斯多葛學派觀點的進步信條，同樣仰賴絕對的時間概念。因此，毫不意外，相對的和關係性的空間與時間認識（前現代宇宙論和認識論的常見特色），直到最近，都被視為特殊議題，或是怪異狀態，尤其是在同資產階級力量共謀的社會理論領域中。大部分經濟學者和政治科學家無法脫離絕對空間和時間盒子來思考，以令人耗弱的方式，扭曲了他們對世界的理解。

個體的地理理論，讓我們得以批判和突破這種霸權。它將個人設想為由於地理包覆及社會與關係性位置的桎梏，而負擔深重且在物質上受限。閱讀幾乎任何一份民族誌，你很可能就會遇到和洛克觀點大相逕庭的個體化概念。這些民族誌通過謹慎重建特

定歷史與地理情境中的社會實踐、再現，以及過生活的方式，建立了一種個體概念，從而隱晦地或有時是明白地對抗了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寰宇主義的虛構。這些個體已經開啓了他們創造不斷變化的空間與時空關係、地方營造、積極捲入環境轉變，並承受這一切對他們的造就的經驗，並藉此在地理上啓蒙了。誠如迪塞圖指出的，我們甚至藉由在城市裡行走而創造了空間。⁸但可惜的是，許多這類民族誌作品未能理論化它們自己的結論，以利創立一種另類的社會科學知識取向，將地理學、人類學和生態學的基本原理，帶領到它們在吾人認識之整體架構中的合適位置。順此，另一項失敗則是沒能認識到，我們的任務不僅止於理解我們的地理學、我們的人類學及我們的生態學，還在於以建設性且解放的方式來改變它們。我們必須承認，個體本然地擁有能力，可以突破他們自己的地理、人類和生態限制。簡言之，真實的政治總是涉及「人地不宜的人群」。另類地理的生產，不僅是必要的先決條件，也是激進社會變革的首要建設手段。

關係性永遠無法受到控制（這正是國家和資本主義勢力厭惡它們的原因）。但是，關係性總是有所疑問的。例如，我們對誰效忠，不是輕易的決定（威廉斯經常以小說形式探討這個議題，尤其是他的作品《忠誠》〔*Loyalties*〕）。⁹一旦獲致同意，強大的忠誠在政治上會有決定作用。因此，關係性雖然是非物質性的，卻絕非自由漂浮。當它們凝結成爲固定的信念和政治結盟模式，它們便構成了分量深重的權力連結。爲人接受的教條（像是康德傳達

的種族優越性的階層觀點，或是彌爾預設的家長制)，就其客觀後果而論，都既危險又具破壞性。有趣的是，後殖民理論家採取柏克對於地理事實的訴求，來對抗以家長作風將自由主義之普遍性質，運用於印度情況的有害後果，但不幸地，他們轉而向海德格過度排外的（而且同樣是普遍主義的）地方理論尋求解答（基於錯誤的亞里斯多德派原則，「地方優先於一切事物」）。¹⁰ 黑爾德、貝克、艾比亞、努斯鮑姆和其他人所設想的寰宇主義的問題，在於它仍然奠基於個人身為行動者的抽象自由主義和康德概念（即使在努斯鮑姆的情形中，活力充沛的寰宇主義原則採取的是關係性形式）。

我們可以獲致結論，即如果沒有積極的人類能動者個別或集體地生產出新的空間和時空性，在物質層次且根據不同意象來創造與重塑地方，並生產出新的第二自然，藉此革新他們的社會—生態與環境關係，就無法追求自由與自主的政治。¹¹ 空間的生產在這裡不僅意味了在絕對空間和時間內創造事物，也是建立和使用相對空間——還致力於內化（無論個別或集體地）時空中可解放我們及他人的那些非物質與關係性的連結和凝聚。顯然，這裡的出發點，是對於個體必須逃離什麼東西的覺察（馬克思的評論：人類自由乃始於拋卻物質必然性和物理依賴的領域，是個有所啓發的起點）。但是這種解放過程，永遠無法在空間和時間之外、在地方創建之外發生，也不能不緊密牽涉社會—自然關係的辯證。

「個體」的地理理論，揭露了其他理論系統的虛構錯誤，這可

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成就，因為馬克思就曾經指出，針對錯誤問題的唯一解答，經常是質疑問題本身。例如，絕對空間和時間理論乃各類社會議題（譬如移民法）之唯一基礎的假設有其局限效果，揭穿這一點，實大有助益。但是，地理理論本身無法回答任何大哉問（分析性和政治性的），像是解放政治的較佳形式（例如，哪一種移民政策比較理想）。然而，它確實能夠替尋找合適解答的努力，鋪展出「可能性的條件」。具體來說，它堅持一項平凡主張，即孤立、無地方、不受限於環境的個體概念，會產生嚴重的錯誤理論命題，替積極民主政治的擘畫，設下顯然無法克服的實質障礙。抽象的個體概念（或是任何同源概念，像是身體），就像柴契爾會說的，沒留給我們新自由主義政治以外的其他出路。不過，在這一點上，個體和國家之間關係的問題，便移到了分析的中央舞台。

國家理論

國家的概念，就像個體的概念，向來在社會理論中有所疑問，也持續爭論不休。通過地理理論來理解國家，這樣的取向可以稍微闡明何以致此的原因。最近，有些社會科學家對他們主張拋棄的概念感到十分不耐煩。在其他情形裡，強烈而充滿怨恨的爭辯——像是 1970 年代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針對階級、國家和經濟之間關係的辯論——由於耗盡精力而逐漸消失，在那個案例

裡，徒留顯然令人無法滿意的結論，即國家既是一個物神幻想（階級權力的面具），本身又是一個組織化的政治力量。舉例來說，讓我們考察阿伯蘭斯（Philip Abrams）和米切爾兩位學者的重要貢獻。

阿伯蘭斯寫道，「設想為同社會分離之實質實體的國家，已證明是極度難纏的分析對象。」¹²他指出，我們困於「一種物化，它本身嚴重阻礙了某些政治權力問題的有效研究」。這種物化將作為實體的國家，定位於絕對空間和時間中，從而排除了其他類型的時空性。阿伯蘭斯指出，在一切難以接受的物化（尤其認為國家是具有積極因果力量的實體的那類觀點）背後，有著「經過操縱的國家信念建構」，使得「國家觀念具有重要的政治現實」。他因而提議，我們要「拋棄作為物質研究對象的國家，無論具體或抽象，同時繼續極度認真地看待國家的觀念」。國家可能是個幻想，或是錯誤再現，但它依然是個社會事實。實際上，阿伯蘭斯在這裡召喚了關係性的理解。國家是個「令抽象變具體」，讓「不存在變存在」的神話。「它的生命一開始是個隱含的建構，然後物化——成為國家（*res publica*），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物化（*public reification*）——並且獲得明顯的象徵認同，逐漸脫離了實踐，成為實踐的幻想性陳述。」在這裡，在關係性和絕對的理解之間，隱隱召喚出一種辯證關係。因此，國家「不是站在政治實踐面具背後的現實。它本身就是阻止我們看清政治實踐本貌的面具」。它是「一種意識形態計畫」，而且是「正當性的操作」，「試圖將無

法支持且無可忍受的事物，呈現為其他東西，亦即正當的、無私的支配，從而誘發支持或忍受。」這是一種將主體束縛「進入自身之臣屬狀態」的方法。如此一來，誠如馬克思針對商品所說的一樣，它是一種「物神建構」。它在僵硬的領域化制度形式中，遮掩和固定了社會—空間關係中的流動與不穩定。

262 社會理論家的任務，是要拆解這種物神的神祕。這就要去探討「國家觀念」如何「在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中，被投射、供給並以各種方式信奉」。這也要求——但阿伯蘭斯遺憾地掩蓋了這一點——建立位於國家觀念之生產背後的，衝突性社會關係與物質性社會實踐的性質。不過，阿伯蘭斯確實接受了密利班德（Ralph Miliband）的觀點，即「國家系統」之定義為「一組政治與執行控制的制度及其關鍵人員，『政治菁英』：政府、行政部門、軍方和警察、司法部門、次級政府和議會機關」。但是，他對於這些制度安排所預設的地理形態（像是軍方營區，或甚至是領域轄區的建立），卻未置一詞。他也發現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觀點大有可為，即國家是個可以達成某種矛盾性統一的「位址」或「地方」，但他卻錯失了將任何地方建構理論運用到這種論點的機會，即使他確實問了關鍵問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地方？」（這又是一個案例，顯示了重要思想家提起了關鍵地理概念——地方——卻轉而檢視他們認定比較重要的問題，而沒能探究其意義，或考察它的可能性。）阿伯蘭斯接著承認了一種可能性（但他稍早曾敦促我們，不要研究作為物質對象的國家），即「經驗上能觸

及的研究對象可以存在，如果有適當的研究，將會向我們顯示既定社會系統內的支配模態」。國家可以在絕對空間和時間中，作為物化的實體而存在，但是——在這裡，我提出我對阿伯蘭斯說法的評註——它必須視為一種物神對象，就跟馬克思處理商品的方式大致相同。它真實存在（它變得物化），但它是「人群之間的物質關係，以及事物之間的社會關係」。阿伯蘭斯幾乎可以肯定是不願提及拜物教這個觀念，因為那是阿伯蘭斯顯然刻意要拋諸腦後的馬克思主義國家辯論的一個面向。

然而，阿伯蘭斯最後暗中歸結出來的，是模糊而局部地顯露出國家的地理理論能夠直接揭露的東西。如果我們將國家的時空存在，視為其定義的關鍵（有什麼國家可以宣稱超越了空間和時間？），那麼，國家就必須推斷為是獨特的地方形構過程的結果。我們已經知道，若未曾檢視絕對、相對和關係時空性之辯證統一如何建構（就像普蘭查斯的正確摘述，這內化了一切種類的矛盾），就無法理解地方的形構。我們也不能將國家視為超越社會—生態轉型的持續動態。於是，阿伯蘭斯說法的問題，就變得很清楚。他假定國家的物質性起源於社會關係和觀念的物化，很可能是搞錯了方向。或許，劃界和創造地方的具體物質實踐，引導人類將國家建構為一種再現、一種觀念，然後以某種方式來經歷那個觀念，並環繞著這個觀念而鞏固他們的國家物化實踐。地理理論指出了，在絕對空間與時間中的具體實踐，關聯於相對與關係時空的辯證運動，肯定曾經且持續會涉入國家的形構和維持。

米切爾將阿伯蘭斯的論點推得更遠（雖然在某些方面是從反方向推進），這麼一來，他就更接近從更偏向地理的視角來看待國家形構的辯證。首先，他合併「國家觀念和國家系統」，成為「同一過程的兩面」。¹³跟阿伯蘭斯一樣，他認為我們的分析任務，不是「釐清這種區分，而是予以歷史化」。具體而言，我們需要知道國家、社會和經濟之間的邊界，在歷史上（我會追加還有在橫跨全球空間的地理上）如何概念化。國家不僅是個主觀信念，還是「以各種可見形式複製的再現，像是法律實踐的語言、公共建築、軍服的穿著，或是邊境的標誌或巡邏」。因此，雖然國家可以是「幽靈般的抽象」，具有「規訓的權力」（像傅柯所設想的），但它以能觸知的唯物論方式「持續再生產」（並因此而物化）。因此，我們需要發現「規訓權力以某種方式鞏固，形成以領域為基礎的、現代國家之制度性結構秩序」的歷史過程。和阿伯蘭斯一樣，米切爾認為國家是個物神客體，是「一個疊加在真實規訓權力上的（主權和權利）屏幕」。所以，依照傅柯的說法，雖然國家「只不過是複合性的現實，以及神秘化的抽象」，它「獲得了結構的外貌」。根據米切爾的註解，國家是「由空間的組織化分割、身體的規律分布、精確的定時、移動的協調、因素的結合、無盡的重複，所生產出來的效果，這一切都是具體的實踐」。這一切實踐令國家變得真實。它們物化了國家。因此，我們應該檢視國家，「並非當它是一個真正的結構，而是令這種結構宛如存在的那些實踐的強大而顯然是形上學的效果。」

例如，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是它的物質邊境。「藉由建立一個領域邊界來圈圍人口，並且操持對橫跨邊界移動的絕對控制，政府權力就界定且協助建構了一個國族實體。」但是，「設置和巡邏邊境，牽涉了各種相當現代的社會實踐——連綿不斷的刺絲網籬、護照、移民法、檢查、通貨控制等等。」通過這種平凡無奇的實踐，「大部分在二百年前、甚至是一百年前，都未曾聽聞」，國族國家被製造成為「一種幾乎是超越性的實體」，成為一種「非物質的整體，似乎獨立於社會的物質世界之外」。換言之，國家通過它的物質效果，在關係性時空中獲致了一種呈現。米切爾接著主張（同時引述普蘭查斯和傅柯來支持），「工廠體制和國家權力，都是現代的空間、時間與人格之秩序化，以及抽象與主體性新效果之生產的面向。」簡言之，在資本主義崛起期間發生的空間與時間再結構（雖然基於某個理由，米切爾避免以這種方式來說明），將工廠和國家生產成為獨特的實體。「相反於從資本積累邏輯和生產關係的組織來導引出國家的形式」——這是197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嘗試——米切爾偏好將資本和國家視為「一個共同抽象過程的面向」。¹⁴

這種抽象過程到底是什麼、它來自何處，以及它為何會發生，在米切爾的解說裡依然含糊不清（不僅止於施加絕對的空間和時間概念，以此作為國家治理術和領域觀念之明確建構的條件），一開始支撐國家觀念之創造的社會關係與過程，也有同樣的問題。不過，國家觀念的內容，並未在時間中保持恆定。而且，

大部分的當代辯論——以及寰宇政治的一個重要元素——牽涉的正是這個過程是否走得太遠，以致讓國家概念變得多餘（如貝克的說法），如果還不是全然不相干的話。米切爾沒有走這麼遠，但是他確實指出了過去的轉型。他宣稱——依我之見，犯了錯——「經濟體作為一個自我包含的動態整體，同其他經濟體分離，並臣服位於外部的國家干預、調整和管理的觀念，在 19 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角度下，是無可想像的」（有鑒於李斯特〔List〕和德國歷史學派的構想，這是個奇特的陳述），而且「經濟體」用於指稱「既定地理空間中，生產、流通和消費關係的結構或整體」，僅出現於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他說，新鮮的是「這個觀念，即這些過程的相互關係，形成一個自我包含的空間或客體，臣屬於自己的內部動態，並且順服於『外部』的衝力或干預，而在整個自我包含的客體中造成了迴響」。

國家成為資料收集的基礎，國家與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y）都是通過統計再現才存在。但是這種相互認同作用，發生時間遠遠早於米切爾的認定（事實上，這種再現的元素可以至少回溯到重商主義時期，例見門恩〔Thomas Mun〕發表於 1664 年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以及佩帝大約同時期針對愛爾蘭經濟的統計探究，界定了正在浮現的國民——它正是全國性的——政治經濟學場域）。17 世紀以後，國家也崛起成為全國通貨的關鍵管制者（國家鑄幣的品質非常重要，牛頓因而受召主持了一陣子國王的造幣廠，並將被

查獲製造假幣者送上泰本〔Tyburn〕的絞刑架)。唯一值得判處死刑的異端，不再是由上帝界定，而是由財神定義。但是米切爾的一般論點肯定無誤：「能想像到的位於經濟體外頭的最重要事物，就是認定最能影響或改變經濟體的事物——國家。」國家的概念和國民經濟的概念之間，存在著共同演化，就像個體和國家的概念，是彼此整合而崛起的一般。

將國家物化成為可觸知的對象，並將我們對於國家的感受，物化為有如權力容器的社會實踐，其可塑性也值得關注。護照最初是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引入，逐漸在19世紀消失。1914年以前，茨威格（Stefan Zweig）回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全球之旅，「邊境只是象徵性的界線，你橫越邊境時，就像跨越格林威治的子午線一般，不會多加思考。」¹⁵然而，這個類比饒富深意，因為建立時區的空間組織，對於資本主義和20世紀初期國際系統的組織化效率，非常重要。1914-18年的戰爭之後，護照的要求更嚴格，以致我們現在覺得開放邊境的觀念，若非極度駭人的危險，就是無可想見的怪異，即使我們越來越常跨越邊界。但是，奇怪的是，隨著再現世界中出現了國家和經濟體之間的新區分，「所謂的經濟過程和制度，越來越難在實務上與政府或國家的過程與制度有所區別。」¹⁶中央銀行和國家機構橫跨在國家與經濟之間假定存在的區分上，就如同國家教育活動和福利供應橫跨在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區別上。米切爾的結論是，雖然國家顯得像是一種抽象，我們仍然必須說它「是空間組織、時間安排、功能專

殊化、監督與監控，以及創造出世界基本上可區分為國家與社會、或國家與經濟這樣的表象的再現，這類凡俗過程的效果」。當然，根據我的觀點，資本的循環才是米切爾辨認出來的這些「凡俗過程」背後的隱藏驅動者，原因正是我在其他地方說明過的，如果國家尚未以某種形式出現，那麼，資本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循環，就會創造出某種十分類似的領域性組織。¹⁷

米切爾的呈現——就一位具有針對在埃及的殖民措施，測試傅柯式思惟的長期經驗的人而言，這頗可以預期——對於空間決定作用很敏感。他經常提及國家的非物質但客觀的性質。這便將國家牢牢地安置在關係性時空中，並且就其與絕對空間和時間領域的連結而論，擁有各式各樣分析的可能路線。首先，我們需要知道，建立了國家觀念的關係性，以及建立了絕對空間與時間中之特定物化形式的主導性社會過程和社會關係（如性別和階級關係）。進一步，要考察與自然的關係、（兼納人造和所謂自然的）環境的想像，以及歷史與集體記憶，在物化的國家形式中，替國族團結觀念提供實質內涵上的角色。譬如荒野、邊境、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ore）或林肯紀念堂，在定義美國國家與國族的例外論意義上，到底有何角色，致使所有美國政治家如此頻繁地訴諸這些地方（並且具有各種客觀後果）？國族意象深深仰賴於社會一生態辯證如何在概念上與物質上重塑，而在國家邊界內持續一段長久時間（德國的森林、法國的地區〔*pays*〕、蘇格蘭的峽谷等等）。米切爾也十分關注，國家非物質性但客觀的性質，如何

具體地物質化於絕對空間和時間中，成爲障礙、邊界，以及其他各種物質性社會實踐（經常帶有儀式性和象徵特質）。這些實踐將國家物化爲真實的物質實體，並且如同阿伯蘭斯的可能說法，給了它連貫結構的表象。列斐伏爾式的向度也潛入了，因爲再現性實踐的力量明顯影響了物質性的社會實踐，以及我們如何經歷國家的關係性。

時空性的這些不同面向之間關係的辯證性質，在米切爾的著作中只有些微暗示，但是要擴展它並不困難。例如，在再現領域中，製圖實踐的漫長歷史，在物化國家上扮演了核心角色。¹⁸ 很難認真看待阿伯蘭斯認爲國家不會作爲物質實體而存在的論題，因爲每張世界地圖都清楚以這種方式界定和命名了國家。分隔了大部分墨西哥與美國的軍事化圍籬，甚至更令人憎惡的是，爲了區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地而建造的圍牆，是存在於絕對空間中的可觸知事物，就如同我們在每個國際機場遇到的障礙物和崗亭，我們在某種入境當局的裁決下，得以通過或遭拒。當然，邊界是社會的建構，但是當轉變成精密的實質防禦工事時，它們就會把視國家物質性爲無可接受之物化的裁斷，轉化爲尚未議決。當然，我們如果不同時拆解國家作爲觀念的關係性，就無法理解這些物化，但這正是要點所在，必須堅持時空性矩陣內的辯證關係，以及替地理理論提供一個關鍵定泊的地方創造之實踐。不過，阿伯蘭斯、米切爾和我都同意的一點是，所有這一切的特殊歷史地理，都必須加以詳述，也得拋棄以下假設，即國家若非體

現了某種普遍而不變的本質或真理（可以在經驗上揭露或作用其上），就是單純且毫無問題的經驗觀察對象。回溯來看，傳統社會理論和政治實踐嚴重地圈限於未經檢視的國族國家之領域框架內（即使是進步的構想也是如此，像是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的想像》），實在是令人震驚。

那麼，地理理論會如何看待國家呢？試想以下的虛構故事。一位國王以仁慈之道統治王國。有一天，入侵的殖民勢力出現在他的宮廷，要求他界定他的王國的起點和終點。國王說，他無能為力。驚訝的殖民者說，不可能是這樣。如果國王無法界定王國的領土，他如何知道誰是臣民？國王解釋，他的臣民不是以居住在固定領土來定義的，而是以對他的效忠來界定。臣民可能置身任何地方。有時候，他做的事情引起某些臣民不滿，他們就會轉而效忠別人。隨著他的善政獲得聲望，以及他具備奇魅、明智而慈愛統治者的形象，願意繳稅給他的臣民數量就會變多。他也會主張他的權力具有神話般的起源，並擁有和天神溝通的特權，只有他可以說服天神慈愛地關注他虔信臣民的命運。這個王國沒有固定的領域邊界，但運作得非常好。它在關係上界定，也是相對地界定，但是在絕對空間和時間中卻沒有清楚定義。相互衝突的殖民勢力，堅持繪製地圖以便劃清它們的勢力範圍，堅持國王也要這麼做。現在，國王的臣民是由居住在笛卡兒派製圖者定義之絕對空間與時間中的領域來界定。國王不再需要以善政和明智統治來說服臣民，因為邊界是封閉的。他可以在他的領土內建立控

制和監督的系統，並且通過武裝力量（由殖民勢力親切地以某種代價供應）來徵稅。在從關係性到絕對界定的轉變中，全然不同的支配力量崛起了。這聽起來可能有點牽強，但是這離一度稱為暹羅的王國（現在的泰國）發生的事，沒有差太遠。¹⁹

然而，從國家「臣民」的立場來看，這種劇情就具有嚴肅得多的氣氛了。例如，狄吉諾瓦（N. De Genova）在他有關芝加哥墨西哥裔移民的研究中，發現有必要部署「一種批判的跨國視角，以便驅除某些主導性的空間意識形態，它們支撐了有關美國和墨西哥之間，以及美國和更一般性的拉丁美洲之間，自然化差異的流行常識」。通過他所謂的「墨西哥裔芝加哥」的透鏡，他試圖「令有關墨西哥移民與美國國族國家之間關係的正統空間知識，更能夠解釋一個空間權力和不平等的體制」。例如，他堅持將芝加哥的墨西哥人定位於相對時一空，成為移動中的「移民」（migrants），而非地方中的「移入者」（immigrants）。他進一步接受他們自己相對於「美國人的空間地勢」的空間關係性感受，這種地勢「本然地是種族化的」，並且持續種族化而生產了「不平等的社會關係，藉此全球資本、國族國家和跨國勞工，都在鬥爭的矛盾中，不均等地生產出『全球化』發生所在的特定地域」。其效果是破壞了「美國國族國家作為一種前提的認識論穩定性」，同時，墨西哥裔芝加哥的墨西哥特質之意義本身，便意味了美國國族國家空間的永遠瓦解，並且體現了某些真正新穎事物的重大可能性，即一種徹底不同的社會形構。他探問，當芝加哥被視為由

墨西哥人生產的地方時，發生了什麼事？這些關係性與絕對的空間和時間框架，有著深刻的衝突，而「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無法消除的空間不連續」，施展成爲對於越來越以非法狀態來面對邊界的移民潮而言，是種族化且逐漸無法穿透的邊界。稱爲墨西哥裔芝加哥的地方，「最好是理解爲社會關係的空間局勢，並因而包含了無數地方。再者，這種局勢是通過每日社會關係，以及包含跨國勞動遷移、資本主義企業和美國國族國家之交錯的有意義實踐而構成的。」狄吉諾瓦強調，稱爲拉丁美洲和墨西哥裔美國人研究的知識生產場域，本身經過了組織，使其堵塞而非闡明了情境的複雜性，以及創造任何新式社會形構的激進可能性。²⁰

我在這段說明中，疊加了一些我自己的地理理論性時空範疇於狄吉諾瓦的著作上，以便闡明研究扎實且解殖的民族誌敘說，如何通常能生產出接近我在這裡試圖直接建立的那種知識結構。當然，這件事之所以能輕易辦到，源自狄吉諾瓦深深受惠於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但是，拉丁美洲與墨裔美國人研究——反帝國主義和解放政治深刻鑲嵌其中的兩個場域——被一位原本深表同情的研究者評斷爲缺乏概念精確度，乃因爲它們錯誤的空間詳述，這一點清楚表明了要糾正康德的基礎知識，問題重重。

這一類解說提出了問題，即如果國家的空間性是沿著關係性的路線，而非依照笛卡兒／康德的空間合理性來建構，這個世界會是什麼模樣。誠如米切爾暗示的（雖然他後來否認），後者之所以崛起成爲霸權，跟資本與國家聯合的規訓權力興起有些關聯，

這一點本身是個重要論點。但即使在這裡，還是有些奇特之處，指出了一個更大的議題。例如，美國最高法院面臨了一項挑戰，即資本家可能無法在波多黎各擁有完整貿易權利，除非波多黎各人擁有住在美國的同等權利，於是在1904年決定，「雖然在國際意義上，波多黎各不是外國，但它就美國國內而言，卻是外國。」當然，正是源於這種推論，另一個更為險惡的臨界空間，像是關塔那摩灣（超出任何美國法院的管轄，卻在其他方面內在於美國國家），就可以存在。²¹

270

國家形構的地理理論，與通過絕對空間和時間理論的霸權而加諸個體認同的規訓機器，這兩者的類似之處，在這裡變得很關鍵。現代國家如果沒能掌握一種簡單原則，來辨認和個體化其所控制、監視和支配的人口，就不算是現代國家了，因為傅柯便指出了，國家形構和行政管理的首要焦點是人口，而非領土。史考特（James Scott）指出，「像個國家般觀看」，首先要求的是想像一種可以予以調查、監視和控制的地方、人員與財產權之領域辨識的絕對格網。再者，通過原子化個體的加總來界定國民經濟，引燃了各式各樣國家管理與干預的經濟理論，其中自由主義是首要範例。絕對時空性理論的支配地位，無疑是資本主義與國家權力之延續的「可能性條件」。這種支配不會導致其他時空性形式的消除（這點從來無法辦到）。說絕對的形式位居霸權，是要指出一種情況，即關係性的意義，像是國族主義，大部分時候是侷限於單一的絕對領域定義的容器中。班哈比指出，主權是一個關係性

概念，但它所獲得的大部分特殊意義，是源於它被圈限在國族國家是絕對空間與時間中的獨特實體，這樣一個越來越無法運作的觀念中。問題在於，「我們旅行其上的地勢——各國構成的世界社會——已經改變了」，但是「我們的規範性地圖卻還沒變」。²² 阿伯蘭斯、米切爾、狄吉諾瓦及班哈比的著作之所以令人關注，是因為它們標示了笛卡兒 / 康德霸權的瓦解，以及相對與關係的概念躍上前台的逆轉。有意思的是，在歐洲，隨著絕對的邊界消失，以及個人移動的阻礙減弱，關係性的意義和忠誠再度崛起，對於個人認同作用來說變得更為顯著。即使有開放的邊界，但還是有這麼多人偏愛停留一地，深切說明了某種關係性的依附與意義，有影響人們選擇的力量。歐盟的開放空間中，國族主義對抗的持續蓬勃，證明了關係性定義的力量和重要性。

271

這便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我們認識到國家是一個偶然概念，不具備超越生產和再生產它的（相對和關係性時空中的）那些多樣過程的意義時，會發生什麼事情。一方面，這解放我們去反思空間和權力之間豐富多樣的關係（傅柯辨認了這種關係，卻未能拆解）。但另一方面，這又發出危險訊號，因為我們在前幾章已經見到，地理概念像是領域或區位，通常代表了其他東西，並因而堵塞而非闡明了我們世界中矛盾的社會—生態運作。史巴克（M. Sparke）指出，以他所謂的粗略簡化的「貧血地理學」（anemic geography）（像是海岸線效果或邪惡軸心），來取代孤立的普遍概念，沒有意義。這就是為何建立一個本身嚴謹且完全足以掌握當

代生活複雜性的地理理論，變得如此重要。史巴克通過他的審慎批判，闡明了這種「貧血地理學」有多麼深遠地滲入了社會與文學思想。他寫道，「地理的概念隱喻，像是巴巴（Bhabha）的『區位』，阿帕杜萊的『景觀』，哈特與內格里的『平滑空間』，拉克勞（Laclau）與墨菲（Mouffe）的『地勢』、『場域』、『地區』、『邊境』、『邊界』、『平面』、『位置』、『區域』等等」，都只不過是「遮掩了未完成的、俗世地理鬥爭羊皮紙的眾多貧血地理學」。²³ 米切爾將領域性國族國家鞏固成爲「幾乎是超越性的實體」，也是「貧血地理學」的展現，因爲它預設了國家和國族之間先存的領域紐結（史巴克和狄吉諾瓦都鬆動了這種紐結）。巴巴、阿帕杜萊、哈特與內格里、拉克勞與墨菲以及米切爾，這些傑出人士都由於他們的「貧血地理學」而遭受批評，我們就更迫切需要界定出地理理論，以便解釋在他們原本博學的分析中，不受抑制地流動的無數地理理性的謀略。史巴克和我都會同意，重點不在於我們地理學家置身某種獨特地位，可以恣意評斷（因爲地理學家和任何人一樣，也可能會產出「貧血地理學」）。要糾正地理的基礎知識，需要來自各種視角的批判探究集體努力。即使如此，絕對清楚的是，地理理論的適當知識——空間、地方和環境如何生產，以及有何影響的適當知識——只是政治解放的必要條件，絕不是充分條件，而且即使這樣，偏向一方的理論化形式，就跟完全沒有理論一樣成問題。

例如，有一種危險是將我們的空間概念，以純粹的、甚至是

主導的關係性角度來模塑。如果國家最主要是建構為一種非物質的社會關係，因而只是一個政治觀念，那就太容易屈服於幻想，認為即使國家有著堅實的醜陋物化，還是可以僅憑不去想它，就會消失於無形。這種「通過概念化而遺忘國家」（卓意洛〔R. Trouillot〕的說法）的方法存在已久，但是近年來經歷了奇特的復甦。²⁴哈特與內格里在他們的暢銷書《帝國》中，通過概念化命令而將國家變成無關緊要。這種手法也不僅侷限於國家。佛里曼同樣將世界扁平化，藉此推銷他的新自由主義願景。柴契爾想要擺脫一切公民社會的頑強形式，厚顏無恥地堅稱，「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只有個別的男人和女人，還有他們的家庭。」相反地，某些對公民社會政治比較忠誠的支持者，揮動他們的論述指揮棒，就想要否認國家的關聯性。近年來，甚至「資本主義」也通過論述命令就被消弭了（這就是米切爾所做的是嗎？），令全世界許多勞工為之迷惑，不識他們遭受壓迫的主要根源。²⁵

但是，探索國家的地理理論，還可以獲得一項關鍵洞識，亦即如果我們將國家看成是一種特殊的地方建構，誠如阿伯蘭斯（追隨普蘭查斯）所建議的，那麼，捲入地方理論的每件事物——聯繫上空間與自然的生產——就必須納入對於國家的過去與現在面貌，以及未來前景的理解之中。我們不能再將國家視為某種理想類型或是不變的本質。相反，我們必須將它視為地方建構過程的變動結果，在其中，與自然的關係、生產過程、社會關係、科技、世界的心智概念，及日常生活的結構等不同環節，都在一個

有邊界的世界（一個領域化的組裝）中交錯，令變動的實體成爲穩固的社會權力「恆存」（permanence）。根據這種立場，某些僵硬的政治對抗就會開始消解（就像在史巴克和狄吉諾瓦的著作中那樣）。舉例來說，我們必須質疑，在大多數無政府主義政治中能找到的反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尤其是採取社會立場者，對於地方建構深感興趣。我們已經知道，布克金的願景是「一種人性尺度的自我治理市鎮，和其他人性尺度、自我治理的市鎮，通過邦聯制度而自由結盟」，這示範了一種「分散化社區，通過自由邦聯或網絡方式結盟，以便協調某個區域的社區的無政府主義願景，在現代的激進脈絡中，反映了傳統的參與式民主理想」。²⁶ 布克金提議的是一種特殊的地方建構形式，藉此取代國族國家，但他無可避免遇到所有地方建構形式都會有的弔詭與矛盾，無論那些地方建構是由自治論者、社會無政府主義者、毛派分子、市政府、開發商，或是獨裁者所組織的。雖然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這種特殊地方形構的「凋零」，可能是個值得嘗試的計畫，但是一切形式的地方建構的凋零，卻無法想像。地理理論不僅有助於消解錯誤的對立，像是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對立，但也有助於釋放出政治能量和政治想像，以重新檢視能滿足特定社會一生態目標的、最適當人類社會之領域組織形式的整個議題。它直接提出了關鍵問題，並因而有助於我們避免地方建構的較嚴重錯誤，同時辨認出以全然不同的形象重建地方的必要工具。例如，僅僅是墨西哥裔芝加哥這個概念，就是一個出發點，另一個見解是，如果我們要

認真對待能源使用和氣候變遷的話，就必須徹底在地理上重塑我們的都市系統。

建構地理

類似阿伯蘭斯和米切爾的著作，表明了當代世界體系中的地方建構危機，在其中，針對稱為國家的地方的狹隘而絕對定義，越來越沒有意義。這個危機在史巴克和狄吉諾瓦的著作中，有清楚的解說。在地理理論的規則下，地方形構的這個危機，同時也是時空性以及社會—生態關係的危機。身為實體的國家彼此爭戰，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因為如果它們發動戰爭，就像伊拉克的情形，它們會立即發現自己捲入了關係性的鬥爭，而不是單純的領土爭戰。入侵伊拉克正是個例子，顯示美國政治和軍事領袖是以過時的絕對時空結構來思考。這跟肯恩（Kern）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說明，幾乎如出一轍，當時的政治人物沒注意到一種新的時空秩序已經浮現，因而無法避免一頭栽進了戰爭。²⁷ 列斐伏爾在回顧時寫道，1910年左右，「某種空間破碎了。」這是「常識、知識、社會實踐、政治權力的空間，是迄今在日常論述和抽象思想中備受尊崇的空間，是溝通的環境和管道。……歐幾里德和透視主義的空間已經不再是參照系統，其他共同地方，像是城鎮、歷史、父權、音調系統、傳統道德等，也一併消失了」。這是葉慈（Yeats）在他著名而經常為人引述的詩句中記載的時刻：

「事物分崩離析；中心再也無法支撐。」這是喬伊斯（James Joyce）後來描寫的時代：「我聽見了所有空間的廢墟，破碎的玻璃和傾頹的石牆，還有度過最後一次光芒的時間。」在這個脈絡下，維也納藝術家克林姆（Gustav Klimt）絕望地「在沒有穩固座標的世界中找尋方位」，將他對於空間和實體的再現，「從自然主義式的穩固，經過印象派的流動，再轉變到抽象和幾何靜態。」²⁸這是由凡爾賽合約以絕對角度拼湊回去的破碎世界，但只會再度破碎，最具象徵性的就是 1990 年代，作為凡爾賽和約產物的南斯拉夫國家的分裂。²⁹

2001 年之後，倫斯斐、錢尼及沃佛維茲（Wolfowitz）說服布希採取的政治和軍事策略，未能認識到 1990 年代左右出現的新時空與社會—生態秩序。他們不僅犯了一個重大的範疇錯誤，以粗糙的絕對角度來攻擊一個關係性的問題（所謂的恐怖主義），也沒能見到地緣經濟力量和社會—生態關係的快速變化動態，如何徹底改變了世界舞台上的地緣政治關係（四個重要事例是：冷戰結束、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強權、大部分歐洲以單一貨幣為核心而凝聚，以及大量全球生態問題導致的壓力）。早期建立的國家看似穩固的物化，承受了壓力，而且在某些情況中劇烈地崩解了（像是前蘇聯和南斯拉夫）。試圖強化舊有物化的回應（例如沿著邊界豎起圍籬，建立開放移動的阻礙），在政治上變得越來越急迫，同時，這些物化卻在面對新自由主義式自由貿易的蓬勃、每件事物（包括人員）的超級移動性、經由運輸與通訊革命而達致的相對時

一空間關係轉變，以及所謂負面外部性（汙染與環境劣化問題，或是人體免疫缺損病毒／愛滋病〔HIV/AIDS〕等新疾病）不會在國家邊界前止步的明確事實時，越來越微不足道。政治鬥爭已經從絕對的固定疆土，移轉到無法輕易控制、巡邏和規訓的不穩定關係性領域。這就導致了全球經濟中的去領域化和再領域化。

雖然這種情況提出了脫離先前在歷史上和地理上由資本與國家於絕對空間和時間中施展的規訓限制（包括凌駕個人的限制），從而保有自由的允諾（而且這種自由的提升確實受到歡迎），它也造成難以抵擋的不穩定、相互衝撞的忠誠、斷裂的記憶、多重的效忠，以及連串暴力等危險。我們已經在前南斯拉夫和東帝汶（East Timor）見到，再領域化不必然是個平和的過程（雖然除了車臣的例外，在前蘇聯的情況中卻出乎意料地平和）。面臨這種局勢，我們現在看到了重建規訓世界秩序的嘗試再起。但很顯然的是，美國帝國主義式的粗暴黷武主義支配，注定會失敗，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集體力量，即使在阿富汗也無法遂行。雖然通過協調體制來中介的各區域中心之間的力量均勢，擁有較佳的成功機會，運輸和通訊的快速相對轉變，結合了國族主義、區域主義和競逐基本資源（尤其是能源）的浪潮，讓任何地緣政治權力關係之穩定均衡狀態的前景，保持在低度可能性上，這時正值地方形構（如都市化）的社會－生態和時空危機迅速深化之際。在這個背景下，寰宇主義治理和倫理的全球系統，立基於獨立國家的邦聯（如同康德的設想），似乎變得比較吸引人，但令人困擾的

是，看到被理解且物化為絕對實體（而且在世界地圖上如此描繪）的國家觀念，竟被帶回來當作關鍵的安定裝置。努斯鮑姆令人訝異的（雖然非常康德派）復興傳統的國族國家，以及艾比亞堅持根著的寰宇主義，都指出了這個趨勢。這種有問題的回應，某個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似乎剩下來還在積極作用的其他主要選項，是某種形式的全球反國家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它的某些根源位於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意志論這邊）。

因此，地理理論的問題如下：當代國家的空間和時間是什麼，以及現在可能且值得建立的是哪一種可稱為國家的地方？在檢視這個問題時，稍早概述的時空性與地方形構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出發點。在歷史和地理上形成的國家的絕對性質，不難記載和批判。我們對它們的認識不少，即使有些性質已經削弱。在物質社會實踐的領域裡，還有實質邊界有待協商，儘管在再現領域中，製圖學在支撐國家作為絕對時空中之輪廓鮮明實體的幻覺上，繼續扮演要角。16世紀以降，劃分為各個國家的世界地圖，仍與我們同在，而且，這些再現已藉由地籍調查，並通過米切爾描述的將製圖再現轉譯為現實物理邊界的各種實踐，而成真了。在這種實質領域框架中，藉由頌揚國族觀念的集體創始神話和文化形式的召喚或建構，來建立關係性的團結，就變得很重要。建立歐洲國家系統的西伐利亞條約，若是缺乏這種物質化與物化，就不可能運作，同樣地，沒有建立關係性的團結，國家主權概念就不可能依照我們現在認識的形式來定義，儘管是位於專制主義

的領域化框架中。但是，同理可證，缺乏這種物化，及其類似的對國家認同、忠誠和效忠的活歷關係性，國家主權的衝突與國際戰爭，就不可能採行它們已然採取的形式。實際上，戰爭是「人群之間的物質關係，以及事物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國家拜物教的物質展現。國家相互開戰，猶如它們是（或他們的統治者想像它們是）賦有權能且易受威脅（聲稱某個國家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脅，可能意味著什麼？）的獨特社會實體。不過，唯有在這些虛構但物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出現關切跨越邊界之款待權的康德式寰宇主義論點。康德對於由獨立共和國組成的世界聯邦的願景（就此而言，布克金的自治市組成的邦聯願景），完全奠基在絕對空間和時間上。這種絕對性如何為人所活歷（作為保安、限制、治理性、統治、排除或放逐），也成了重大的歷史與地理問題。

277

但國家的相對位置性又是如何？相對於貨幣、商品和人員流動，以及資訊和文化習慣流動（遑論空氣和水循環的物理過程）的國家邊界孔隙，不斷破壞國家作為密閉實體的觀念，迫使各種國家機器同其他國家機器與實體，針對永遠逃脫絕對控制的流通和交換條件進行協商。關稅暨貿易協定、外交使團和聯盟、協商的流動與搬上舞台的文化交流，以及針對譬如說空氣和水污染，或是過度開採資源而分攤協議和連帶責任，將國家假定為處於失控且不穩定的世界市場與全球生態系統之相對時—空中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事實。跨國界的制度安排崛起，限制了絕對主權，但也誘發了帝國主義實踐，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促進了帝國主義。

如威爾森所言，如果無論商人和金融家到哪裡，美國政府都必須追隨交換價值，隨後部署其權力——外交、軍事、道德和經濟的力量——來協助（若非導致）對其他地方與國家的商業攻擊，那麼，爭奪相對時—空中位置性的鬥爭，就成了國家必須變成何等模樣的引導（若非形塑）面向而躍居前台。實際上，國家越來越是通過相對時—空中國際鬥爭的策劃來界定。

國家的相對觀（國族的相對觀更是如此），可能會轉換成爲事物般的措辭（位於絕對空間與時間）。但是，國家有可能接著變成具有各種物質、文化及社會效果之社會凝聚的核心。不同時空性之間的辯證關係（米切爾在他討論國家如何變成先驗的與非物質的對象時，便如此暗示），會以這兩種方式運作。例如，在大英帝國統治於印度實施的領域性笛卡兒框架內部，國族主義運動隨後闡明且建構了19世紀以降的強大國族特質神話。這些印度神話有助於鞏固繁多民族之間的領域紐結感，也給原住民帶來一股（原本由外來殖民強權定義的）印度國家可以作爲既是有意義實體，也是崇敬、愛慕和忠誠對象，這種強有力的感覺。1947年的分割效果，似乎在印度次大陸的許多地方，鞏固了這種國族主義感受，從而促使印度國家看似一個首尾連貫的結構。這使集中化權力得以鞏固，並運作於極度不均的地理發展，以及語言、經濟與文化多樣性的情境中。隨後，關係性就發揮了鞏固被稱爲印度的國家，這個新領域區劃的作用，至少據凱維里居（S. Kaviraj）所言，這個印度國家儘管在現實上有諸多明顯缺失，但在印度大部

分（雖然不是全部）地方仍獲得民眾的尊敬。³⁰實際上，某種特定關係性的建構，就是爲了鞏固國家的絕對規訓權力，這繼而創造出資本主義得以在某些限制與支持場域內運作的可能性條件。於是，在關係性尚未成功植入的那些印度空間，例如東北各邦，出現了暴力衝突地帶（如納薩運動〔Naxalite movement〕及其後繼者）。雖然普蘭查斯狹隘地將國家定義爲社會凝聚的矛盾位址，從而誤將這種現象確立爲一條理論原則，但他將這一點視爲支持近代實存國族國家建構的地方營造過程的一般性後果之一，並沒有錯。國家的絕對權力也可能妨礙而非促進自由的資本主義發展形式，這種主張也很容易舉證說明（例如新自由主義化之前的印度案例）。

不過，關係性並不穩定。對布希政府的一項重大批判在於，它傷害了作爲自主與自由燈塔的美國形象，並削弱了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道德權威，其破壞程度大到使得身爲政治實體的美國，不再有能力投射出相同的象徵權力，並藉此行使它曾經擁有的全球領導權。例如，在所謂「紅」與「藍」各州之間產生的內部分裂，凸顯了以社會凝聚爲代價的內在矛盾（但應該指出，這並未以阻礙資本積累的方式展開）。形象、道德權威、國族主義和社會凝聚，都是關係性（非物質的）字眼，而美國的例子極好地說明了它們驚人的改變速度。當關塔那摩灣和阿布格萊布而非自由女神像，成爲美國國家代表的象徵後，那麼，在非物質的關係性領域中，就發生了某種必然有廣泛客觀後果的非常重要事情。歐巴

馬（Barack Obama）當選美國總統，幾乎可以肯定會對美國在世界其他各地的道德權威造成巨大衝擊（這可能就是為何有如此多企業資本部門支持他的原因）。看似團結一致的國家可能瓦解的驚人速度，也涉及忠誠和歸屬的關係性觀念固有的不穩定。

279

國家，從地理理論觀點來看，是辯證地構成的構造物，一個夾在絕對、相對與關係性定義之間，處於物質社會實踐、再現和生活方式之間的「相對恆存」。它是陷入領域化之互動政治中的、獨特地方創造過程的結果。貫穿（尤其是管理與治理的）技術、心智概念、（階級和官僚階層的）社會關係、虛構的國民經濟內的生產機器、與自然的關係，以及日常生活政治等多重環節，並運作其中的社會—生態變遷的辯證，鞏固了國家機器偶然發生且地理不均等的演化過程。國家組裝內部各種環節的辯證，鋪展於只有部分被國家邊界封存的內部與外部不均地理發展框架內。雖然國家機器看似具有行動自主性的連貫實體（相較於經濟和市民社會，以及其他國家），但國家總是個偶然的存在（事物、概念、觀念和意象），是位於某種更廣大的整體內部，納入其地理情境之可能性條件底下，永遠處於不穩定狀態的內在關係。

地理理論的適用性，遠遠超過針對個人和國家之定義的批判性檢視。像是城市、區域、鄰里和社區這類概念，都可以用類似方式來詳加闡述。過去三十年來，城市概念也如同國家概念一樣，被以相同方式質疑（甚至到達一種程度，如同國家一樣，某些分析者想廢棄這個詞彙，不再用來描述任何種類的物質實體，

儘管多數人承認，應保留它作為觀念而存在)。相反，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作為一種缺乏地理理論的政治理論，是毫無意義的，即使政治理論家如普南(Putnam)和政治哲學家如沃爾澤，努力在沒有地理理論下闡明他們的結論。地理理論解釋了這種觀感何以興起，但隨後復甦了跟國家概念同等重要的社區或城市概念，作為複雜得多的地理術語。例如，當雨果(Victor Hugo)在波拿巴(Louis Bonaparte)帝國統治期間，自願流放至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被問道他是否想念巴黎時，他簡單答覆說「巴黎是個觀念」(因此，引述了他對於總是隨身攜帶的關係性巴黎概念的積極內化)，但他「總是厭惡里沃利街(the Rue de Rivoli)」(藉此顯示了他反對當時奧斯曼〔Haussmann〕強加於巴黎的絕對空間形式)。31 我想，我們都能體會雨果的意思。

解放空間

我們可以總結，針對努斯鮑姆提問的簡潔回答，就是必須將地理理論，納入設計來支持邁向更適當寰宇主義形式的任何課程的基礎。例如，將我們從資產階級威權主義奠基其中的絕對空間與時間理論的狹隘疆界中解放出來，正是邁向解放我們的概念世界的重要第一步，如此便有助於為進步行動界定出更為廣泛的「可能性條件」領域。對於地方建構和社會—生態辯證運作之道的更深刻了解，也是更周詳地探討替選出路的必要先決條件，而這

些替代選項超越了標誌大多數當代左派的粗俗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批判地探討社會和法律理論的基本概念，也能透露出不少端倪。連結我們的想像和能力的隱蔽地理鏈——地理理性的謀略——既強大又隱微（部分原因是它們如此顯而易見、平凡無奇）。這種阻擋務實追求更寬闊的概念自由的障礙，必須去除。

不過，除了整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對於關係性理論的連串興趣，最近針對像是「個人」、「國家」和「城市」等概念的質疑，顯示我們有必要直接面對時空性、地方建構，以及全球秩序內部社會—生態關係的普遍危機，並理解它是什麼。這就是地理理論提出的，也是社會理論接納的核心問題。沒能認清它在學術界和權力走廊中的重要性，可說是在理智上不可原諒，政治上岌岌可危。這立即引發了涉及地方建構之主導社會—生態過程性質與形式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誰（個人或集體）擁有塑造關係性意義和相對位置性的權力及影響力，以致在絕對空間和時間的現實中催生（物化）了一種特殊地方？這種將我們如何度過日常生活及建構我們自身未來的方式具體化的後果，可謂十分深遠。

最後，這引領我們進入實際存在的一般左翼政治的陰暗領域。晚近最值得關注之處是，某種版本的關係性政治（relational politics）在左翼取得了霸權位置。哈特與內格里的《帝國》等文本大受歡迎、哈洛威（John Holloway）的《不以掌權來改變世界》（*Changi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的強大影響力，還有「新潮」基進哲學家如巴迪烏、洪席耶和紀傑克（Zizek）的著作，

加上關係性思想家如班雅明和德勒茲的普及，由此種種，可見一斑。³² 當然，這些思想家之間有顯著差異，但他們共通之處在於對「事件」、「時刻」抱持一定的忠誠（巴迪烏的可能說詞），以及看重過程更甚事物的具體特質（哈洛威說，**成爲**乃一切〔becoming is all〕，**存在**一文不值〔being is nothing〕；而巴迪烏，在沒有任何重要當代事件之下，僅僅訴諸純粹關係性的忠誠概念，把忠誠視爲當代政治可能性的核心，雖然在他最近的構想中，他主張要對「共產主義假說」忠誠）。³³

這種關係性的定位，無疑具有根本的解放作用。例如，它使巴迪烏得以建構具破壞性的當代政治實踐批判，使哈洛威得以強調操作的力量、過程的重要，以及勞動轉變世界的政治力量。但是，批判的地理理論會指出，單純給關係性優先地位（尤其僅僅與列斐伏爾的「活歷」概念聯繫起來時），卻是大錯特錯。它使我們回到休斯克（Carl Schorske）在《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ècle Vienna*）中，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的自戀、自我全神貫注的世界，在其中，超越性勝過了實際政治參與，更不必說是政治組織和策略的具體議題。³⁴ 關係性思考衍生的洞見和靈感，可能很根本而重要，但直到它們可以跟人類藉由譬如都市生活的絕對空間和時間中的物質實踐，以及通過所有交換形式（社會、文化與生態，以及經濟）的相對時一空，來聯繫與操持日常生活的方式重新連結，才會與政治有關。針對絕對形式（如國家）的關係性批判，可能完全合乎道理，但問題的解決之道不可能是「將國家概

念化到消逝不見」，或者，如哈洛威所做的，將每件完整事物視為一種物化，而我們在定義上便與之疏離異化，因而甚至不該視為與政治鬥爭相干。藉由這種方式，哈洛威竭力擺脫了空間、地方與自然之生產中出現的一切具體問題，從而產出一個理論框架，十足像洛克的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種框架般孤立而抽象。舉例來說，如實採納他的觀念，可能意味著毫不在乎我們實際上在周遭建設的究竟是哪一種都市化。簡言之，牆垣、門扉和橋樑很重要，它們如何配置，會對我們過生活的方式造成重大差異。儘管以「沒有城市的都市化」（引自布克金的書名）對抗當代資本主義都市化的異化，聽起來可能是個好主意，但它沒有解決如何使我們解放夢想的都市地理具體成形的問題。此外，輕視各種組織、制度化和領域化形式（包括備受詆毀的國家，作為一種具體但具獨特可塑性的地理構造物），若非視之為毫不相干，就是認定其本然具有壓迫性，但這種看輕形同切斷了任何類型的改良路徑，更不必說是革命性的政治實踐了。我必須強調，地方建構理論中真正重要的，其實是在不同（絕對、相對和關係性）時空向度橫跨穿越的辯證移動，以及導向環境轉型的縱橫交錯環節（技術、社會關係、自然中的過程、心智概念、生產〔勞動〕過程和日常生活）。對此視而不見，藉此拒絕了那種辯證實踐，就是拒絕面對真正的轉型革命政治的「可能性條件」。雖然在觀念上重申「共產主義假說」是有可能的，一如巴迪烏的作法，但通過基礎穩固的歷史地理唯物論，也有可能辦到這一點，這是在《共產黨宣言》

的新導言中試圖表明的。³⁵

馬克思與恩格斯已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資產階級藉由徹底革新資本積累的地理，達致其自身獨特的寰宇主義形式（如今由頻繁飛行的企業及商界菁英、全球會計師和顧問、國際機構雇員、專業與技術菁英之類的人來代表）。它打造了全新的運輸與通訊相對空間，促進了以勞動價值（以各種貨幣形式為代表）的關係性形式為核心的商品、貨幣和人員的快速運動。它創造出揹負著古老名稱的新地方，像是北京、倫敦、羅馬、紐約、開羅和法蘭克福，以及相對新穎的地方，例如新加坡、孟買、上海、德班（Durban）、聖保羅、洛杉磯、深圳、杜拜等。資產階級以其自身形象，根據自身的獨特需求，創造出空間和地方，在這麼做時，開創了單憑想像就令人深感驚奇的，（刻意與非意圖的）地球之社會—環境轉型。我們住在一個截然不同於五百年前狀態的地理世界。每個人都曾經且仍舊被迫適應這些快速變遷的空間關係、地方建構和環境轉型，始終努力建構反空間（counter-spaces）和反地方（counter-places），最好是能夠應對，或是積極抵抗。因此，當代資產階級的那種寰宇主義，不只是無中生有的觀念。相反，它是一種從 1492 年起（如果不是更早之前）就展開的多重地理轉型中崛起的意識形態。另類、對抗及更傾向平等主義的寰宇主義的崛起，同樣要求我們注意到，這種政治理想要能夠實現，甚至只是能完整構思，都需要先有地理可能性條件的轉變。從屬者反叛的寰宇主義要能夠站穩腳步，就必須構想出跟資產階級集體完

成者相較毫不遜色的徹底地理轉型。

要理解地理理論的完整面貌，無疑是一樁令人望而生畏的知識任務。但是，誠如偉大的 19 世紀地理學家雷克呂在他晚年給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的一封公開信中所寫的：「甘冒個人生命危險的偉大熱忱和奉獻，並非為理想獻身的唯一途徑。有覺知的革命者，不只是感情豐沛的人，也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對他而言，每一種促進正義和團結的努力，都仰賴精確的知識，還有對於各學科的廣泛理解，包括歷史、社會學和生物學」，以及他奉獻畢生心力的地理學。³⁶ 或者，誠如洛克、康德和努斯鮑姆可能都會同意的，沒有適當的地理知識，不僅我們將無法理解周遭的世界，還會破壞我們對於普遍正義的寰宇主義要求：正當我們周遭的「希望空間」開啓以供我們採納和創造之際，我們卻會為了自戀式超越論的、慾望永遠無法滿足的關係性夢想世界，而放棄了所有革命政治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的地理形勢，是人類一次又一次努力建構和重建而成的，那麼，它就可以再次重建，以便更充分吻合我們的政治野心。

註釋

前言

- 1 G. 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ember 2002, A33.
- 2 T. Blair, 對美國國會演說，18 July 2003, "History Will Forgive Us"; 線上取閱：<http://politics.guardian.co.uk/speeches/story/0,11126,1008150,00.html>
- 3 G. W. Bush, "Both Our Nations Serve the Cause of Freedom," *New York Times*, 20 November 2003, A14.
- 4 G. W. Bush, "Acceptance Speech to Convention Delegates in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3 September 2004, P4; "The Inaugural Address: The Best Hope for Peace in Our World Is the Expansion of Freedom in All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21 January 2005, A12-13.
- 5 D. Brooks,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Times*, 22 January 2005, A15.
- 6 引自 N. Chomsky, *On Power and Ideolog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14.
- 7 N. Smith, *The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8 M.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 Rabinow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84), 45.
- 9 Smith,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30-31.
- 10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 11 J.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80-81.
- 12 S. Benhabib, *The Rights of Others: Aliens, Residents and Citiz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 44.
- 13 批判觀點可參見 N. Chomsky,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from Kosovo* (Monroe, Main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U. Beck,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127-29，對此採取更務實的觀點，雖然沒有初步評論那麼具支持性。
- 14 M.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11-12.

- 15 I. Kant, 引自 J. May,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Its Relation to Recent Geograph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0), v.
- 16 N.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8.
- 17 J. Locke, 引自 May,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135.

第一章 康德的人類學與地理學

- 1 I. Kant,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7-8.
- 2 Kant, 引自 S. Benhabib, *The Rights of Others: Aliens, Residents and Citiz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
- 3 Benhabib, *Rights of Others*.
- 4 同前註, p.33.
- 5 R. Bolin, "Immanuel Kant's *Physical Geography*,"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Bolin 翻譯及註釋: I. Kant, *Geographie (Phyische Geographie)* (Paris: Bibliotheque Philosophique, 1999); J. May,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Its Relation to Recent Geograph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0).
- 6 Olaf Reinhardt 翻譯的康德《地理學》英文版, 即將在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書系「康德譯文全集」中出版, 並附有一本由 Stuart Elden 與 Eduardo Mendieta 編輯的批判評論, 將於 2009 年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 (SUNY Press) 出版。
- 7 May,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132-36.
- 8 Kant, 引自 May,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137; Kant, 引自 F. Van de Pitte, "Introduction," in I. 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xiii; 亦見 J. Zammito, *Kant, Herder, 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9 M. Foucault,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 Robert Nigro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33.
- 10 M. Foucault, "Commentary of Kant's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Arianna Bove 翻譯,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oucault.htm>;

- A. Allen, "Foucault and Enlightenment: A Critical Reappraisal," *Constellations*, 10, no. 2 (2003): 180-98.
- 11 M. Nussbaum, "Kant and Stoic Cosmopolit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5 (1997): 1-25, 尤其第八頁。
- 12 I.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249-51.
- 13 Kant, *Anthropology*, 203.
- 14 P. Cheah and B.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15 K. Marx, *Capital*, vol. 3 (New York: Penguin, 1981), 958-59.
- 16 Kant, *Anthropology*, 96.
- 17 同前註・225.
- 18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 19 R-P. Droit, "Kant et les Fourmis du Congo," *Le Monde*, 5 February, 1999.
- 20 Kant, *Geographie*, 223 (我譯自法文) ; May,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66.
- 21 E.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68); L. Barzini, *The Italians* (New York: Atheneum, 1967); T. Zeldin, *The French* (New York: Vintage, 1984); P.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 22 J.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83).
- 23 Droit, "Kant et les Fourmis du Congo."
- 24 S. Elden, *Mapping the Present: 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 (London: Continuum, 2001).
- 25 C.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532.
- 26 Benhabib, *Rights of Others*; T. Brennan, *At Home in the World: Cosmopolitanism No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7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70.
- 28 M. Foucault,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Power/Knowledge*, ed. C. Gordon

- (London: Harvester, 1980), 77.
- 29 問題與回應，連同評論，其中有些和我自己的詮釋大相逕庭，可參見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ed. J. Crampton and S. Elden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 30 康德藉以在牛頓與萊布尼茲之間妥協的獨特方式，令我對康德論證之絕對結果所做的斷言，充滿了爭議。重點在於，他在他的知識理論裡，嚴格地將歷史從地理中劃分出來，而與此相符的唯一空間與時間觀，就是絕對觀。康德實際上封閉於絕對觀點中，這個論點有人支持，尤見 E. Casey, "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ly Short Stretch of Time," in *Senses of Place*, ed. S. Feld and K. Basso (Phoenix, Ariz.: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Advanced Seminar Series, 1996), 14.
- 31 May,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 32 R.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Lancaster, Pa.: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39); K. Sauer, *Land and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 33 賞識傅柯的地方知識論證的觀點，參見 C. Philo, "'Bellicose History' and 'Local Discursivities': An Archaeological Reading of Michel Foucault's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in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ed. Crampton and Elden, 342-67.
- 34 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76
- 35 Nussbaum, "Kant and Stoic Cosmopolitanism," 引述斯多葛派，10.

第二章 自主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判

- 1 U.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51; E. Stokes, *English Utilitarians in 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D.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129.
- 3 Ibid., 50, 92-93.
- 4 D. Clayton, *Islands of Truth: The Imperial Fashioning of Vancouver Island*

-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9).
- 5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32.
 - 6 引自 A. Badiou, *Meta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5), 131.
 - 7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8.
 - 8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84.
 - 9 同前註, 108-11.
 - 10 同前註, 119-20.
 - 11 同前註, 121-22.
 - 12 同前註, 21.
 - 13 同前註, 148.
 - 14 同前註, 41-42.
 - 15 同前註, 133.
 - 16 H. Arendt,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1968), 56.
 - 17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215.
 - 18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254.
 - 19 M. Katzenstein, U. Singh, and U. Thakar, "The Rebirth of Shiv-Sena: The Symbiosis of Discursive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no. 2 (1997): 371-90.
 - 20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132.
 - 21 C. Sauer, *Land and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147.
 - 22 A. Pagden, "Introduction," in C. Sauer, *The Early Spanish M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W.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 23 A. Escobar, "Plac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a Post-Development Era,"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R. Prazniak and A. Dirlik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 24 M.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340.
 - 25 同前註, 333.
 - 26 P.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7 C. Mohanty, *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sing Solida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三章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 1 T.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 3-5, 45-49.
- 2 同前註, 314-15.
- 3 G. 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ember 2002, A33.
- 4 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 H. De Soto,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1989);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 6 T. Mitchell, "The Work of Economics: How a Discipline Makes Its World,"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46 (2005): 297-320.
- 7 J. Elyachar, *Markets of Dispossession: NGO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in Cair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D. Gross, "Fighting Poverty with \$ 2-a-Day Jobs," *New York Times*, 6 July 2006, Weekend in Review, 4 (quote); C. Brick, "Millions for Millions," *New Yorker*, 30 October 2006, 62-73; C. Prahalad,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Philadelphia: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6).
- 8 M.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6).
- 9 這個說法引自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亦見 N.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 10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第六章。
- 11 A.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96); R. Appelbaum and W. Robinson, eds., *Critical Globaliz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尤其 91-100。
- 12 Friedman, *World Is Flat*, 50.

- 13 參見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an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E. Dash, "Off to the Races Again, Leaving Many Behind," *New York Times*, 9 April 2006, Business Section, 1, 5; P. Krugman, "Graduates versus Oligarchs," *New York Times*, 27 February 2006, A19; N. Munk, "Don't Blink. You'll Miss the 258th Richest American," *New York Times*, 25 September 2005, Weekend in Review, 3; J. Anderson, "Fund Managers Raising the Ante in Philanthropy," *New York Times*, 3 August 2005, Business Section, 1, 3.
- 14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E. Arvedlund, "Russia's Billionaires Club Now Totals 27 Members," *New York Times*, 7 May 2005, C1; E. Porter, "Mexico's Plutocracy Survives on Robber-Baron Concessions," *New York Times*, 27 August 2007, Editorial Observer.
- 15 Friedman, *World Is Flat*, 382-83.
- 16 J.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129-30; J.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第四章。
- 17 A. Amsden, *Escape from Empire: The Developing World's Journey through Heaven and Hel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 18 S. Amin, *Beyond U.S. Hegemony? Assessing the Prospects for a Multipolar World* (London: Zed Books, 2006); S. George,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IF...* (London: Verso, 2003); W.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A. Roy,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B. Gills,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P. Hawken, *Blessed Unrest: How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the World Came into Being and Why No One Saw It Coming* (New York: Viking, 2007).
- 19 J. Gray, *False Dawn: The Il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Press, 1998), 207.
- 20 批判地引自 D. Robotham, *Culture, Society and Economy: Globaliz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Sage, 2005), 第七章。
- 21 P. Krugman,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22 D. Harvey,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93-110.
- 23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第六章。
- 24 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第四章。
- 25 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 26 B. De Sousa Santos and C. Rodriguez-Garavito, eds., *Law and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owards a Cosmopolitan Leg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 Ong,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7 J. Brash, "Re-scaling Patriotism: Competition and Urban Identity in Michael Bloomberg's New York,"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35 (2006): 387-432.
- 28 D.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T. Wallace, "NGO Dilemmas: Trojan Horses for Global Neoliber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2003): 202-19.
- 29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230.
- 30 M. Edwards, and D. Hulme, e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1995); Wallace, "NGO Dilemmas."
- 31 De Sousa Santos , 出自 De Sousa Santos and Rodriguez-Garavito, eds., *Law and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 32 A. Bartholomew and J. Breakspear, "Human Rights and Swords of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XX (2003): 124-45.
- 33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 34 同前註 , 235.
- 35 K.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225.
- 36 我對權利鬥爭比較一般性的看法 , 參見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175-82.
- 37 Sachs, *End of Poverty*, 81.
- 38 Ong,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Gray, *False Dawn*, 207.

第四章 新寰宇人

- 1 P. Cheah, "Introduction Part II: The Cosmopolitical Today," in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ed. P. Cheah and B. Robbi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23.
- 2 赫德立場的說明，參見 J. Zammito, *Kant, Herder 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 3 M.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 4 K. Marx and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2).
- 5 葛蘭西的觀點，摘述於 A. Anderson, "Cosmopolitan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Divided Legacies of Modernity,"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and Robbins, 270-71; C. Calhoun,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Frequent Travellers: Towards a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Cosmopolitanism," in *Conceiving Cosmopolitanism: Theory, Context and Practice*, ed. S. Vertovec and R. Coh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6-109; S.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299; R. Wilson, "A New Cosmopolitanism Is in the Air,"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and Robbins, 352.
- 6 Cheah and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9.
- 7 U. Beck,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in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in *Conceiving Cosmopolitanism*, ed. S. Vertovec and R. Cohen, 61.
- 8 U. Beck,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72-73.
- 9 U. Beck. "Living in the World Risk Society," Hobbouse Memorial Lectu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5 February, 2006.
- 10 R. Cohen, "A Generation of German Pacifists at Odds over the War," *New York Times*, 6 May 1999, A 10 報導了貝克對軍事人道主義的支持。
- 11 Kant，引自 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9.
- 12 R. Fine and W. Smith, "Jürgen Habermas's Theory of Cosmopolitanism," *Constellations* 10, no. 4 (2003): 469-87.

- 13 Beck, *Cosmopolitan Vision*, 95.
- 14 De Sousa Santos, B., "Beyond Neoliberal Governance: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s Subaltern Cosmopolitan Politics," in *Law and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ed. De Sousa Santos and C. Rodriguez-Garavi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9-63.
- 15 A. Badiou, *Metapolitics*, trans. J. Barker (London: Verso, 2005), 138.
- 16 同前註，118; 亦見 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第五章。
- 17 D. Held, "Principles of Cosmopolitan Order,"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 ed. G. Brock and H. Brigho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27; Held, "Law of States, Law of Peoples," *Legal Theory* 8, no. 2 (2002): 1-44.
- 18 Held, "Principles of Cosmopolitan Order," 18.
- 19 同前註，20; De Sousa Santos, "Beyond Neoliberal Governance" 談論了最近朝向「治理」的轉變：更具體的例子，參見 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六章。
- 20 Beck, *Cosmopolitan Vision*, 76.
- 21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338;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22 S. Benhabib, *The Rights of Others: Aliens, Residents and Citiz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2; A. Ong,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3 Benbabib, *Rights of Others*, 122-27; M.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 24 I.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5 M.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06)，尤其 76-78.
- 26 J. Rawls, *The Law of the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236.

- 27 Benhabib, *Rights of Others*, 77.
- 28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284-85.
- 29 同前註，306.
- 30 同前註，257.
- 31 同前註，317.
- 32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 33 De Sousa Santos and Rodriguez-Garavito, eds., *Law and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14.
- 34 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5 De Sousa Santos, "Beyond Neoliberal Governance."
- 36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20.
- 37 同前註，311.
- 38 Cheah and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2-3.

第五章 地理邪惡的平常性

- 1 K.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69-70.
- 2 G. W. Bush,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9 January 2002; 線上取閱：<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print20020129-11.html>
- 3 First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Inc., *Economic Sanctions Survey* (Fort Lee, N.J.: First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Inc., 2000).
- 4 M. Scheuer, *Imperial Hubris: Why the West Is Losing the War on Terror* (Dulles, Va.: Potomac Books, 2004).
- 5 R.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 6 A. Nilsen, "The Valley and the Nation: The River and the Rage," Ph.D. 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Bergen, 2006.
- 7 M. Hajer,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8 J.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80-81.
- 9 T. Koopmans, and A. Beckman, "Assignment Problems and the Location of

- Economic Activities," *Econometrica* 25 (1957): 53-76; M. Fujita, P. Krugman, and A.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 10 W. Connolly, *The Ethos of Plur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Connolly, "Speed, Concentric Cultures and Cosmopolitanism," *Political Theory* 28 (2000): 596-618.
- 11 M. Shapiro, "The Events of Discourse and the Ethics of Global Hospitality," *Millennium* 27 (1998): 695-713.
- 12 S. Deshpande, "Hegemonic Spatial Strategies: The Nation-Space and Hindu Communa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India," *Public Culture* 10, no. 2 (1998): 249-83.
- 13 同前註。
- 14 M.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83); J. Elster, *Local Justice: How Institutions Allocate Scarce Goods and Necessary Burde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2).
- 15 J. Clifford, "Mixed Feelings," in *Cosmopolitics*, ed. P. Cheah and B. Robbi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362-70.
- 16 E. Burke, 引自 A. Appiah, *The Ethics of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41.
- 17 A. Appiah, "Cosmopolitan Patriots," in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21-29; Appiah,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Norton, 2006).
- 18 R. Falk, "Revisioning Cosmopolitanism," in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60.
- 19 Appiah, *Ethics of Identity*, 第六章。
- 20 Appiah, *Cosmopolitanism*, 99.
- 21 W. Michaels, *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 How We Learned to Love Diversity and Ignore Identit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 22 M.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 23 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97).
- 24 J. Re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Nationality,"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and Robbins, 77-90.

- 25 I.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7).
- 26 T. Brennan, *At Home in the World: Cosmopolitanism No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7 M.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06), 257; Nussbaum, "Kant and Stoic Cosmopolit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5 (1997): 1-25.
- 28 有關地理學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最純熟討論，參見 D. Livingston,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 (Oxford: Blackwell, 1993)，很有系統的探討，但最後仍將「爭論」簡化為不同傳統之間對話的問題；D. Gregory,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4)，很出色地將批判的地理學思考聯繫上社會及文學理論傳統，但不幸忽略了該學科歷史當中，物理和數學探究的強勢傳統引發的問題。

第六章 地理理性

- 1 W. Pattison, "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 *Journal of Geography* 63 (1964): 211-16.
- 2 J. Harley, P. Laxton, and J. Andrews, eds., *The New Nature of Map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製圖史計畫出版的好幾卷書，最初由 J. B. Harley 與 David Woodward 編輯。
- 3 W. L. 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C.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4 我在其他地方曾考察這一點；參見 D. Harvey, "The Soci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8, nos.3-4(2005): 211-56.
- 5 A. Godlewska and N. Smith, eds., *Geography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1997); D. Gregory, *The Colonial Present: Afghanistan, Palestine and Iraq* (Oxford: Blackwell, 2004).

- 6 R. Hartshorne,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Re-examined,"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5 (1955): 205-44; F. Schaeffer,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3 (1953): 57-84.

第七章 時空與世界

- 1 A. Whitehead,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33.
- 2 這是我的論文〈空間作為關鍵詞〉(Space as a Key Word)的總結與延伸，出自 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119-48。其他地理學著作，參見 N.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1984); D. Massey, *For Space* (London: Sage, 2005); Soja, E.,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R. Sack,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It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當然，時空性主題向來是其他學科廣泛探究的課題，我最喜歡的文本有以下幾種：歷史，A. Gurevich, *Categories of Mediev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85)；人類學，N. Munn, *The Fame of Gaw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文化研究，S.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我在第九和十章，檢視過許多這些其他研究。
- 3 R. Osserman, *The Poverty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 4 同前註，125-33.
- 5 地理學中相對空間的技術性解釋，最顯著的可參見 P. Haggett, *Locational Analysis in Ge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5).
- 6 N. Rescher, *Leibniz's Metaphysics of Nature* (Dordrecht: Reidel, 1981).
- 7 B.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A. Whitehead.

- "La théorie relationiste de l'espac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3 (1916): 423-54.
- 8 E. Grosz, "Bodies-Cities," in *Sexuality and Space*, ed. B. Colom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1-54.
- 9 E. Casey, "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ly Short Stretch of Time," in *Senses of Place*, ed. S. Feld and K. Basso (Phoenix, Ariz.: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Advanced Seminar Series, 1996), 13-51.
- 10 C. Garnett, *The Kantian Philosophy of Spac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1965).
- 11 Whitehead, "La théorie relationiste de l'espac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3 (1916): 423-54.
- 12 D. Bohm,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Ark Paperbacks, 1983); G. Deleuze,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Deleuze and F.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13 A.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M. Hardt and T.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T.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UN)contemporary Vari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4 A. Badiou, *Being and Event* (London: Continuum, 2005).
- 15 W.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9) : 關於聖心堂，參見 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第18章。
- 16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13.
- 17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E.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 18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9 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T. J. Clark, *Image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 20 J. Barry, "Voice Off," in *Third Berlin Biennial for Contemporary Art. Catalogue* (Berlin: Biennale, 2004), 48-49.

- 21 K.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給卡貝的信，引自 L. Marin, *Utopics: Spatial Play* (Atlantic Height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4), 73-79.
- 22 K. Marx, 引自 I. Mesjaros,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485.
- 23 E. Thompson,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56-97; R.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Verso, 1989).
- 24 R. Williams,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The Eggs of the Eagle*, vol. 1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9), 10-12.
- 25 J. Clark, and C. Martin, eds.,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The Radical Social Thought of Elisée Reclu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 26 K.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 27 同前註，167.
- 28 同前註，275.
- 29 K. Cox, 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lford, 1997).
- 30 M.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31 J. Rancière, *The Nights of Labor: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2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我在第九章回顧了某些人類學和歷史學證據。
- 33 D. Moore, *Suffering for Territory: Race, Place and Power in Zimbabw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 34 J. Le Goff,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我在第三部分回顧許多這個過渡時期的文獻。
- 35 M. Kohn, *Radical Space: Building the House of the Peop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3-8.
- 36 同前註。
- 37 同前註，第6章。
- 38 Foucault, *Order of Things*; M. Foucault, "Heterotopias," *Diacritics* 16, no.1 (Spring

- 1986): 22-28.
- 39 M. Foucault,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Power/Knowledge*, ed. C. Gordon (London: Harvester, 1980);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 Rabinow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84); J. Crampton and S. Elden, eds.,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 40 H.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 41 J. Elyachar, *Markets of Dispossession: NGO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in Cair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D. Graeber,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第八章 地方、區域、領域

- 1 E. Casey, *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Casey, "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y Short Stretch of Time," in *Senses of Place*, ed. S. Feld and K. Basso (Phoenix, Ariz.: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Advanced Seminar Series, 1996), 16-17.
- 2 M. Kohn, *Radical Space: Building the House of the Peop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 G. Himmelfarb, "The Illusions of Cosmopolitanism," in M.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72-77; A. Escobar, "Plac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a Post-Development Era,"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R. Prazniak and A. Dirlik (Lanham, Md.: Rowan and Littlefield, 2002), 193-217; E. Burke, 引自 A. Appiah, *The Ethics of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41.
- 4 Appiah, *Ethics of Identity*; A. Appiah,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Norton, 2006).
- 5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13; U. Hannerz,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6 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64-66。有關區域概念在地理學中的歷史，參見 R. Hudson, *Producing Places* (New York: Guilford, 2001); T.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4); J. Agnew,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87); Agnew and J. Duncan, eds., *The Power of Place: Bringing Together Ge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N. Entriken, *The Betweenness of Plac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Modernity* (London: Macmillan, 1991); G. Kimble, "The Inadequacy of the Regional Concept," in *London Essays in Geography*, ed. L. Stamp and S. Wooldridge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7), 151-74; D. Massey,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Regional Studies* 13 (1979): 233-43; M. Pudup, "Arguments within Region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2 (1988): 369-90.
- 7 K. Archer, "Regions as Social Organisms: The Lamarckian Characteristics of Vidal de la Blache's Regional Geography,"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1993): 498-514; A. Buttimer, *Society and Milieu in the French Geographical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1); A. Rossi,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4).
- 8 有關區域的分類取向，參見 D. Grigg, "Regions, Models and Classes," in *Models in Geography*, ed. R. Chorley and P. Haggett (London: Methuen, 1967), 479-501。區域和地方的一般討論，參見 K. Anderson and F. Gale, eds., *Inventing Place: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1992); Hudson, *Producing Places*; Cresswell, *Place*;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A. Paasi, "Place and Region: Regional Worlds and Wor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 (2002): 802-11; T. Oakes, "Place and Paradox of Modernity,"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7 (1997): 509-31; B. Andersson, *Imagines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A. Paasi, *Territories, Boundaries and Consciousness: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 (New York: Wiley, 1997).
- 9 R. Ardrey,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New York: Atheneum, 1966); R.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It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0 D. Delaney, *Territory: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9-11; 探討這些議題的一項格外有意思的民族誌研究，參見 S. Narotzky and G. Smith, *Immediate Struggles: People, Power, and Place in Rural Sp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11 P. Taylor, "The State as Container: Internationality, Interstateness, Interterritorialit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 (1995): 1-15.
- 12 寫於 1970 年代，有關該主題的一系列論文，參見 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art 2; N.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1984); M. Storper, and R. Walker,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Territory,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Growth* (Oxford: Blackwell, 1989).
- 13 G. Deleuze and F.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14 K. Basso, "Stalking with Stories: Names, Places and Moral Narratives among the Western Apache," in *1983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Washington, D. C.: AES, 1984); Basso, "Wisdom Sits In Places: Notes on a Western Apache Landscape," in *Sense of Place*, ed. Feld and Basso, 52-87.
- 15 K. Basso, *Wisdom Sits in Place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5); D. Moore, *Suffering for Territory: Race, Place and Power in Zimbabwe*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
- 16 Moore, *Suffering for Territory*, 21; D. DeLillo, *The Names* (New York: Vintage, 1989), 329-31.
- 17 M. de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69; G.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6-7.
- 18 D. Morley and K. Robbins, "No Place Like Heimat: Images of Home(land)," in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ed. E. Carter, J. Donald, and J. Squir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3-31.
- 19 M. Gordon, "My Mother is Speaking from the Deser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 March 1995, 47-70.
- 20 R.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Verso, 1989)；另參見 "Militant Particularism and Global Ambition," in 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第一章。

- 21 W. Benjamin, *Illus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22 C. Boyer,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135.
- 23 Kohn, *Radical Space*, 149.
- 24 C. Norberg-Shulz,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1980).
- 25 Rossi,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A. Loukaki, "Whose Genius Loci: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cred Rock of the Acropolis,"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7 (1997): 306-29; Loukaki, *Living Ruins: Value Conflicts* (Farnham, U.K.: Ashgate, 2008).
- 26 M.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165.
- 27 同前註，114-15.
- 28 同前註，160.
- 29 同前註，156; M. Heidegger, *Discourse on Thinking* (New York: Harper, 1966), 47-48; U.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215.
- 30 T.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26-29.
- 31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154; Casey, "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37.
- 32 H.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A. Merrifield,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1991): 516-31.
- 33 B. Foltz, *Inhabiting the Earth: Heidegger,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 (Atlantic Park, N.J.: Humanities Press, 1995).
- 34 Tuan, *Space and Place*.
- 35 推斷海德格對於批判西德重建的興趣，參見 S. Elden, *Mapping the Present: 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 (London: Continuum, 2001), 87; Bate, J.,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Wiley, M., *Romantic Geography: Wordsworth and Anglo-European Spaces* (London: Macmillan, 1998).
- 36 有關深層生態學，參見 A.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關於海德格與環境主義，參見 Foltz,

- Inhabiting the Earth* ; 以及 E. Reclus, *L'Homme et la Terre*, ed. B. Ghiblin, 2 vol., 刪節本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2).
- 37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K. Sale, "What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Nation*, 22, October 1990, 444-46; R. Kunstler, *The Geography of Nowher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merica's Man-Made Landscap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 38 Escobar, "Place, Economy, and Culture."
- 39 Casey, *Fate of Place*, 30, 35.
- 40 D.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5.
- 41 A. Dirlik,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R. Prazniak and A. Dirlik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15-51.
- 42 Casey, *Fate of Place*, 43.
- 43 我在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261-64 , 總結了懷海德的觀點。
- 44 Moore, *Suffering for Territory*, 21; C. Katz, "On the Grounds of Globalization: A Topography for Feminist Political Engagement," *Signs* 26, no. 4 (2001): 1213-34.
- 45 近年完成了許多有關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動態中，都市間競爭之意義的研究。參見 N. Brenner, and N. Theodore,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Urban Restructuring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Oxford: Blackwell, 2002); H. Leitner, J. Peck, and E. Sheppard, *Contesting Neoliberalism: Urban Frontiers* (New York: Guilford, 2006).
- 46 G. Deleuze, and M. Taormina,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74)* (London: Semiotexte, 2003).
- 47 Kohn, *Radical Space*.
- 48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 將我的觀點描述成這樣，而 Dirlik, "Place-Based Imagination" 信以為真。J. K. Gibson-Graham, "Beyond Global vs. Local: Economic Politics Outside the Binary Frame," in *Geographies of Power: Placing Scale*, ed. A. Herod and M. Wright (Wiley-Blackwell, 2002), 25-60.
- 49 D. 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0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9.
- 51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 52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 第 1 章 ; Harvey, *Spaces of Hope* , 第 10 章。
- 53 A. Etzioni, *The New Golden Rule: Community and Moral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 54 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 第 2 章。
- 55 J. Conway, *Identity, Place, Knowledge* (Halifax: Fernwood Publishing, 2004); Katz, "On the Grounds of Globalization"; M. Keith, and S.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D. Hayden,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56 M. Bookchin, *Remarking Society: Pathways to a Green Futur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182-85.
- 57 I.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九章 環境的性質

- 1 J.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7; rpt. 2003), 25, 408.
- 2 同前註, 408.
- 3 同前註, 417。關於西非稻米文化, 參見 J. Carney, *Black Rice: The African Origins of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America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關於土壤侵蝕問題, 參見 G. Jacks and R. Whyte, *Vanishing Lands* (New York: Doubleday, 1949).
- 4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453.
- 5 同前註, 455.
- 6 同前註, 414.
- 7 同前註, 462.
- 8 J.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163.
- 9 J. Sachs (with J. Gallup and A. Mellinger), "Is Geography Destiny," in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 B. Pleskovic and J. Stiglitz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9), 127-78; Sachs, *End of Poverty*, 165.
- 10 Sachs, *End of Poverty*, 166-67.
- 11 Sachs, *End of Poverty*, 167.
- 12 R. Haussmann, "A Case of Bad Latitude: Why Geography Causes Poverty,"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1): 45-53。參見 D. Harvey,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in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3章。
- 13 K.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 14 D. Acemoglu,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2002): 1233.
- 15 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 第11章。
- 16 A. Przeworski, "Geography vs. Institutions Revised: Were Fortunes Reversed?" Department of Politics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2004.
- 17 C.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18 E. C.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Ratzel's System of Anthropogeographic* (New York: Henry Holt, 1911).
- 19 E. Huntington,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Huntington, *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5); D. Worster, *Dust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0 P. O'Keefe, N. Smith, and B. Wisner, "Taking the Naturalness Out of Natural Disasters," *Nature* 260 (1976): 566-67; N. Smith, "Disastrous Accumulati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6, no. 4 (2007): 769-87.
- 21 關於 Griffith Taylor, 參見 J. Powell,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odern Austra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9-49.
- 22 O. Spate, "Toynbee and Huntington: A Study in Determinism," *Geographical Journal* 118 (1952): 406-28.
- 23 G. Tatham, "Environmentalism and Possibilism," in *Ge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G. Taylor (London: Methuen, 1951), 128-64.

- 24 P. Vidal de la Blache,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Constable, 1926); K. Archer, "Regions as Social Organisms: The Lamarckian Characteristics of Vidal de la Blache's Regional Geography,"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 (1993): 498-514.
- 25 G. Marsh,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26 Engels, 引自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84.
- 27 W.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4).
- 28 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我在此依循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提出的一般性論點。
- 29 A.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7-14.
- 30 K. Soper, *What Is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1995); N. Castree and B. Braun, eds., *Social Natur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2001).
- 31 這是 Neil Smith 在 *Uneven Development* 裡的基本論點。
- 32 K.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493.
- 33 Emil Altvater 批評我的構想，因為我不夠尊重熱力學第二定律確立的限制。參見 E. Altvater, "Review of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 (1998): 225-35; 這個論題的極端版本，參見 K. Lee, *Soci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Scar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 34 I. Prigogine, and I.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Boston: Shambhala, 1984); R. Levins and R. Lewontin,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地理學當前思想的絕佳概論，參見 Castree, and Braun, *Social Nature*.
- 35 E. Wilson,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New York: Knopf, 1998), 266.
- 36 同前註，266-67.
- 37 同前註，270.
- 38 Marx, *Capital*, vol. 1, 493-94.
- 39 Wilson, *Consilience*, 83.
- 40 同前註，128.
- 41 同前註，166.

- 42 同前註，168.
- 43 這是出自另外一部傑作的意涵：Tsing,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4 A. Escobar, "Plac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a Post-Development Era,"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R. Prazniak and A. Dirlik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193-217; J. Gibson-Graham,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o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 45 D. 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N. Smith,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J. Docherty, M. Graham, and M. Malek (London: Routledge, 1992); E. Swyngedouw, 1997: "Neither Global nor Loc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ed. K. Cox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37-66.
- 46 R. Bhaskar,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Verso, 1993).
- 47 Leiss, *Domination of Nature*; M.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 48 C. Caudwell, *Studies and Further Studies in a Dying Cul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 49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 50 N. Smith, "Nature as Accumulation Strategy," *Socialist Register* (2007): 16-36.
- 51 B. Braun, "Toward a New Earth and a New Humanity: Nature, Ontology, Politics," in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ed. N. Castree and D. Gregory (Oxford: Blackwell, 2006), 191-222.
- 52 引自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48-57; Levins and Lewontin, *Dialectical Biologist*.
- 53 W.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13-14.
- 54 D. Bohm,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Ark Paperbacks, 1983); M. Wilkins,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in *Quantum Implications*, ed. B. Hiley and F. Peat (London: Routledge, 1987), 338-60; A.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M.

- Hardt and A.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55 W. 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56 同前註，68.
- 57 Marx, *Capital*, vol. 1, 133.
- 58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chap. 8.
- 59 Marx, *Capital*, vol. 1, 494.
- 60 D. Harvey, "The Fetish of Technolog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Prometheus's Bequest: Technology and Change," *Macalester International* 13 (2003): 3-30.
- 61 Marx, *Capital*, vol. 1, 133.
- 62 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London: Verso, 1991); N. Hartsock, *Money, Sex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1973); M.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Zed Books, 1986); C. Katz, "Whose Nature, Whose Culture? Private Productions of Spac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e," in *Remaking Nature: Nature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ed. N. Castree and B. Braun (London: Routledge, 1998), 46-63; F.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5).
- 63 尤其參考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 64 G.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65 K. Marx, *The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73), 414-15.
- 66 同前註，704-5.
- 67 D.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 L. Nichols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 68 P. Hawken, *Blessed Unrest: How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History Is Restoring Grace, Justice and Beauty to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7).
- 69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111; D. Haraway,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89) : 亦見 E. Martin, *Flexible Bodies: 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 70 引自 M. Delanda,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 Continuum Books, 2006), 121.
- 71 同前註。
- 72 K.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 73 同前註。
- 74 有關這些路線的進一步闡述，參見 D. Harve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 Certain Footnote in Marx's Capital," *Human Geography* 1, no. 2 (2008): 即將出版。

結語

- 1 參見 D. Harvey, "The Sociology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8, nos. 3-4 (2005): 211-56.
- 2 T. Lemke,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Michel Foucault's Lecture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on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30 (2000): 190-207.
- 3 W. Benjam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55; A. Badiou, *Metapolitics*, trans. J. Barker (London: Verso, 2005).
- 4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5 E. Grosz, "Bodies-Cities," in *Sexuality and Space*, ed. B. Colom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1-54; N. De Genova, *Working the Boundaries: Race, Space, and "Illegality" in Mexican Chicag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6 R.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 7 K. Mark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154; Lemke, "'Birth of Biopolitics.'"
- 8 M.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ress, 1984).
- 9 R. Williams, *Loyaltie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5).
 - 10 J. Clark, and C. Martin,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The Radical Social Thought of Elisée Reclu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 11 參見 D. Robotham, *Culture, Society, Economy: Globaliz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Sage, 2005) 的犀利批評。
 - 12 P. Abrams, "Notes on 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e State,"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ed. A. Sharma and A. Gupta (Oxford: Blackwell, 2006), 112-30.
 - 13 T. Mitchell,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State Effect," in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ed. Sharma and Gupta, 169-86.
 - 14 同前註，174-82.
 - 15 引自 S.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
 - 16 Mitchell,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State Effect," 183.
 - 17 M. Biggs, "Putting the State on the Map: Cartography, Territory, and European State Form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1 (1999): 374-405.
 - 18 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 19 T.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 20 De Genova, *Working the Boundaries*, 第3章。
 - 21 Smith,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47.
 - 22 J.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nhabib, *Rights of Others*.
 - 23 M. Sparke, *In the Space of Theory: Postfoundational Geographies of the Nation-St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xxxiv, 116-17.
 - 24 R. Trouillo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Deceptive Kind," *Current Anthropology* 42, no. 1(2001): 125-34.
 - 25 將資本主義概念化成為幾近消失，例見 J. Gibson-Graham,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o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 26 M. Bookchin, *Remaking Society: Pathways to a Green Future* (Boston: South End

- Press, 1990), 194-95.
- 27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9*.
- 28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C. 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New York: Vintage, 1981), 226.
- 29 Smith,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 30 S. Kaviraj, "On the Enchantment of the State: Indian Thought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Narrative of Moder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 (2005): 263-96; P.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1 引自 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64.
- 32 M. Hardt and T.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 Holloway, *Changi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Badiou, *Metapolitics*; J.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S. Zizek,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 33 A. Badiou,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2d ser., 49 (2008): 29-48.
- 34 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308.
- 35 D. Harvey, "Introduction," in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 36 Clark and Martin,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249-50.

參考書目

- Abrams, P. "Notes on 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e State."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ed. A. Sharma and A. Gupta (Oxford: Blackwell, 2006), 112-30.
-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2002): 1231-94.
- Agnew, J.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87.
- Agnew, J., and J. Duncan, eds. *The Power of Place: Bringing Together Ge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 Alexander, D. "Bioregionalism: Science or Sensibility." *Environmental Ethics* 12 (1990): 161-73. Reprinted in McGinnis, M., ed. *Bio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61-73.
- Allen, A. "Foucault and Enlightenment: A Critical Reappraisal." *Constellations* 10, no. 2 (2003): 180-98.
- Altvater, E. "Review of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 (1998): 225-35.
- Amin, S. *Beyond U.S. Hegemony? Assessing the Prospects for a Multipolar World*. London: Zed Books, 2006.
- Amsden, A. *Escape from Empire: The Developing World's Journey through Heaven and Hel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 Anderson, A. "Cosmopolitan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Divided Legacies of Modernity."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and Robins, 270-71.
-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Anderson, J. "Fund Managers Raising the Ante in Philanthropy." *New York Times*, 3 August 2005, Business Section, 1, 3.
- Anderson, K., and F. Gale, eds.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1992.

- Anderson, P.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Appelbaum, R., and W. Robinson, eds. *Critical Globaliz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Appiah, A.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Norton, 2006.
- Appiah, A. "Cosmopolitan Patriots." In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21-29.
- Appiah, A. *The Ethics of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Archer, K. "Regions as Social Organisms: The Lamarckian Characteristics of Vidal de la Blache's Regional Geography."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 (1993): 498-514.
- Arday, R.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New York: Athenaeum, 1966.
- Arendt, 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97.
- Arendt, H.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1968.
- Arendt, H.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Armstrong, P., A. Gly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ting and Breaking Up of the Great Boo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Arvedlund, E. "Russia's Billionaires Club Now Totals 27 Members." *New York Times*, 7 May 2005, C1.
- Bachelard, G.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 Badiou, A. *Being and Event*. London: Continuum, 2005.
- Badiou, A.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2d ser., 49 (2008): 29-48.
- Badiou, A. *Metapolitics*. Trans. J. Barker. London: Verso, 2005.
- Barry, J. "Voice Off." In *Third Berlin Biennial for Contemporary Art, Catalogue* (Berlin: Biennale, 2004), 48-49.
- Bartholomew, A., and J. Breakspear. "Human Rights and Swords of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3): 124-45.
- Barzini, L. *The Italians*. New York: Athenaeum, 1967.
- Basso, K. "Stalking with Stories: Names, Places and Moral Narratives among the Western Apache." In *1983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 (Washington, D.C.: AES, 1984).
- Basso, K. *Wisdom Sits in Place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5.
- Basso, K. "Wisdom Sits in Places: Notes on a Western Apache Landscape." In *Sense of Place*, ed. Feld and Basso, 52-91.
- Bate, J.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 Beck, U.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in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In *Conceiving Cosmopolitanism*, ed. Vertovec and Cohen, 61-85.
- Beck, U.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 Beck, U. "Living in the World Risk Society." *Hobhouse Memorial Lectu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5 February 2006.
- Bello, W.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 Benhabib, S. *The Rights of Others: Aliens, Residents and Citiz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enjamin, W.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9.
- Benjamin, W.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Berlin, I.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7.
- Bhaskar, R.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Verso, 1993.
- Biggs, M. "Putting the State on the Map: Cartography, Territory, and European State Form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1 (1999): 374-405.
- Blair, T. Speech to U.S. Congress, 18 July 2003, "History Will Forgive Us." Consulted online: <http://politics.guardian.co.uk/speeches/story/0,11126,1008150,00.html>
- Bohm, D.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Ark Paperbacks, 1983.
- Bolin, R. "Immanuel Kant's *Physical Geography*." Trans, and annotated by R. L. Bolin. Master's thesis, Dept. of Geography,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 Bookchin, M. *Remaking Society: Pathways to a Green Futur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Boyer, C.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 Brash, J. "Re-scaling Patriotism: Competition and Urban Identity in Michael Bloomberg's New York."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35 (2006): 387-432.
- Braudel, F.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 Braun, B. "Toward a New Earth and a New Humanity: Nature, Ontology, Politics." In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ed. Castree and Gregory, 191-222.
- Bray, D.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Brennan, T. *At Home in the World: Cosmopolitanism No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renner, N., and N. Theodore.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Urban Restructuring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Oxford: Blackwell, 2002.
- Brick, C. "Millions for Millions." *New Yorker*, 30 October 2006, 62-73.
- Brooks, D.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Times*, 22 January 2005, A15.
- Burawoy, M.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Burdett, R., and D. Sudjic, eds. *The Endless City*. New York: Phaidon, 2008.
- Bush, G. W. "Acceptance Speech to Convention Delegates in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3 September 2004, P4.
- Bush, G. W. "Both Our Nations Serve the Cause of Freedom." *New York Times*, 20 November 2003, A14.
- Bush, G. W. "The Inaugural Address: The Best Hope for Peace in Our World Is the Expansion of Freedom in All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21 January 2005, A12-13.
- Bush, G. W.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9 January 2002. Consulted onlin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print20020129-n.html>
- Bush, G. W.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ember 2002, A33.
- Buttimer, A. *Society and Milieu in the French Geographical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1.
- Calhoun, C.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Frequent Travellers: Towards a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Cosmopolitanism." In *Conceiving Cosmopolitanism*, ed.

Vertovec and Cohen, 86-109.

- Carney, J. *Black Rice: The African Origins of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America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asey, E. *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Casey, E. "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ly Short Stretch of Time." In *Senses of Place*, ed. Feld and Basso, 13-51.
- Cassirer, E. *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 Castree, N., and B. Braun, eds. *Social Natur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2001.
- Castree, N., and D. Gregory.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6.
- Caudwell, C. *Studies and Further Studies in a Dying Cul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 Chakrabarty, D.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handler, D.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 Chatterjee, P.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heah, P. "Introduction Part II: The Cosmopolitical Today."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and Robbins, 20-44.
- Cheah, P., and B.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omsky, N.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from Kosovo*. Monroe, Main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 Chomsky, N. *On Power and Ideolog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 Clark, J., and C. Martin, eds.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The Radical Social Thought of Elisée Reclu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 Clark, T. J. *Image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 Clayton, D. *Islands of Truth: The Imperial Fashioning of Vancouver Island*.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9.

- Clifford, J. "Mixed Feelings."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and Robins, 362-70.
- Cohen, G.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ohen, R. "A Generation of German Pacifists at Odds over the War." *New York Times*, 6 May 1999, A10.
- Connolly, W. *The Ethos of Plur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 Connolly, W. "Speed, Concentric Cultures and Cosmopolitanism." *Political Theory* 28 (2000): 596-618.
- Conway, J. *Identity, Place, Knowledge*. Halifax: Fernwood Publishing, 2004.
- Cooper, 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 Cox, K., 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lford, 1997.
- Crampton, J., and S. Elden, eds.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 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4.
- Cronon, W.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 Dash, E. "Off to the Races Again, Leaving Many Behind." *New York Times*, 9 April 2006, Business Section, 1, 5.
- Davis, M.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6.
-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De Genova, N. *Working the Boundaries: Race, Space, and "Illegality" in Mexican Chicag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De Soto, H.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 De Soto, H.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1989.
- De Sousa Santos, B. "Beyond Neoliberal Governance: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s Subaltern Cosmopolitan Politics." In *Law and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ed. De Sousa Santos and Rodriguez-Garavito, 29-63.

- De Sousa Santos, B., and C. Rodriguez-Garavito, eds. *Law and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owards a Cosmopolitan Leg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Delanda, M.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 Continuum Books, 2006.
- Delaney, D. *Territory: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 Deleuze, G.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Deleuze, G., and F.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Deleuze, G., and M. Taormina.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74)*. London: Semiotexte, 2003.
- DeLillo, D. *The Names*. New York: Vintage, 1989.
- Deshpande, S. "Hegemonic Spatial Strategies: The Nation-Space and Hindu Communa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India." *Public Culture* 10, no. 2 (1998): 249-83.
- Dia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7; rpt. 2003.
- Dirlik, A.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ed. Prazniak and Dirlik, 15-51.
- Droit, R.-P. "Kant et les Fournis du Congo." *Le Monde*, 5 February 1999.
- Edney, M.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Edwards, M., and D. Hulme, e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1995.
- Elden, S. *Mapping the Present: 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 London: Continuum, 2001.
- Elster, J. *Local Justice: How Institutions Allocate Scarce Goods and Necessary Burde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2.
- Elyachar, J. *Markets of Dispossession: NGO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in Cair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Entriken, N. *The Betweenness of Plac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Modernity*. London: Macmillan, 1991.

- Escobar, A. "Plac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a Post-Development Era."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Prazniak and Dirlik, 193-217
- Etzioni, A. *The New Golden Rule: Community and Moral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 Falk, R. "Revisioning Cosmopolitanism." In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53-60.
- Feld, S., and K. Basso, eds. *Senses of Place*. Phoenix, Ariz.: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Advanced Seminar Series, 1996.
- Fine, R., and W. Smith. "Jiirgen Habermas's Theory of Cosmopolitanism." *Constellations* 10, no. 4 (2003): 469-87.
- First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Inc. *Economic Sanctions Survey*. Fort Lee, N.J.: First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Inc., 2000.
- Foltz, B. *Inhabiting the Earth: Heidegger,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 Atlantic Park, N.J.: Humanities Press, 1995.
- Foucault, M. "Commentary of Kant's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Trans. Arianna Bove. Consulted online: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foucault>
- Foucault, M. "Heterotopias." *Diacritics* 16, no. 1 (Spring 1986): 22-28.
- Foucault, M. *Introduction to Kant's Anthropology*. Ed. R. Nigro.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8.
-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 Foucault, M.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Power/Knowledge*, ed. C. Gordon (London: Harvester, 1980), 63-77.
- Foucault, M.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78*.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Foucault, M.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 Rabinow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84), 32-50.
- Friedan, B.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Norton, 1963.
- Friedman, T.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
- Fujita, M., P. Krugman, and A.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 Garnett, C. *The Kantian Philosophy of Spac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1965.
- George, 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IF...* London: Verso, 2003.
- Gibson-Graham, J. K. "Beyond Global vs. Local: Economic Politics Outside the Binary Frame." In *Geographies of Power: Placing Scale*, ed. A. Herod and M. Wright (Wiley-Blackwell, 2002), 25-60.
- Gibson-Graham, J.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 Gills, B.,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Glacken, C.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Godlewska, A., and N. Smith, eds. *Geography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1997.
- Gordon, M. "My Mother Is Speaking from the Deser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 March 1995, 47-70.
- Graeber, D.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 Gray, J. *False Dawn: The Il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Press, 1998.
- Gregory, D. *The Colonial Present: Afghanistan, Palestine and Iraq*. Oxford: Blackwell, 2004.
- Gregory, 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4.
- Grigg, D. "Regions, Models and Classes." In *Models in Geography*, ed. R. Chorley and P. Haggett (London: Methuen, 1967), 479-501.
- Gross, D. "Fighting Poverty with \$2-a-Day Jobs." *New York Times*, 6 July 2006, Weekend in Review, 4.
- Grosz, E. "Bodies-Cities." In *Sexuality and Space*, ed. B. Colom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1-54.
- Gurevich, A. *Categories of Mediev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85.
-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5.
- Haggett, P. *Locational Analysis in Ge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5.
- Hajer, M.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Haraway, D.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 L. Nichols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190-233.
- Haraway, D.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89.
- Haraway, D.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 Hardt, M., and A.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arley, J., P. Laxton, and J. Andrews, eds. *The New Nature of Map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artshorne, R.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Re-examined."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5 (1955): 205-44.
- Hartshorne, R.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Lancaster, Pa.: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39.
- Hartsock, N. "Globalization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David Harvey's Dialectical Marxism," in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ed. Castree and Gregory, 167-90.
- Hartsock, N. *Money, Sex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1973.
- Harvey, D.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93-110.
- 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 Harvey, D. "The Fetish of Technolog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Prometheus's Bequest: Technology and Change," *Macalester International* 13 (2003): 3-30.
- Harvey, D. "Introduction." In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 Harvey, D.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
-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2007.
- Harvey, D. "Marxism, Metaphors, and Ecological Politics." *Monthly Review* 49, no. 11 (April 1998): 1-38.
-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arvey, 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 Certain Footnote in Marx's Capital." Forthcoming in *Human Geography* 2 (2008).

- Harvey, D.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Harvey, D.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In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chap. 3.
-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 Harvey, D. "The Soci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8, nos. 3-4 (2005): 211-56.
-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arvey, D.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 Harvey, D.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ausmann, R. "A Case of Bad Latitude: Why Geography Causes Poverty."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1): 45-53.
- Hawken, P. *Blessed Unrest: How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History Is Restoring Grace and Beauty to the World*. New York: Viking, 2007.
- Hayden, D.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Heidegger, M. *Discourse on Thinking*. New York: Harper, 1966.
- Heidegger, M.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 Held, 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eld, D. "Law of States, Law of Peoples." *Legal Theory* 8, no. 2 (2002): 1-44.
- Held, D. "Principles of Cosmopolitan Order."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 ed. G. Brock and H. Brigho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27.
- Himmelfarb, G. "The Illusions of Cosmopolitanism." In M. Nussbau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72-77.
- Holloway, J. *Changi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 Hudson, R. *Producing Places*. New York: Guilford, 2001.
- Huntington, E.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 Huntington, E. *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5.
- Jacks, G., and R. Whyte. *Vanishing Lands*. New York, 1949.

- Jay, M.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 Jayamaha, B., D. Smith, J. Roebuck, O. Mora, E. Sandmeir, Y. Gray, and J. Murphy. "The War as We Saw It." *New York Times*, 19 August, 2007, Week in Review, 6.
- Kant, I.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54-60.
- Kant, I.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 Kant, I. *Geographie (Physische Geographie)*. Paris: Bibliotheque Philosophique, 1999.
- Kant, I. "Immanuel Kant's Physical Geography." Trans. O. Reinhardt and D. Oldroy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7.
- Kant, I.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Katz, C. "On the Grounds of Globalization: A Topography for Feminist Political Engagement." *Signs* 26, no. 4 (2001): 1213-34.
- Katz, C. "Whose Nature, Whose Culture? Private Productions of Spac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e," In *Social Nature*, ed. Castree and Braun, 46-63.
- Katzenstein, M., U. Singh, and U. Thakar. "The Rebirth of Shiv-Sena: The Symbiosis of Discursive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no. 2 (1997): 371-90.
- Kaviraj, S. "On the Enchantment of the State: Indian Thought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Narrative of Moder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 (2005): 263-96.
- Keith, M., and S.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Kern, S.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
- Kerner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8.
- Kimble, G. "The Inadequacy of the Regional Concept." In *London Essays in Geography*, ed. L. Stamp and S. Wooldridge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7), 151-74.
- Klein, 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 Kohn, M. *Radical Space: Building the House of the Peop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 Koopmans, T, and A. Beckman. "Assignment Problems and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Econometrica* 25 (1957): 53-76.
- Krugman, P.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Krugman, P. "Graduates versus Oligarchs." *New York Times*, 27 February 2006, A19.
- Kuhn, 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Kunstler, R. *The Geography of Nowher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merica's Man-Made Landscap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 Lee, K. *Soci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Scar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London: Verso, 1991.
-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 Lefebvre, H.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 Le Goff, J.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eiss, W.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4.
- Leitner, H., J. Peck, and E. Sheppard. *Contesting Neoliberalism: Urban Frontiers*. New York: Guilford, 2006.
- Lemke, 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Michel Foucault's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on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30 (2000): 190-207.
- Levins, R., and R. Lewontin.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Livingston, D.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 Oxford: Blackwell, 1993.
- Loukaki, A. *Living Ruins: Value Conflicts*. Farnham, U.K.: Ashgate, 2008.
- Loukaki, A. "Whose Genius Loci: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cred Rock of the Acropolis."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7 (1997): 306-29.
- Lovejoy, A.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Marsh, G.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Martin, E. *Flexible Bodies: 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 Marx, K.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 Marx, K. *Capital*. Vol. 3. New York: Penguin, 1981.
- Marx, K.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 Marx, K. *The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73.
- Marx, K.,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 Marx, K., and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 Massey, D. *For Space*. London: Sage, 2005.
- Massey, D.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Regional Studies* 13 (1979): 233-43.
- 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 May, J.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Its Relation to Recent Geograph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0.
- Mehta, U.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Merrifield, A.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1991): 516-31.
- Mertes, T.,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 Mesjaros, I.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Michaels, W. *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 How We Learned to Love Diversity and Ignore Identit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 Mies, M.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Zed Books, 1986.
- Mignolo, W.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 Mignolo, W.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itchell, T.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State Effect." In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ed. Sharma and Gupta, 169-86.

- Mitchell, T. "The Work of Economics: How a Discipline Makes Its World."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46 (2005): 297-320.
- Mohanty, C. *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sing Solida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oore, A. "Rethinking Scale as a Geographical Category: From Analysis to Practi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 no. 2 (2008): 203-25.
- Moore, D. *Suffering for Territory: Race, Place and Power in Zimbabw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orley, D., and K. Robbins. "No Place Like Heimat: Images of Home(land)." In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ed. E. Carter, J. Donald, and J. Squir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3-31.
- Moses, R. "What Happened to Haussmann?" *Architectural Forum* 77 (1942): 1-10.
- Munk, N. "Don't Blink: You'll Miss the 258th Richest American." *New York Times*, 25 September 2005, Weekend in Review, 3.
- Munn, N. *The Fame of Gaw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Naess, A.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Narotzky, S., and G. Smith. *Immediate Struggles: People, Power, and Place in Rural Sp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Negri, T. *Subversive Spinoza: (UN)contemporary Vari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 Nilsen, A. "The Valley and the Nation: The River and the Rage." Ph.D. 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Bergen, 2006.
- Norberg-Shulz, C.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1980.
- Nozick, R.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 Nussbaum, 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06.
- Nussbaum, M. "Kant and Stoic Cosmopolit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5 (1997): 1-25.
- Nussbaum, M., et al.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 Oakes, T. "Place and the Paradox of Modernity."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 Geographers* 87 (1997): 509-31.
- O'Keefe, P., N. Smith, and B. Wisner. "Taking the Naturalness Out of Natural Disasters." *Nature* 260 (1976): 566-67.
- Oilman, B.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Ong, A.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Osserman, R. *The Poetry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 Paasi, A. "Place and Region: Regional Worlds and Wor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 (2002): 802-11.
- Paasi, A. *Territories, Boundaries and Consciousness: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 New York: Wiley, 1997.
- Pagden, A. "Introduction." In C. Sauer, *The Early Spanish M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xii-xvii.
- Pagden, A. "Stoic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Legacy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Constellations* 7, no. 1 (2000): 3-22.
- Pattison, W. "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 *Journal of Geography* 63 (1964): 211-16.
- Philo, C. "'Bellicose History' and 'Local Discursivities': An Archaeological Reading of Michel Foucault's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In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ed. Crampton and Elden, 342-67.
-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 Porter, E. "Mexico's Plutocracy Survives on Robber-Baron Concessions." *New York Times*, 27 August 2007, Editorial Observer.
- Powell, J.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odern Austra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rahalad, C.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Philadelphia: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6.
- Prazniak, R., and A. Dirlik, eds.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 Prigogine, I., and I.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Boston: Shambhala, 1984.
- Przeworski, A. "Geography vs. Institutions Revisited: Were Fortunes Reversed?" Department of Politics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2004.

- Pudup, M. "Arguments within Region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2 (1988): 369-90.
- Rancière, J.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Rancière, J. *The Nights of Labor: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Rawls, J. *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Reclus, E. "The Feeling for Nature in Modern Society." In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ed. Clark and Martin, ii9-28.
- Reclus, E. *L'Homme et la Terre*. Ed. B. Ghiblin. 2 vols., abridged. Paris: La Decouverte, 1982.
- Rec, J.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Nationality."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and Robins, 77-90.
- Rolph, T.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 Rescher, N. *Leibniz's Metaphysics of Nature*. Dordrecht: Reidel, 1981.
- Robotham, D. *Culture, Society, Economy: Globaliz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Sage, 2005.
- Roy, A.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 Sachs, J.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 Sachs, J. (with J. Gallup and A. Mellinger). "Is Geography Destiny." In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 B. Pleskovic and J. Stiglitz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9), 127-78.
- Sack, R.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 Sack, R.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It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ale, K. "What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Nation*, 18. October 1990, 444-46.
- Sassen, S.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auer, K. *Land and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 Sayre, N. "Ec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Scale: Parallels and Potential for Integration."

-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 no. 3 (2005): 276-90.
- Schaeffer, F.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3 (1953): 57-84.
- Scheuer, M. *Imperial Hubris: Why the West Is Losing the War on Terror*. Dulles, Va.: Potomac Books, 2004.
- Schorske, C. *Fin-de-Siècle Vienna*. New York: Vintage, 1981.
- Schwab, K., and C. Smadja. "Globalization Needs a Human Fa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8 January 1999, 8.
- Scott, J. *Seeing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emple, E. C.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Ratzel's System of Anthropogeographie*. New York: Henry Holt, 1911.
- Shapiro, M. "The Events of Discourse and the Ethics of Global Hospitality." *Millennium* 27 (1998): 695-713.
- Sharma, A., and A. Gupta,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Oxford: Blackwell, 2006.
- Sheppard, E., and R. McMaster, eds. *Scale and Geographic Inquir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4.
- Smith, N.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Smith, N. "Disastrous Accumulati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6, no. 4 (2007): 769-87.
- Smith, N. *The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Smith, N.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J. Docherty, M. Graham, and M. Malek (London: Routledge, 1992).
- Smith, N. "Nature as Accumulation Strategy." *Socialist Register* (2007): 16-36.
- 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1984.
- Soja, E.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 Soper, K. *What Is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1995.
- Sparke, M. *In the Space of Theory: Postfoundational Geographies of the Nation-St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 Spatz, O. "Toynbee and Huntington: A Study in Determinism." *Geographical Journal* 118 (1952): 406-28.
- Stiglitz, J.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 Stokes, E. *English Utilitarians in 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 Storper, M., and R. Walker.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Territory,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Growth*. Oxford: Blackwell, 1989.
- Swyngedouw, E. "Neither Global nor Local: 'Gloc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37-66.
- Tatham, G. "Environmentalism and Possibilism." In *Ge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G. Taylor (London: Methuen, 1951), 128-64.
- Taylor, P. "The State as Container: Internationality, Interstateness, Interterritorialit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 (1995): 1-15.
- Thomas, W.,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Thompson, 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68.
- Thompson, E.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56-97.
- Trouillot, R.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Deceptive Kind." *Current Anthropology* 42, no. 1 (2001): 125-34.
- Tsing, A.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an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 Van de Pitte, F. "Introduction." In I. 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xi-xxii.
- Vertovec, S., and R. Cohen, eds. *Conceiving Cosmopolitanism: Theory, Context and*

-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Vidal de la Blache, P.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Constable, 1926.
- Wade, R.,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 Wallace, T. "NGO Dilemmas: Trojan Horses for Global Neoliber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2003): 202-19.
- Walzer, M.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93.
- Wheatley, P.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 Whitehead, A. "La théorie relationiste de l'Espac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3 (1916): 423-54.
- Wiley, M. *Romantic Geography: Wordsworth and Anglo-European Spaces*. London: Macmillan, 1998.
- Wilkins, M.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In *Quantum Implications*, ed. B. Hiley and F. Peat (London: Routledge, 1987), 338-60.
- Williams, R.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Williams, R. *Loyaltie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5.
- Williams, R.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The Eggs of the Eagle*. Vol. 1.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9.
- Williams, R.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Verso, 1989.
- Wilson, E.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New York: Knopf, 1998.
- Wilson, R. "A New Cosmopolitanism Is in the Air." In *Cosmopolitics*, ed. Cheah and Robins, 351-61.
- Winichakul, T.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 Wittfogel, K.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 Worster, D. *Dust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right Mills, C.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Young, I.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Zammito, J. *Kant, Herder, 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Zeldin, T. *The French*. New York: Vintage, 1984.

Zeldin, T. *An Intimate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Zizek, S.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索引

條目後的頁碼係原著頁碼

檢索時請查正文頁邊數碼

Abrams, Philip 阿伯蘭斯 261-63

Absolute space 絕對空間 111; connection to causality 與因果關係的關聯 226; as fixed and immovable 作為固定與不可移動的 134; historical hegemony of 歷史霸權 167-68; maps in 地圖 206; relational at Ground Zero 世貿中心遺址的關係 146-48; uses for concept of 概念用途 141; 亦見 Absolute space and time 絕對空間與時間

Absolute space and time 絕對空間與時間 275-76; absolute bourgeois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絕對資產階級行政權力 258; constructing geographies in 建構地理 275-76; individual as autonomous being in 自主的個人 257; individuation and 個體化 252-53; reification of state in 國家的物化 266-67, 274-75; state formation and 國家形構 270-71

Absolute time: connection to causality 絕對時間：與因果關係的關聯 226; 亦見 Absolute space and time 絕對

空間與時間

"A Case of Bad Latitude: Why Geography Causes Poverty" 〈壞緯度個案：地理何以導致貧窮〉 209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68-71, 73-74

Acemoglu, Daron 阿西莫格魯 210-12

Advocacy groups 倡議團體 72, 73

Afghanistan 阿富汗 3, 7, 99, 102, 107, 147, 275

al-Sadr, Muqtada 埃爾薩德 100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movement 另類全球運動 63, 194

American Century 美國世紀 12

The American Ideolog 美國意識形態 1

Americanism 美國主義 118

Amin, Samir 阿敏 63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3, 74

Anarchists, and place construction 無政府主義者，與地方建構 199-200, 272-73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 254

Anemic geography 貧血地理學 271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反全球化運

- 動 46, 84, 153, 174
- Appadurai, Arjun 阿帕杜萊 57, 271
- Appiah, Anthony: on closed territorial boxes 艾比亞：論封閉的領域箱 112, 188; on rooted cosmopolitanism 論根植寰宇主義 113, 114-15, 116, 168, 275
- Arendt, Hannah 鄂蘭 34, 117
- Argentina 阿根廷 66, 229
- Aristotle 亞里斯多德 166, 194, 232
- Arms trade, in Africa 軍火交易，非洲 104
- Asante 阿散蒂 114-15
- Asian crisis of 1997-98 1997-98 年亞洲危機 56, 69, 106
- Assemblage of state 國家組裝 279
- Assets: appropriation of 資產：挪用 68, 69; redistribution of 重分配 70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 32
- Australia 澳大利亞 216
- Authoritarian neofascism 威權新法西斯主義 8
- Axis of evil 邪惡軸心 12, 99-100, 118
- Bachelard, G. 巴舍拉 178, 179
- Bacon, Francis 培根 214, 217
- Badiou, Alain 巴迪烏 84, 140, 179, 281, 282
- Banality of evil 邪惡之平凡無奇 117, 118
- Barry, Judith 巴利 144
- Basso, Keith 巴索 175, 176-77, 180, 187
- Beck, Ulrich 貝克 81-82, 84, 87, 91, 106, 163, 235
- Beckman, A. 貝克曼 107, 108
- Belgium 比利時 104
- Bello, Walden 貝洛 63
- Bengal 孟加拉 40
- Benhabib, Seyla: on exclusionary nationalism of Rawls 班哈比：論羅爾斯的排他性國族主義 90-91; on layered structure of citizenship rights 論公民資格權利的階層結構 88-89; on local interpretations of ethical principles 論種族原則的地方詮釋 106; on migrant rights 論移民權 26, 27; on right of hospitalit 論款待權 18; on sovereignty as relational concept 論作為關係概念的主權 270; on universals-particulars 論普遍—特殊 10-11
- Benjamin, W. 班雅明 142, 254, 281
- Berbers 柏柏人 255
- Berlin, Isaiah 柏林 118
- Bhaskar, Roy 巴斯卡 230
- Big bang theory 大爆炸理論 137
- Binaries 二元區分 222

- Bin Laden, Osama 賓拉登 115, 47
- Biological determinism 生物決定論 226-28
- Biological metaphor, of body politic 生物隱喻，身體政治的 42
- Biological warfare 生物戰爭 100
- BJP Hinduist national party 印度國大黨 110-11, 199
- Blair, Tony: cosmopolitanism and 布萊爾：寰宇主義 102, 105, 113; on universal values 論普遍價值 2; wealth inequalities under 其下的財富不平等 60
- Bloomberg, Michael 彭博 71-72
- Bohm, David 波姆 139, 233
- Bookchin, Murray 布克金 199-200, 273, 282
- Boundaries, fluidity of 邊界，流動性 43
- Bounded communities 有邊界的社群 88, 91
- Bounded spaces 有邊界的空間 77, 109, 134, 169-70, 189, 197
- Bounded territories 有邊界的領域 135, 198
- Bourdieu, P. 布迪厄 255
- Bourgeois cosmopolitanism 資產階級寰宇主義 163-64, 282-83
- Bowman, Isaiah 波曼 217
- Boyer, Benjamin C. 博耶 179
- Braudel, Fernand 布勞岱爾 170, 238
- Braun, B. 布勞恩 232
- Brazil 巴西 66, 73
- Brennan, Tim 布瑞南 118
- Brooks, David 布洛克斯 3
- Brown, George 布朗 60
- Buckley, William 巴克利 7
- Burawoy, M. 布若威 152
- Burial at Ornans* (painting)《奧南的葬禮》(繪畫) 143
- Burke, Edmund 柏克 7; cosmopolitanism of 寰宇主義 42-43; cosmopolitanism of sentiments of 多愁善感的寰宇主義 43; critique of British imperial practices in India 批判英國在印度的帝國行徑 47; on entailed inheritance 論限定繼承的遺產 43, 44
- Bush, George W.: on American values 布希：論美國價值 1, 2, 256;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under 違反人權 3; on moral justification for attacking Iraq 論攻擊伊拉克的道德理由 1, 8; version of Kantian cosmopolitan ethic 康德寰宇主義倫理的版本 35; W. Wilson influence on 威爾森的影響 3, 4
- Bush, George W. administration: breakdown of U.S. moral authority

- under 布希政府：美國道德威權的
 垮台 278-79; tax reform under 稅務
 改革 59-60
- Cadastral survey 地籍調查 172
- Cairo 開羅 163
- Calhoun, Craig 卡洪 79
- Capitalism: abstract space of 資本主義：
 抽象空間 184;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to function 運作可能性的
 條件 270, 278; crony 裙帶 63, 106;
 cultural conditions for 文化條件 62-
 63; global 全球 65-66, 131, 188;
 industrial 工業 54, 224; instabilities
 of 不穩定性 209-210; liberal 自由主
 義 182, 185; multinational 跨國公司
 131, 147; neoliberal 新自由主義 9,
 79-80, 97, 115-16, 185, 194;
 noncapitalism 非資本主義 46; place
 concept under 地方概念 186, 194-
 95; populist 民粹主義 55; predatory,
 in Africa 非洲的掠奪 203-204; rise
 of 興起 68; Roosevelt and 羅斯福 5,
 105; spatio-temporality of 時空性
 155-57, 258, 264-65; wage labor
 within 內部的薪資勞動 152
- Capitalist neocolonialism, in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新殖
 民主義 39, 45
- Carbon trading 碳交易 232
- Cartesian/Kantian world view 笛卡兒/
 康德世界觀 233, 270-71
- Cartesian mechanical world view 笛卡兒
 機械世界觀 222
- Cartesian/Newtonian world view 笛卡兒
 / 牛頓世界觀 32, 222, 234
- Cartesian view of space and time 笛卡兒
 式時空觀 32, 138
- Cartography 製圖術 47-49, 172, 255, 276
- Casey, Edward 凱西 138, 166-67, 175,
 184, 188-90, 193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 79, 168
- Catholic cosmopolitanism 天主教寰宇主
 義 168
- Caudwell, Christopher 考德威爾 230-31
- Causation, environmental thesis of 因果
 關係，環境論題 203-206, 209-210,
 214-15, 233
- Central human capabilities 核心人類能力
 90-93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中央
 情報局 12, 39, 128
- Central-place theory 中地理論 33
- Chakrabarty, Dipesh 查克拉巴蒂 37, 40,
 44
- Chandler, D. 錢德勒 73
- Changes in the Land* (Cronon) 《土地的
 變遷》(克羅農) 232

- Chaotic decentralization 混亂的去中心化
207
- Chatterjee, Partha 查特吉 49
- Cheah, Pheng 謝平 23, 77, 80
- Cheney, Dick 切尼 3, 274
- Chicano studies 墨西哥裔美國人研究
269
- Child labor 童工 73
- Child prostitution 雛妓 73
- Chile 智利 195, 199
- China: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中國：
中央集權化 210; citizenship in 公民
資格 88; decentralization in 去中心
化 66, 209; dispossession of peasants
in 剝奪農民 68; economic advantage
and culture 經濟優勢與文化 62-63;
per capita income increase in 人均收
入增加 61; rising economic power of
增加的經濟力量 207-209; spatial
determinism in 空間決定論 206,
207-208;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
60, 61
- Citizenship: global 公民資格：全球 79-
80, 117; layered structure of 階層結構
88
- Civil society, evolution of 市民社會，演
化 257
- Clark, T. J. 克拉克 143
- Class power 階級權力 58-59, 62, 115
- Clayton, D. 柯雷頓 38
- Clifford, James 柯利弗德 113, 114
- Climatic determinism 氣候決定論 215
- Clinton, Bill 柯林頓 37
- Clinton administration, nation building
during 柯林頓政府，期間的國家建
造 7
- Coal and Steel Agreement 煤碳與鋼鐵協議
83
- Coastline determinism 海岸線決定論
206, 207-209, 215, 217, 219, 228,
271
- Coevolutionary circle 共同演化圈 228,
231
- Cohen, G. A. 柯恩 239
- Colonialism, effect on global inequalities
殖民主義，對全球不平等的影響
210-11
- Columbian exchange 哥倫布大交換 45
-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倫布 45
-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57, 67, 68; of
cultural forms 文化形式 69; of
nature 自然 69, 223, 231-32
- Commons, suppression of rights to 公
地，抑制權利 68
- Communist hypothesis 共產主義假說
281, 282
-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 Engels)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與恩格斯) 52, 79, 163-64, 174, 195, 282
- 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義 89, 112-13, 197, 279
- Community: achieved 社群：成就的 197; bounded 有邊界的 88, 91;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for 可能性的條件 112; ecological 生態的 200; imagined 想像的 254; money power as 作為金錢權力 197-98; place-based 以地方為基礎的 44, 199-200; sense of 感覺 188; spatio-temporality of 時空性 185
- Community of practice 實踐社群 96
- Competition 競爭 66-67; interterritorial 領域之間 67; interurban 都市之間 66-67
- Comprador neoliberal state 買辦新自由主義國家 70
- Conceptual fields 概念領域 250
-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可能性的條件 42, 141; capitalism and 資本主義 270, 278; for domestication 馴化 203; of experience 經驗 22; geography knowledge as 地理知識 29, 30-31, 42, 99; nature as, for human action 自然，為了人類行動 222-23; physic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 as 自然地理條件 209; space as, for knowing 空間，為了認識 250
- Connolly, William 康諾利 108-109
- Consilience 融貫統合 227
- Consilience* (Wilson) 《融貫統合》(威爾森) 226
- Consumption, suppression of alternative forms of 消費，另類形式的壓抑 68
- Contra movement 反對運動 39
- Cooper, Robert 庫柏 102-103
-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寰宇主義治理 85-87
- Cosmopolitanism: bourgeois 寰宇主義：資產階級 163-64, 282-83; counter 反對的 79; discrepant 有差異的 113-14; education need 教育需求 11-12, 13, 35, 105; elitism of 菁英主義 86; emergence of 興起 94; ethics of 倫理 20-21, 27; of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82-83; fake 冒牌貨 82; human rights and 人權 11-12; intensification of 強化 81; layered 分層化 85-86; liberal 自由主義 114; moral 道德 11, 79-80; nationalism and 國族主義 81; need for new theory of 新理論的需求 80-81; preconditions for cosmopolitan politics 寰宇主義政

- 治的前提 19, 85; pure 純粹的 168;
reemergence of 再起 78-79;
rhizomatic 地下莖 109, 198; rooted
根植 43, 113, 114-15, 116, 117-18,
168, 275; rule of law and 法治 118;
of sentiments 情感 43;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of 時空向度
87; subaltern 從屬者 84, 95-97,
114, 283
- Cosmopolitan law 寰宇主義律法 17-18,
21, 27, 33-34
- Cosmopolitan patriotism 寰宇主義愛國
主義 114
- Cosmopolitics 寰宇政治 80, 117
- Counter-cosmopolitanisms 反寰宇主義 79
- Courbet, Gustave 庫爾貝 143
- Credit system, and debt entrapment 信用
體系與債務圈套 68
- Crisis 危機：參見 Financial crisis 金融
危機
- Critical geography 批判地理學 129
- Critical regionalism 批判的區域主義 179
- Critical sociology 批判社會學 129
- Cronon, W. 克羅農 232-33
- Crony capitalism 裙帶資本主義 63, 106
- Crusoe, Robinson 魯賓遜 98-99, 257
- Cuba 古巴 100
- Culture vs. nature 文化對自然 210-12,
213
- D'Anglas, Boissy 東格拉 39
- Darfur 達佛 34, 96, 118
- Darwinian theory of evolution 達爾文的
演化理論 224, 237
- The Death of Nature* (Merchant) 《自然之
死》(莫欽特) 234
- Debt trap 債務陷阱 69-70
- De Certeau, Michael 迪塞圖 178, 259
- Deep ecology 深層生態學 138, 187, 230,
233
- De Genova, N. 狄吉諾瓦 268-69
- De la Blache, Vidal 白蘭士 170, 218, 220
- Delancy, David 迪藍尼 172-73
- Deleuze, G. 德勒茲 139, 174, 244, 281
- DeLillo, Don 德里羅 177-78, 182
- Democracy: Internet as vehicle for 民
主：網際網路作為載體 109;
paternalistic social 家長式社會 66
- Denationalization 剝奪公民資格 96
- Deracinated liberal theory 孤立的自由主
義理論 49, 256
- Deregulation 解除管制 69
- Descartes, René 笛卡兒 134, 217
- Deshpande, S. 德什潘德 110, 117, 162
- De Soto, Hernando 德索托 53-54
- De Sousa Santos, B. 桑托斯 62, 71, 74,
95, 96-97
- Determinism: biological 決定論：生物的
226-28; climatic 氣候的 215; 亦見

-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論
- Deterritorialization 去領域化 173-74, 194, 244, 275
-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ory 發展經濟學理論 10
- Development theory 發展理論 54
-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辯證唯物論 230
- Dialectics of nature 自然辯證法 230-33
- Dialectics of socio-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社會—生態轉化的辯證法 233-36
- Diamond, Jared 戴蒙 31, 202-207, 233
- Dirlik, A. 德利克 189, 193, 197, 250
- Dispossession, accumulation by 奪取，積累 68-71, 73-74
- Doomsday Survey 末日調查 253
- Droit, R.-P. 多伊特 26, 28
- Dustbowl 黃塵地帶 215
- Eastern Europe,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東歐，財富與收入不平等 60
- East/Southeast Asia, wealth inequalities in 東亞 / 東南亞，財富不平等 60-61
- East Timor 東帝汶 9, 118, 119, 275
-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unintended 生態後果，非意圖的 219
- Ecological utopians 生態烏托邦 232
- Ecology, deep 生態學，深層 138, 187, 230, 233
- Economic reasoning, spatiality effects on 經濟推論，空間性效應 107-109
- Economic theory, conventional 經濟理論，傳統的 64-65
- Economy,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of 經濟，統計再現 265
- Edney, Matthew 愛德尼 47
- Egypt 埃及 54-55, 266
- Einstein, Albert 愛因斯坦 135, 136, 139
- Ejidos, privatization of 共有地，私有化 68
- Elitism 菁英主義 86, 187
- Elster, Jon 埃爾斯特 112
- Elyachar, J. 艾利埃恰 54-55, 162-63
- Eminent domain 國家徵用權 68
- The End of Poverty* (Sachs) 《終結貧窮》(薩克斯) 207-208
- Energy, stored 能量，儲藏的 223-24
- Engels, Frederick: on human victory over nature 恩格斯：論人勝自然 218-19; on moments of struggle 論鬥爭時刻 196
- Enlightenment 啟蒙 6, 35, 46, 100, 119, 222-23
- Enron 安隆 69, 103
- Entangled landscape 纏繞的地景 155
- Environment, meanings of 環境，意義 221

- Environmental causation thesis 環境因果關係論題 203-206, 209-210, 214-15, 233
- Environmental change, anthropogenic vs. natural 環境變遷，人為對自然 218-19
- Environmental commons, global 環境公地，全球 68-69
-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論 126, 213-20, 241-42; challenge and response 挑戰與回應 217, 219; climatic determinism 氣候決定論 215; coastline 海岸線 206, 207-209, 215, 217, 219, 228, 271; defining 定義 19; environmental limits and 環境限制 216-17; human domination of nature 人對自然的宰制 218-19; Kant and 康德 21, 28, 29, 31; possibilist 可能論者 217-18; as racist 作為種族主義者 31; soft form of 溫和形式 242; stop and go determinism 停止與前進的決定論 216, 217
- Environmental history 環境史 31-32
- Epigenesis theory 新生理論 228, 231, 233, 234, 235
- Escobar, Arturo 艾斯科巴 46-47, 114, 168, 188, 229
- Ethical ideals, universal 倫理理想，普遍的 33
- Ethnoscape 族裔景觀 57
- Etzioni, Amitai 艾茲歐尼 197
- Euclidean space 歐幾里德空間 274
- Europe, multiculturalism in 歐洲，多元文化論 83
- European Constitution (2005), resistance to, 歐洲憲法（2005），抗拒 83
- European Union, cosmopolitan character of 歐盟，寰宇主義特性 82-84
- "Events" 「事件」 137, 140
- Evil, banality of 邪惡，平凡無奇 117, 118
- Evil empire 邪惡帝國 118
- Exceptionalism, American 例外論，美國 6
- Exchange value 交換價值 149, 150
- Exclusionary nationalism 排他性國族主義 90-91
-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crease in 行政補償，增加 59
- Exploitation theory 剝削理論 153
- Expulsion, of peasant populations 驅除，農民人口 68
- Exxon 艾克森石油公司 101
- Fascism, place-based theories of 法西斯主義，根基於地方的理論 167
- Failed states 失敗國家 12, 102
- Falk, Richard 福爾克 114

- Fanon, Frantz 法農 43
- Febvre, Lucien 費夫 217
- Feminism, universal 女性主義，普遍的 49-50
-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 商品拜物教 164
- Finance capital 金融資本 57
-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金融危機：2008年 70-71; Asian crisis of 1997-98 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 56, 69, 106; in developing world 開發中世界 66; worldwide debt crisis 全球債務危機 70
- Fixity/motion 固定性 / 移動 174
- Fordism 福特主義 152
- Forestation projects 造林計畫 104
- Foucault, Michel: governmentality theory of 傅柯：治理術理論 257, 258; heterotopia of 異質地方 30, 33, 111, 159-61; Kant and 康德與 6, 22, 25, 194; on space and geography 論空間與地理 30-31; on spatio-temporal ordering 論時空秩序化 156-57, 161
- Four Freedoms 四大自由 6
- Fourier, Joseph 傅立葉 152
- Fourteen Points 十四點計畫 6
- Frankfurt School 法蘭克福學派 219, 230
- Free market 自由市場 8
- 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 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 56
- Free-market globalization 自由市場全球化 51-52
- Free trade 自由貿易 8
- French Revolution 法國大革命 39
- Friedman, Milton 傅利曼 53, 54
- Friedman, Thomas: on flat world 佛里曼：論扁平世界 106, 222-23; on globalization 論全球化 51-52; on neoliberalization 論新自由主義化 58; on neoliberal reforms 論新自由主義改革 61; on property right 論財產權 54-55
- Gendered spatio-temporality 性別化的時空性 255
- Gender relations,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性別關係，歷史地理 138, 214
-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 232
- Genius loci* concept 場所精神概念 180-82, 193, 218
- Geographical concept-metaphors 地理的概念—隱喻 271
-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地理決定論 108
- Geographical knowledge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地理知識，歷史意義 130-31
- Geographical theory: uses of 地理理論：

- 用途 279-80; 亦見 Individuation 個體化; State theory 國家理論
- Geographic knowledge: as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地理知識：作為可能性的條件 29, 30-31, 42, 99; historical knowledge vs. 歷史知識 31-32
- Geography: critical 地理學：批判的 129; as distinctive discipline vs. knowledge 作為特殊學科 vs. 知識 128-29; earth sciences tradition of 地球科學傳統 127, 128; essentialist definition of 本質論定義 127-28; man-land tradition of 人地傳統 126-27; spatial tradition of 空間傳統 126, 249; studies tradition of 研究傳統 126
- Geography of Nowhere* (Kunstler) 《烏有之鄉地理學》(肯斯勒) 188
- George, Susan 喬治 63
- Gibson-Graham, M. 吉柏森-葛拉罕 229
- Glacken, Clarence 葛雷肯 29, 127, 130, 213, 235
-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資本主義 65-66, 131, 188
- Global citizenship 全球公民資格 79-80, 117
- Global corporations, regulation of 全球企業，管制 93-94
- Global environmental commons 全球環境公地 68-69
-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 85-87
- Global inequalities, causes 全球不平等，原因 209, 210-12, 213
-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全球化：由下而上 95-96; freemarket globalization 自由市場全球化 51-52; meaning of 意義 57-58; three moments of U.S. 三個美國時刻 6
- Global-local relations 全球-在地關係 151
- Global poverty problem 全球貧窮問題 104
-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79
-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13, 103-104
- God, Newtonian/Cartesian view of 上帝，牛頓/笛卡兒觀點 222
- Gordon, Mary 戈登 178
- Governance ideology 治理意識形態 71
- Governmentality theory 治理術理論 162, 257-58
- Graeber, D. 葛瑞伯 163
- Gramsci, Antonio 葛蘭西 79, 168, 238
-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GROs) 草根組織 72, 75-76
- Gray, John 葛瑞 63-64, 76
- Great chain of being 存有的巨鏈 213
- Greece, ancient 希臘，古代 181-82
- Greek philosophy 希臘哲學 116

- Greenhouse gases 溫室氣體 13
- Gross, David 葛洛斯 55
- Grosz, E. 葛洛茲 138
- Grotius, Hugo 葛洛休斯 53, 55, 89-90, 92
- Ground-nut scheme 花生計畫 104
- Ground truthing 地面實況調查 35
- Ground Zero, conception of absolute space of 歸零地，絕對空間概念 146-48
- Guantanamo Bay 關塔那摩灣 3, 270
- Guanxi* 《關係》 62-63
- Guattari, F. 瓜塔里 139, 174
- Guns, Germs, and Steel* (Diamond) 《槍砲、病菌與鋼鐵》(戴蒙) 202-204; 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 in 集中化 / 去集中化 206-207; competition between/conquest of human groups 人類群體之間的競爭 / 征服 204-205; environmental causation thesis and 環境因果關係論題 203-206, 209, 210, 214-15, 233; maps in absolute space 絕對空間裡的地圖 206; migratory movements 遷移 205; plant and animal domestications 植物與動物馴化 203-204, 227-28; spatial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創新的空間擴散 205
- Gutkind, Herbert 古特金德 234, 235
- Habermas, Jürgen 哈伯瑪斯 238
- Halliburton 哈利伯頓 105
- Hannerz, Ulf 漢娜 169
- Hanseatic League 漢撒同盟 191
- Haraway, D. 哈洛威 241, 242
- Hardt, Michael 哈特 233, 272, 281
- Harley, J. B. 哈利 126
- Hartshorne, R. 哈茲宏 3
- Hawken, P. 霍肯 242
- Hedge funds 避險基金 59, 69
-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 44-45, 116-17, 118; essentialist theory of place of 地方的本質化理論 180, 194
- Held, David 黑爾德 89, 97; cosmopolitanism of 寰宇主義 105-106; on hermeneutical complexity 論詮釋的複雜性 85-86
- Hermeneutics 詮釋學 85-86, 105-106
- Hérodote* 《希羅多德》 30, 31
- Heterotopia 異質空間 30, 33, 111, 159-62
- Himmelfarb, Gertrude 希莫爾法布 167-68
- Hindus 印度人 48, 63, 277
- Hindutva (Hindu-ness) 印度國族主義者 (印度人) 110-11, 162
-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歷史地理唯物主義 232
- Historical geography 歷史地理 32
- Historical knowledge vs. geographic

- knowledge 歷史知識 vs. 地理知識 31-32
- History, and memory 歷史，與記憶 178-79
- History of Cartography* (Woodward) 《製圖史》(伍德沃德) 126
- Holloway, John 哈洛威 281-82
- Hospitality, right of 款待，權利 18
- Howard, Ebenezer 霍華德 130-31
- Hugo, Victor 雨果 279-80
- Human development, state control effect on 人類發展，國家控制效應 209-10
- Human labor process 人類勞動過程：參見 Method of moments 環節方法
- Human nature concept 人性概念 225-29
- Human rights: advocacy groups and 人權：倡議團體與 72, 73; cosmopolitan principles and 寰宇主義原則 11-12; under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底下 72-75; universality-application tension 普遍性—應用張力 10
- Hume, David 休姆 6, 28
- Huntington, Ellsworth 杭亭頓 215
- Hurricane Katrina 卡崔娜颶風 215
- IBM 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63
-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dia 認同：印度的建構 110-11; as immaterial but objective 作為無形但客觀的 137-38
- "I-It" objective view 「我—它」客觀觀點 234
- Imagined space 想像空間 111
- Imperial rule, justification of 帝國統治，正當化 39-40
- India: average per capita income increase in 印度：人均收入增加 61; BJP Hinduist national party in 印度國大黨 110-11, 199; constructed myth of Indian statehood 建構的印度國家神話 49, 277-78; denial of legitimacy of British occupation 拒絕英國佔領的正當性 42-43; dispossession of peasants in 農民剝奪 68;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認同建構 110-11; as imperial vs. indigenous conception 作為帝國 vs. 對本土的概念 47-49, 50; justification for denial of rights to natives 拒絕原住民權利的正當理由 39; Narmada Dam project 納瑪達大壩計畫 103; wealth equalities in 財富平等 61
- Individual rights 個人權利 72-73
- Individuation theory 個體化理論 252-60; absolute bourgeois administrative power 絕對資產階級的行政權力 258; absolute space and time 絕對空間與時間 252-53; autonomous individual 自主個人 257; isolated individual 孤

- 立的個人 256-57; positionality 位置 255-56; relational spatio-temporalities 關係性的時空性 253-55; relative space-time 相對時空 253, 255; situatedness 情境性 256-57
- Indonesia 印尼 61, 62, 229
- Industrial capitalism 工業資本主義 54, 224
- Infantilizing, of whole peoples 整個民族的幼稚化 39-40
-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emple) 《地理環境影響》(森普爾) 213-4
- Inner knowledge 內部知識 21
- Inner subjectivities 內部主體性 171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智慧財產權 68
- Intelligent design 智慧設計論 126, 213
- Internal relations, role in dialectical analysis 內部關係，辯證分析裡的角色 137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國際刑事法庭 72, 94, 102
- International Forum of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國際論壇 64
- Internationalism 國際主義 7, 39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國際貨幣基金 56, 57, 62, 63, 70
- Internet: cross-border politics and 網際網路：跨界政治 87; possibility as vehicle for democracy 作為民主載體的可能性 109
- Iran 伊朗 100
- Iran-Contra scandal 伊朗軍售醜聞 101
- Iraq 伊拉克 107; failure of U.S. in 美國的失敗 9-10; 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 in 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 56; human rights in 人權 3; U.S. efforts to democratize 美國的民主化努力 7, 8; war with Iran 與伊朗的戰爭 100
- Iraq War 伊拉克戰爭 8, 82, 101, 273-74
- Isolationism 孤立主義 7
- Israel 以色列 173
- Italy 義大利 158-59, 199
- "I-Thou" relational view 「我—汝」關係性觀點 234
- Joyce, James 喬伊斯 274
- Judgment vs. intelligence 判斷 vs. 智慧 24
- Justice 正義 27, 111-12
-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Young) 《正義與差異政治》(楊恩) 89, 94-95
- Kant, Immanuel: academic career 康德：學術生涯 18-19, 21; Anthropology lectures 人類學演講 19, 21-22, 23-24, 25, 30; on citizenship 論公民資格 25, 26, 27; on colonialism 論殖

民主主義 28;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argument of 可能性條件的論證 22, 29, 30-31, 42, 99, 209; on cosmology 論宇宙論 21, 31-32; on cosmopolitan ethic 論寰宇主義倫理 20-21, 27; on cosmopolitan law 論寰宇主義律法 17-18, 21, 27, 33-34; definition of the Geography 地理學的定義 32; dualisms of 二元論 21, 225; on enlightenment 論啓蒙 22-23; on gender and race 論性別與種族 25; on geographic vs. historical knowledge 論地理 vs. 歷史知識 31-32; Geography lectures 地理學演講 19-20, 21, 26-29; on human maturity/immaturity 論人類成熟 / 未成熟 22-23, 25, 27, 33, 39; on judgment/intelligence 論判斷 / 智慧 24; on metaphysics 論形上學 20; on national identity 論國族認同 25; on nationhood by common descent 論共同起源的國族特質 25-26; notion of justice 正義觀念 27; on objective vs. subjective meanings 論客觀 vs. 主觀意義 171; on outer/inner knowledge 論外部 / 內部知識 21; on pacific federation vs. peace treaty 論和平邦聯 vs. 和平條約 83; prejudicial depictions of

customs and habits 風俗與習慣的偏見 描述 26-27; problems with anthropology/geography of 人類學 / 地理學的問題 34-35; on revival of science of geography 論地理科學復興 11; on right to hospitality 論款待權 27, 76, 109; on right to refuse entry 論拒絕進入權 27; sense of *gens* 氏族感 44; "sensitivities" to people and places 對人與地方的「敏感」 110; on 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論時間與空間的分離 47, 161; on species being 論類存在 204; on transcendent definition of freedom 論自由的超越性定義 24; on universal ethical ideals 論普遍倫理理想 33; on virtual individual 論虛擬個體 77

Katrina (hurricane) 卡崔娜 (颶風) 215

Katz, Cindi 卡茲 191, 198, 250

Kaviraj, S. 凱維里居 278

Kissinger, Henry 季辛吉 119

Klimt, Gustav 克林姆 274

Knowledge: geographic vs. historical 知識：地理 vs. 歷史 31-32; local 地方 33, 166-67

Knowledge, geograph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foundational propositions and 知識、地理與人

- 類學：基本命題 107-108; role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在環境政治裡的角色 103-105; uses of 用途 105-107
- Kohn, Margaret 柯恩 157-59, 162, 194
- Koopmans, T. 庫普曼斯 107-108
- Kosovo 科索沃 7, 11
- Krugman, Paul 克魯曼 108
- "K Street" lobbyists 「K 街」說客 53, 63
- Kunstler, R. 肯斯勒 188
- Labor market: increase in numbers worldwide 勞動市場：全世界的數量增加 61; privatization of 私有化 68
- Las Meniñas* (painting) 《侍女圖》(繪畫) 143
- Latin America, neocolonialism in 拉丁美洲，新殖民主義 39, 45
- Latin American studies 拉丁美洲研究 269
-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awls) 《萬民法》(羅爾斯) 90-91
- Lefebvre, H. 列斐伏爾 141-42, 184, 188, 191; ensemble concept of 整體概念 244; on everyday life 論日常生活 238; on heterotopic spaces 論異質的空間 194-95; on isotopy-heterotopy difference 論同質—異質差異 161-62; on World War I 論第一次世界大戰 274
- Left politics 左翼政治 281
- Leibniz, Gottfried 萊布尼茲 32, 137, 139, 140, 154, 222
- Lenin, Vladimir 列寧 152
- Levins, R. 萊文斯 224, 232
- Lewontin, R. 勒文廷 224, 232
- Liberal capitalism 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182, 185
- Liberal hawks 自由主義鷹派 82
- Liberal international idealism 自由主義國際理想主義 7
- Liberalism 自由主義 37-38, 41
- Liberal theory, deracinated 自由主義理論，孤立的 49, 256
- Liberal universalism 自由主義普遍主義 44-45
- Liberating spaces 解放空間 280-83
- Libertarianism 自由意志論 8
- Libya 利比亞 100
- Living tradition 鮮活的傳統 180
- Local conditions, as justification for domination 地方條件，作為支配的正當化 38-39
- Localism 地域主義 114, 198
- Local justice 地方正義 112
- Local knowledge 地方知識 33, 166-67
- Locke, John 洛克 4, 5, 6, 14, 257

- Loukaki, A. 羅卡基 181
- Lovejoy, Arthur 洛夫喬伊 220
- Luce, Henry 陸斯 12
- Maastricht Accord 馬斯垂克條約 83
- Malthus, Thomas 馬爾薩斯 209
- MANGOs 市場取向的非政府組織 94
-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symposium) 「人在改變地球面貌上的角色」(研討會) 234-36
- Manufacturing Consent* (Burawoy) 《製造甘願》(布若威) 152
- Maps, relative truth of 地圖, 相對真實 136
- Marcuse, Herbert 馬庫斯 219
- Marin, L. 馬林 160
- Market of dispossession 奪取的市場 55, 163
- Markets of dispossession* (Elyachar) 《奪取的市場》(艾利埃恰) 162-63
- Marsh, George P. 馬許 218, 236
- Marx, Karl 馬克思 21; on capital value 論資本價值 246; on freedom 論自由 24; on liberal political economy 論自由主義政治經濟 98-99; on materialism of natural science 論自然科學唯物論 223; on moments of struggle 論鬥爭時刻 196; on rights 論權利 75; on socio-ecological relations 論社會—生態關係 236-37; on technology 論科技 237, 239-40; on tension between fixity/motion 論固定 / 移動張力 174; value theory of 價値理論 149-52, 163-64
- Marxist exploitation theory 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 153
- Massey, D. 瑪西 189
- May, J. 梅 19, 33
- McCarthyism 麥卡錫主義 235
- Measurement, dependence on frame of reference 測量, 取決於參照架構 136
- Médécins sans Frontières 無國界醫生 74
- Mediascape 媒體景觀 57
- Mehta, Uday Singh 梅塔 37, 38, 106; on fluidity of boundaries 論邊界流動性 43; on integrity of experience 論經驗的完整性 42; on moral judgment 論道德判斷 43-44, 46; on political integrity of nonconsensual societies 論非共識社會的政治誠信 41-42; on politics of exclusion 論排他性政治 39-40
- Mellon, Andrew 梅隆 70
- Merchant, Carolyn 莫欽特 234
- Metaphorical usages of place 地方的隱喻用法 170
- Metatheory 後設理論 33

- Method of moments 環節方法 236-47;
 activity of production 生產活動 238;
 asymmetries among 其中的不對稱
 243; influence on place formation 對
 地方形構的影響 244-45; mental
 conceptions of world and 世界的心
 智概念 239, 242, 245; nature and 自
 然 237-38; relations among 其間的
 關係 239-44; second nature and 第
 二自然 237-38; social relations 社會
 關係 238-39; socio-ecological
 relations and 社會—生態關係 236-
 37; sustenance of daily life 日常生
 活的維繫 238; technological
 moment 科技環節 237, 239-42
- Mexican Chicago 墨西哥裔的芝加哥
 268-69, 273
- Mexico 墨西哥 60, 66, 68
- Michaels, Walter Benn 麥克爾斯 115
- Microbiology 微生物學 233
- Microcredit institution 小額信貸制度 163
- Microenterprise economy 微型企業經濟
 54-55
- Microfinance 小額信貸 54-55, 95
- Mignolo, Walter 米格諾羅 45-46
- Migration: Europe and 遷移：歐洲 83;
 Mexico and 墨西哥 268-69, 273
- Miliband, Ralph 米利班德 262
- Militant particularism 戰鬥性特殊主義
 179, 196
- Militaristic imperialism 軍國主義帝國主
 義 8
- Military humanism 軍事人道主義 11, 82,
 91, 93
- Mill, John Stuart 彌爾 38; defense of
 imperial rule over India 帝國統治印
 度的辯護 256; paternalism of 家長主
 義 44; on self-governance 論自我治
 理 40
- Mills, C. Wright 米爾斯 267
- Mitchell, Timothy 米切爾 54, 263-66
- Modern states 現代國家 102
- Mohanty, Chandra 莫漢蒂 49-50
- "Moments" 「環節」 137; 亦見 Method of
 moments 環節方法
- Monads 單子 137
- Money, relational value of 貨幣·相對價
 值 151-52
- Monnet Plan 莫內計畫 83
- Monopoly rents 壟斷租金 67
-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孟德斯鳩 (夏爾勒—路易·德·
 俗孔達) 28, 213
- Mont Pelerin Society 朝聖山學會 53
- Moore, D. 摩爾 155, 156, 157, 176, 177,
 190-91
- Morley, D. 莫利 178
- "Mortals" concept 「凡人」概念 186

- Mortgage foreclosures 抵押貸款止贖 68
- Motion/fixity 移動 / 固定 174
- Multiculturalism, in Europe 多元文化論, 歐洲 83
-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跨國資本主義 131, 147
- Mumbai, Shiv Sena movement in 孟買, 濕婆軍黨運動 44
- Mumford, Lewis 孟福 235
- Mun, Thomas 門恩 265
- Münch, Edvard 孟克 143
- Mutations, of diseases 突變, 疾病 243-44
- Myth of statehood 國家的神話 49, 277-78
- Naess, Arne 奈斯 139-40, 233
- The Names* (DeLillo) 《名字》(狄利羅) 177
- Narmada Dam project 納瑪達大壩計畫 103
- National character theory 國族性格理論 77, 78
-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7, 167
- Nationality, relational 國族性, 關係的 96
- National Socialism 國家社會主義 117
- National socialism, place-based theories of 國家社會主義, 根基於地方的理論 167
- Nation building 建國 7
- Nation state: antinationalism and 國族國家: 反國族主義 92-93; changing role of 角色的變化 87-88; rehabilitation of traditional 傳統的復興 275
- Native populations, legitimacy of domination of 原住民, 統治的正當性 38-39
- "Natural disasters" 「自然災害」 239
- Natural law 自然法 222
- Natural resources: appropriation of 自然資源: 挪用 68; defining 定義 235
- Nature and culture 自然與文化 210-12, 213; boundary between 其間的邊界 230-31; coevolution of 共同演化 234
- Nature concept 自然概念 220-25; as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for human action 作為人類行動的可能性條件 222-23; Enlightenment science construction of nature 自然的啓蒙科學建構 222-24; meanings of nature 自然的意義 220-21
-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Hartshorne) 《地理學性質》(哈茲宏) 32
- Negative externalities 負面外部性 275
- Negri, Toni 內格里 139-40, 233, 272, 281
- Neocolonial violence, in Africa 新殖民暴力, 非洲 104

-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義 7, 64
- Neoliberal capitalism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9, 79-80, 97, 115-16, 185, 194
- Neoliberalism: alternatives to 新自由主義：其他出路 64; commodification under 商品化 57, 67, 68-69; competition under 競爭 65-67; comprador neoliberal state apparatus 買辦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 70-71; criticism of 批評 63-64; de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under 政治權力的去中心化 66; deregulation under 解除管制 69; financial institution rescues under 金融機構救援 70-71; financial manipulation under 金融操作 69-70; human rights and 人權 72-75; inappropriateness of policies of 政策的不合時宜 61-62; income/wealth disparities under 收入／財富差異 58-61; inherent geographical character of 固有的地理特質 64-65; neglect of cultural conditions by 忽視文化條件 62-63;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under 私有財產權 8, 53-55, 68; privatization under 私有化（參見 Privatization 私有化）；promise vs. reality 承諾 vs. 現實 56-57; rule of law under 法治 2, 8, 73; shock therapy 震撼療法 60, 106, 207; success of 成功 67
- Neoliberal utopianism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 7-8
- Newton, Isaac 牛頓 135, 137, 265
- Newtonian mechanical view of world 牛頓式機械世界觀 222
- Newtonian view of separate time and space 牛頓的時空分離觀 32, 33, 135
- Nicaragua 尼加拉瓜 39, 101, 195
- Non-Euclidean spherical geography 非歐幾里德球面地理 135-36
-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非政府組織 72, 73, 94
- Norberg-Schulz, C. 諾柏－舒茲 180, 181, 193
- North Korea 北韓 100
- Nozick, Robert 諾齊克 256
- Nussbaum, Martha 努斯鮑姆 26, 29, 84; on antinationalism and nation state 論反國族主義與國族國家 92-93; capabilities approach 能力取向 90-93, 221-22; on collapse of values 論價值崩潰 119; on cosmopolitanism education need 論寰宇主義教育需求 11-12, 13, 35, 105; criticisms of 批評 164-65, 167-68, 169; moral cosmopolitanism and 道德寰宇主義

- 與 11, 79-80; on preconditions for cosmopolitan politics 論寰宇主義政治前提 19, 85; on rehabilitation of traditional nation state 論傳統國族國家的復興 275; on relational loyalties 論關係性忠誠 163; on Stoics 論斯多葛學派 195-96
- Obama, Barack 歐巴馬 278-79
- OECD countries,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財富與收入不平等 60
- Offshoring 境外 57
- "Of Other Spaces" (Foucault) 〈論異類空間〉(傅柯) 159-61
- Ollman, B. 歐爾曼 137
- 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 (Hippocrates), 《論空氣、水與地方》(希波克拉底) 126
- Ong, Aihwa 王愛華 71, 88
- On the Jewish Question* (Marx) 《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 257
- Open and closed places 開放與封閉的地方 188-94
- Oppositional politics 對立政治 13, 42, 49, 64, 73-76, 198
- Oppression, types of 壓迫，類型 89
- Order Out of Chaos* (Prigogine and Stenger) 《撥亂反正》(普里高津與史騰格爾) 224
- Outer knowledge 外部知識 21, 171
-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Bourdieu) 《實作理論大綱》(布迪厄) 255
- Paasi, A. 帕西 172
- Pacific federation vs. peace treaty 和平邦聯 vs. 和平條約 83
- Pagden, Anthony 佩格登 45
- Panopticon 全景敞視建築 30, 161
- Paradigm shifts, in sciences 典範轉移，科學界 225
- Paris, relationality of 巴黎，關係性 192-93, 279-80
- Parochialism 地域主義 198
- Passports 護照 265-66
- Pataki, George 帕塔基 147
- Paternalistic social democracy 家長式社會民主 66
- Patriot Act 愛國者法案 3
- Pattison, William 帕蒂森 125-27, 128, 129, 132, 249
- Peace treaty vs. pacific federation 和平條約 vs. 和平邦聯 83
-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Williams) 《黑山居民》(威廉斯) 148
- Permanences 恆存 137, 190-92, 197, 250
- "Perpetual Peace" (Kant) 〈永久和平〉

- (康德) 17, 117-18
- Peru 祕魯 54
- Petty, William 派蒂 253, 265
- Phenomenology 現象學 116, 117, 166, 171, 175, 183, 187
- Place, reification of 地方，具體化 280-81
- Place-based politics 根基於地方的政治 195, 196
- Place-bound communitarian solutions 以局限於地方的社群主義解答 196-97
- Place construction 地方建構 184, 187-88, 191; anarchists and 無政府主義者 199-200, 272-73; to displace nation-state 取代國族國家 199-200; under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197-98; power of place and 地方的權力 198-99; 亦見 Places, regions, territories 地方、區域、領域
- Places, regions, territories: descriptive terms for bounded space 地方、區域、領域：有邊界空間的描述性用語 169-70; on "dwelling" 論「居住」 183-85; ecological sentiments and place 生態情感與地方 186-87; *genius loci* concept 場所精神概念 180-82, 193, 218; Heidegger and 海德格 182-88; metaphorical usages of place 地方的隱喻用法 170; "mortals" concept 「凡人」概念 186; nation concept 國族概念 173; open and closed places 開放與封閉的地方 188-94; place-based environmentalist politics 根基於地方的環境主義政治 184-85; place vs. territory 地方 vs. 領域 175-76; politics of place 地方政治 194-201; preference of region over space 偏好區域甚於空間 170;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區域的與省級的 170; region and place 區域與地方 171; relationality of place 地方的關係性 177-82; species being concept 類存在概念 186; state concept 國家概念 173; territory concept 領域概念 171-75; on world market 論世界市場 182-83; 亦見 Place construction 地方建構
- Pluralism 多元主義 91
- Poetics of Space* (Bachelard) 《空間詩學》(巴舍拉) 178
- Political theory, false universals of 政治理論，虛假的普遍性 108
- Politics, role of space in 政治，空間的角色 157-65; heterotopia 異質地方 159-61; isotopy-heterotopy difference 同質—異質差異 161-62; processes and 過程 162-63; resistance and 抵抗

- 158-59; symbolic space 象徵空間
158
- Politics of difference 差異政治 97
- Pollution rights 污染權 104
- Population density/distribution 人口密度
/ 分布 216-17
- Populist capitalism 民粹主義資本主義 55
- Populist nationalism 民粹主義國族主義 7
- Positioning, relational 定位，關係的 281-82
-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佔有性個人主義 82
- Postdevelopmental theory 後發展理論 46
- Postmodern states 後現代狀態 102-103
- Poulantzas, Nicos 普蘭查斯 262, 278
- Poverty, effects of private property on 貧
窮，私有化財產的影響 54-55, 104
- Preemptive war, against Iraq 先發制人的
戰爭，對抗伊拉克 8
- Premodern states, and rule of law 前現代
國家，與法治 102
- Prigogine, I. 普里高津 224
- Private property: effects on poverty 私有
財產：對貧窮的影響 54-55, 104;
under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8,
53-55, 68
-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 公私夥伴關係
71
- Privatization: aim of global 私有化：全
球目標 68-69; in Iraq 在伊拉克 56;
of labor market 勞動市場 68
- Probabilistic theory 可能性理論 224
- Process-based philosophies 根基於過程
的哲學 232
- Production, suppression of alternative 生
產，壓抑其他出路 68
- Productivist approach 生產至上論取向
217
- Progress doctrine 進步信條 258
- Promethean approach 普羅米修斯取向
217, 232
- Propaedeutic, 預備知識 20, 29, 30, 105,
117, 121, 202-203, 259, 272
- Protectionism 保護主義 7, 52
- Ptolemy 托勒密 126
-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270
- Quantum theory 量子理論 139, 233
- Racialized spatio-temporality 種族化的時
空性 255
- Racism 種族主義 28
- Radical developmentalism 基進的發展主
義 39
-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基進的環境主
義 226
- Radical Space* (Kohn) 《基進空間》(柯
恩) 157-59
- Rancière, J. 洪席耶 84, 153, 281
-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選擇理論 109

- Ratzel, Friedrich 拉茲爾 213
- Rawls, John 羅爾斯 28, 90-91
- Reagan, Ronald 雷根 56, 101
- Reclus, Elisée 雷克呂 187, 283
- Reductionism, biological 簡化論，生物學 226-28, 229
- Ree, Jonathan 黎 117
- Regions 區域：參見 Places, regions, territories 地方、區域、領域
- Reitz, Edgar 瑞茲 178
- Relational nationality 關係的國族性 96
- Relational positioning 關係的定位 281-82
- Relative permanences 相對恆存 250
- Relative space 相對空間 135-36
- Relph, Ted 瑞爾夫 187
- Republicanism, of G. W. Bush 共和主義，布希 7
- Res nullius 無主物 4
- Reterritorialization 區域化 131, 173-74, 194, 244, 275
- Rhizomatic cosmopolitanism 地下莖寰宇主義 109, 198
- Ricardo, David 李嘉圖 209
- Risk 風險 59, 67, 69, 70, 81, 82
- Robbins, Bruce 羅賓斯 80
- Robbins, K. 羅賓斯 178
- Rockefeller, John D. 洛克菲勒 39
- Roosevelt, Franklin D. 羅斯福 3-4, 6, 105
- Rooted cosmopolitanism 根植寰宇主義 43, 113, 114-15, 116, 117-18, 168, 275
- Rossi, Aldo 羅西 181
- Rouge states 赤色國家 12, 102
- Rousseau, Jean Jacques 盧梭 6, 213
- Roy, Arundhati 羅伊 63
- Rule of law: as American value 法治：作為美國價值 2, 8; cosmopolitan 寰宇主義 118; international 國際的 5, 8-9, 37, 48, 78, 102; neoliberalism and 新自由主義 73; premodern states and 前現代國家 102
- Rumsfeld, Donald 倫斯斐 274
- Russia, market reform in 俄羅斯，市場改革 60
- Sachs, Jeffrey 薩克斯 10, 31, 62, 106, 207-208; environmental causation thesis and 環境因果關係論題 209, 210, 214, 233
- Sale, Kirkpatrick 塞爾 188
- Sassen, Saskia 薩森 79, 87-88, 96
- Sauer, Carl 騷爾 32, 45, 46, 236
- Schaeffer, F. 謝弗 32-33
- Schorske, Carl 休斯克 281
- Scott, James 史考特 270
- The Scream* (painting) 《吶喊》(繪畫) 143

-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熱力學第二定律 224
-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Foucault), 《安全、領域、人口》(傅柯) 161
- Sedimented banalities of dwelling 積澱樓居之平凡無奇 117
- Self-help housing, in favelas 自助式住宅, 貧民區 55
- Semple, Ellen C. 森普爾 213-14
- Serbia 塞爾維亞 11, 119
- Sex industry 性產業 68
- Shapiro, M. 夏皮羅 109-110
- Shias 什葉派 99, 101
- Shiv Sena movement 濕婆軍黨運動 44
- Shock therapy neoliberalism 震撼療法新自由主義 60, 106, 207
- Simultaneity, in physical universe 同時性, 物理宇宙 136
- Singularities 奇異特質 43
- Situated hermeneutic complexity 情境化詮釋學的複雜性 97
- Situatedness 情境性 105-106
- Slave trade 奴隸貿易 68
- Slim, Carlos 史林姆 60
- Smith, Adam 亞當斯密 5, 6, 53, 55, 257
- Smith, Neil 史密斯 12, 229, 231-32, 244
- Social consciousness 社會意識 245
- Social democracy, paternalistic 社會民主, 家長式的 66
- Socialist universalism 社會主義普遍主義 44-45
- Social reproduction 社會再生產 238, 242
- Sociobiology 社會生物學 226
- Socio-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社會—生態轉變 233-236
- Somalia 索馬利亞 7
- Soper, Kate 索珀 221
- South Asia, postcolonial 南亞, 後殖民 45-46
- South Korea 南韓 66
- Soviet Union, former: agronomy in 前蘇聯: 農學 218; as evil empire 作為邪惡帝國 100; reterritorialization in 再領域化 275
- Space: as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for knowing 空間: 作為認識的可能性條件 250; 亦見 Absolute space 絕對空間; Spacetime framework 時空架構; Spatio-temporal matrix 時空矩陣
- Spaces of Hope* (Harvey) 《希望的空間》(哈維) 195
- Spacetime framework: heterotopia 時空架構: 異質地方 159-61; interplay among spatio-temporal frames 時空架構裡的交互作用 150-51; isotopy-heterotopy difference 同質—異質差異 161-62; politics and 政治 157-65; processes and 過程 162-63;

- resistance and 抵抗 158-59;
- spacetime framework, first dimension 時空架構，第一向度 134-41; symbolic space 象徵空間 158; 亦見 Spacetime framework, first dimension 時空架構，第一向度; Spacetime framework, second dimension 時空架構，第二向度
- Spacetime framework, first dimension 時空架構，第一向度 134-41; absolute space 絕對空間 134; direct measurement in 直接測量 138-39; processes 過程 136-37; relational spacetime 關係性時空 137-40; relative space 相對空間 135-36; relative spacetime frameworks 相對時空架構 134, 136
- Spacetime framework, second dimension 時空架構，第二向度 141-44; material space 物質空間 142, 143-44; space as conceived 感知的空間 142-44; space as lived 生活的空間 142-44
- Space vs. place 空間 vs. 地方 46
- Spanish colonialism 西班牙殖民主義 45
- Sparke, M. 史巴克 271
- Spatc, Oscar 史佩特 217
- Spatial plays 空間運作 160
- Spatio-temporal chaos 時空混亂 155-56
- Spatio-temporal matrix 時空矩陣 145f, 148-54; class consciousness concept 階級意識概念 153; dynamics of matrix of 矩陣動態 154-57; relationality of space 空間的關係性 148-49; value concept in 價值概念 149-52; work concept in 工作概念 152-53; worker aspirations in 勞工抱負 153-54
- Species being concept 類存在概念 186
- Spinoza, Baruch 史賓諾莎 139, 140, 230, 233
- Spoehr, Alexander 史波荷 235, 239
- Stalin, Joseph 史達林 230
- State-economy divide, blurring of 國家經濟區分，模糊化 266
- Statehood, myth of 國家，神話 49, 277-78
- State sovereignty 國家主權 276
- State theory 國家理論 260-73; absolute qualities of state 國家的絕對性質 276; defining 定義 268-69, 279; denial of relevance of 否定其相關性 272; geographical 地理的 270-71; immaterial qualities of 非物質特性 266-67, 277; materiality of the state 國家的物質性 261-63; metaphysical effect of practices of state 國家實踐的形上效果 263-65; physical frontier

- of state 國家的物理邊境 264;
 reification of state 國家的具體化
 261-63, 265-67, 274-75; relational
 idea of state/nation 國家 / 國族的關
 係性概念 277-78; in relational
 spacetime 關係性時空 266; relative
 positionality of state 國家的相對位置
 277; state as process of place
 construction 國家作為地方建構過程
 272-73; state as transcendental 超越
 性的國家 277;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of state 國家的統計再
 現 265
- Stenger, I. 史騰格爾 224
- Stiglitz, Joseph 史蒂格利茲 62
- Stoics 斯多葛學派 40, 88, 195
- Stokes, Eric 史托克斯 37
- Stop and go determinism 停止與前進的
 決定論 216, 217
- Strabo 斯特拉博 126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Kuhn) 《科學革命的結構》(孔恩)
 224
- The Study of History* (Toynbee) 《歷史研
 究》(湯恩比) 217
- Subaltern cosmopolitanism 從屬者寰宇
 主義 84, 95-97, 114, 283
- Sunnis 遜尼派 99, 101
- Symbolic capital 象徵資本 67
- Symbolic learning systems 象徵學習系統
 242
- Symbolic places 象徵地方 180
- Taliban 塔利班 147
- Taylor, Griffith 泰勒 216-17
- Taylor, P. 泰勒 173
- Technoscape 科技景觀 57
-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 德日進 235
- Temperament 性情 23, 256
- Territorial imperative 領域要務 171-72,
 174
- Territorialization 領域化 212, 244
- Territories 域領：參見 Places, regions,
 territories 地方、區域、領域
- Terrorism 恐怖主義 274
- Thatcher, Margaret 柴契爾 54, 56, 60,
 218, 260, 272
- Thompson, E. P. 湯普森 148
- Time 時間：參見 Absolute space and
 time 絕對空間與時間; Spacetime
 framework; Spatio-temporal matrix
 時空框架：時空矩陣
- Time-space compression 時空壓縮 109
- Toynbee, Arnold 湯恩比 217
-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Glacken),
 《羅德海岸的痕跡》(葛雷肯) 127, .
 213
- Trade barriers, reduction of 貿易壁壘，

- 縮減 57
- Treaty of Westphalia of 1648 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 276
- TRIPS agreement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68
- 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 (Michaels) 《多樣性的困境》(麥克爾斯) 115-16
- Trouillot, R. 托意歐 272
- Truth of being 存在的真相 229
- Tuan, Yi-fu 段義孚 142, 185
- Turin Cooperative Alliance 杜林合作聯盟 158
- Turner, John 透納 55
- Underdevelopment 低度開發 39, 55
- United States: eminent domain in 美國：國家徵用權 68; household debt increase in 家戶負債增加 69
- Universal feminism 普遍性的女性主義 49-50
- Universalism, liberal/socialist 普遍主義，自由主義 / 社會主義 44-45
- Universalism of rights 權利的普遍主義 74-76
- Universalizing projects, problems in 普遍化計畫，問題 8-9
- Universal solutions, as negative utopias 普遍性解答，作為負面烏托邦 9
- Universals-particulars 普遍性—特殊性 10-11
- Universal values 普遍價值 2
- U.N. Millennium project 聯合國千禧年計劃 105
- Urbanization 都市化 235
- The Urban Revolution* (Lefebvre) 《都市革命》(列斐伏爾) 161-62
- Use value 使用價值 149, 150
- Usury 高利貸 68
- Utopia: ecological 烏托邦：生態的 232; neoliberal 新自由主義的 7-8; 亦見 Heterotopia 異質地方
- Values: Bush on American 價值：布希論美國 1, 2, 256; capital value 資本價值 246; collapse of 崩潰 119; exchange value 交換價值 149, 150; as social relations 作為社會關係 149-51; universal 普遍的 2; use value 使用價值 149, 150; value theory of Marx 馬克思的價值理論 149-52, 163-64
- Van de Pitte, F. 凡德皮特 20
- Vatican 梵蒂岡 12, 121, 128, 168, 180
- Velázquez, Diego 維拉斯奎茲 143
- Veneroso, F. 維內羅索 70
- Venezuela 委內瑞拉 39, 100
- Von Hayek, Friedrich 馮·海耶克 53

- Von Mises, Ludwig 馮·米塞斯 53
- Wade, R. 韋德 70
- Walzer, Michael 沃爾澤 28, 89, 111-12, 113, 279
- Washington Consensus 華盛頓共識 95
-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財富與收入不平等 58-61
- Wealth redistribution 財富重分配 105
- Wennergren symposium 溫納格倫研討會 234-36, 239-40
- Western Apache 西阿帕契族 175-76, 180
- "What Is Enlightenment?" (Foucault) 〈何謂啟蒙?〉(傅柯) 25, 33-34
- What Is Nature?* (Soper) 《何謂自然?》(索珀) 221
- Whitehead, Alfred N. 懷海德 133, 137, 138, 139, 154, 190, 250
- White man's burden 白人的負擔 39
- Wilkins, Maurice 威爾金斯 233
- Williams, Raymond 威廉斯 148-49, 170, 178, 196, 220, 259
- Wilson, E. O. 威爾森 226-28, 233, 234
- Wilson, R. 威爾森 79-80
- Wilson, Woodrow 威爾森 3, 4, 5, 7, 277
- Wittfogel, Karl 魏特弗格 210
- Wolfowitz, Paul 沃爾福威茨 274
- Woodward, David 伍德沃德 126
- Work, and alienation 工作·與異化 152-53
-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7-8, 56, 57; failed projects of 其失敗的計畫 104-105; individualized private property and 個人化的私有財產與 54; mega-dam projects 超級大壩計畫 13, 103; self-help housing and 自助住宅與 55; Stiglitz forced from 被迫離開的史蒂格利茲 62
- World citizenship 世界公民資格 117
- The World Is Flat* (Friedman) 《世界是平的》(弗里曼) 51-52
- World Social Forum 世界社會論壇 9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世界貿易組織 37, 57, 68
-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戰 173, 274
-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戰 99, 173
- Yeats, William B. 葉慈 274
- Young, Iris M. 楊恩 89, 94-95, 200
- Yugoslavia, former 前南斯拉夫 274, 275
- Zapatistas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 90
- Zimbabwe 辛巴威 155
- Zizek, S. 紀傑克 281
- Zweig, Stefan 茨威格 265